

[俄罗斯] М. И. 齐保鲁哈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Ципоруха) 著

杨海明 译

# 征服西伯利亚

——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Покорение Сибири от Ермака до Беринг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 М. И. 齐保鲁哈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Ципоруха) 著

杨海明 译

# 征服西伯利亚

——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Покорение Сибири от Ермака до Беринг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本书从考古、地域、人文等方面全景式展现了西伯利亚的历史演变，重点描述了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征服、殖民西伯利亚的历史。

### 作者简介：

М. И. 齐保鲁哈，俄罗斯历史学家，1927年生于基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同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苏军，曾在“拉扎里奥夫将军号”巡洋舰服役。1948年，被授予中尉军衔。1966年，转到位于莫斯科近郊太阳戈尔斯克城的海军中央机关所属技术器械基地中心工作。主要作品有《环球扬帆》《被遗忘的俄国海洋研究者》《黑旗之下——海盗和海上劫掠编年史》等。

М. И. Ципоруха  
Покорение Сибири от Ермака до Беринг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ече»  
Москва 2004

---

根据维契出版社莫斯科 2004 年版译出

# 译 序

杨海明

《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一书是俄罗斯历史学家 M. И. 齐保鲁哈 2004 年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介绍了俄国自 11 世纪中叶开始到 18 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征服、殖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中国史学界一直高度关注俄国东扩史（俄国东扩史即哥萨克东扩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有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沙俄侵华史》，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的《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佟冬的《沙俄于东北》等，这些资料初步揭开了哥萨克东扩的面目。但随着俄国档案的逐步解密、中俄两国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时代的发展，我们原有的研究成果已显落后了，迫切需要我们与时俱进，考究一下俄国对哥萨克东扩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便开创我们学术研究的新局面。正可谓“掘本土之宝镜映出其八仙过海之盛况；借他乡之华章织就我百家争鸣之宏图”。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俄国史学界对该段历史的探索脉络。俄罗斯的研究情况经历了一个从大起大落到回归正常的过程。1639 年阿特拉索夫“发现”与入侵堪察加半岛之后过了半个多世纪，俄国已出现了有关哥萨克东扩的著作，比如 Г. М. 米勒尔的《西伯利亚史》、И. Е. 费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到了 19 世纪，歌颂俄国侵华“英雄”的著作更是大量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1844 年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А. П. 瓦西里耶夫的三卷本《外贝加尔俄哥萨克史纲》等。在中苏友好时代，苏联的学者尚能较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 M. H. 波克罗夫斯基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俄国历史概要》和《19 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与战争文集》。随着两国关系的

恶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也殃及了学术研究，当苏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掀起一场大规模的修改历史的运动时，一批为贯彻苏共有关决议的“研究成果”出现了，这里只要提及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两大卷本《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1606—1683 的历史文件”；第二卷，“1686—1691 的历史文件”）就足以见微知著了。苏联解体之后，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国家关系的轨道，史学研究被政治裹挟的现象逐渐淡化，加之学者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跟进和学术资料的丰富，关于俄国哥萨克东扩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М. И. 齐保鲁哈的这部学术专著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问世的。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运用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进行了解读。

本书最大的特点和价值在于它是一部详细介绍哥萨克东扩的专著。关于哥萨克东扩的历史在中外史学、文学作品中涉及的并不少，不说汗牛充栋，也是俯拾皆是。但遗憾的是都散见于各类不以哥萨克东扩为主线的作品中，要么是史书中的一个章节，要么从一个时间点或地点出发介绍这段历史，再不就是从国际关系、外交关系、民族关系的高度对这段历史做理论上的探讨，虽各抒己见、各有见地，使人管中窥豹对哥萨克东扩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或对这段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了解甚多，但终究无法对其全貌从起始、进程到结局有一个了然于胸的把握。令人欣慰的是，齐保鲁哈的《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问世了，它做到了许多人想做而基于各种原因终未下手的事情，弥补了西伯利亚历史研究中完整展现哥萨克东扩这一缺页。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资料广泛、翔实。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当然要“以史为鉴”，因此，俄国的史书——编年史成为作者最钟爱的第一手资料，这其中主要的有涅斯托尔的《系年纪事录》（近译《古史纪年》，王松亭译注，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译者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此外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最新的考古挖掘资料并配以几十幅图片，把西伯利亚几千年来的人文、地理、动物、风俗、人情、宗教、种族、雕刻呈现在世人面前，图片中有新石器时代托木斯克坟场出土的狗熊雕像，女真时代龙头的雕像，古老的雅库特人的箭、头盔和箭

袋，贝加尔附近布里亚特人祖先——古蒙古人部落帐篷的造型和游牧场面，托博尔斯克的索菲娅教堂，克里亚克人的巫师跳神图，1738—1739年海军上校 M. П. 什班伯格船队在千岛群岛和日本海沿岸的航线图等。作者在讲述历史事件时不时引用哥萨克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给沙皇和省督军的奏折、呈文以及沙皇的御旨，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每次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参与人数、所携物资、过程、结局均查有实据，史有出处，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俄国绘图家 C. Y. 列缅佐夫 1701 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集》是俄罗斯西伯利亚考察、探险成果集大成的作品，列缅佐夫通过实地走访，参阅前人和编年史及哥萨克提供的信息编纂的这部地图集几乎囊括了西伯利亚当时所有的地理资料，成为此后俄国和外国西伯利亚研究者、探险者必备的工具书。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并大量引用了这本地图集的内容，使得本书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几千年中不断变换的地名、山川、岛屿、森林、河流、湖泊、海洋、海峡、海湾、河口、山隘、种族、部落，加上前面所引用的史料、图片使得本书不仅是一本史学专著，而且堪称一部西伯利亚历史的活字典和百科全书。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俄国人征服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有新的独到的见解。作者在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的方法对丰富的俄国和外国文字资料、图片、考古发现、当事人的回忆等进行梳理、分析之后，在对某些历史节点的认知上作出了肯定的结论，甚至提出了与前人不甚相同的观点。例如，以前史学界把俄国哥萨克跨越乌拉尔山开始殖民西伯利亚的时间定在 16 世纪中叶，即俄国攻下喀山之后，但此次作者认为，据《系年纪事录》（当时尚未归并俄国的），诺夫哥罗德人越乌拉尔山向当地的萨莫耶德人收贡是 1096 年，而据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说法是，诺夫哥罗德人跨越乌拉尔出征是在 1364 年。在诺夫哥罗德归并俄国后沙皇伊凡三世派出军队跨越乌拉尔山远征是 1483 年。这比通常人们所主张的俄国人跨越乌拉尔山的时间按最晚的推算也早了近一个世纪。至于同中国有关的“新发现”也不少，试举一例：“1681 年之前不仅整个黑龙江沿岸地区，而且乌苏里江沿岸的部分地区都并入了俄国。”此种发现书中甚多，此处

不一一列举，只以这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作为代表。另外作者还对“西伯利亚”一词的起源提出了两种假说：（1）起源于蒙古语；（2）起源于额尔齐斯河与匈奴有关的部族。这与通常流行的起源于“鲜卑”一词有所不同。关于千岛群岛名称的由来，作者认为出自堪察加半岛的伊特里门人和居住在半岛南端的伊特里门人和爱奴人的混血后代居民，这一考证也为俄罗斯合法占有千岛群岛的辩解加了分。关于“贝加尔湖”一词的起源，作者则认为来自雅库特人，在雅库特人的语言中，贝加尔意味着“海”，这与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北海不谋而合。对阿穆尔河（黑龙江）名称的起源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对俄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的展示比较客观，承认了某些历史事实（但在依据这些事实对一些历史事件作评述时也时有违背历史真相之处）。比如作者并不否认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通古斯人、达斡尔人是中国人，他们向清朝皇帝纳贡，也如实描绘了哥萨克对这些中国领土的强行进入和占领，但在谈到中国作出巨大让步而与之签订的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时却又说，在中国人把几乎1万名步兵和骑兵带到尼布楚周围的情况下“莫斯科的代表被迫于1689年8月27日（俄历，公历1689年9月7日，即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同中国签订了《涅尔琴斯克和平条约》”，说“只是经过了170年，当东西伯利亚省长H. H. 姆拉维约夫将军于1858年同中国签订《璦琿条约》时，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土地所属权问题上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恢复”。作者的这种结论同书中罗列的事实发生了冲突，之所以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怪事，我们认为基于以下的原因：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齐保鲁哈必须尊重事实，因此他在书中只能将一些人所共知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如实地描绘出来，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虚假的爱国心使他也只能犯这种看似荒唐实属无奈的低级错误。书中有关中国的章节，此类不实之词还有不少，我们不想与之争辩，我们只看重它的史料价值。

这本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参考价值，是我们向读者推荐此书的理由。当然，书中某些观点也是值得商讨的。比如前言中作者关于俄罗斯性格的自我吹捧，其实书中作者关于哥萨克在攻占西伯利亚土著居民领土时的野蛮杀戮就已经戳穿了自己的夸大之词。另外，显然，这本书的

宗旨是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论证俄国人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现者和征服者，因此也是它真正合法的主人，这在某些方面也同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再有，作者在介绍西伯利亚历史时，所引资料有些出自中国历代史书，由于翻译之误，有的时间、人物不甚准确。然而，瑕不掩瑜，我们还是看重它的史料价值，因为要澄清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就要拿出自己更有说服力的论据，为此就不仅要知己还要知彼，将原版书介绍给国人就是知彼的方式之一。只有这样才能拿出一本经得起国内外专家和历史检验的有关西伯利亚和远东真实面目的著作，才能还原哥萨克东扩的血腥历史，而本书恰恰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

有必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当俄国人 17 世纪从水旱两路大举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进军之日，也恰是清朝皇太极征服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之时（我们暂且不提中国古时，例如明朝 1409 年决定升努尔干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努尔干都司”，驻努尔干城；黑龙江与亨滚河汇合处右岸的特林地方以及 1411—1433 年 23 年间太监亦失哈曾十次前往视察一事）。俄军和清军对当地部落征讨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区别，但随后对所占地区的治理却见出了长短。俄国人是进展神速，巩固有方，占一地设防、开发一地，稳扎稳进、步步为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仅往新占领地移民，而且军政部门随新疆土的开拓也马上跟进。清政府于 1642 年占领原属明朝努尔干都司管辖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之初所采取的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招抚恩养政策还是可圈可点的，但随后，由于入关与明朝作战、消灭农民起义军、平三藩等重大事务的牵扯，以及出于保护龙兴之地的傲慢和短视，对这些故土新归的地区就逐渐疏于管理甚至放弃了，这给了一直觊觎远东广袤、富饶领土的俄国人以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到 1685 年雅克萨之战爆发之前，俄国人早已打进家里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在对俄国殖民者东扩时的残暴感到愤怒和震惊之时，也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俄国人在开拓领土时的疯狂、坚韧和守土时的稳健和策略，或许这是本书给我们的一种另类启示？

## 前 言

现在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占据了超过当代俄罗斯 1/4 的领土。广袤无际的西伯利亚深处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黄金、金刚石、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惊艳：这里有欧亚大陆最大的河流，辽阔的平原、低地，高耸的山脉和无边无际的高原，成片的一望无际绵延几千公里的冻土带和原始森林，还存有清新的空气和世上最洁净的贝加尔湖水。西伯利亚大地从西到东跨越八个时区，从北到南的距离超过 3000 公里。

俄罗斯人发现了世界上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16 世纪最后 30 年和 17 世纪前半期被认为是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第二个完成阶段，首先它以俄罗斯人发现了西伯利亚和远东为特征，其次是以俄国人到达了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在北方和东北方的自然界线以及到达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为特征。

英国学者约翰·贝克尔就这个问题写道：“俄罗斯人在 17 世纪穿越西伯利亚的行动进行得异常迅速。构成了北亚水路体系的便捷的交通线路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俄罗斯人的成就，虽然不应夸大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考虑到所有开辟这条道路的天然优势，但这支无名的军队仍应被视作建立了这样的功勋：它将永远被看作这支军队的勇敢和进取心的一座丰碑，而且是任何另外一个欧洲民族都不曾完成的能与之比肩的功勋。”（注 1，231、232 页）

还有一点同样令人吃惊：西伯利亚并入俄国和俄国人占领西伯利亚总的说来具有和平的性质，这对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书名上使用“合并”代替“征服”一词比较合适。我们说征服西伯利亚只是考虑到 16、17 世纪莫斯科当局代表人物的思

维方式。当代历史学家 Н. И. 尼基金的论断是多么公正：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活动充分地揭示了它身上早就被发现的一个品质——不同寻常的能力……与人友善……许多人都把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看作这种与人为善的原因。按照某些研究者的意见，俄罗斯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对被殖民国家的民众采取傲慢、鄙视和敌对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的忍让”。在革命前的文献中就曾指出：“对外族人抱一种不容忍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渗透到西伯利亚的俄国移民的精神中去。他们把沃古尔人、萨莫耶德人、奥斯恰克人（曼西人、聂聂茨人、汉特人——作者注）首先看作人并仅仅由此而确定自己在生活中对他们的态度。”（注 2，140 页）

在发现和占领西伯利亚的最初阶段，在哥萨克和实业者——早期开拓者中与“受洗的外族人”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用著名的人种学家 Б. О. 多尔基赫的话说，17 世纪下半叶，“在从勒拿河到阿纳德尔河广阔的犹加吉尔大地上都有公职人员和实业者娶犹加吉尔女人为妻”。（注 3，440 页）17 世纪国内著名的开拓者，其姓名永远留在地理地图上的哥萨克谢苗·杰日尼奥夫就曾两次结婚，且两次娶的均是雅库特女人。

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西伯利亚，所有这些受洗的混血儿都得到了公职人员子女的全部权利并成为当地居民中俄国影响的传播者。在这方面，俄罗斯开拓者——哥萨克和实业者（开采者、渔人、猎人等——译者注）的行为从根本上有别于例如英国人在印度和美洲的行为，他们在那里仿佛用一堵墙同当地居民隔离开，尤其是在私人关系上。

西伯利亚和与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沿岸毗连的远东地区的合并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依我们看，它成为俄罗斯帝国形成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可以确信无疑地说，如果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同瑞典的北方战争的胜利开启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口，使得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克服了彼得一世前俄罗斯在许多领域的落后，是俄罗斯帝国建立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西伯利亚的合并就是这项事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俄罗斯的主要领土是在西伯利亚合并的进程中确定下来的。控制和开发这片富有天然资源的土地之后，首先靠大量名贵毛皮（这种 16、

17 世纪的软货币) 进入国库, 使得俄罗斯在 17 世纪已出现了巨额的资金流入, 因此西伯利亚归属俄罗斯使国家有能力更好地装备军队, 巩固国防, 为捍卫俄罗斯帝国的利益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对俄罗斯商业来说, 西伯利亚的合并为扩展贸易流通和建立新的工业企业开辟了新的更大的可能性。

当代俄罗斯人不应忘记那些著名的和无名的西伯利亚开拓者的功勋, 他们付出了忍受难以置信的寒冷和饥饿的代价, 付出了牺牲无数哥萨克和实业者生命的代价, 为世界发现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建立了许多西伯利亚城镇和乡村。我们的前辈赠予当代俄罗斯人这块最富有的土地, 因此我们应当知道发现和开垦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历史。作者希望, 了解这段光荣的历史能够增强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感, 激励他们去从事旨在巩固和繁荣我们祖国的事业。

图字 01 - 2015 - 28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 (俄罗斯) М. И. 齐保鲁哈著；杨海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161 - 9749 - 3

I. ①征… II. ①М…②杨… III. ①俄罗斯—历史—研究 IV. ①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0331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定价 8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前言 .....	(1)
首次越过“石头山”的出征 .....	(1)
古代西伯利亚历史 .....	(17)
叶尔马克在西伯利亚	
——首次“夺取西伯利亚”的历史 .....	(71)
第二次“夺取” .....	(94)
“金子般沸腾的土地”曼加杰亚的命运 .....	(111)
叶尼塞和泰梅尔的先驱者 .....	(135)
西伯利亚大河勒拿河和它的支流是怎样被发现的 .....	(153)
西伯利亚东北沿海地区的俄国果奇 .....	(166)
外贝加尔和贝加尔的西伯利亚哥萨克 .....	(178)
哥萨克和实业者向鄂霍次克海沿岸进发 .....	(185)
从北冰洋到东部海洋海上通道的开辟 .....	(199)
首航阿穆尔河 .....	(218)
穿越西伯利亚到达遥远的博克达汗的国家 .....	(237)
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先驱者 .....	(252)
17 世纪著名的西伯利亚地图绘制者和首位西伯利亚	
历史学家 .....	(267)
17 世纪俄国人移民西伯利亚 .....	(282)
俄国人在千岛，谁最早描述了千岛群岛？ .....	(289)
参考书目 .....	(306)
译后记 .....	(310)

## 首次越过“石头山”的出征

是的，我的群山，乌拉尔山脉，  
不会忘记你们，群山，直到永远。  
啊，那条道路穿越了你们，群山，  
那是一条西伯利亚的大道。

——俄罗斯民歌

俄罗斯人最早在何时越过“石头山”（在编年史中人们这样称呼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很难确定这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的准确日期。《系年纪事录》的作者涅斯托尔把诺夫哥罗德贵族久里亚塔·罗戈维奇讲述的关于派志愿者到北方省收贡赋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标注为1096年，而编年史作者是在四年前听到这个故事的：“我派自己的少年侍从（志愿者——作者注）到伯朝拉去，这是一些向诺夫哥罗德纳贡的人，他从那儿到达在北边与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的旧称）相邻的尤格拉（俄国史书中将伯朝拉河、鄂毕河下游以西地区称为尤格拉。早在1032年诺夫哥罗德人就前去尤格拉地区，有史料记载，1264年左右，该地曾编为诺夫哥罗德的一个乡——译者注）。尤格拉人告诉我的少年侍从，三年前他们在海边发现了奇迹：那儿有一些高耸入云的山脉一直通向海湾（‘通往海中的月亮’），在那儿听到许多人声和喊叫声……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指着我们的铁制武器，打手势请求把武器给他们。如果有谁把刀和斧头给他们，那么作为交换，他们就给他皮货……通往这些山脉的道路要经过一些无法逾越的深渊、积雪和森林，因此我们不经常到那儿。此外，我们知道再往北还有人烟。”（注4，527页）

上面所引的《系年纪事录》中的片段取自《拉夫连季编年史》，这

是《纪事录》最晚的副本之一（1377）。而在《伊巴吉夫编年史》（《纪事录》15世纪初的副本）当中，编年史作者讲述他在1114年造访了沃尔霍夫河（位于现今列宁格勒州，是唯一一条从伊尔门湖流入拉多加湖的河流——译者注）上的拉多加市（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公元862年的编年史曾提到它——译者注），在那儿同拉多加人和拉多加地方行政长官巴维尔进行了交谈，他们给他讲述了北部地带的情况。行政长官告诉他，“一些上年纪的男人到过尤格拉人和萨莫耶德人以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往东北到达了尤格拉人（当代曼西人和汉特人的祖先）和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常住地以外的地方（注5，244页）。

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在分析这些编年史故事时认为，诺夫哥罗德人在11世纪已经深入到乌拉尔山那边了。许多当代历史学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但在14世纪之前的罗斯，无论是乌戈尔人部落中的沃古尔人和奥斯恰克人（现在他们被称作曼西人和汉特人）迁来的地区，还是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区都被称作“尤格拉”，这些部落是乌拉尔山西侧斜坡和鄂毕河沿岸森林地带的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的南邻。所以我们认为，根据上面从《系年纪事录》中所引片段不能准确地断定，诺夫哥罗德的志愿者不是在乌拉尔山脚下收取贡赋，而是在山那边的尤格拉，也就是从乌拉尔向东一带收取的。

据编年史记载，12世纪后半叶诺夫哥罗德人两次出征到尤格拉去收贡赋。按编年史，在1187年时，因收贡赋而抵达的队伍中有100位著名的诺夫哥罗德人被伯朝拉和尤格拉的纳贡者所杀害。1193年诺夫哥罗德省督军雅德列到了那里，他收集了银子、黑貂和骨制品（看来是用海象牙所制）。按照编年史，那一年大诺夫哥罗德政权派出以省督为首的队伍到尤格拉收贡赋，但被尤格拉人和与尤格拉当地居民做买卖的诺夫哥罗德商人打败。可见，大诺夫哥罗德当局和商人——私营企业主在尤格拉的竞争一时非常激烈。13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家指出，在大诺夫哥罗德统治下的北边省份中有彼尔姆、伯朝拉、尤格拉。

北方丰富的皮毛吸引了俄罗斯东北公国王公们的注意力。在离尤格

河（位于沃洛戈达和基洛夫州，北德维纳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口不远的地方，在诺夫哥罗德人去往伯朝拉和尤格拉大地的路上，罗斯托夫的王公们于1218年修建了乌斯秋格城（后来叫大乌斯秋格市），它像一个楔子插入诺夫哥罗德领地，从那儿人们完成了向到伯朝拉和尤格拉收贡的诺夫哥罗德人的进攻。而诺夫哥罗德贵族也没停止向伯朝拉和尤格拉派遣收贡赋的志愿者队伍，就像编年史所说，这是一些由“贵族的孩子（13世纪古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派服军役及担任文官职务的小地主——译者注）和勇敢的人们”聚集起来的“旅行者”，也就是一伙儿乘船合伙抢劫的海盗（注6，75页）。

14世纪乌斯秋格并入莫斯科大公国后，乌斯秋格的王公们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加大了对诺夫哥罗德收贡赋者的压力。乌斯秋格人不止一次阻断了诺夫哥罗德人去往尤格拉的自由通道，尤其是在返回的路上，当诺夫哥罗德人带着珍贵的毛皮货试图经过乌斯秋格沿苏杭纳河向西去往诺夫哥罗德时。1323年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首次报道了这件事，当时诺夫哥罗德的志愿者已经成了俘虏，而他们收缴的贡赋则被运到了莫斯科。从这时起一直到15世纪中叶，大诺夫哥罗德和大乌斯秋格之间的流血冲突就没停止过。在冲突过程中，要么诺夫哥罗德人在乌斯秋格屠城后顺利地到家，要么乌斯秋格人成功地夺取了“毛皮官款”。

但根据所有12—14世纪前半期的这些编年史资料还不能断言，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诺夫哥罗德志愿者跨越“石头山”的出征。最早绝对明确地谈到关于这件事是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中，里面在1364年的纪事中指出：“那些年冬天，无数诺夫哥罗德人——贵族子弟、年轻人还有省督亚历山大·阿巴古诺维奇·斯捷潘·里亚帕，他们同尤格拉人沿鄂毕河两岸直到大海进行战斗。”（注7，9页）

北乌拉尔山两面斜坡上的伯朝拉和尤格拉对诺夫哥罗德商人而言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它盛产“黑貂、银鼠、黑鼬、北极狐、白狼和鱼牙”，这些东西在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极其珍贵的。14世纪中叶，与尤格拉通商的诺夫哥罗德商人甚至组成了一个独特的行会“尤格拉会社”（尤格尔希纳），1365年在诺夫哥罗德列加吉纳大街建成的圣·三位一体石头教堂成了行会的中心和保护者（注6，138页；注8，367—368页）。

国内地理发现家和史学家 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诺夫哥罗德人的队伍可能沿着两条道路跨越乌拉尔山：沿伯朝拉河右边的支流乌萨河出发，然后翻越极圈乌拉尔山到达鄂毕河左岸的支流索毕河；或通过更加南边的路线沿着伯朝拉河右边的支流舒果尔河跨越乌拉尔山，然后越过北乌拉尔山到达鄂毕河支流北索斯瓦河的上游地区。这些出征的结果使得鄂毕河下游地区某个时期成了诺夫哥罗德州，而它的居民则向诺夫哥罗德纳贡（注 9，220 页）。

按编年史记载，诺夫哥罗德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征尤格拉是在 1445 年前夕。这次跨越乌拉尔山的是以瓦西里·申古尔斯基和米哈伊尔·雅罗尔为首的德维纳族士兵。这次出征之后，尤格拉事实上已不再从属诺夫哥罗德。

莫斯科的编年史作者为了标注乌拉尔山那边的土地，1408 年时首次使用了“西伯利亚”一词：“脱脱迷失（金帐汗国可汗——作者注）在秋明附近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在秋明，后迁伊斯凯尔城，人称失必尔，与西伯利亚是同名异译。据《元朝秘史》第 92 页及《元史》卷 132 载，失必尔是元朝初年居住在这里的一个部落的名称，中国学者冯家昇等认为，失必尔就是古代汉文史书中的鲜卑——译者注）土地上被击毙。”（注 8，36 页）

关于“西伯利亚”一词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比较靠谱的是两种假说。一部分学者从蒙语“Шибир”（密林之意）推断出“西伯利亚”一词，认为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蒙古帝国建立之日起（13 世纪）蒙古人就一直这样称呼北亚同半森林半草原接壤的原始森林地带。蒙古骑兵队伍不能深入到这些原始森林地区，沼泽和森林中的小虫是他们无法克服的障碍（注 2，7 页）。

这些学者认为，根据马可·波罗与一些到过蒙古帝国心脏地带和被蒙古占领的中国的欧洲旅行者的讲述，“Шибир”（西伯利亚）一词才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

第二种比较有根据的假说认为，“西伯利亚”这个称呼的起源同居住在半森林半草原的额尔齐斯河沿岸的部落的自我称呼有关（“Сабиры”或“Савиры”或“Сипыры”——所有这些都指的是一些同匈奴有同源关系的部族，他们在公元 5 世纪几乎灭掉西罗马帝国的军

队) (注2, 7页; 注11, 15页)。国内知名历史学家Л. Н. 古米廖夫也证实, “西伯利亚”一词从公元5世纪就有了: “居住在鄂毕河流域和它的支流地区的乌戈尔部落, 包括曼西人(沃古尔人)一直这样称呼。‘西伯利亚’的称呼也在两个突厥可汗的封号中出现: Сыби汗和Шиби汗。”(注9, 221页)

在西欧, “西伯利亚”一词最早出现在1375年加泰隆(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注)人的地图上, 写作“Себур”(谢布尔)。И. П. 马基多维奇和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 这种写法是模仿了14世纪前半叶阿拉伯和波斯作者(“Сибири и Абир”, “Ибир - Шибир”)。在威尼斯绘图家、修道士弗拉-马乌罗1457—1459年完成的著名的圆形世界地图上, “Sibir”指的是“亚洲萨尔马基亚(古时, 东欧和高加索被称为萨尔马基亚——译者注)”北边的一片土地, 它们之间被山隔开(注9, 221页)。

根据1456年大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大公签订的《亚热尔比茨基条约》, 尤格拉地区已经在莫斯科的影响范围之内了。把大诺夫哥罗德的北部省份攫为己有的同时, 伊凡三世决定向尤格拉派出一支军队。乌斯秋格人瓦西里·斯克里亚巴按照莫斯科的旨意在乌斯秋格组建了一支志愿者(“乐意从事的人们”)的队伍并于1465年5月9日随队出征。维切格达河右边的支流维米河流域的居民维米人和自己的王公瓦西里一起成了队伍里的“头儿和向导”。两个乌戈尔“王公”(部落领袖)卡尔比和杰奇克加入俄国国籍是这次出征的结果。他们受命向周围的部落收取贡赋并将其上缴伊凡三世的国库。

1472年以费德罗·比斯特拉公爵为首的一支更强大的队伍被派往了尤格拉。其结果是: 科尔瓦河和维舍拉河上游沿乌拉尔山地区居住的乌戈尔部落彻底被合并到了莫斯科公国。这样一来, 莫斯科当局已控制了新的、更加便捷的跨越“石头山”的道路(注5, 248页; 注8, 368页)。

但不是所有乌戈尔领土上的“公国”都加入了莫斯科公国。一部分乌戈尔部落联盟的首长实施了对沿乌拉尔山地区的科米人和俄罗斯人村落的进攻。科米部落也向外乌拉尔发动进攻, 破坏了坐落在洛济瓦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五条大河——译者注)和佩雷姆河(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州的北面，塔夫达河左边的支流——译者注）流域的曼西人的亚瑟基（15世纪沃古尔人的部族领袖，统治北乌拉尔山的山前地带到鄂毕河的广大地区——译者注）“公国”的村落。

1478年大诺夫哥罗德和它所有北方的领地彻底归入莫斯科罗斯之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向乌拉尔那边派出军队，以便巩固自己在鄂毕河土地上的政权。

为争夺卡马河上有争议的领土，金帐汗国垮台后独立的两个汗国（鞑靼-喀山汗国和西伯利亚或秋明汗国）之间发生了残酷的斗争。在西伯利亚鞑靼人夺取了原属于喀山汗国的位于土拉河沿岸的土地后，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为了自己在鄂毕河流域的利益，伊凡三世利用了这一斗争，他站在喀山一边，并于1483年组织了俄罗斯军队对西伯利亚进行征讨。

俄罗斯军队是由北方沿海地区的乌斯秋格人、维切格达人、维米人、西索里奇人和彼尔姆人组建的。莫斯科的军政长官费多尔·古尔勃斯基-切尔内伊公爵和伊万·伊万诺维奇·萨尔迪科-特拉文被派作他们的首领。1483年5月9日，俄罗斯军队从大乌斯秋格向西伯利亚进发。他们经过卡马河沿岸地区，沿卡马河支流维舍拉河向上，越过乌拉尔山脉完成了第一次历史上被证实的跨越乌拉尔山中部的远征。1472年彼尔姆并入莫斯科公国之后，渡卡马河、维舍拉河途经切尔德尼（位于彼尔姆边疆区北部，科尔瓦河右岸——译者注）的道路对莫斯科军队来说已变得畅行无阻。在乌拉尔山的东面，俄国士兵进入了亚瑟基“公国”的领土。

在塔夫达河的支流佩雷姆河的河口，俄国人和泽梁人（科米人）的联合部队击溃了敌视俄国人的沃古尔头人佩雷姆“王公”尤姆山的军队，然后，长官率军队乘平底船“沿塔夫达河向下经秋明到达西伯利亚领土，一边战斗，一边前进，缴获和抓捕了许多财产和俘虏。而从西伯利亚沿额尔齐斯河……向下，经过战斗到达伟大的鄂毕河和尤格拉的土地，同尤格拉王公们作战并将其俘获”（注9，221页）。

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在载有上述引文的“乌斯秋格编年史汇编”中，编年史家把“西伯利亚”这个词作为某个确定的城市的称呼。按我们的观点，可以把编年史家笔下的“西伯利

亚地区”这个词理解为对整个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和托博尔河下游以及它右边的支流地区的称呼。有一点很明确，就是随着俄国人从乌拉尔山越来越往东深入，“西伯利亚地区”这个概念开始意味着从乌拉尔山往东到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沿岸地区的所有北亚的领土。

在塔夫达河向下航行时，俄国军队经过了秋明汗国。15世纪80年代，莫斯科同成吉思汗的后代秋明汗易卜拉辛·依巴克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俄国士兵能前往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到达尤格拉部落的居住地。乌斯秋格编年史汇编在描述这次远征时准确地指出了尤格拉的位置：它位于额尔齐斯河河口北边一点，也就是所有诺夫哥罗德人越过“石头山”探险终结的地方，即通过北边的伯朝拉路线到达的地方。

俄罗斯人在外乌拉尔的远征止于鄂毕河东边支流的戈特（现在的汉特—曼西自治区的一部分——译者注）领土。戈特王公莫尔丹和叶柯梅奇雅王公的两个儿子被抓住送到莫斯科。尤格拉的王公们通过中间人彼尔姆的主教开始同伊凡三世谈判。

1483年，远征使得来自戈特和尤格拉领土上的几个沃古尔和尤格拉部族的头人，甚至还有一个西伯利亚鞑靼王公成为莫斯科大公的臣民。戈特王公们通过神圣的仪式——“喝金水”誓言效忠。在缔结和约时，尤格拉的“王公们”完成了一些异乎寻常的仪式并且发了誓。在仪式上出现了云杉、熊皮、蟾蜍、鱼、面包和武器。在谈判中，代表伊凡三世的主教吩咐要做完祈祷。

第二年春天，沃古尔显贵的代表抵达莫斯科，他们是：曼西部落的尤姆山和卡尔巴；来自居住在西伯利亚领土上受到鞑靼人及其文化强烈影响的沃古尔部落的里亚基克；来自鄂毕河下游汉特人居住的戈特“公国”的贝特凯依。使臣们把贵重的毛皮作为西伯利亚贡物带给莫斯科并请求释放被俘的王公。他们承认自己是莫斯科公国的臣民，应当每年往国库交纳毛皮作贡赋。伊凡三世亲切地听取了使臣们的诉求，将莫尔丹王公和叶柯梅奇雅的两个儿子放回了西伯利亚（注8，369页；注12，433、434页）。

的确，在鄂毕河下游俄国人没有建立任何常驻的巩固的据点，所以那次鄂毕河下游领土归并莫斯科公国一般说来是有条件的。

1499年底，伊凡三世再次把自己一支超过4000人的军队派到了乌

拉尔山的那边，他们中有几乎 2000 名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一支由彼得·费多洛维奇·乌沙托伊公爵指挥的部队主要由德维纳人、皮涅加人和瓦加人组成，他们从沃洛戈达河出发，沿苏杭纳河和北德维纳河到达皮涅加河口。接着，他们继续沿皮涅加河和皮涅加联水陆地进发，到达古洛依河，沿此河到达白海的梅津湾。沿梅津河和它的支流别扎河向上，队伍到达伯朝拉河的支流齐里马河的上游，沿齐里马河下行到达河口，再沿伯朝拉河到达它右边的支流乌萨河的河口。

后来在 11 月，一支由谢苗·费多洛维奇·库尔勃斯基公爵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夫里洛夫—勃拉日尼科为首的军队到达那里，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向“尤格拉领土上的戈特”进发，并顺路攻占鄂毕河左岸的里亚宾公国（曼西人中世纪在里亚宾河与北索斯瓦河地区建立的公国，旧址位于现今鄂毕河沿岸地区的西北部——译者注）。这支队伍主要由乌斯秋格人和维米人组成，看来，他们是经过维米联水陆地到达伯朝拉的。

在乌萨河口，士兵们建造了一座不大的木制要塞乌斯达什。在伯朝拉河口区岸边（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原先实业者过冬地的位置上）又建造了一个设防村，后来被称作布斯托捷尔城堡（古代伯朝拉边区的都城，离现在的纳里扬马尔市不远——译者注）。一般认为，正是这支队伍的士兵参与了这项工作（注 6，78 页；注 13，11 页）。

11 月 21 日，部队向“石头山”（乌拉尔山脉）进发，长官骑鹿，士兵骑狗（据另外的史料——他们滑雪）。以加夫里洛夫—勃拉日尼科为首的一部分军队沿乌萨河到达它的上游，接着经过乌拉尔山北部的所谓尤格拉通道翻越“石头山”。这条路为俄罗斯的实业者和商人所熟知，他们在同尤格拉部落进行贸易时积极地利用它。

另一部分军队在库尔勃斯基和乌沙托伊的带领下从南面翻山。两个星期后，队伍到达乌拉尔山跟前并穿过山中通道（“通过缝隙翻山”）到达鄂毕河下游地区的省份，从开始出征行程总共 4650 俄里（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译者注）。翻山道是道路中最困难的地段：“云中的石头（山——作者注）高不可见，——士兵们在返程时回忆道，只有风在吼，伊诺（风——作者注）撕开了云层。”（注 12，434 页）

同当地居民——萨莫耶德人的最早的冲突在过翻山隘口时就开始

了。俄罗斯人夺取了他们 200 头鹿，后来用这些鹿转运货物和人。士兵们从隘口出发，沿北索斯瓦河（此处有误，应为丘索瓦亚河——译者注）的支流瑟尔瓦河前行，一个星期后到达尤格拉人设防的“小城”里亚宾。占领该城后，部队沿北索斯瓦河顺流而下。不久，当地部落酋长的代表们（奥勃多尔和尤格拉的“王公”）乘鹿从鄂毕河口抵达，他们宣称愿意成为莫斯科大公的臣民并向他纳贡。除了里亚宾，军事长官 С. Ф. 库尔勃斯基和 П. Ф. 乌沙托伊还“捕获了 33 座城市（居民点——作者注），抓获了 1009 名最优秀的人，带来了 50 位王公（部落酋长——作者注）。瓦西里和勃拉日尼科占领了 50 座市镇……在伟大的日子（复活节——作者注）来到莫斯科向国王交差，上帝保佑了所有的一切”（注 5，249 页）。部队于 1501 年春顺利从西伯利亚返回。

指出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吏部文献”中保存有极详细地描述这次远征的材料，其中提到，“石头山”的走向是“从海到海”。因此，当时在罗斯的人们已经知道，乌拉尔山脉是从冰冻的海延伸到里海，也就是从北方到遥远的南方。

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当政时，这些远征“石头山”的结果就在莫斯科大公的封号中得到了反映，从 1514 年起，除了已知的其他的封号，封号中还包括孔金公和奥勃多尔公，就是说用两个位于“石头山”那边省的名称奥勃多尔（鄂毕河右边支流波卢依河地区）和孔金（额尔齐斯河左边的支流孔达河地区）作为封号（注 9，222—223 页；注 10，36、37 页）。

收取贡赋并将其交给莫斯科政权是尤格拉“王公”和聂聂茨酋长们的职责。意大利人拉斐尔·巴尔别里尼 16 世纪中叶曾到过莫斯科，他指出：“我曾同两个这样的捕兽人交谈并一起吃饭，他们有机会进宫是要把自己不同寻常的贡赋献给国王。这些贡赋由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毛皮货组成。”（注 8，369 页）

从 16 世纪中叶起，莫斯科开始向尤格拉派出收贡赋的人——“丹希克（данщик）”以便把毛皮运到莫斯科。尤格拉“王公”和聂聂茨酋长们则保证这些人在尤格拉领土上安全通行。的确，贡赋的多少也无法确定。“王公们”能从当地猎户收多少毛皮，“丹希克”就往莫斯科运多少。

16世纪时，俄罗斯人和泽梁人（科米人）中从事狩猎、捕鱼、开采的人剧增，他们收购珍贵的毛皮，同鄂毕河下游以及与西西伯利亚北部沿岸相邻地区的土著居民做生意。安东尼·维德1555年绘制的地图先在立陶宛而后在荷兰出版，那上面已经出现了鄂毕河、鄂毕湾。同时，在读了这幅地图的拉丁文和波兰文的图例后就清楚了，维德与其说是地图的作者，不如说是俄罗斯地理图纸的收藏者，因为这些图纸是在1533年（也就是瓦西里三世去世前）之前就逃到立陶宛的御前大臣伊万·里亚茨基从莫斯科送给他的，就是说，这些图纸成图的年代还要早（注14，379页）。

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头10年，西欧出版的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者的著作和地图上出现了“叶尼塞河”、“皮亚西纳河”的称呼，还有一些关于泰梅尔的信息。显然，这些信息是他们从俄国文献资料中获取的。所以俄罗斯人实际开发西西伯利亚的北部地区在整个地区并入莫斯科罗斯之前就开始了。

16世纪时，俄国人同外乌拉尔各民族的贸易往来加强了。俄罗斯人移居东北沿海地区尤其是伯朝拉及支流区域有助于巩固这种贸易。在通往“石头山”那边的北方的水路和陆路地段出现了俄罗斯人的村庄和据点：布斯托捷尔城堡、乌斯季—齐里马镇、角城等。总是有大量俄罗斯商人带货前往外乌拉尔，在那儿交换毛皮。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的西伯利亚历史研究者C. B. 巴赫鲁申指出，伯朝拉居民在乌拉尔以外的经营活动不限于“同布斯托捷尔城堡和外乌拉尔地区的萨莫耶德人的贸易”。维米人和布斯托捷尔人早在16世纪就开始“带着各种货来到所有的西伯利亚城市（正如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在一封信中引用已有的事实时所指出的），在所有的西伯利亚领土上，沿着各省，走帐篷、钻森林同鞑靼人、奥斯恰克人、瓦古里奇（沃古尔人）人和萨莫耶德人进行交易”（注6，80、81页）。

来自俄国北方沿海地区的实业者和商人不止一次地在外乌拉尔过冬，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沿海的过冬地。这些过冬地后来逐渐变成了活跃的交易场所，俄罗斯的商品在那儿换成了西伯利亚的毛皮。所有这一切使俄国的实业者和商人掌握了当地人骑狗（实为狗拉雪橇）和骑鹿

的出行方式、狩猎方法，穿起了很好地适应西伯利亚严寒气候条件的土著人的衣服。同样，尤格拉和聂聂茨部落很快就意识到使用俄罗斯的铁制产品（箭头、刀、斧头等）的优势并通过俄国人的帮助完善了在冻土带、原始森林的狩猎方法和海上的捕鱼方法。

16世纪初，西西伯利亚鞑靼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约在1495年，成吉思汗的一个子孙——秋明可汗易卜拉辛·依巴克在同鞑靼贵族的斗争中死亡。据鞑靼传说，来自有影响的“泰布根氏族”（一译泰布哈氏族——译者注）的鞑靼贵族马麦特（或马赫麦特）杀死了他。

后者联合了托博尔和额尔齐斯河中部的鞑靼村落，把额尔齐斯河岸边尤格拉古老的设防村庄作为自己的首都，起名为“西伯利亚”或“卡什雷克”。所以由鞑靼村落组成的新的国家联盟开始被称作西伯利亚汗国。16世纪头10年，秋明汗国已不复存在，它的领土并入了西伯利亚鞑靼汗国，该国分布在从鄂毕河下游、北冰洋沿岸到哈萨克汗国北部边界的辽阔领土上。

那时金帐汗国的奠基人——蒙古人征服了在额尔齐斯河沿岸和巴拉宾草原放牧的波洛韦茨人（克普恰克人即中国史籍上的钦察人）。但蒙古人已融入克普恰克人之中，接受了波洛韦茨人的语言和文化。西伯利亚的鞑靼人作为波洛韦茨人和蒙古人的后代一直采取游牧的生活方式。鞑靼贵族控制了能放牧大量马群的最好的牧场和无数奴隶（“亚赛里”）。个别村落的拥有者——贵族和老爷在经济活动中广泛使用“亚赛里”和贫穷的（依附性的）农民的劳动。

这些农民——村落里“耕种官地的”人们组成了村落头人的卫队并且每年向贵族或老爷交纳“礼品”——鱼、毛皮或畜产品。此外，鞑靼村落“耕种官地的”人们和被鞑靼人征服的汉特和曼西部落以及外乌拉尔的巴什基尔人每年还应向可汗交纳实物税，主要是毛皮。如果可汗宣布进行军事远征，还要作为士兵参与军事行动。所以可汗和他的近臣既压迫“耕种官地的”人们，也压迫被征服的部族。

可汗有自己主要的高级文官——大臣——“卡腊查”，有自己的军队和仆人。他从自己的首都向所有的村落派出收实物税的人——“达鲁克”。贵族管理自己的村落，在可汗发动军事远征时带领自己的军队

参与其中。因参与远征，贵族可以得到部分战利品。依靠战利品和把俘虏卖为奴隶，鞑靼贵族和老爷大发战争财。

16世纪中叶，当泰布根氏族的可汗叶基戈尔和他的兄弟别克布拉特统治西伯利亚汗国时，布哈拉的统治者穆尔塔咱的儿子库楚姆向汗国发动了进攻。当时的俄国文献把库楚姆称作秋明可汗依巴克的孙子。库楚姆的军队是由乌兹别克人、诺盖人（土耳其语系的民族，居住在阿斯特拉罕省及斯达夫罗波尔边疆区——译者注）的部队和巴什基尔（没有离开乌拉尔山的马扎尔人的后裔，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突厥民族，中国史籍最早提及巴什基尔人的是《北史·突厥铁勒列传》，其中记录了“北褥九离”——译者注）士兵组成的。在同库楚姆的斗争中，叶基戈尔和别克布拉特决定依靠莫斯科沙皇伊凡四世。

1555年1月，西伯利亚可汗的使臣加戈鲁尔和班亚德到达莫斯科。他们祝贺沙皇攻占喀山和在阿斯特拉罕的军事行动取得顺利进展。使臣们“代表叶基戈尔并以全部族的名义向沙皇叩拜，要求沙皇将他们的王公和所有西伯利亚领土收归自己名下，保护他们免受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侵扰，派出自己的收税人达鲁克向他们征税”（注8，371页）。沙皇亲切地宣布，现正将西伯利亚收入“自己囊中”。他要在自己的封号中加上“全西伯利亚领土的统治者”的称谓（注12，436页）。

叶基戈尔的使臣在莫斯科答应，每个“耕种官地的”人向沙皇交纳一张貂皮作为贡赋，而每个人向收税的“达鲁克”则交一张灰鼠皮。通过询问使团成员和他们的随从，外交事务衙门长官判明，汗国共有30700个“耕种官地的”人，就是说，每年贡赋的总数是30000张黑貂皮，使臣们同意这种规模的年贡。

德米特里·古洛夫·涅别依金被任命为沙皇驻西伯利亚汗国的代表。他携带沙皇的“赏赐封诰”到达外乌拉尔并于此主持了叶基戈尔、别克布拉特和他们的主要官员效忠莫斯科沙皇的宣誓。的确，并没允许大使去调查西伯利亚的人口以确定每年应纳贡赋的数额。不久，叶基戈尔派大使巴扬达前往莫斯科并带去总共700张黑貂皮的贡赋。这一举动使沙皇大为震怒，他下令把大使关进监狱（注12，437页）。

沙皇向尤格拉的别夫盖依王公派出了公使，吩咐他向每人收取一张

貂皮并立即将其运到莫斯科。为此，他允诺保护尤格拉免受任何侵略。因为库楚姆继续进逼叶基戈尔的队伍，所以后者向莫斯科发出信函，誓言效忠沙皇，随信送上 1000 张貂皮和向“达鲁克”交的税——160 张貂皮（代替灰鼠皮）。

1563 年，库楚姆在布哈拉可汗的帮助下击溃了叶基戈尔，俘获了他、他的兄弟及近亲，然后处死了他们。侥幸逃生并在中亚细亚得到庇护的只有别克布拉特的儿子赛义德—艾赫马特（赛义加克）。

几年后，库楚姆彻底粉碎了鞑靼贵族和尤格拉部族王公的反抗。他用乌兹别克人和诺盖人的队伍护卫着自己并开始强行推广伊斯兰教。根据库楚姆的请求，布哈拉可汗阿卜杜拉于 1572 年向西伯利亚汗国派出穆斯林宗教界的代表以便在那儿确立伊斯兰教。过了几年，阿卜杜拉可汗向“西伯利亚人民”派出了一个新的传教士团，成员包括最有威望的伊斯兰教神学者和学者，以督导西伯利亚人的信仰。因此，到 16 世纪 80 年代初，所有的鞑靼贵族都接受了新的宗教。

最有可能的是，尽管库楚姆自称是秋明可汗和西伯利亚可汗，但鞑靼村落里“耕种官地的”人们和其余大多数额尔齐斯河沿岸、鄂毕河沿岸的居民却把他看作外来人和占领者。国内著名政论家 A. H. 拉季谢夫在一篇有关西伯利亚并入莫斯科帝国的专著中指出：“除了和他一起来的人之外，人们服从库楚姆这个外来户只是由于恐惧，就像在被占领国总是发生的那样。”（注 8，366 页）

在粉碎了地方统治者的反抗和多少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库楚姆开始准备同罗斯的战争。为了掩盖进攻的准备，他给沙皇写信并于 1571 年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并携带了 1000 张貂皮的贡品，该代表团承认了叶基戈尔签订的条约。库楚姆甚至在卡什雷克接见了沙皇大使特列齐雅科·丘布科夫并答应向沙皇纳贡，还签署了效忠信。

首先应当成为库楚姆进攻目标的是彼尔姆的领土，而完成对这块土地突袭的还是秋明的鞑靼人。当时他们在依巴克（前面曾提到过他）的儿子——库特卢克—萨尔丹王子的率领下破坏了卡马河上的乌索利耶，“根除”和杀死了“质朴的俄罗斯人”（注 6，99 页）。

最先认清彼尔姆领土上盐业财富价值的是一个来自俄国北边的农民阿尼加·斯特洛干诺夫，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的主人。多年来，索利·

维切格茨卡亚（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维切格达河南边不远处——译者注）成了斯特洛干诺夫家制盐业的主要中心。此后，阿尼加在彼尔姆边区逐渐建了一些晒盐场。1558年，沙皇允许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在当地寻找盐水的源头，并在沿卡马河的空旷地带开辟更多的晒盐场和开垦生荒地。

而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则承担了护卫沿卡马河地区不受诺盖人和其他外族入侵的责任。为此，他们得到沙皇允许，在距卡马河上的乌索利耶（位于彼尔姆边疆区中部卡马河左岸——译者注）15俄里的贝斯科尔岬建立小城科恩郭尔，“那个地方戒备森严，在城里添置了火炮和火绳枪，自己组织了炮手、火绳兵、卫兵以防备诺盖人和鞑靼军队”。1564年，他们征得允许在科恩郭尔上面15俄里的奥尔洛瓦河岸洼地建立另一座小城盖儿德干或叫奥廖尔，以保卫新建的晒盐场：“每段城墙大约30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注），下面接近城墙的那一面，靠近熬盐场的地方，把有黏土之处堆满了石块，他亲自掌控火绳兵和卫队，在城里还为他本人组建了速射队”。在这段时间前后，在注入丘索瓦亚河支流亚伊瓦河的乌索尔卡河的河口修建了第二座小城亚伊瓦。

1568年，雅科夫·斯特洛干诺夫也得到了这样的允许：紧靠着新的盐田沿丘索瓦亚河向上“修建要塞和小城市”并在那儿雇佣士兵和炮手。这样就产生了下丘索瓦镇，而后来，随着丘索瓦亚河上游发现盐水，又出现了上丘索瓦镇。稍晚些，在瑟尔瓦河边建成了坚固的小城，而到了1597年在奥切拉河岸（注6，99、100页）建成了奥切拉小城堡以保护捕鱼业。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做这一切都是靠贩盐的收入，当时贩盐的丰厚进项甚至高于贩酒的收入。

阿尼加和他的三个儿子雅科夫、格里高利、谢苗都在沙皇伊凡四世直辖的禁卫军服役。像所有的禁卫军一样，他们要发毒誓忠于沙皇，忠诚地为他服务，不能阴谋反对他，要告发所有背叛他的人。

斯特洛干诺夫一家作为沙皇的差役利用受信任的特殊身份在这些年里积攒了大量的财富。1571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烧毁莫斯科城厢后，出现了诺盖人和西伯利亚鞑靼军队进攻彼尔姆领土的现实危险。

斯特洛干诺夫一家决定加强自己城镇的卫戍部队并且不晚于1572年春天雇佣了1000名伏尔加哥萨克为自己服务。有这样一种传说，在

这 1000 人当中有在卡马河服役不少于两年的哥萨克军官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说实话，这不太可能，因为沙皇害怕被黜，已要求斯特洛干诺夫把所有被他们招募的哥萨克队伍派到西方去抵御克里米亚鞑靼军队新的进攻。

西伯利亚可汗和诺盖人进攻的威胁迫使沙皇允许斯特洛干诺夫一家在靠近各乌拉尔山口的瑟尔瓦河岸建立牢固的城堡。后来他们一家甚至在乌拉尔那边的土拉河地区的达赫切依建立了据点——居民点，而这里先前属于诺盖人的领土。

库楚姆的代理人在得到西伯利亚可汗相助的保证后开始鼓动切列米斯人（现名马里人，俄罗斯马里自治共和国的基本居民——译者注）和巴什基尔人暴动反抗莫斯科，这使形势复杂起来。1572 年，起义的切列米斯人、巴什基尔人和汉特人抢劫了卡马河上的商船队，“杀死 87 个俄罗斯商人”（注 8，357 页）。1573 年夏天，以库楚姆的侄子马麦特古尔可汗为首的西伯利亚军队越过乌拉尔山抢劫了卡马河左边的支流丘索瓦亚河岸边的俄罗斯居民点。遭殃的还有臣服沙皇的曼西人，他们的男人同俄罗斯男人一样被杀死，而女人和孩子则成了俘虏。

马麦特古尔在路上成功地抓获并杀死了贵族的儿子（人们这样称呼那些有国家公职的小地主——大公卫队年轻成员的后代或没落贵族世家的后代）特列齐雅科·丘布科夫，他是被派往哈萨克汗国做大使的。此后同莫斯科的和解就再也不可能了。

因为喀山边区的起义愈演愈烈，所以沙皇宣布在全俄招募贵族后备军。但谨慎的马麦特古尔在离斯特洛干诺夫的小镇 5 俄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并向前方派出了侦察巡逻队。打听到俄国军队在伏尔加河沿岸集结以及斯特洛干诺夫那儿出现了不少于 1000 名伏尔加哥萨克的消息，马麦特古尔返回了乌拉尔山那边。得不到西伯利亚可汗帮助的起义者放下了武器并宣誓效忠沙皇。

马麦特古尔彼尔姆远征的结果是拔除了达赫切依地区斯特洛干诺夫的居民点。齐基尔是该地区当地汉特人的王公，马麦特古尔的士兵杀死了他。但住在达赫切依周围当地的汉特人同俄国人有久远的联系，不愿服从西伯利亚鞑靼人，于是派出急使请求俄国当局帮助他们抵御库楚姆的仆从。

斯特洛干诺夫一家一直想占据乌拉尔山那边的领土。在沙皇公使丘布科夫被杀后，他们又轻易地从莫斯科政权那儿得到一些新的特权。1674年，斯特洛干诺夫一家得到沙皇颁赐的特权证书，内有：“根据阿尼加·斯特洛干诺夫家的孩子雅科夫和格里高利的禀报赏赐如下：在达赫切依和托博尔河边给他们建要塞，为抵御西伯利亚人和诺盖人可以拥有火器，雇佣炮手和火枪兵，在要塞周围，在采铁场附近……起院墙……可以拥有用以经营的林、牧耕地。”（注12，458页）

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应当保护沙皇使节前往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汗国道路的畅通，为此沙皇答应他们许多事，其中有：“我们还奖励雅科夫和格里高利：在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和其他的河边，在那些适宜防卫的地方，为猎人的休息修建要塞，雇佣着火红色服装的卫队，在约定的20年到期前，捕鱼、捕兽不交代役租。”（注15，670页）

这就是说，莫斯科当局坚定地要求斯特洛干诺夫家族不仅要占领彼尔姆，还要夺取外乌拉尔的省份。但斯特洛干诺夫家族暂时只能考虑巩固自己在丘索瓦亚河边的小城镇而非向乌拉尔那边出征。

# 古代西伯利亚历史

因此，西伯利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历史、它辽阔的领土和开发它的历史，而且是所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众多部落和民族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些民族同不仅是相邻的国家，而且常常是非常遥远的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复杂关系的历史。简单地说，这是世界历史中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发现西伯利亚》

俄罗斯人到西伯利亚时，西伯利亚不是一个空无人烟的地方，那儿已经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复杂的历史，自己的信仰和神话，自己独特的文化。西伯利亚何时出现了人类，他们是怎样沿着广阔的西伯利亚大地迁移的？目前这对于科学界来说在许多方面还是个谜。有一点很明确：人类往西伯利亚迁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应当发生在欧亚各个不同的地区。但这一过程既已开始，那么古人——最初向亚洲东、西部去的猎人——的迁移就已经无法停止。在描述西伯利亚古代史时，我们将主要使用 8 世纪和 11 世纪文献中的资料。

## 捕获猛犸的西伯利亚猎人

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旧石器时代（古老的石器时代）的人从原住地区沿着几条道路分别迁到辽阔的西伯利亚大地的深处：从中亚细亚（沿里海低地、科彼特山脉和伊朗高原山麓、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沿着帕米尔和天山山脉；在南方是从蒙古草原往北；西面是沿乌拉尔山西部各省和俄罗斯平原。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旧石器时代人们向西伯利亚移民起码是从三个中心，沿着三个方向：从亚洲中部和东南部，从东欧和中亚细亚。在伊尔库茨克和巴拉干斯克之间的安加拉河岸边、在叶尼塞流域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地区、在阿尔泰山区的卡通河流域、在勒拿河上游和外贝加尔的色楞格河流域，学者们已找到了旧石器时代游牧人和猎人营地的残迹以及原始人村落的遗址。

在两个相隔只有几公里的古代居民点马利塔（靠近伊尔库茨克的安加拉河左边支流别拉亚河左岸同名的古代村落）和布列齐（安加拉河右岸另一处古老的西伯利亚村庄下布列齐）发现的東西为上（也就是晚期）旧石器时代猎人的不同寻常的技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25000 年以前，这些村落里住着捕猎猛犸、毛犀牛和北方鹿的猎户。并且，就像一些学者所查明的，这些猎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半定居的方式。一般说来，这同石器时代的猎人过着漫游无定的生活的固定见解是矛盾的。为了过冬，他们沿着河岸建造了一些完整的村落，里面那些结实的住宅相互之间紧靠着（在布列齐就发现了四座这样的住宅残迹）。

广泛使用猛犸骨、犀牛骨和北方鹿的角作为建筑材料是这些住宅的特点。布列齐保留下来的一所住宅比其他的都好。里面 12 根竖着安装的“柱子和支架”作为房子的根基支撑着墙壁和屋顶，这是些猛犸的腿骨和长牙，还有猛犸和犀牛的颅骨，它们的下端埋入地下，并用石灰石板从下面加以固定。

学者们查明，最有可能的是，这所住宅的圆形屋顶有一个用鹿角相互交叉编织而成的网状的骨架，毫无疑问，为了建房使用大型动物的骨头不是偶然的。问题在于，当时安加拉河两岸都是草原和冻土带，而没有森林。住在白令海峡两岸的爱斯基摩人和定居的楚科奇（楚科奇一词源于楚科奇语“恰乌楚”鹿多之意——译者注）人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在建造自己冬天的住所时，用的也是被海水冲来的鲸鱼的鳍和骨架部分。

这些住宅里面有炉灶，人们用它生火做饭。正是在这些火堆旁边，旧石器时代的工匠用石制工具制作了精美的猛犸骨雕塑。

在马利塔和布列齐发现了独一无二的妇女雕像，有赤裸的，有穿皮

衣的。学者们在这些雕像上看到了世上最古老的缝制衣服的图像。1936年，在布列齐找到的小雕像上能看见用皮子缝制的毛朝外的连衫裤，将年轻妇女的身体从头到脚紧紧地裹住。最初的雕刻者用半圆的小坑和刻纹给用来缝制连衫裤的皮子做上标记，这些标记按一定的规律、顺序分布在小雕像的整个表面上。

按照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的意见，正是这个布列齐的小雕像传达出了“脸部所表达的独特生命力”。就像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所作的那样，他动情地、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古代工匠这件卓越的艺术作品：“她的长长的椭圆形的脑袋向上收窄，前额小巧突出，面颊和颧骨的轮廓非常清晰，向前突出；下巴的塑形圆润。嘴不显露，但能‘猜出来’，没有它也无关大局。稍显胖的鼻子的线条很柔和，往下是明显的阶梯形。不大的眼睛斜视着，给人的感觉是一对扁桃形的坑。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立刻就让人回忆起某个特定的种族——蒙古族人面部的特征。”（注8，50页）

这些赤裸的女性小雕像出色地展示了女人形象那种稳定的“几乎是合乎规范的”完美性，这样的女人形象经常被塑造成挺直身子站立、双手叠加在胸前的样子。这些小雕像上女人的头发“或者浓密、厚实地垂落在胸前，或者一绺绺相互平行地堆积起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呈阶梯状平铺开”（注8，48页），并且女人的裸体被旧石器时代的工匠塑造得真实和准确。通常这是一个成熟女人的胴体：丰满结实的大腿、硕大的肚子和乳房。在西欧和东欧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的雕像恰恰就是这样的，这些雕像是最初的工匠按照女性始祖的观念创造的，这些观念同对多产和母性的崇拜密不可分。

在马利塔和布列齐也找到了精美的用猛犸牙雕刻的泳禽类动物的雕像——天鹅和水鸟。古代的工匠善于用猛犸骨制作各种装饰品。在马利塔一所房屋的地底下，人们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坟。从前某个时候孩子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华美的用猛犸牙雕刻的带花纹的项链，珠串的尽头是一个用猛犸骨制作的飞鸟状的雕像。在这个坟里还找到了一些雕刻的妇女的冠状头饰、手镯和当作护身符的小牌牌。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迁移到了西伯利亚南部的是些什么样的能工巧匠啊！但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怎样出现在安加拉河？A. П. 奥柯拉德尼科

夫院士（许多学者同意他的意见）就此写道：“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20000年（布列齐的日期——21000年）前猎人们像一股涓涓细流，也仿佛是旧石器时代社会的一些‘原子’从西方经乌拉尔深入到安加拉河去捕猎猛犸。他们在现今的阿钦斯克（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译者注）（那儿发现了早先捕猎猛犸的猎人居住的村落，这些猎人有着与古代马利塔人和布列齐人相似的技能，同时与旧石器时代西方猎人的技能也有共同之处——作者注）建立了歇脚点。到达托木斯克后，他们杀死猛犸并吃掉它们。然后，他们就在马利塔和布列齐永久定居下来，并用猛犸和犀牛的骨头建造自己的村落。”（注11，61页）

## 西伯利亚最初的捕鱼业

西伯利亚早期社会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在最后的冰冻期结束时。大陆的冰川消失了，冻土带和草原上出现了森林。冰期后气候变暖发生在8000—4000年之前。这个阶段在人类发展史上被称作中石器时代。

西伯利亚许多部落制作狩猎武器的技艺在中石器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世界上最早的一些片状箭头正是在西伯利亚中石器时代的坟墓里找到的。而它们的出现是以弓这种狩猎武器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使得石器时代的人类在发展狩猎经济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捕鱼业和狩猎一样在这个阶段的人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初专用的捕鱼工具有大鱼叉，以及制作精巧的骨制鱼钩。在中石器时代人的村庄里发现了用砾石和大块的硅石做成的专用的石镞子，由此可以认定，贝加尔湖周围的猎人和捕鱼者已经懂得造船了。

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意见，正是从西伯利亚中石器时代起（中石器时代远东沿海边区的发现物），“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国、日本列岛、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最终还有北美大陆开始孕育最早的岛国居民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注8，91页）。

在6000—5000年之前，西伯利亚开始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这个广袤的地区自然界大体上具备了当代的面貌。沿着北冰洋海岸分

布着冻土带。它的南面是森林冻土带区域，那儿的森林沿着河谷一直伸向冻土带，再往南展现出大片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

新石器时代时，人类已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所有的领土上居住，但当时西伯利亚的居民还很少。新石器时代在西西伯利亚沿着无数条大河两岸和湖泊四周居住着不同的部落，他们突出的技能就是会制作黏土器皿和磨光的石头工具（其中有凿子、刀子、镑子、燧石长刮刀、箭头和枪头等）。

新石器时代鄂毕河沿岸的居民主要以捕鱼为生。因为广阔的鄂毕河流域给人们提供了经常性的食物来源，这就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类型。首先，这些主要住在窑洞里的部落相对的定居性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他们这种特殊的技能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比如用鱼皮缝制衣服，而且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他们的衣服，——Г. 诺维茨基 18 世纪初在谈到居住在鄂毕河两岸和它的支流岸边的汉特人时写道，一般说来，用鱼皮制作，最常用的是类似鲑鱼的江鳕鱼，还有鲟鱼，只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把鱼皮整平、弄软，好像能够用它们给自己缝制所有的衣服，一般说是用江鳕鱼的皮，用另外的鱼皮制作袜子、靴子。”（注 8，97 页）看来，新石器时代人们就是这样的。

## 新石器时代西伯利亚猎人的美丽的驼鹿

学者们在鄂毕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人村落遗址找到了许多漂亮的古代艺术品，如飞鸟骨雕、各种野兽的雕像。从新石器时代萨姆西卡墓地遗址出土的狗熊雕像在学者中特别有名。“狗熊摆出一种平静的姿势，两只前爪像人一样叠加在胸前。狗熊的脑门很大，嘴是那种长长的典型的熊嘴。脑袋上竖起两只圆的扁平的耳朵，两个小坑标志着两个小眼睛，长嘴巴刻画得非常细腻。整个雕塑给人一种平静、安详的感觉。”（注 8，101 页）而在鄂毕河上游沿岸的悬崖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可以看到奔跑的狗熊和驼鹿，还有急速飞行的鸟的造型。

这并非偶然。因为西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同居住在里海和乌拉尔山之间北部森林里的部落文化相近。在那儿，在鄂毕河流域住着一个石器时代很大的人类种群——乌拉尔人和乌戈尔人。

熊在乌戈尔—芬兰部族的世界观、神话和宗教信仰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鸭子在他们的神话中的作用也可以说是这样。要知道，在芬兰部族的神话里的和平来自被一只巨大的鸭子带到海上的鸭蛋。

学者们特别推崇居住在安加拉河两岸和勒拿河上游以及色楞格河下游的部族，他们在公元前4—前3世纪创造出了独特的贝加尔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部族的人更多地从事捕猎一些大型的原始森林里的动物——驼鹿、鹿、熊和野猪。

正是这种狩猎的需求激发了当时的人去创造出新的、更加完善的捕猎工具。出现了大号的相当重的箭头。为了把带有这种箭头的箭射到相当远的距离，又发明了大号的弓。学者们推断，这样的弓的长度达到1.7—1.8米，而用弧形弓弦把弓的木制的呈弯状的两端系紧。

显然，用这种弓射出的箭比从前的箭飞的距离要远得多，并且有巨大的杀伤力。为了打死近距离的动物，人们使用了一种带有用硅石和硅页岩制作的又长又重的枪头的矛。

被驯服的狗参与了围猎，帮助新石器时代最初的猎人寻找野兽并追捕它们。狗在新石器时代猎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对它的关心超过对任何一种其他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的村落里发现了一些专门埋狗的坟地。或许，埋狗时还要举行某种应当保证狩猎成功的仪式。

对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安加拉河两岸、勒拿河上游和许多其他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部族来说，驼鹿这个森林中的庞然大物的形象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世界观和神话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那儿的悬崖上雕刻的许多岩画中都有驼鹿的形象。

就像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精准指出的那样：“森林猎人不仅把驼鹿看作食物的来源，而且把它的作用看得无可比拟得重要。驼鹿这种神兽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宇宙本身，仿佛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物质出现的宇宙，也好像是作为一只母驼鹿出现的宇宙，不管对当代人来说显得多么奇怪。宇宙的三个世界：天上，中间世界——我们的地球，想象中死人的地下王国——地狱，都通过驼鹿的形象呈现出来。”（注11，75页）

在新石器时代最初的猎人的想象中，甚至太阳的升降也成了神话中的猎人不停地反复地猎取“天上的神”驼鹿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

驼鹿死了，然后又诞生并以太阳的形象出现在天上。

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的猎人们还把对自己氏族先人的祭祀同驼鹿的形象联系起来。悬崖上有画上的或打造上的驼鹿图形，看来是举行祭祀节庆活动的地方，活动的目的是保佑氏族的平安、氏族猎人狩猎成功，祈求整个部落居住区野兽大量繁殖，多多益善。

## 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鱼钩是怎样被发现的

大约 5000 年以前远东领土上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的典型特征是：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陶器，猎人使用弓箭，还有磨光的石器。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上游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狩猎，只有部分人从事捕鱼业。在阿穆尔河中游和沿海地区居民除了捕鱼和狩猎还从事农业。学者们在这个地区挖掘古代村落时发现磨粮装置的部件并非偶然。俄罗斯的哥萨克 17 世纪时正是在那儿看到了达斡尔和久切尔（或杜切尔人，系女真人。女真原作“朱里真”，又作“朱里扯特”“主尔扯特”“主儿彻特”“拙尔察歹”，即满语之“珠申”。俄语的“Дучеры”“Джючеры”或“Дючеры”显然是“朱里扯特”等女真的转音——译者注）部族的种田能手。

19 世纪中期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的居民是这些民族的后代，他们使用的历法明显地反映了这些以鱼为主食的公认的“吃鱼者”的活动。5 月的称呼恰恰就同最初出现的一种叫作“杰恩基”的鱼有关。6 月被称作北鲟，因为这时它在河里的数量最多。8 月鱼的巡游最频繁，因而被称作“大鱼月”或者“大月”。7 月鱼的穿行、巡游不大，所以被称作“小鱼月”。

阿穆尔部落的人连衣服也用鱼皮制作。捕鱼业对他们的意义可以在当地的神话和民间口头创作中得到反映。在阿穆尔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学者们发现了不知作何用的有钻孔的圆形石头、石棒槌和铁拳头。直到当地乌尔其和基里亚克居民中的老人做了解释之后才搞清了这些东西的用途。原来在新石器时代和不远的过去，这些东西是用来打死被鱼叉叉伤及撞在网里或上钩的大鱼——鲟鱼和大鲟鱼的。考虑到新石器时代阿穆尔的渔民乘坐的是一些很轻的小船，很难想象用另外

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大个儿的哑铃形的铅锤对新石器时代的渔民来说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看来，在阿穆尔河和一些流速很快的河里安放渔网尤其是大渔网时，这种大型的铅锤是有效的。1961年，在阿穆尔河中游新彼得洛夫卡村，考古考察队领导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在挖掘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时找到了一个独特的用玉石做的带钩的鱼形金属片，这是在挖掘时找到的最古老的鱼形金属片。

奥柯拉德尼科夫的学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纳托利·班杰列耶维奇·杰列文科讲述了这次能够证明古代渔民的技艺和发明才能的发现：“古代阿穆尔的工匠用玉石制作出了各种装饰品。其中有一些柔和的微白色的带有浅绿色纹理的带钩的鱼形金属片。它的形状像一个槽形的板片：一面凹，另一面凸。一端椭圆，稍有些尖，另一端稍厚些，在一端有钻孔用来穿钩线。”

当奥柯拉德尼科夫找到首枚带钩的鱼形金属片时，“出现了许多关于它的用途的猜测，但所有这些猜测由于各种原因都被否定了。金属片长期放在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的桌子上。有一次，他年轻的邻居到访，看到这个东西后惊奇地喊叫起来：‘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你从哪儿弄到这么精美的鱼形金属片啊？’这一下子决定了这个不知作何用途的发现物的命运。他们立刻往浴缸里注上水，给金属片拴上线，金属片真的在水里漂游起来，完全就像它的现代姊妹——渔夫绞竿上的带钩的鱼形金属片那样游动”（注 58，307 页）。

大量储备风干的、渍酸的鱼使得冬季也能养活许多人。于是出现了一些大型的能住好几百人的渔民村落，冬天村里人住在一些一百平方米或更大些的半地下的房屋里。旁边是保存储备品的仓库、鱼的烘干房，以及夏天的住所——建在木桩上的小屋。

阿穆尔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形式多样的表现对多产和母性始祖崇拜的艺术，这种崇拜在母系氏族时代就产生了。离阿穆尔共青城不远的博隆—奥扎尔湖（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中游平原的东北部——译者注）原来盛产鱼，中间有一个不大的处处是峭壁的岛，学者们在岛上发现了一个用来祈福多产的古庙宇，里面有一些用石头雕刻的造型符号，表现了最初的男女

(注 8, 134 页)。

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的岩画——“李奇纳”令人震惊，它们完全是独创的，不同于西伯利亚和北欧的岩画。19 世纪后半期，在阿穆尔河岸边、古代那乃人村庄萨卡奇—阿良附近发现了部分外切的大圆石，上面有一些打造出的面具“李奇纳”。就像在现场亲自研究这些面具的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指出的，“萨卡奇—阿良大圆石上的图案带有太古时代的特征。它们经常被研磨得如此光滑，以至于用眼看很难确定个别人物的轮廓和它们的细节。起初在很多场合下，要想成功地考察图案上的沟槽，只有靠触觉，靠用手抚摸。在古代打磨出来的石头的表面非常均匀和光滑，而原来大圆石上的底儿既不平又粗糙，人手都无法触摸”（注 11, 120 页）。

在萨卡奇—阿良总共发现了 150 个类似的图案。许多图案都是在舍列蔑杰沃村上面、乌苏里江右岸的悬崖上和沿着从哈巴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流动的吉雅河河谷的峭壁上找到的。

这些独特的面具——“李奇纳”要么使人想起人的颅骨造型，要么是脑袋的造型，上面有窄小的斜视的眼睛。在某些图案上还可以分得出松软的大胡子和浓密的上髭。在阿穆尔河岸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黏土器皿废墟中也找到了类似的“李奇纳”，而且这儿的“李奇纳”已经带有躯体和手脚，但手脚的末端不是指头，而更像是尖尖的指甲，就像是安上了熊爪。看来，这些“李奇纳”是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人为解释周围的世界而创造的古代神话中的形象出现的。

而在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下游渔民的定居点康顿（按照 20 世纪 60 年代所作的碳射线分析，它的年龄为 4520 年或再多 20 年）（注 58, 319 页）也找到了一个精美的黏土小雕像。这又得让著名的考古学家、康顿挖掘工作的领导者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了：“从历史的尘埃中显现出来的不单单是一个古代妇女的概括的人种学形象，更像是她的一个肖像造型。新石器时代对现实极其敏感的雕塑家以一种真挚的热情用黏土传达出特定的人类的脸部特征。首先能够抓住观众眼球的当然是被细腻地描绘出来的宽宽的椭圆形的脸，还有脸上那对蒙古人来说很平常的突出的高颧骨。再就是小巧的下巴和同样小巧的、非常突出的、向前噉着的嘴巴。像北美印第安人一样细长的鼻子非

常引人注目。在一块柔软的黏土上深深刻出的眼睛又细又长，像一条弧形的缝隙，十分夸张。这个康顿小雕像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可能是它那向观众稍稍倾斜的脑袋和细长柔软的脖子。这个姿态立刻使我们感觉到某些遥远的东西如同近在眼前。这不就是闻名天下的埃及女皇吗？就在此刻，挖掘的大学生们送它一个名字：阿穆尔的涅费尔基基（埃及阿麦哈杰帕四世法老的妻子——公元前 14 世纪，译者注）。”（注 11，126 页）

## 西伯利亚最早的畜牧家和冶金家

公元前 3 世纪后半期，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部落中出现了金属（铜制）工具。饲养牲畜首次成为他们经济中的一个固定部门。考古学家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杰普洛乌霍夫根据 1920—1929 年在巴杰尼村附近山下的一片丧葬地——土墓中发现这个时代最早遗迹的地点把萨彦岭、阿尔泰地区古代部落在历史上所处的这个阶段叫作阿凡纳谢沃文化中的阿凡纳谢沃时期。依据对古代坟墓的挖掘，他得以首次查明古叶尼塞部落从公元前 3 世纪末到蒙古时期（13—14 世纪）文化发展的脉络（注 54，49 页）。杰普洛乌霍夫这份核实过、补充过、有的地方修改过的年代记略图直到 20 世纪末在主要的特征上仍保留了自己的重要性。

阿凡纳谢沃部落继续广泛使用石制工具：斧子、杵、标枪头和箭头。但金属已经被用来制造耳环、手镯等装饰品，还用来制造针、锥子和小刀。同时，无论是铜，还是金、银，甚至是陨石铁都用来制造装饰品。人类社会这个为了制造劳动工具同时使用石头和金属的发展阶段被称作铜、石并用时代或青铜时代。

重要的是，阿凡纳谢沃人不仅喂养羊、牛和马，而且还开始掌握农业生产方式。的确，没有阿凡纳谢沃人从事农业的准确资料。但学者们认为，农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家畜饲养业的兴起，在阿凡纳谢沃人的丧葬地找到的石杵和木槌用来捣碎禾谷类粮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仅住在叶尼塞草原，而且还遍布阿尔泰山区的阿凡纳谢沃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大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是欧亚大陆欧罗巴部落最东边的分

支，即来自西方，而他们所有东、西方的邻居都是蒙古人种。

从公元前2世纪起，奥古涅夫文化（这个称呼是根据C. A. 杰普洛乌霍夫挖掘这些部族的人最早的坟场地——哈卡斯南边的奥古涅夫村给出的）时期的一些部落就住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这些部落的墓地坐落在叶尼塞河、阿巴坎河（叶尼塞河西边的支流，位于哈卡斯共和国境内——译者注）及它们的支流乌依巴都河、卡梅什塔河、切尔诺瓦河两岸。奥古涅夫人晚于阿凡纳谢沃人来到叶尼塞河并从这些地方挤走了后者。外来户的身体形状不同于阿凡纳谢沃人，他们身材高大，带有欧罗巴人的脸部特征。但奥古涅夫人不是纯种欧罗巴人，他们身上能看到明显的蒙古人的特征。

奥古涅夫人主要从事畜牧业——饲养羊和牛，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构成坟墓四壁的板材上经常能看到用尖东西画出的公牛和母牛的图案。牧人被迫长期离家放牧，所以放牧成了奥古涅夫男人的主业。而女人则从事家务和照料小孩。她们重要的工作是纺毛线、织布、做衣服以及制作黏土器皿。

奥古涅夫人加工金属的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些坟墓里发现铜和青铜的鱼钩、刀、针和装饰品是极为平常的。和一些用锤平的金属薄片制作的产品一起出现的还有铸造产品，例如铜斧子。

奥古涅夫人的艺术作品震惊了学者们：人脸部的石雕，小小的头部石雕，上面刻有女人脸的骨片，用骨头和石头刻出的鸟和兽的形象，在石板和雕刻物上打造出的幻想中的猛兽。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石板上真实地、用细腻的线条刻出的母牛和公牛的形象。学者们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奥古涅夫人“多半是从北部森林”来到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也可能是从叶尼塞中部某个地方”（注8，169页）。

顺便说一下，按许多学者的意见，正是奥古涅夫人这种起源解释了他们艺术作品（看来还有宗教）中艺术形象独特的两重性：幻想中猛兽的形象——这是原始森林中古老的狩猎生活方式和旧传统的回声；而人的造型和公牛、母牛的造型——这已经是新的与畜牧业生活方式相关的传统的表现了。

公元前2世纪中期，西方的一些部族来到米努辛斯克盆地顶替了奥古涅夫人，他们的文化被称作安德罗诺夫文化。学者们断言，这种文化

时期的部落主要分布在沿乌拉尔地区和哈萨克斯坦，所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仅仅是这个地区最东面的部分。人们在西伯利亚南部全部草原地区和部分森林草原地区发现了安德罗诺夫文化的遗迹。因此，根据《西伯利亚历史》一书作者的意见，统一的安德罗诺夫文化分布在从沿乌拉尔山到叶尼塞河地区（注8，272页）。

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在于：这个时期的畜牧业（牛、羊、马，看来，它们首先是作为役畜来使用，以及作为肉源）和原始的农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开始完全决定了安德罗诺夫部落的生活性质。

铜铸造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学者认为，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从不深的矿井开采铜矿，然后用原始的专门的炉子将其熔化。铜在坩埚里熔化后分注到模子里，铸成后接着开始锻造工具的工作部分，而刀口还要磨快。众所周知，在开采铜的同时，安德罗诺夫人还开采金子。安德罗诺夫人的村子里有可能出现了生产铜产品的工匠，对他们来说，制造工具就是生活中的主业，也就是说，在安德罗诺夫人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劳动分工。

安德罗诺夫人的生活方式首先是由对牛群的照管决定的。公牛和母牛需要有一个方便的饮水处，所以安德罗诺夫人的经常性住所都在近水处。而且储备过冬饲料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定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他们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河谷里，在一些固定的地方，因此这有助于建立定居的生活方式。严寒季节，安德罗诺夫人只能把家畜赶到自己屋里，此前它们都待在专门的牲口圈里。

在安德罗诺夫人的社会里，男人、牧人和士兵的作用加强了。学者们认为，正是从这时起，父权制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制度下，畜群都掌握在某些以男人为主的家里，而这个男人会尽力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孩子们。

毋庸置疑，安德罗诺夫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学者们推测，安德罗诺夫人挤走了当地的部族并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多半是从哈萨克斯坦来到西伯利亚南部的，并且在公元前16—前14世纪沿南西伯利亚扩散开。

后来，历史上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蒙古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卡拉苏克文化（它是用卡拉苏克—“黑水”河谷挖掘地

来命名的)时代来临了。可以确信,卡拉苏克文化是在安德罗诺夫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同其他文化的交流却扩展到遥远的东方——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西部。同时它对相邻的森林草原部落和草原部落的文化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这个地区定居的农牧部落过渡到了半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经济活动的周期如下:春天,粮食播种后,他们赶着畜群转移到夏天的牧场,而秋天回来收割庄稼并来到过冬地。这样一来,冬天的居住地就安置在冬天的牧场区,夏天的安置到夏天的牧场区。

卡拉苏克文化时代的部族开始将马用来骑乘。学者们在坟墓里找到了早期的也是原始的带骨制垫圈的笼头,但没有坚硬的嚼子。人成了骑手,这立刻为军队乃至整个部落的机动性创造了一种可能,尤其是当考虑到在安德罗诺夫时代马已经作为役畜来使用了。所以,保证“民族迁移”、保证部落和整个部落联盟大规模、长距离向新的居住地移动的所有前提条件都具备了。然而,卡拉苏克人暂时还是有固定的住所,不过按学者的意见,他们只是冬季在那儿住。

卡拉苏克文化的特征是:具有高超的铸造技术水平。这个时期的部族分布的所有地区有数不清的古代的铜矿场。在制作艺术产品时,卡拉苏克的工匠表现出独特的技艺。工匠们学会了使用石头或黏土做的两面开合的铸造模型。形状复杂带图案的铸件被广泛应用。所作的分析表明,卡拉苏克的铸工在铸造青铜产品时使用了专门的添加剂——砷或锡,但是用纯铜制作铸造物则不然。

## 西伯利亚斯基泰人<sup>①</sup>的历史

公元前8—前7世纪住在欧洲东部和亚洲草原上的部落完成了从农牧业向游牧—畜牧业的过渡。这个过渡给世界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导致了新的部落联盟的形成,促进了一种新的独特文化的发展。但欧亚大陆这块草原地区的所有部落却有着在总的方面相似和同源的文化,

---

<sup>①</sup> 又译西徐亚人,公元前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中国《史记》和《汉书》称为“塞”或“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译者注。

它们被冠以斯基泰型、斯基泰—萨尔马特型或者斯基泰—西伯利亚型文化的名称。

叶尼塞中部草原的周围有许多山脉和无法通行的森林，这造成了同外界一定程度的隔阂，使得卡拉苏克部族没有过渡到游牧生活方式。但这些部落文化的发展使得米努辛斯克盆地和丘雷姆—叶尼塞草原盆地地区形成了新的、独特的、著名的达加尔文化。达加尔文化得名于米努辛斯克盆地附近的达加尔岛，现在已成为米努辛斯克市的一部分。19世纪末，考古爱好者 A. B. 阿德利阿诺夫、Д. А. 科列敏茨和 И. П. 库兹涅佐夫—科拉斯诺雅尔斯基最早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开始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并找到了 30 多个当时的墓地。

在叶尼塞中部的草原地区有许多达加尔古墓。距离叶尼塞河右岸的支流阿巴坎河河口 60 俄里的阿巴坎城堡地区有达加尔文化时期的一些古墓，俄罗斯最早出于科学目的的发掘就是从这儿开始的。1722 年 1 月，彼得一世派学者 Д. Г. 梅赛施密特到西伯利亚进行科学考察，发掘工作就是由他完成的。此后，首次发掘古墓的日子——1722 年 1 月 6 日——通常被看作西伯利亚考古的开端。正如后来参与挖掘的人所解释的：“博士之所以强迫人们在这儿挖，是因为他想了解，这些多神教徒在古代是怎样为自己建造坟墓的。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还画了一幅不大的墓地的草图。”（注 54，12—13 页）

很久以后，学者们查明，达加尔文化从公元前 7 世纪存在到公元前 1 世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的时间都达到了 200 年。公元前 2—前 1 世纪，在达加尔文化时期的部落中能明显地看到部落贵族和平民的分化，因为学者们碰到了两种类型的下葬：公共墓地和分布于堆积而成的古坟场里的单独墓地。此时在埋葬地已经找不到青铜工具了，学者们在坟地里发现了铁制的刀、匕首、铍子等，铁器时代开始了。

看来，墓地里的贵族都有一番被做成木乃伊的经历。为此，需要用环锯术取出颅骨中的脑组织。习惯上人们把脸部柔软的外皮取下，把颅骨涂上黏土，用逼真地传达出死者面部特征的彩绘石膏面具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在以后的世纪里，这个风俗在叶尼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达加尔文化时期的部落间存在某种隔阂是因为该地区四周有一些天

然的障碍，即使如此，学者们还是注意到，他们同其他的草原部落还是有接触的。毫无疑问，这可以从他们的文化和其他草原居民的文化沿着相似的道路发展得到证实。

这种相似明显地表现在达加尔人的武器（匕首、箭和斧钺）和他们的马具的形状同其他部落的武器和马具的形状相似，这些部落中不仅有相邻的图瓦和阿尔泰的部落，还有东欧的斯基泰部落。这种相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被称作“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的”艺术创作中，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还会详细地谈到。据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推测，达加尔人使用东伊朗语。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地区许多河流的名称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鄂毕河的名称在塔吉克人那儿意味着“水”（注 11，83 页）。

现在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斯基泰文化时期那些部落的历史。按照 C. A. 杰普洛乌霍夫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 M. П. 格利亚兹诺夫的分类法，斯基泰时代文化的繁荣期是在公元前 5—前 3 世纪，这个阶段被称作巴泽雷克发展阶段，它因为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河谷挖掘出大量墓地而得名。当然，还有那些在图瓦所挖掘的未被盗和未被破坏的早期坟场在研究斯基泰时代的文化时起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在 M. П. 格利亚兹诺夫教授主持下，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牵头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进行了考察，这是苏联时期这类最重要的考察之一，它在研究西伯利亚南部古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参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次考察的工作人员对研究西伯利亚南部古代的坟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挖掘阿尔泰和图瓦地区的古代坟场时发现，当时对木制器具、皮子、毡子和纺织品的保存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因为坟场的下面是冻土，它能很好地保护古代的坟墓。

对巴泽雷克坟场出土的木器所进行的碳射线分析给出了坟地的时间：2240—2290 年和 2350—2490 年。显然，这正是斯基泰文化时代部落的坟场，这些部落在那个时候迁到了阿尔泰、图瓦和中亚、东哈萨克斯坦的许多省份。

通过游牧的方式饲养牲畜是这些部族的主业。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斯基泰文化时期的部落饲养了一些肉用的肥绵羊，羊毛用来做织物，滚成

大块的毡。除了绵羊还饲养乳畜和马。可以认为，农业在他们那儿只是辅业。历史学家 A. Д. 特卡奇肯定了狩猎在巴泽雷克部族中的重要作用。在一些坟场里曾挖掘到猎人的护身符：狗熊、野猪、麝、大角鹿的獠牙和野兽的雕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山羊、绵羊、大角鹿、驼鹿、羚羊、野猪和猛兽是这个地区斯基泰时代部落的猎杀对象。（注 8，228 页）

这些部族住在毡房里，诚然，他们也有圆木造的房子。显然，巴泽雷克人是出色的骑手，他们还使用马车运货。

这些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些强人，他们死后被葬在高处的坟场。修建这些大型的墓穴要耗费巨大的劳动和时间。尺寸较小的坟地用来埋葬部落的贵族人士。

斯基泰文化时期的部落生活伴随着某些个别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无休止的战争。首先是为了优质的牧场，为了控制主要的财富——畜群。在这些骑兵部队冲突的过程中，胜利者抢占了别人的土地。有趣的是，在这种时候他们首先要破坏的是部落联盟和氏族贵族首领的大墓穴。看来，这种亵渎坟墓的做法被他们看作对失败者最大的侮辱和向对方复仇的方法。

斯基泰人用香料对死去首领的身体进行防腐处理，还要把在下葬时被杀死的首领的近臣、妃子或者年轻的妻子的尸体一并放入大坟墓。他们常常把下葬的尸体放入一些用整块西伯利亚落叶松树干挖成的木制棺椁里。

在首领和贵族的坟地里学者们找到了马的残骸，并且依据死者身份的不同在坟地里葬入 2 匹到 10—14 匹马。而在图瓦地区阿尔让村的大型石棺墓地的中心石棺里埋葬着看来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妻子。学者们在那儿发现了不少于 160 匹各色骑乘马的残骸，上面有华美的装饰：青铜马嚼子、金质的额头小牌牌、彩石和野猪牙制成的坠儿，马的尾巴上系着金质的条带。和首领的残骸在一起的那些马被装饰得尤其华丽（注 54，82 页）。

有意思的是，在阿尔泰和图瓦地区的斯基泰人那儿还有本地品种的马——矮个的和耐力好的，以及显然多半是从中亚细亚运来的马——高大、匀称、善跑的马。

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斯基泰时代部落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匕首和斧钺或叫斧剑（一种粉碎型、刺人的剑斧二合一的冷兵器——译者注）。箭头和匕首用青铜铸造，人们把它们挂在腰间木制的拼接而成的刀鞘和箭筒里，外敷皮革常常用贴花装饰。沉重的青铜斧钺装有长达 70 厘米的木制把柄，即把木制把柄的一端穿入青铜尖刃——弗多克（刺入、织入、缝入之意——译者注）中，士兵们看来很好地掌握了这种斧钺。斧钺在当时是一种最致命的砍人和刺人的武器，通常人们用皮套将其盖住后把它别在腰间。士兵们还配备有用木板条制作、用皮条加固的盾牌。

巴泽雷克工匠们创造的具有“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的卓越的艺术作品是用木头、骨头、角、铜和金、皮、毛、毡制作的。同时，对工匠们来说，主要的不是材质的价格，而是作品本身的完美。参与挖掘图瓦萨格拉地区斯基泰时代坟场的历史学家 A. Д. 格拉齐指出，那儿“精心保存着一批工艺高超的用驼鹿角和赤鹿角制作的物件。外形粗糙的金首饰很少得到重视。这些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动物的形象，奔跑起来收不住脚的山羊和绵羊，赤鹿、羚羊和狍子，笨重雄壮的驼鹿，快马和各种猛兽，主要是猫科动物，以及想象中的生物，例如狮身鹰头兽象”（注 8，237 页）。

这些古代的艺术作品因何而出色？为什么它们在被创造出 2500 年之后仍然使人惊艳？何为“草原‘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这样的事用几句话很难说清楚。看来，问题在于，在这些阿尔泰和图瓦地区古代居民的艺术形式中，两种似乎是对立的特点和谐地融为一体：强烈的风格化和现实主义。“里面，——用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的话说，两种对立的品质相对照地共处一隅：真实地、准确地传达出动物形态的这种或那种特征和将其不同寻常地风格化，能看到日常事物和幻想事物的大胆融合。这种风格的作品以剧烈的动作为标记，充满了斗争和激情。里面没有明显的沉静的痕迹、以往那种均衡的痕迹，而在新石器时代的泰加森林和峭壁上这种构图比比皆是。”（注 11，82—83 页）

我们看到，野兽的争斗是“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的艺术作品的主要情节。看来，这鲜明地表现了斯基泰部落充满奔袭、战斗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对敌人的无情。按照 M. П. 格利亚兹

诺夫教授的观点，可以把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游牧民的一系列艺术作品看作歌颂勇士和妇女的英雄史诗，他认为，后来突厥和蒙古民族的英雄史诗就植根于早期游牧民族的史诗（注8，232页）。

现在在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着许多斯基泰时代工匠的优秀作品，其中有大量的被称作“彼得一世的西伯利亚藏品”的金质艺术品，它们最为人所熟知。所有这些公元前7—前2世纪的工匠们制造的收藏品都是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坟场里找到的。这批藏品中有古罗斯的金银颈饰、腰牌和其他的带有动物图案的装饰品。1715年著名的实业家、乌拉尔山地工厂的奠基人尼基塔·杰米托夫把一批“从西伯利亚出土的华美的金质物品”送给女皇叶卡捷琳娜作为礼物。其中有带野兽搏斗图案的铸造的金属牌牌和两端镶有野兽雕像的颈饰。女皇高度赞扬了这批西伯利亚的金质物品并命令进一步搜寻宝物。仅仅过了两个月，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公爵就送来了10件古代的金质物品，而过了一年从西伯利亚又运抵了超过100件。在随后的时间里，斯基泰时代工匠们的金质产品不断从西伯利亚运来成为皇帝的收藏品。

学者们在研究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岩画时，首先碰到的是图瓦地区的“奥钮尔综合体”——即许多世纪里人们朝拜的一个游牧部落的庙宇附近的大量岩画，由此了解了很多有关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和图瓦地区部落文化的历史。岩画表现的主要是些野生动物和狩猎的场景。显然，在岩石上画这些图案同那些强有力的要保证最大限度的狩猎成功的行为有关。

令人惊奇的还有这样一些古代艺术文物，例如，所谓的“鹿石”——在图瓦、蒙古和外贝加尔发现的刻有奔跑的鹿和其他动物图案的石碑。

那时西伯利亚和中亚同古代世界先进文明的国家有着文化和经济联系。在阿尔泰和图瓦的墓地人们找到了起源于西方的珠串，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镜子，伊朗的织物和用猎豹皮制作的物品以及出自印度洋沿岸的贝壳。

在阿尔泰的一处墓地找到了一个美索不达米亚或波斯出的地毯，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地毯。公元前1世纪在巴比伦、古代的亚述国、米底国（公元前7—前6世纪伊朗山区西北的奴隶制国家——译者

注) 和波斯的人们制作这样的地毯。这个彩色地毯的尺寸为 1.83 米 × 2 米, 是在古代墓地遗址得到的, 上面绘有梅花鹿的图案、骑士、装饰图案和带翼的狮身鹰头兽象。

当地的工匠借鉴了外国的题材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在古代的墓地遗址就找到了两幅 6.5 米 × 4.5 米的毡做的大型壁挂。在一幅运用贴花工艺制作的壁挂上塑造了女神和生命的常青树形象。她面前有一个乘马的骑士, 他的面容明显地带有地中海人种的特点。第二幅壁挂表现的是带翼的斯芬克斯 (注 8, 233 页)。

阿尔泰和图瓦地区游牧民同东、西方的文化联系日趋紧密, 这预示着他们开始大规模向新的居住地迁移时间的迫近和古突厥游牧国家“民族大迁移”时代的来临。

## 南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领土上匈奴帝国的历史

公元前 1 世纪末外贝加尔和蒙古草原上斯基泰文化时期部落的古坟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匈奴的遗迹。19 世纪末, Ю. Д. 达利卡一格雷恩采维奇最早在外贝加尔发现了这些遗迹并正确地断定, 它们恰恰属于匈奴时代的古迹。历史学家 М. И. 利什斯基针对在伊利莫夫山谷和其他地方对古坟场进行的发掘工作用他的话说: “耶稣诞生前 3 世纪中期联合成一个强大的匈奴国家的不就是那些用木制棺椁下葬的突厥部落吗?” (注 8, 242 页)

我们所了解的许多关于匈奴的生活方式和匈奴国家形成的历史都是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 (公元前 155—前 88 年) 的著作《史记》中得知的, 国内知名汉学家 Н. Я. 比丘林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译成了俄语。

司马迁是这样描写从事游牧畜牧业的匈奴 (在中国古书中他们被称作“混奴”) 人的生活的: “居北蛮, 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马、牛、羊, 其奇畜则骆驼、驴、骡。逐水草迁徙……自君王以下, 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 被旃裘。” (注 55, 39—40 页)

学者们推测, 在匈奴的畜群中不仅有当地品种的牛, 而且还有“雅克”——能在高寒地区生存的牦牛和本地牛与牦牛杂交的牛, 匈奴

住处一些物品上许多牦牛的图案证实了这一点。

像真正的游牧民一样，所有的匈奴都骑马：在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墓地里都能找到铁制的马嚼子。当然，匈奴还把马作为役畜来使用，把它们像牛一样套到带篷马车和一般的马车上。

在距离伊瓦尔加河（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贝加尔湖和乌兰乌德之间——译者注）口——下伊瓦尔加遗址不远的色楞格河的一个古代设防村落挖掘找到的东西证实，匈奴人也从事农业，这些发现物中不仅有黍子，还有农具：生铁犁、铁镰刀和石碾子，以及储存粮食的窖。

外贝加尔的考古发现确认，匈奴已懂得炼铁、青铜和铜，并用其制造各种工具和武器。历史学家 M. И. 利什斯基宣称，在下伊瓦尔加遗址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用以炼铁的生吹炉，毛铁和炉渣的残余。那儿还找到了一块块的青铜炉渣。他推断，下伊瓦尔加村落遗址曾是当时外贝加尔地区匈奴的手工业中心。匈奴人的制陶业也很发达（注 8，243 页）。

匈奴的某些部分可能只在冬季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些冬天的住所是些半地下的土窑洞，墙壁是用草泥垛的或砖坯垒的，里面抹上掺了剁碎的干草的泥。匈奴在这些房屋里安装了独特的取暖设备：烟从炉灶顺着在墙根垂直铺设的烟道往外冒出，也就是说这套设备是作为屋里的暖气来使用的。在烟道旁修建了火炕或支上了铺板。

普通匈奴的衣服是用皮子、毛和粗糙的毛织物做的，贵族穿的衣服是用昂贵的外来织物做的：细毛织物、丝织品和各色的棉布，上面常有鲜艳的绣花。这些昂贵的织物还用来作为贵族棺槨的包覆材料。

匈奴人穿带裤子的长衣服或长袍。冬天他们穿带毡里子或带缝上棉里子或皮里子的衣服。长袍外系上用布或皮子做的宽腰带。贵族还用金、银和青铜的牌牌和扣绊来装饰腰带。

匈奴是好战的民族。他们的男人如果没有参与军事出征，那么就要继续不断地从事军事训练。中国古代史料就此写道：“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士力能毋（应为贯的古字，贯通弯，贯弓即弯弓——译者注）弓，尽为甲骑。”（注 55，40 页）

自然，骑兵是他们主要的军种和打击力量。匈奴用兵的战术在于使用骑兵作为打击力量以迅速向敌军发起进攻。但在遇到像样的抵抗时，匈奴的军事首领会利用迅速的撤退以有效地组织起对敌军的下一次包围

和用骑兵进行二次进攻。

中国史料就此写道：“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注 55，40 页）“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注 55，50 页）

为了渡河，匈奴人善于架桥，他们还用壕沟和围墙来巩固自己的居所，学者们在下伊瓦尔加遗址进行挖掘时则发现了这样的居所。匈奴人把工程学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是从古代中国人那儿学来的。

根据在外贝加尔和蒙古挖掘匈奴古城遗址和墓地的结果可以描述一下匈奴的武器。作战的弓长达 1.5 米，由骨质和角质的镶边拼接而成，以增强弓的韧性和弹性。箭头多为骨制和铁制的，鲜有青铜的。为了增强对敌人的心理威慑，匈奴在箭头的顶端装上了带钻孔的骨制小球。所以箭在飞行中能发出吓人的呼哨声。人们把放入一个特别套子的弓挎在左边，装满箭的箭袋则从右边背在背上。

在匈奴社会里，父权—氏族关系的特征很明显。司马迁宣称：“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显然，这样做是为了子孙和财产不出家族。匈奴的家庭是家长制的，男人是一家之主。不过，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匈奴女人并不处于顺从地位。

匈奴分为 24 个部族。“家族的头儿”，也就是酋长为部族的首领。在匈奴人那儿保留了一些最初的氏族民主的元素：酋长会议和民众大会。司马迁认为：“匈奴有每年在龙城（匈奴统治中心地即王庭，也称单于庭、龙城、茏城等——译者注）聚会三次的习惯，即一月、五月和九月，在被称作‘戊日’的那天，人们为天神献上祭品（“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后汉书》卷 89，《南匈奴传》——译者注）……在这些会议期间，酋长们讨论国家大事，还有赛马和赛骆驼的娱乐活动。”（注 55，119 页）酋长们还有临时的会议，以解决战还是和的问题，或者确定谁是死去的单于（匈奴的最高统治者）的继承人。

同古代中国的交往对匈奴社会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在部落贵族中流行崇尚奢华、佩戴金银首饰和锦衣绸服的习俗。正如司马迁所说，匈奴“喜爱中国丝织品、棉布和各种食物”（注 55，57 页）。这些“食物”应当首先理解为稻米和酒。因为甚至在外贝加尔出土的匈奴古物

中也找到了用来吃煮米饭的筷子。

对于匈奴贵族还有普通匈奴人来说，依靠掠夺战利品使得战争首先成了发财的源泉。“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注 55，56 页）

匈奴的进攻伴随着抢劫、俘虏和奴役被战胜国的军人和平民、赶走牲口和掠夺财产。大部分战利品和其中的好东西给了部落中的贵族，他们在掠夺性的军事远征中首先富了起来。

在匈奴社会里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权形式，在许多方面已具有国家的形态。单于的政权是独裁和世袭的，通常单于把王位传给长子或兄弟。匈奴曾经建立过某种程度的国家机构。王室成员得到了最高的国家职务，同时把一定的省份作为领地交给他们治理。除了单于家族的成员，还有三个“显赫的家族”也得到了国家职位。通常，单于正是从这些“家族”中为自己挑选妻子。因此匈奴的国家职位似乎成了世袭的。

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建立国家和对外交流的需求急切地要求创造文字。考虑到经常同中国打交道，并且此前许多世纪中国已有了使用文字的传统，匈奴贵族为了外交和其他一些官僚制度的需要决定采取中国的象形文字。

公元前 221 年，在经过 500 年的分裂之后，秦国的国君又把中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帝国。此后秦国的国君接受了中国皇帝的封号，开始被称作秦始皇。于是，秦国国君所进行的 23 年的战争结束了，在这期间，他占领或吞并了中国另外六个国家的领土。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以讨伐北方的游牧民，把匈奴从黄河弯曲处，辽阔的鄂尔多斯草原—高原赶了出去。

以头曼单于为首的匈奴人退到了北方。匈奴部落联盟由于遭受重创衰落了，甚至被迫向东方的邻居东胡称臣纳贡。而中国重新开始修建巨大的防御城墙，以使中国北部免遭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的侵扰。

所有这一切使得匈奴部落联合起来并于公元前 3 世纪末在中亚草原上组成了第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公元前 209 年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杀死了父亲和兄弟，宣布自己为单于。24 个匈奴氏族承认他为自己的国王，部分部落贵族反对他，但他用死刑来镇压反对派。在对相邻的民族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匈奴的世袭贵族彻底转到了

他这方面。

掌握政权之后，冒顿对军队进行了改革。他把军队分成四支骑兵部队，各支部队用马的毛色来区分：黑色、白色、棕黄色和青色。在自己统治的第一年，冒顿完成了东征，消灭了东胡部落群，而不久前匈奴还要向其纳贡。匈奴在克鲁伦河中游南部草原的某处对东胡予以毁灭性打击，战争以对被战胜者的空前掠夺为结局：土地、牲畜和财产都转移到了匈奴的手中。东胡的残余逃到了满洲里、蒙古和外贝加尔。

然后冒顿挥军向西，直指统治黄河流域以西和南山山脉以北地区的月氏（他们是贵霜人和萨迦人）。匈奴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在公元前 204 年他们又成功地夺回了鄂尔多斯。公元前 203—前 202 年冒顿向西北用兵，臣服了住在安加拉河南部草原从事畜牧业的部落鬲昆（吉尔吉斯人）。匈奴向北直达西萨彦岭山脚下的图瓦盆地草原，征服了定居在叶尼塞河沿岸的农人和牧民。

公元前 188 年，在同匈奴的冲突中遭受一系列失败后，中国皇帝高祖被迫同冒顿签订了“和亲”条约，把中国公主嫁给匈奴统治者为妻，此外，每年还要纳贡。

冒顿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每当中国皇帝死去后他都要向寡居的皇后求婚，而作为嫁妆他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权。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皇后的确“很愤怒”，但考虑到匈奴帝国的威胁，她只能给予谦恭的回答：“单于没有忘记敝邑（皇后这样自称——作者注）并惠赐书信给她。敝邑不胜惶恐，担惊受怕，度日如年。她老态龙钟，四肢无力，头发脱落，牙齿松动……举步艰难。单于误听了，不要因此而玷污自己。”（注 55，53 页）为使对求婚的拒绝更显委婉，又赠送价值不菲的礼物——两套御用马车和两组同套一车的四匹马。

大概在克服了沿额尔齐斯河谷走向的蒙古阿尔泰山脉这个障碍之后，冒顿开始了例行的征伐。占据卡尔宾斯基和纳雷姆山脉一侧并且斋桑湖周围土地的克普恰克部落（即波洛韦次人——译者注）被征服了。匈奴控制了色楞格河上游并沿着它的河谷向贝加尔进发。

公元前 177 年月氏在罗布泊流域完败于匈奴，撤向锡尔河、阿姆河两河之间的地区。在西方，冒顿同样完成了对乌孙游牧部落的征讨。他

的军队越过准噶尔之门——东经 82.3° 的山间通道，有可能到达了准噶尔阿拉套山系的北坡。乌孙被征服了，但匈奴政权仅限于征收贡赋（注 9，141 页）。

公元前 174 年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成为单于，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东边可能到大兴安岭，西边至额尔齐斯河谷，北边到贝加尔湖，南边延伸到戈壁沙漠。

老上在位期间，匈奴国家继续得到巩固。根据单于私人谋士中行说的建议，匈奴对国内人口、牲畜和财产进行了登记，以此为基础向臣民课税：谋士中行说“教会单于的近臣怎样造册，以便按数目征收人头税、牲畜税和财产税”（“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译者注）（注 55，49 页）。中行说还“教会了单于用 10 英尺长的竹筒给中国宫廷写信”，也就是用中国使节给中国皇帝寄送信函时所使用的竹板写信。

老上统治时期，匈奴继续向中国进攻。公元前 162 年，根据中国人的提议，老上和中国签订了和平条约，按照条约虽然双方承认，“汉和匈奴是两个相邻和平等的国家”，但预先规定，中国每年向匈奴送“礼”：黍子、稻米、丝绸、锦缎和棉织品。事实上这是中国每年给匈奴的贡赋。

公元前 2 世纪末，匈奴越过西萨彦岭，深入到西亚加斯（哈卡斯）的土地，占领了米努辛斯克盆地。当时单于的谋士，出自草原的学识渊博的官吏卫律掌握了政权。公元前 99 年匈奴遭到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指挥下的中国军队的进攻。李广的孙子李陵（此处原文有误，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李广和李广利不是同一个人——译者注）率领一支 5000 人组成的骑士步兵。匈奴包围了李陵的部队并将其俘获。留在匈奴那日后，李陵“得到了西亚加斯的封地”，也就是成了哈卡斯的统治者。

历史学家 A. И. 马尔德诺夫谈到了西亚加斯地方长官位于叶尼塞的豪华宫殿：“这个宫殿的遗迹是在阿巴坎附近进行地下挖掘时偶然发现的，宫殿的豪华陈设震惊了考古学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覆盖着瓦的宫殿屋顶的残余，上面有祈福的铭刻。沉重的门把手由青铜铸成，上面饰有神话中角魔的面具，它们也有祈福这种奇异的含义。这些面具——护身符不是宇宙中怪物脑袋的假定性图解，而是漫画式地传达出古欧罗

巴-达加尔人真实的身体特征：高高的鹰钩鼻子和睁得大大的眼睛。阿巴坎的面具显然是由当地的工匠铸造的，面具此时所表现的自己国家的神就如同当地居民所想象的样子。楼房内部复杂的取暖设备的残迹保存完好。宫殿楼房的四周环绕着草泥垛成的墙，还有进出的门和塔楼。废墟中间发现了各种铁制的物件：斧子、把手、铁环、螺钉、玉碟的残片、珊瑚珠、金耳环、各种家庭日常用具，首先是皮带和刀子的扣绊。在废墟里还找到了两类器皿：一类主要是当地人——塔什迪克人（达加尔文化时期居民的后裔——译者注）用的，此外还有典型的匈奴人用的，类似在外贝加尔遇到的匈奴早期的器皿。匈奴的统治并不巩固，李陵的子孙领导了反对他们的起义。”（注8，260—261页）

历史学家认为，和匈奴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西亚加斯人的后代（公元1世纪中期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局部地区国家形态的产生作了准备。

公元1世纪中期，匈奴被同周围民族无休止的战争所削弱，国家分裂成了两部分。不久，南匈奴臣服于中国。北边的匈奴部落联盟从南面遭到中国人不断地进攻，东面，来自养精蓄锐已久的鲜卑部落联盟的进攻，北面，外贝加尔部落的进攻。公元93年，匈奴同鲜卑主要在蒙古领土上进行的战争以后者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此后，北匈奴的一部分在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于公元1世纪末逃到了西方。在途经沿乌拉尔山地区最后到达东欧的过程中，匈奴征服了一些部落，撵走了一些部落，还把一些部落收容到自己的部落联盟之中。公元4世纪前半期，匈奴出现在东欧草原。这个游牧民族因自己血腥的掠夺征战在欧洲声名狼藉。公元451年在高卢（来自拉丁语，历史上欧洲部分地区的罗马称呼——译者注）的沙隆（位于现今法国的夏隆—香槟泉市——译者注）原野上进行了一场会战，阿提拉指挥的匈奴军队惨败，由此，匈奴不可阻挡的占有新领土和人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 西伯利亚突厥汗国的士兵

公元6—8世纪，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南部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两

个比较大的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联盟——铁勒和突厥。显然，这些部落有着共同的祖先——匈奴人和丁零人（匈奴的一个分支）。丁零人分成北、西两部分，前者住在贝加尔地区匈奴人的北边。

根据传说，北丁零人有如下特征：他们“长着两条马一样的小腿”，健步如飞。历史学家 Л. П. 巴达波夫这样解释这个传说：北丁零人穿的是从马或狍子腿上取下的皮子缝制的靴子，冬天滑雪时用的滑雪板上包裹的也是这种皮子。在不是很久远的过去，某些西伯利亚南部的居民——图瓦人、阿尔泰人、哈卡斯人、朔尔人（西伯利亚南部的民族，是在乌戈尔人、萨莫迪人、叶尼塞人、突厥人杂交过程中形成的，就其文化和出身接近北阿尔泰人和某些哈卡斯人种——译者注）穿的也是类似的靴子，他们同样使用这种滑雪板（注 8，266 页）。

在中国史书中，丁零人的后代被叫作“铁勒”。公元 4—6 世纪，大多数铁勒部落都住在现今蒙古境内，在往图瓦迁移时曾到达阿尔泰山。铁勒部落的某些称呼在突厥的古金石文字中提到过，如维吾尔、骨力干等。

在那些编年史中包含有古代久尔克——久尔克尤特——中国史书称久克尤（均为突厥一词的俄语音译——译者注）部落联盟的资料，由此产生了突厥语系的称谓。但使用这种语言的不仅有突厥人，还有许多铁勒部落，包括维吾尔人（奥古兹人、克普恰克人等）。

根据一些广为人知的神话和传说，突厥人的祖先是北方的匈奴。历史学家 Л. П. 巴达波夫讲述了其中的两个传说。北匈奴国君的兄弟是一个为母狼所生的萨满。他的一个儿子变成了一只天鹅，也就是说，似乎成了天鹅的始祖。他的儿子成了丘亚河上的统治者。他的第四个儿子纳都六设和十个妻子住在索国，十个妻子所生的儿子都姓母亲的姓。妃子所生的儿子叫阿史那。父亲死后他被选为首领，称阿贤设。他的孙子叫土门，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中作为历史人物和突厥国家、突厥汗国的奠基者经常被提到。

按照另外一种传说，突厥人的祖先是匈奴人的一支，后为敌人所败，除了一个 10 岁的男孩之外，几乎都被杀绝。一只母狼救了男孩并把他藏在位于高昌国（吐鲁番）北面的一个山洞里。

母狼和长大的男孩生了 10 个孩子，他们娶了其他氏族的女人为妻

并有了很多后代，阿史那是后代中的一个。经过了几代人以后，突厥人从这些山中走出，在准噶尔阿尔泰山的南麓生活和劳作，成了操蒙古语的柔然部落的铁匠，柔然部落当时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汗国（注 8，268—269 页）。我们知道，那个时代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许多民众都从事与开矿、炼铁、制作金属工具和装饰品有关的打铁业，而且打铁业总是被认为同萨满教有关，是一种同神和上帝打交道的事业。铁匠和找矿者在其他部落中享有的独特威望便是由此产生的。

所有这些传说都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证实。众所周知，一些不大的匈奴国家中的一个（位于黄河弯曲处南部）于公元 439 年被击溃后，匈奴的祖先迁到了位于吐鲁番（现在叫作博克达山）西北的高昌山区。那儿蕴藏有铁矿石，匈奴像附近居住的其他铁勒部落一样从事打铁业。在这儿，他们接受了“久尔克尤特”或“久克尤”的称呼。

突厥部落的联合与突厥汗国的形成发生在公元 6 世纪 30 年代初，这从突厥联盟可汗沙钵略于 585 年写给中国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从突厥被上天造出后已过去了 50 多年。”（注 8，269 页）突厥部落的强大是因为他们有铁制的武器和盔甲——头盔和连环甲。

历史学家 Л. П. 巴达波夫引用了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准确地指出了突厥汗国力量的来源：“突厥人的力量在于骑乘和弓箭。如果他们看到有利的情形就打马前行，如果遇到危险，就立刻后退。他们像暴风和闪电一样呼啸、汹涌，完全不懂得要有稳定的战斗队形。弓和箭是他们的爪子和牙齿，而连环甲和头盔则是日常的服装。他们的军队不操练步伐，也不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宿营，他们就在能找到水草的地方露宿，而羊和马就是战士的食品。”（注 8，270 页）所有这一切使人想起匈奴诉诸军事行动的战术。

公元 6 世纪中期，突厥首领土门打败并侵夺了铁勒人 5 万顶帐篷，而此前在 546 年他们曾起义反抗柔然可汗的统治。土门向柔然可汗阿那环提议让后者把女儿嫁给他。可汗那充满鄙视的回信是这样写的：“你是我们一个普通的铁匠，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注 8，270 页）作为回答，土门杀了柔然的使者并于 552 年在一次在现今（中国）绥远省东南部领土上的会战中打败了柔然。在这之后，柔然可汗自杀身亡，而土门宣布自己为可汗。突厥可汗的统治就这样开始了，虽然突厥国家

大约在 20 年前就已产生了。

可汗是汗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其助手是王位继承者特勒（тегин）和军队统帅设（шады）。突厥汗国像匈奴国家一样分成左右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任命了这两个部分的最高统治者——右叶护和左叶护（ябгу），军队也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别由右设和左设指挥。叶护和设由可汗任命，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充任。可汗国家共有大小官吏 28 等，所以国家的特征——官僚体制的存在，在汗国是非常明显的。

在土门的幼弟木杆可汗在位时期，突厥汗国的统治区域从西向东扩展，从中亚细亚到辽东湾；从南向北，从中国到贝加尔湖，包括阿尔泰和萨彦岭地区。铁勒部落完全臣服于突厥可汗并积极参与汗国的军事讨伐。这个时期，不仅相邻的中国，而且那样一些遥远的强国，像拜占庭和萨珊伊朗（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伊朗——译者注）都同突厥汗国发生经济和政治往来。

公元 553 年成为突厥可汗的木杆，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是一个“坚强、残忍、勇敢、聪明的人，除了战争，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大约是在 554 年的春天，木杆从自己的大本营向西面的鄂尔浑河派出了以室点蜜可汗为指挥官的军队。看来，没有遇到认真抵抗，突厥人就通过了准噶尔并且在穿越匈奴曾使用过的准噶尔之门（山中通道）后深入到七河。然后突厥在离现在的克孜勒—奥尔达市不远的地方越过锡尔河，并于 555 年到达“西”海（咸海）。他们在经过西哈萨克草原时粉碎了当地部落的抵抗，并最终到达了伏尔加河。当室点蜜在西方作战时，木杆率部深入到图瓦中部和叶尼塞河的上游，并征服了那儿的操突厥语的部落（注 9，143—144 页）。

公元 560 年，突厥人击溃了白匈奴（嚧哒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中国史书，他们原来居住在长城以北，称滑国，是中亚塞种人和汉代大月氏人的后裔，西方史学家称之为“白匈奴”——译者注）部落联盟的进攻，这使得来自处于突厥汗国影响下的粟特（阿姆河和锡尔河中游之间的地区，粟特人是古代中亚细亚的一个民族，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的商人恢复了同中国沿丝绸之路的贸易。商人们向室点蜜可汗建议向伊朗沙赫（波斯国王）派出使团，以便得到允许通过它的国家输出丝绸。粟特人马尼阿赫被任命为突厥的大使，

但伊朗沙赫不允许商人通过。

室点蜜决定同伊朗沙赫开战。为了联合伊朗沙赫的世仇拜占庭的力量，室点蜜把马尼阿赫派往那儿。马尼阿赫经过咸海南部沿岸地区，沿着荒凉的乌斯久尔特高原（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之间——译者注），从里海北边绕过，经高加索到达拜占庭。568年8月，在缔结军事同盟和签订贸易协定之后，马尼阿赫在拜占庭大使塞马鲁克陪同下返回。到达室点蜜大本营后，塞马鲁克得到了作为礼物的女俘并陪同室点蜜出征波斯。后来，他同新的突厥大使一起返回拜占庭（注9，145页）。

木杆死后，他的幼弟佗钵于572年成为突厥帝国的可汗。他在位时期，强大的国家分成了东、西两部分，由可汗的近亲统治。此时，分裂和衰落的中国力图用各种礼物与突厥统治者结好。中国北部省份的一些统治者每年给可汗一万匹丝绸，另一些统治者也奉上了昂贵的礼品，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佗钵的统治以试图在突厥人中推广佛教而著名。可汗本人和他的近臣接受了新的宗教，甚至某些神圣的佛教书籍也被译成了突厥语，但广大游牧民不接受佛教。581年，佗钵的儿子，名扬四海的沙钵略成为可汗（已经提到过他），然而他无法控制所有的领土，因内讧，就在那年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部汗国仍由沙钵略统治，而达头可汗成了西部汗国的可汗。中国皇帝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削弱突厥、加剧两个汗国之间的敌对状态。

630年，东突厥可汗颉利被中国人击败并成了俘虏，这样，第一个突厥汗国事实上灭亡了。中国皇帝借机在铁勒和东突厥领土上扩展自己的影响。但660—663年，铁勒和东突厥部落发动起义并于682年成立了以骨咄禄（按古老的突厥碑帖称颉跌利施）为首的北方（东方）突厥人的第二个突厥汗国，骨咄禄出自显赫的阿史那家族，是逝去的颉利可汗的亲戚。

在战胜众多铁勒部落后，他宣布自己为可汗并迁移到突厥的故国，被称作“黑沙”（在古代突厥碑帖中，“卡拉库姆”在阴山山脉的北面，距库库浩特，即现在的呼和浩特不远）的地方（突厥语中，卡拉是黑色的，库姆是沙子——译者注）。东突厥汗国处在敌对国家和部落的包围中，骨咄禄或颉跌利施可汗在智者噉欲谷的帮助下击溃并征服了这些敌人。

骨咄禄死后，他兄弟默啜于692年宣布自己为可汗。他继续了对中国成功的进攻。696年默啜向中国皇帝提议镇压契丹部落的起义，中国皇帝为此应当放回散居在中国各地所有的突厥人。默啜击败了契丹人，中国皇帝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契丹人的回归使默啜的力量剧增，于是他又重开反对中国唐朝皇帝的战争。中国皇帝因此悬重赏要他的脑袋。

东突厥汗国使住在蒙古的所有铁勒部落俯首称臣，默啜还使西突厥人依附于自己。东契丹部落向可汗纳税，还要完成一些“强迫劳动”。这就是第二个东突厥汗国的辉煌时期。

噶欲谷是几代可汗的谋士和军队统帅，他于711年雪冬领导了对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的征伐，但通过西萨彦岭的主要山口保护了吉尔吉斯人的大部队。噶欲谷不等夏天来临就率自己的军队到达海姆奇科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并从那儿沿它左边的支流阿克—苏克河河谷进发。在一幅突厥碑帖（许多这样的碑帖保留到现在，上面记述了这位统帅的活动并以这样的词句开头：“我，智慧的噶欲谷……”）中写道：“我命令大家骑到马上，开辟一条穿越深雪（达1.5米——作者注）的道路。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山顶，拄着木棍，牵着马步行。前面的人踩出一条道，我们越过了森林密布的顶峰。”这是第一次被书面资料确认的跨越西萨彦岭的行军。

“下山时经过艰难跋涉，于第10天夜间……到达山麓……我们顺奥纳河（大奥纳河，阿巴坎河右边的支流——作者注）往下”。稍作停顿并清点剩余者和冻死者的人数后，噶欲谷乘马日夜兼程向西进发，在阿巴坎河谷的一处地方击溃了对进攻毫无察觉的吉尔吉斯军队，其首领在战斗中阵亡。然后噶欲谷到达叶尼塞中游的河谷并占领了吉尔吉斯部落联盟的所有领土。突厥人在那儿留下了自己的驻防部队，在阿巴坎山麓和米努辛斯克盆地进行的发掘可以证实这一点。噶欲谷他们到达的最北边的地点是叶尼塞河左边的支流，处于北纬54.3°的杰西河河谷。再次翻越西萨彦岭后，噶欲谷返回了鄂尔浑河的大本营（注9，147页）。

但被奴役部落的起义并未停止。在公元716年的一次讨伐中，默啜在森林中意外被一名此前在战斗中被击败的拔野古（与维吾尔人、萨彦人同为铁勒人之一部——译者注）部落的士兵杀死。当744年最后一个可汗乌苏米施被杀死后，第二个突厥汗国就此灭亡。

突厥汗国的历史同操突厥语的部落居住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有紧密的联系。历史学家 Л. П. 巴达波夫认为，阿尔泰地区当时住有突厥人从下列事例可以得到证实：人和马一起葬入石头墓地。他断言：“古代突厥人的家世传说证实了突厥祖先和阿尔泰及叶尼塞的联系，其中包括索国的故事。通常认为，这个国家位于萨彦岭—阿尔泰高原，那个地方在一个称作库满金的氏族（北阿尔泰人）中到现在还保留了‘索’这个称呼。在这个传说里还谈到，萨满祖先的一个儿子变成了天鹅：天鹅氏族（куулар——库拉尔——图瓦人的祖先）一直延续到图瓦人和现在的阿尔泰人。在当代萨彦岭—阿尔泰高原民族（图瓦人、哈卡斯人、铁列乌特人、库满金人）中还保留了有关天鹅图腾的观念。”（注 8，274 页）

阿尔泰山西部住着一些铁勒人的部落：卡鲁克人、克普恰克人、久尔盖什人（小突厥人，西突厥汗国的一个特殊部族——译者注），在叶尼塞河谷的奇克人，以及临近的亚速夫部落。所有这些铁勒部落、突厥人和其他一些与之相邻的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突厥语系的部落都从事游牧畜牧业，饲养羊、马、牛，在阿尔泰还养牦牛。虽然牲口一年四季都在牧场上，但还是要准备饲草。历史学家 Л. П. 巴达波夫确认，20 世纪前半期图瓦人和阿尔泰人还在使用古老的储备饲草的方法：把青草割下后，将其搓成辫子，挂在树上晾干并保存起来（注 8，275 页）。

狩猎在西伯利亚南部部落的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在图瓦，也在阿尔泰开采铁矿，同时用草泥熔炉冶铁。阿尔泰的铁匠用当地出产的铁制造剑、箭头，以及一种阿尔泰的武器——带有微微弯曲的沉重刀身的马刀。就像匈奴人一样，箭头上装上一个空心的骨质的小球，上面有个小孔，以便飞行时发出吓人的呼哨声。他们制造的铁锅很精巧，既有圆形吊挂式的，也有带锥形小脚的。直到 18 世纪阿尔泰地区仍在制作这种锅，北阿尔泰人正是用这种锅向准噶尔可汗进贡的。

Л. П. 巴达波夫宣称，古代阿尔泰人制作的铁铤、斧子可以用来砍树和制作各种木制物件，到 19 世纪他们的生活中还保留有这种东西，而在图瓦，在“盖儿日克”的名称下一直保留到 20 世纪中期（注 8，276 页）。

当地的铁匠还为部落贵族打造银制器皿。考古学家发现，某些这样

的器皿上有古突厥的金石文字的题铭。看来这些铁匠就像 20 世纪初的图瓦人、阿尔泰人和哈卡斯人一样，也是珠宝匠。制作毡子，加工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皮子是阿尔泰和图瓦地区重要的家庭生产方式。学者们在西伯利亚南部 6—8 世纪的坟墓里找到了用来包帐篷、缝衣服和做被子的各种毡子。

有趣的是，突厥人用某些植物的纤维来制作粗布。Л. П. 巴达波夫说：“游牧民的织布机很小并且可以拆卸，与阿尔泰人、布里亚特人和朔尔人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机器相似。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的尺寸都不超过 70—80 厘米，整个机器可以轻松地放进书包和小口袋里并拴在马鞍上。阿尔泰人在 20 世纪前半期就用这种机器来制作粗布——茶叶花（一种植物）纤维织的粗麻布，而布里亚特人则用来制作毛织品。”（注 8，276 页）

匈奴的部落贵族和可汗的近臣还同中国人做买卖，他们用牲畜（大多数是马）和毛皮主要用来交换丝绸和金子。

突厥人主要的食品是羊肉和野生动物（狍子、大角鹿等）的肉，以及牛奶。看来，他们也食用松子，有时甚至把它当成随葬品。酸奶在饮食中有重要作用，人们广泛食用用马奶做的马奶酒——一种游牧民喜爱的醉人的饮料。根据编年史的记载，人们用马奶酒相互待客时，单膝跪地并伴以歌声，就像不久前现代图瓦人和阿尔泰人所作的那样。通常人们把马奶酒保存在木制的或黏土制的，也可能是皮制的器皿中。

虽然突厥部落的家庭体制没有规定实行一夫多妻制，不过男人还是在家庭中占了主导地位。说实话，女人在家庭中相对是自由的，所有家务都压在她身上。男人经常不在家，他要从军出征、要狩猎，或者放牧自家的大群牲畜。

突厥和某些铁勒部落（维吾尔人）的文化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于 6 世纪中期创造的金石文献或曰鄂尔浑文字证实了这一点。在石头和建筑物上发现金石遗迹的地方有：蒙古北部（公元 8 世纪石碑上古突厥鄂尔浑文和维吾尔文题铭），叶尼塞河谷，也就是米努辛斯克盆地（乌依巴特河、阿巴坎河和图巴河两岸），图瓦地区（众所周知，在某些石头和悬崖上的 50 多幅金石文字题铭大概属于更晚的时期，即吉尔吉斯人统治时期），贝加尔和阿尔泰地区（某些物件上的题铭出

自古突厥人的墓地)，甚至还有欧洲的顿巴斯地区和多瑙河流域。

这种突厥文字多半是通过粟特人（前面谈过粟特人同突厥可汗的关系）以阿拉米字母（闪语系之一，因阿拉门斯基部落而得名。该部落公元前14世纪住在两河及叙利亚，在语言和人种方面接近古代的犹太民族——译者注）为基础创造出来的。突厥文字在木杆可汗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公元6世纪70年代一些著名的佛教经典就被译成了突厥语。

显然，古突厥题铭（尤其是鄂尔浑文题铭）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编年史，它包含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所以，这些题铭是一些有关当代图瓦人、阿尔泰人、哈卡斯人祖先历史的重要的文献资料。毫无疑问，识字是贵族和可汗大臣的特权，普通的游牧民大概是不识字的。

在大规模清点士兵、马匹或牲畜数量时，“人们在树上砍出痕迹作为它们数量的标记”（注8，281页）。人们用蜂蜡把带砍痕的小木块同金属小箭头封在一起，于是，小木块就变成了文献。

在可汗的官方文献中，年代是按12年一个轮回来标注的，即按某个动物的名称来起名（马年、羊年、蛇年、鼠年等）。这些年代的称呼应严格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每12年重复一次。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石雕来判断突厥造型艺术发展的水平。这种因“石人”而驰名的雕像在图瓦和阿尔泰山地区经常能遇到，许多这样的雕像都是在古突厥时期制造的。雕像经常表现手握器皿的男人。在许多雕像上面能分辨出脸、衣服和武器的细微之处。历史学家Л. П. 巴达波夫认为，在用石头垒成的围墙跟前举行的葬后宴开始前，人们要把死者的雕像做完并摆好。在埋葬可汗和贵族代表人物时，还要布置荐亡的殿堂。

在图瓦、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山区留下了许多突厥和铁勒部落的岩画。哈卡斯的苏烈克斯岩画反映的是弯弓骑马的猎人，他们主要追捕有蹄动物。学者们认为，这些岩画恰恰产生自古突厥时代。在图瓦其他的岩画上也能看到这样的狩猎场景，其中包括猎狗参与的狩猎。

铁勒、突厥和吉尔吉斯部落都信仰萨满教。某些可汗提倡的佛教始终不被广大百姓所接受。古代突厥人相信，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无数的神灵，它们对人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萨满——男女巫师通过祭祀的形式

治病和预测未来，所以在他们观念中萨满是神灵和人之间的沟通者。古突厥神灵的姓名因鄂尔浑碑帖而闻名于世，图瓦人、哈卡斯人和阿尔泰人对这些神灵的信仰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突厥人最初把死人烧掉，他们把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就地火化，并哭悼他们。后来，从 7 世纪头 25 年起，他们开始把死者埋入地下石头墓地下面的坑里。

在结束铁勒和突厥部落的讲述时，我们要指出，古突厥汗国时期是中亚和与之毗连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突厥语系部落广泛的人种同一性正是此时形成的，这种同一性后来在欧亚民族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古代曼西人和汉特人的命运

民族大迁移时代首先指的是匈奴部落从亚洲中部的中亚细亚向西，然后向伏尔加再往西欧迁移的时代，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沿额尔齐斯河和沿鄂毕河下游森林地带部落的生活。在匈奴人的打压下，北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森林草原的部分部落在 1 世纪前半期迁到了西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南部并在那儿同当地的森林部落融为一体。森林部落最终同化了这些外来的草原人，尽管外来户的文化影响不可小视，尤其是在传播畜牧业和养马知识方面。

1 世纪末，被认为是古曼西人的部落分别迁到了土拉河和塔夫达河流域。根据历史学家 Г. М. 马基利尼克夫的意见，在 5—6 世纪迁到东方的山地乌拉尔部落在他们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他认为，古代所有的汉特人和曼西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广泛地传播野兽和人的铸铜雕像。古汉特人部落那时占据了沿额尔齐斯河和沿鄂毕河下游的广大原始森林地区。

在土拉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中游地区的曼西人和汉特人的南部族群以饲养牲畜、农业、纺纱和织布为生。在草原文化的影响下，南部曼西人和汉特人把一部分死者葬在堆成的土岗子下面，而不同于把死者埋入土中的北部部落。

6—9 世纪匈奴部落从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迁到了西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地带。在匈奴西迁之后留下的那部分森林草原部落占据

了哈萨克斯坦的东北地区、沿额尔齐斯河的巴甫洛达尔（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译者注）和秋明地区。他们的混合文化是融合了新的草原文化和旧的森林传统而形成的。人们把他们称作半森林半草原的乌戈尔人（乌戈尔芬兰语系民族的一支，包括匈牙利、奥斯恰克及沃古尔人——译者注），他们属于古代的马扎尔—匈牙利人。

9—13 世纪古代的曼西人和汉特人住在沿额尔齐斯河和沿鄂毕河下游的森林地带，在一些大城镇和一些不设防的小村庄。大城镇通常都建在河岸岬型的高处。城镇的一面由一堵或几堵土围墙来护卫，另一面河岸陡峭的斜坡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土围子外面分布着住所——一些埋入土中的半地下土窑，土窑中间是炉灶。这些半地下土窑相互之间一般都有通道相连。

公元 1 世纪，西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带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部落迁移，当地居民的生活、风俗和传统的狩猎和捕鱼营生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在南部的森林地带，当地居民把狩猎、捕鱼和繁殖牛、羊、马及从事农业结合起来。

尽管当地的金属生产仍然存在，但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乌戈尔部落懂得沉积法炼铁，甚至还生产出了带花纹的钢。青铜被用来制造装饰品。但在公元 2 世纪 20—50 年代当地的金属生产缩减了，并且由于外来收入的扩大事实上已停止了，因为当地人同沿“石头山”（指的是伏尔加联邦区东北部沿卡马河地区，通常也指彼尔姆边疆区——译者注）地区、伏尔加保加利亚（10—15 世纪伏尔加河中游一带的古国——译者注）和罗斯的贸易联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13 世纪时，突厥—克普恰克人侵入沿额尔齐斯河森林地带的南部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被鞑靼—蒙古人从草原赶出来的。当地的乌戈尔居民、汉特人和曼西人在排挤了沿鄂毕河一带的塞尔库朴人之后，迁到了额尔齐斯河下游和纳雷姆边区更加往北的地区。留下的乌戈尔人和外来户融为一体。这样，在 15—16 世纪西西伯利亚就产生了突厥语系的“鞑靼人”。

乌戈尔—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古代邻居的命运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学家 Г. М. 马基利尼克夫是怎样描述它的。萨莫耶德部落群是公元 1 世纪初在托木河流域和鄂毕河上游形成的。6—7 世纪

在突厥人的打压下，他们部分被突厥化，部分往北迁移或到了阿尔泰—萨彦岭高原的荒凉地带。高原上的萨莫耶德部落成了南部一些不大的萨莫耶德民族——玛托尔人、卡拉加斯人（托发拉尔人）、郭伊巴尔人和郭特人的祖先。

去往北方的部分萨莫耶德人在1世纪末至2世纪初到达了北冰洋沿岸，这样，萨莫耶德部落出现在这儿，塞尔库朴人出现在鄂毕河中游沿岸地区，艾涅茨人（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泰梅尔州的少数民族——译者注）出现在塔兹河，恩加那善人（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泰梅尔民族州的少数民族，自称 ня——译者注）和聂聂茨人出现在极圈内的冻土地带。其结果是，聂聂茨人因此丧失了同畜牧业和农业相关的技能，只保留了生活在阿尔泰和萨彦岭时就已诞生的养鹿业。

## 通古斯部落靺鞨人和渤海国<sup>①</sup>的历史

前面已经谈到过阿穆尔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部落鲜明、独特的文化。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早期沿阿穆尔河和远东沿海边区部落的发展史在许多方面都为人所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历史中的这些篇章。

国内的学者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A. П. 杰列文科、Э. В. 沙甫库诺夫和他们的助手证实，公元1世纪初沿阿穆尔河和远东沿海边区已住满通古斯部落，他们在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史料中以靺鞨人而著称于世（靺鞨分为白山、粟末……黑水等七部，其中以黑水和粟末二部最为强盛。黑水的南面是粟末，粟末“依粟末水以居”，粟末水是松花江上游的古称。713年唐朝以粟末首领大祚荣所辖地区为忽汗州，任命他为忽汗州都督，加封左骁卫大将军，渤海君王。自此，粟末“去靺鞨号，专称渤海”。见《新唐书》卷219《渤海传》——译者注）。

靺鞨人定居在河、湖岸边。史书上说，“他们把土壤堆成屏坝，在里面挖成洞穴，从上面开口，下去和出来走梯子”（注58，322页）。

公元5世纪时，靺鞨人的农业很发达。根据史书记载，他们“用

① 公元8—10世纪东北亚古代的封建国家。——译者注

两匹马耕地，播种黍子、小麦和稻子……他们用稻子做酒：先把稻子煮了，再酿成酒，可以喝到大醉”（注 58，325 页）。这就是说，那时他们已经会用犁或简陋的犁耕地，开始是木制的，而后来是用铁犁头。

科学院通讯院士 A. II. 杰列文科指出了马在鞑靼人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主人下葬时要把他的马杀掉作为随葬品的风俗就证实了这一点。按照鞑靼人的观念，主人的马应当在阴间继续为主人服务。他们养马还为了同临近的部落进行交易。

众所周知，鞑靼人是有经验的养猪人，他们也家养母山羊。狩猎和捕鱼在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中有重要的意义。他们用鱼喂猎狗和拉车的狗。

鞑靼人会用矿石炼铁。1961 年考古学家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挖掘出了 8—9 世纪熔铁炉的残骸。他们认为，大概熔铁炉没有保存下来的上半部分是一个圆形的炉筒子，熔铁炉或者埋在地下，或者用耐火材料制成。他们把铁矿石和燃料掺在一起塞满炉子，熔化的金属从下面流出并形成毛铁。铁被鞑靼人用来制作几乎所有的劳动工具。

鞑靼人用猪皮、狗皮和鱼皮缝制衣服，还用鱼皮做鞋。人们用亚麻布和其他的织物来制作节日服装，并用青铜垂饰加以装饰。部落贵族用丝绸和珍珠装饰自己的服装，珍珠是从沿海地区的河里捞取的贝壳中得到的。

考古学家挖出过鞑靼人的装饰品、马和猪形的黏土雕像。在发现的岩画上有马、骑士和小船的雕像。

他们的宗教信仰同分布于自然界的善恶之神——河流、湖泊、森林、高山——的概念有关。鞑靼人关于自然界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都有灵魂的观念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学家就他们的圣地写道：“他们国家的南部有一组高山（拓跋）。魏人把它们称作台跋（此处地名音译不准。据《北史》卷 94 勿吉转载：“国南有徒太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洩污，行径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徒太山、太皇山实为长白山——译者注）。山里有虎、猎豹、棕熊和狼，但不招惹人。人在这些山里禁止小便，如果途中经过此山，总是随身携带食物。”历史学家补充道，“按风俗鞑靼人很敬畏”这些高山，在山里人们“不敢杀死”他们遇见的野兽。鞑靼

人尤其敬重虎和熊。

在史书中是这样描述靺鞨部落的下葬仪式的：“人们为死者在地上挖一个坑，将其埋入里面，把土直接撒到死者身上，因为没有棺材。还要把死者骑过的马杀掉。在逝者面前要摆酒席并献上祭品。”在墓的上面经常要修一个不大的木房子，“防止雨水浇到墓上”。不过他们只在春夏葬人，秋冬他们不把人埋到地里，而是放到一个在森林里专门建造的木板台上，周围放上打猛兽的夹子，也能打黑貂。“黑貂吃肉，所以大量落网。”（注8，310页）

公元5—7世纪，由于社会的分化，出现了富人阶层，他们的影响力剧增，部落里的主要生活问题由他们决定。事实上，此前最初的村社里家长制的氏族关系已很发达，村社就是按这种关系衍生的法则进行管理。在妻子背叛时丈夫可以杀死她就证实了这一点。按照中国的史书，6世纪前靺鞨人就有了部落首领，对部落的统治是由家族来继承的。

6世纪初，靺鞨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极大地膨胀，相邻的部落、朝鲜半岛的国家和中国皇帝对此都极为重视。589年，一个靺鞨使团到达中国，皇帝对使团成员说：“我们从你们当地土人那儿听说，在取得军事胜利方面，你们能力超群。现在你们来了，我们相互见了面，实际情况符合我们的想法。”（注8，311页）

7世纪时，靺鞨人的部落或部落群的首领仍旧由军事长官担任，他们互不从属，独立管理。比较大的靺鞨部落联盟的士兵能达到7000人，而较小的也有3000人。

靺鞨部落联合朝鲜国高句丽同中国军队作战，但遭到了失败。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之后，为了下一步同中国军队的斗争，靺鞨军事长官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开始聚集力量。在随后同中国人进行的战斗中，乞四比羽被中国人俘虏砍了头。

但死去的乞乞仲象的儿子大祚荣却使派去进攻他的中国军队遭受惨败。后来根据史书记载：“大祚荣作为自己民族的首领率部向东将古代的挹娄领土据为己有”，在那儿的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市境内——译者注）上“筑城定居（《新唐书·渤海传》作：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译者注）。大祚荣指挥军队的技艺果敢、高超。靺鞨人和被击溃的高句丽军队逐渐回归”。大祚荣将过去比羽的部落归并到自己的部落

中，于唐圣历年间（698—700年）“建立了震国，宣布自己为国王”（注8，313页）。

与此同时，为了同第二个东突厥汗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又向突厥统治者派出了外交使团。显然，这是为了在同中国皇帝的斗争中寻找同盟者。俄罗斯远东境内和与之相邻的满洲地区第一个以通古斯—满洲部落为主的国家就是这样产生的。

新国家的主要居民是靺鞨人，根据历史学家Э. В. 沙甫库诺夫的权威意见，靺鞨人的氏族一部落名称同当代那乃人、乌尔其人、乌德人、奥罗奇人和满洲人的氏族和部落名称有关。

中国皇帝立刻就服膺了新国家军事上的强盛。713年，根据他的命令，大祚荣被授予古代小国——渤海国诸侯的封号，它的中心在现今北京的南边（此处似有误，古渤海国设五京，南京南海府位于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最南边在北纬40°附近，与北京纬度基本相同——译者注）。据历史学家Э. В. 沙甫库诺夫说，这个命令应当理解为：中国皇帝承认这片领土的特权属于靺鞨统治者。据所有的资料判断，这片领土是靺鞨人在进攻中国军队的过程中夺得的，而中国军队又是从原先的高句丽王国，即靺鞨人旧的盟友手中夺取这片土地的。（注8，314页）

大祚荣死后，他的儿子大武艺成为渤海国的统治者，他继续坚持父亲独立自主的政策。他是“野蛮”统治者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人，而此前这只是中国和日本皇帝的特权。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宫廷的愤怒，但中国统治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武艺就范，因此只能命令将他的名字从自己的史书中勾掉。

中国宫廷企图在统一的渤海部落中制造分裂，于是唆使东北地区的部落反对大武艺，但他镇压了叛乱者。作为对此事的回应，733年大武艺派出自己的小舰队进攻中国山东半岛北部一个大的海港城市登州（现在的蓬莱市——译者注）。

有趣的是，国内的学者在滨海边疆区哈桑地区的科考湾岸边的克拉斯基诺村发现了渤海国的古城遗址，并对其进行了考察。古代那儿曾经是渤海国燕省的省会，同时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渤海国的轮船就是从那儿出发驶向朝鲜和日本海岸的。

中国皇帝向古朝鲜王国新罗派去了大量的军队以便同朝鲜人一起向

渤海国的南部进攻。“但是，根据史书，无法通行的高山、严寒的气候和深达丈（一丈等于3.2米——作者注）余的积雪夺去了一多半士兵的性命，其结果进攻夭折，军队无功而返。”（注8，375页）

727年大武艺向日本派出外交使团，使臣向日本皇帝转交了大武艺的信件和300件貂皮。在回信中日皇写道：“谨向渤海国大公致意。对两国交好的提议，我非常高兴。希望以仁治国。虽然大海阻断了我们，但它不能干扰我们的交往。在你们使团返回之际，我将赠送这些礼物。”日本皇帝赠给大武艺114匹带花纹的白丝，114匹丝和野生大麻混纺的半丝织品，24团毛线和100捆毛绳（注58，342页）。

在渤海国最昌盛的时期，它的领土分布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它的西北边界沿松花江下游和中游，然后向南到达辽东半岛，紧接着直接拐向东方，所以，渤海国还包括朝鲜的部分领土。国家东方的边界是日本海沿岸地区。在北方，边界沿着松花江和阿穆尔河，然后从哈巴罗夫斯克往下继续向东南到达日本海沿岸北纬45°的地方。

738年，大武艺去世，他的儿子大钦茂登上王位。他在国内大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死后的谥号为“文王”。

905年，渤海国最后一任国王大湮撰登基。相邻的契丹部落开始了对渤海国持续的进攻。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于916年称王，把自己的帝国称作辽，就是“铁”之意。926年，尽管遇到顽强抵抗，阿保机还是击溃了渤海国的军队并攻占了許多城镇。接着又攻破渤海国上京城（今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译者注），渤海国国王和他的宫廷都成了俘虏。

契丹人并没有占领渤海国的全部领土，它的东北部，包括远东沿海边区，有可能还包括沿阿穆尔河地区没有并入契丹帝国的版图。尽管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渤海人在整个10世纪和11世纪初不止一次地起义反抗外来奴役者。

在俄罗斯远东沿海边区和与之相邻的满洲地区，学者们发现了一系列渤海国时代的考古学遗迹。研究这些遗迹，首先是牡丹江流域渤海国东都（即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市八连城——译者注）废墟，以及乌苏里斯克附近恰比沟河谷中辉煌的庙宇，我们就会发现，渤海文化专家——历史学家Э. В. 沙甫库诺夫所作的关于渤海国是它那个时代极具

影响力的文化中心的结论是多么的准确（注8，319页）。

## 金国的兴起和衰落

7世纪初通古斯—满洲民族就已经重建了自己的国家组织。居住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鸭绿江和阿穆尔河两岸，长白山山系和锡霍特阿林山（满语，锡霍特是牲畜短少之意，阿林是山——译者注）支脉的靺鞨—女真人的后代完成了这一事业。渤海国灭亡后，部分女真人臣服于契丹，但那些不愿投降的被称作野人女真或女真人。这首先指的是住在从朝鲜边界到阿穆尔河口、日本海沿岸和沿阿穆尔河下游几乎到中游地区的部落。

史书载，“女真人——天真无邪、朴实的人，勇敢、凶猛，不知把握生死价值的分寸。他们勇猛、果敢，每次上战场都穿着厚厚的铠甲”（注8，321页）。

他们从事农业，种植黍子、小麦、稻子、蔬菜，包括西瓜。他们用马拉的铁犁耕地。他们也从事畜牧业，饲养马、牛、猪、狗。他们是好猎手，箭法精准，“能长时间跟踪猎物，追上并将其杀死”（注58，347页）。

女真人在冬天和初春带着狗进入原始森林打鹿、驼鹿、熊和毛皮兽（松鼠、黑貂、貂）。他们用桦树皮制成角状物，在追逐母鹿时借助这个物件模仿公鹿的叫声以迷惑母鹿。打猎时还使用自己驯养的猎鹰，甚至把它们卖到邻国。

他们在原始森林里采集松子、蘑菇和野果子。在鱼大规模洄游期间捕鱼。女真人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豌豆汤和煮黄米，黄米吃的时候不煮烂，加上用蒜和生狗血做的调料。

女真人住在村庄的半地下窑洞里。窑洞里安装了取暖的炉子，烟道顺墙走，和火炕连在一起。

冬天，普通的女真人穿毛衣和用马皮、牛皮、猪皮、羊皮和狗皮做的大衣。下身的保暖衣——裤子、内衣和袜子是用鹿皮或麝皮、猫皮做的，而氏族部落的贵族冬天则穿貂皮、狐皮、松鼠皮大衣，或带里子的丝绸暖袍。白粗麻布做的衣服广为流行，是女真人最喜爱的服装。

编年史家注意到：“他们衣服料子的质量非常好。他们普通的外衣很短，在左边系扣。女人把头发编成辫子并将其在头上盘成一个圆圈。男人也把头发编成辫子，但让它自由地垂在脑后。人们在耳朵上挂着金、银和宝石，用丝线从后面把头发系住。富人为自己制作了珍珠和碧石的装饰品（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妇女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人以珠玉为饰……其衣服，则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译者注），他们穿黑色的用细的粗麻布同黑貂皮、麝鼠皮、狐狸皮和浣熊皮缝制在一起的皮袄。穷人穿用牛皮、马皮、猪皮、猫皮、蛇皮、狗皮和鱼皮做的衣服。”（注 58，347—348 页）

女真人崇拜天、太阳、水、森林和山。编年史家就此写道：“新年的第一天敬太阳，相互拜年。立夏时，人们用箭射柳树和给天上供。这些人不知道记录年代轮回（就是日历的顺序——作者注）。当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我看草是怎样开始发绿的并想：既然草发绿了，就是说，一年过去了。’”（注 58，349 页）

萨满在女真人中的影响独一无二，在部落里的重要性仅次于首领。萨满借助于咒语给人治病时要献上猪或狗作为祭品。他们还能预言未来。当女真人那儿出现集权的国家时，大多数显贵都信奉了佛教，但佛教始终也没成为国教。

女真人都是出色的战士，骑兵是他们军事力量的根基。“他们沿着山和河谷，从陡峭的山崖上（如此快地奔驰——作者注），像是在飞。”女真人的骑兵既不架桥也不使用摆渡，骑在马上就泅过了阿穆尔河和黄河这样宽的河流。

编年史家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武器和战术的：“他们把被称作‘硬’兵——坚韧之兵的矛兵置于前锋部队。士兵和他们的马都披着铠甲。宝剑、弓和箭都挎在后面，直到距离敌人剩下 50 步时才放箭。女真人弓的弹力（弓必须具有的拉力——作者注）不超过 7 度（超过 70 公斤——作者注）。箭达到 6—7 俄寸（1 俄寸等于 4.4 厘米）长（80 多公分——作者注；疑为 30 公分之误——译者注）。从外表看（箭头——作者注）像钎子。被射中时，不可能将这样的箭（从身体里——作者注）拔出。100 人的队伍 5 人一组，每 5 人、10 人、100 人

都有自己的头目。当所有的人整装待命时，5人小头目手握木槌，10人头目手握小旗，百人头目手握鼓，千人头目手握旗帜和金鼓。如果5人头目在战斗中阵亡，就把其余4个生还者处死。如果10人头目阵亡——处死所有5人头目，如果百人长阵亡——处死所有的10人头目。谁把从战场上阵亡的同部族的人带回并交给其亲属，他就可以得到逝者家庭收入的一半。所有的指挥官都亲自掌旗，看到他们，士兵们就知道，他们的头儿身在何处，就知道往哪儿冲锋。

“遇到敌人时，女真人会派出一两个骑快马的士兵侦察敌人的阵地或从侧翼、前面、后面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向敌人队伍冲出100步后，万箭齐发。女真人箭艺精准，几乎箭无虚发。如果得胜，那么先收拢自己的队伍，而不急于追击敌人。如果战败，也不溃散，而是重新聚集，使被打散的队伍又合在一起。他们要么再次进攻敌人，要么后退，直至使敌人惊慌失措。他们这样战斗，仿佛灵魂自己在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注58，350—351页）

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是女真部落为对抗契丹的进犯开始联合的时期，那时契丹的侵略越来越危险。在女真部落联合的过程中，清（金）女真帝国王室的先祖函普和保活里兄弟（或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始祖开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译者注）的部落起了特殊的作用。

他们的一个后代石鲁被推举为野人女真全体部落的领袖。石鲁企图使“东部”女真臣服于自己，他对东方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征讨，在讨伐过程中还深入到远东沿海边区“拜访了苏滨和耶懒”（苏滨——今大绥芬河一带；耶懒——今俄罗斯斯塔乌黑河——译者注），但没有达到目的（注8，325页）。

他的儿子乌古乃（1021—1074）能够逐步推动部落联合的进程，为此他开始重新装备军队。乌古乃和他的兄弟“以各种手段和高昂的代价”从“临近公国”的商人那儿通过用畜产品、农产品和猎物交换的方式得到铁、铠甲和头盔。此后，开始准备弓箭。乌古乃重新装备起来穿上铠甲的军队“变得强大了”。

研究女真帝国历史的专家、历史学博士维塔里·依比法诺维奇·拉利切夫认为，正是由于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并对东部部落采取了灵活的政

策，乌古乃才能兵不血刃地“逐步降服”他们。当远东沿海边区的部落出现饥荒时，乌古乃给那儿送去了马和牛（注8，325页）。

女真部落联盟后来的首领必须要克服某些部落尤其是沿海边区部落首领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企图单独对抗因北方邻居不断增长的力量而坐卧不安的朝鲜统治者。

女真的联合与帝国的宣告成立发生在乌古乃的孙子、著名的首领阿骨打掌权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他的生平有关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让我们来看看 A. П. 杰列文科是如何讲述这些故事的。

阿骨打出生前出现了五彩祥云，星象家说：“在这些彩云下一定会诞生一个不同寻常的能成就伟业的人。”（据《金史》：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译者注）从早年起，阿骨打就以力量和工于心计在自己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童年时代他就爱上了射箭。有一次，当契丹大使在阿骨打父亲宫里时，大使看到继承人手里拿着弓和箭，就命令他射一群鸟。阿骨打射了几次，每次都命中目标。大使称赞了他，把他叫作非凡的少年。

还有一次，阿骨打正在霍里汗将军家的宴会上，他看到离将军家远处有一座高高的山丘，就建议往那儿射箭。但出席宴会的人没有人能够将箭射得如此远。于是阿骨打射了一箭，而他的箭却越过了山丘。当测量距离时，人们发现，箭飞了300多米（注58，352—353页）。

1114年，阿骨打开始了同女真人的宿敌——契丹的战争。他决定向10万人的契丹军队发动突然进攻。出其不意强渡鸭子河之后，他带领3700名士兵利用“卷起遮天蔽日尘土”的顺风向契丹人的营地发起了进攻。措手不及的契丹人溃退了，给胜利者留下了无数储藏品和武器。然后女真人占领了许多大的边境要塞。

1115年阿骨打接受了皇帝的封号，把自己新的帝国称作“金国”（“清”）。史书中引用了他在接受皇帝封号时所说的话。他在使用契丹人辽朝的别称“铁”时说：“宾州的铁哪怕是再好，它也要生锈，也可能被铁锈腐蚀！只有金子不生锈，不能被破坏。此外，完颜家族（我通过函普酋长与之交往）始终喜爱像金子那种闪光的色彩，我决定采用这个称呼作为我的帝国的姓氏。所以给它‘金’这个称号（据《金史》：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以变坏，惟金不变不

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译者注)。”(注8, 332页)

阿骨打称帝立刻引起辽国皇帝的强烈反应，他向东方派出了27万军队。在残酷的战争中，辽国军队被击溃。先是契丹的上京、东京、中京，然后是最后两个京城落入女真手中，几乎所有契丹土地都归属于金帝国。

阿骨打有卓越的治国才能。1117年他发布命令，成立法律和政令文书编纂委员会。他为这个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学者、“学识渊博和有能力的”人。女真人起初使用契丹文字，阿骨打命令“编造民族文字以适应上述法规”。学者完颜希尹制定了女真字母表，阿骨打吩咐将其颁布。后来女真文字日趋完善。毋庸置疑，创造自己的文字在女真文化和国家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

阿骨打在联合庞大帝国内各民族和部落时采取了稳健的政策。1123年他颁布上谕，内称，那些自愿归顺女真的部落将得到赏赐，将给予他们各种恩典。

灭亡辽国的事业是由阿骨打的继承者完成的。原属契丹的一直到黄河的所有土地都到了金帝国的手中。它的皇帝们开始公开同宋王朝发生冲突。宋朝军队遭受了一连串的重大失败。1126年宋朝皇帝同意向金国支付大量赔款：500万两黄金(186.5吨)，5000万两白银(1865吨)，100万匹丝织品，1万头牛和马(注58, 358页)。

后来，同宋朝的战争又不止一次地爆发。1141年双方签订和约(即《绍兴和约》——译者注)，按照条约，宋朝承认女真占据北方省份的合法性并同意每年给予大量贡赋。

这时，北部沿海边区和乌苏里江下游的曼古部落崛起了。他们居住在位于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女真部落的东北部。女真人称他们为“面奴”和“面古”。历史学博士B. E. 拉利切夫认为，这些部落的自我称呼都源于他们(乌尔其人或曼古人)住地河流的名称，而且20世纪时，人们把阿穆尔叫作曼古，也就是河流或水的意思。他认为，曼古可能是乌尔其人的部落联盟，他们在女真时代的居住地比现在要广阔得多。

B. E. 拉利切夫引用了史书中的一些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曼古人(即中国的赫哲族，俄国称之为戈尔德人，也称马姆古人，居住在乌苏里江两岸——译者注)被描述成不吃熟肉，只吃生鹿肉的强人。曼古

猎人有敏锐的目光，因为他们能看几公里远，能分辨细小的物体，不怕做饭时的烟熏火燎。就像史书所说，他们甚至夜间也能看见。蒙古士兵用鱼皮制作的铠甲箭都无法穿透。“一条大河”隔开了蒙古人和女真人（注 8，334 页）。

起初，蒙古人积极同女真首领合作，他们勇敢地同辽军作战。但按他们的说法，女真国没有为此用相应的方式来酬劳他们。1135 年女真皇帝熙宗出兵蒙古，要让这些部落彻底服输。但蒙古人以进攻相回应并打败了熙宗派去的军队。

同蒙古人的战争持续了 12 年并以签订让金国感到屈辱的条约而终结。根据条约的规定，女真人割给蒙古人西滨河北面 27 座城堡，而熙宗皇帝应当向蒙古输送牛、羊和谷物，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每年都要进贡。

接下来，女真为了击溃蒙古人，不止一次向北方用兵。看来，女真皇帝在 12 世纪末最终成功地征服了这些爱好自由的部落。

为了复兴和发展女真的民族文化，为了使女真部落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名扬四海，1160—1189 年在位的女真皇帝世宗建树颇多。必须看到，虽然战胜了宋朝，但中原文化对女真社会的影响却不可小视。

世宗命令对古代女真的风俗加以整理和研究，以便使民众更好地遵从它们，还在先人祠里为女真名人立碑塑像，在宫廷里表演女真的舞蹈和乐曲。贵族和官吏倾心研究民族语言和文字。皇帝对自己的宫内官员说：“不懂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祖国。”他要宫内官员根除中国风俗，禁止采用中国姓氏和穿中国衣服，违者送交法庭。

皇帝专门从根据他的命令编辑的姓氏录当中为自己的儿孙挑选女真名。人们还在女真人中积极遴选有天分的青年，以便今后让其在学校任教和在国家机构里任职。在中国广为传播的佛教和道教作为外来宗教遭到禁止。皇帝坚决反对衣着华丽和宴会豪华的陋习。官员中的受贿和盗窃国家财产者均遭到无情的镇压。

这个时期，女真人制定了国家法律，文化、艺术、科学得到了发展。按科学院通讯院士 A. П. 杰列文科的评价，“女真人成为亚洲东南部和东部文明、先进的民族之一”（注 58，361 页）。

由于蒙古成吉思汗军队的进攻，金国崩溃了。从1210年至1235年，蒙古人同女真人的残酷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国家被无情地破坏和掠夺，被烧毁后的繁华城镇荒无人烟，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道路上长满了草，庙宇、宫殿毁于一旦。当17世纪中叶俄国哥萨克来到阿穆尔河沿岸时，他们遇见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女真人的后代——那乃人和乌尔奇人，一些失去了国家，在许多方面丢失了自己祖先文化的人。

## 雅库特人的古代史

西伯利亚东北部在俄国哥萨克和实业者到来之前人数最多的民族是雅库特人（萨哈人），他们在文化发展水平方面比其他民族有明显的优势。17世纪30年代，他们的主要部落住在勒拿河中游、阿尔丹河和阿姆加河形成的三角地带。此外，他们中不大的一些群落住在亚纳河、奥廖克马河地区、维柳伊河河口和俄国人曾建立过日甘斯克（雅库特的一个村庄，位于勒拿河左岸——译者注）城堡的勒拿河下游地区。

雅库特人的祖先住在遥远的南方，在贝加尔湖沿岸。按照科学院通讯院士A. П. 杰列文科的看法，雅库特人的祖先往北迁移开始于8—9世纪。当时传说中雅库特人的祖先——突厥语系的民族骨力干人（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的民族，6—8世纪的古突厥金石文字曾提到过——译者注）正分别迁往贝加尔湖沿岸，保存到现在的鄂尔浑金石文字中能找到关于这个民族的资料。蒙古人作为外来户是从外贝加尔草原来到勒拿河的，12—13世纪受到这个更加强大的邻居的排挤，雅库特人加剧了向北方出走的速度，14—15世纪这一过程完结（注58，61页）。

米勒尔和葛麦林院士的同伴雅科夫·林杰纳乌与他们一起参与了政府组织的西伯利亚研究考察团，根据他于18世纪初所记录的一些传说，最后一批移民在传说中提到的著名的部落领袖（酋长）德基纳的祖父巴杰的带领下于16世纪末从南方来到勒拿河。A. П. 杰列文科认为，这些部落向北方迁移时，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也都到了那儿，不仅有突厥人，也有蒙古人。在100年当中，各种文化复杂的融合过程一直在进行，况且这些文化在各自地方由于本地通古斯和犹加吉尔部落高超的素养和技能的渗透已经很充实，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雅库特民族。

从南方迁到条件艰苦的雅库特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失去了许多原来能够掌握的技能。雅库特人是养畜能手，他们住在南方，除了养牛和马，还养羊和骆驼，但雅库特的气候并不允许他们再从事这个行当。

他们还失去了文字。勒拿河岸边悬崖上带金石文字标记的岩画证实他们曾经有过文字。这些岩画是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在勒拿河上游岸边卡丘克村下面的什石根斯基悬崖上发现的。然后再往北在距上林斯克（伊尔库茨克州卡丘克区的一个村庄——译者注）不远的地方，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现了这样的岩画。世界上最北边的金石文字的遗迹是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在勒拿河左岸发现的，那个地方在辛斯克村的下面，距离雅库茨克 200 米，是一个叫彼得罗夫斯卡娅的村庄，那儿已经是雅库特的中心了。

看来，在俄罗斯术语“信”“识字”“字母”“书写”出现之前，在雅库特语言中有过表示这种意思的两个单词“苏鲁克”“比奇克”。在其他突厥—蒙古民族当中，这两个单词也是同样的意思。雅库特的传说证明他们的先人有过文字。这其中的一个谈到了传说中的英雄艾列依往北撤退的故事，他教雅库特人在原始森林的严酷条件下饲养牲口和马，制作马奶酒。“艾列依原来懂得古文字，但把自己的书忘在故乡（南方，他从那儿出来——作者注）了。”在另一个传说里，艾列依“是一个识字的人，他有书，但从家里出走时把书扔到了河里”（注 58，72 页）。

迁到北方之后，雅库特人丧失了原来掌握的耕作技能。但他们会用矿石炼铁，制作斧子、棕榈（一种套在长杆上的宽刀）、锅、枪头和箭头、锁子甲、打铁用具和装置（锤子和砧子）等。就像许多东方民族一样，铁匠在雅库特人那里受人尊敬。况且，雅库特人认为，铁匠比萨满更有力量。他们相信，神灵是铁匠的保护者，比萨满神灵更强大，因为铁匠掌握驾驭火的力量和技能，而火能烧死任何一个萨满。

雅库特人的主要财富是牲口。马既用来骑乘，也用来劳作。他们用马奶制作马奶酒，牛和马提供肉食，用牛奶制作黄油和其他的奶制品。他们还用牛皮和马皮制作衣服和鞋、皮带、器皿等，马鬃的用途也很广。

冬天雅库特人要储备饲草喂牛，而马则放出去吃草。因为必须要准备饲草，所以雅库特人只能过半游牧生活。夏天他们去夏天的牧场，冬天迁到离草场较近的地方过冬并囤积牧草。

雅库特人最重要的肉源和皮源来自狩猎和捕鱼。雅库特人用貂皮、狐狸皮、狼皮、兔皮和其他的皮子缝制暖和的衣服。因此猎人之神、森林的主人——巴伊·巴伊阿乃神在雅库特人的史诗中占有重要位置。雅库特人的许多狩猎方法都是从当地的北方民族——通古斯人和犹加吉尔人那儿学来的。善于制作黏土器皿可以证明雅库特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俄国人到来之前，无论是通古斯人、犹加吉尔人还是拉姆特人（埃文尼人），甚至布里亚特人和贝加尔湖周围的居民都不会制作黏土器皿。

描写勇士功勋的英雄史诗——奥龙霍（雅库特人英雄史诗的总称——译者注）是雅库特古代文化的丰碑。按照雅库特古代史专家、历史学家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加加列夫的意见，这些史诗是在雅库特人的祖先居住在南方时产生的，当时他们同萨彦岭—阿尔泰部落的祖先以及古代蒙古人有着密切的接触。

这些传说中的每一个都有10000—15000行，而长点儿的达到20000行甚至更多。雅库特的奥龙霍说书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讲创世的故事：上、中、下三个世界。上层世界住着以主神尤柳恩克·艾—托伊鄂恩为首的诸神，但那儿的有些地方住着一些吃人的怪物阿巴斯。在中间世界里，就像一个传说中所说的，有“35个遍布中间世界的部落，35个住人的村庄”。但中间世界的某些地方也有阿巴斯。而在下层世界只住着以魔头阿尔散·多巴依为首的怪物阿巴斯。

在雅库特人的神话中包括天上所有的神祇：命运之神奇尔加—汗（人们还象征性地把它叫作成吉思汗），人和牲畜的保护女神——叶赫西特，生育女神——艾希特，战神——伊尔比斯汗，雷神部落酋长秀恩科—秀盖汗等。

这些神祇中最受尊敬的是氏族土地（祖国）女神安·阿拉赫钦·哈顿，森林和猎户神巴伊阿乃，火神——部落酋长安·达尔汗，鸟神哈姆鲍路恩·哈托依·艾，铁匠之神基丹·巴赫西。

许多传说讲述了勇士的功勋，他们同恶魔鬼怪的斗争。通常，传说中的英雄是一个善良的、人和地球上所有生灵的保护者，他的敌人阿巴

西艾玛加（魔鬼的亲戚）是一些凶恶、残忍的怪物，它们攻击人，毁坏人的住所，抢走妇女和儿童。

这一系列雅库特传说叙述了勇士们的生活和功勋，他们的形象在许多方面都是基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关于雅库特“沙皇”德根的传说，看来他没有活到雅库特并入俄罗斯那天，但当时他在雅库特部落生活中的作用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雅科夫·林杰纳乌那时曾记下了他的传说。

勒拿河中游雅库特人第一个（可能是全部落的）首领是德根的祖父巴翟依。在民间记忆中，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强有力的统治者，有许多士兵、仆人和奴隶。根据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的意见，他的领地分布在沿勒拿河左岸，从现在的雅库茨克到巴卡罗夫斯克沿河超过125公里的地区。

后来成为首领的是他的儿子孟安，而接替后者的则是小儿子德根。在传说中，德根是作为一个勇士巨人出现的。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是这样转述传说的一些语言的：“他的个头儿是这样的，月夜的树影只能到他双乳下的黑边，一个眼球重30俄磅（12公斤——作者注），而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二分之一俄尺（35公分——作者注）。”（注11，190页）。根据传说，他的儿子们也是这样的勇士，甚至他们中稍弱些的也有这样的力量和耐力，在同哥萨克人作战时挥手撩拨开子弹就如同赶开惹人讨厌的昆虫。

根据传说，德根迫害其他的氏族和部落，要求他们俯首听命，残酷地消灭一切反抗的萌芽，以达到所有的人都服从他的目的。甚至他的儿子们也成了他贪权的牺牲品。但当他年老力衰时，人们复仇的时刻也就来临了。当时从南方来了一大群强大的沙皇的仆人，然而德根周围已经没有勇士了。

记录德根传说的雅·林杰纳乌当时写道，长子们非常愤怒，因为父亲任命小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和首领。于是16世纪后半期开始了残酷的内战，这不仅仅只给一个雅库特民族带来了许多痛苦，而且这场民族悲剧长时间地留在了雅库特人的记忆中。

在雅库特传说中没有关于德根何时死于何处的记载。林杰纳乌曾提到，德根被哥萨克抓住成了人质，他作为俘虏死于最早一批省督到达雅

库茨克之前。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指出：“德根是他那个时代某种致力于雅库特氏族的联合，某种仿佛要统一他们的国土的倾向的代表者。这种联合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在那个时代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因为它首先有助于减轻流血的内讧，在某种程度上遏制那些暴怒的掠夺者——部落酋长，最后，有助于民族力量的大联合，认清全民族的利益，加强各部落间的联系。”（注 11，207—208 页）

但对于当时的雅库特部落来说，不具备联合的客观条件。德根的悲剧事实上是整个已经逝去的雅库特家长制——氏族社会的悲剧。

## 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同成吉思汗军队的斗争

后来的布拉特人（布里亚特人）的祖先是来自蒙古部落中分离出来的，他们从成吉思汗的帝国存在前就住在沿贝加尔湖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

问题在于，1 世纪后半期外贝加尔和蒙古发生了游牧民族的大迁移。维吾尔族的国家消失了，其他的突厥和蒙古民族占据了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地区。6—9 世纪控制沿贝加尔地区的骨力干人看来是往北方去了，他们原来的地方出现了蒙古语系的部落。代替原先住在外贝加尔拔野古人（8—9 世纪贝加尔地区维吾尔汗国的主要部族之一——译者注）部落联盟的是蒙古语系的巴尔古特人（蒙古化的突厥人，主要居住在中国北部——译者注）。

什石根斯基悬崖上的岩画就表现了蒙古游牧民出现在勒拿河上游的情景。学者 Г. Н. 鲁缅采夫和 Л. Л. 维克多洛夫就这些画面写道：“除了坟墓里找到的东西，还在什石根斯基的悬崖上发现了一些精美的雕像，按时间顺序它们排在骨力干图像的后面。这些雕像真实地再现了漫游无定的畜牧群落的迁移场面。走在前面的是武装骑士，他们驱赶着自己前面的畜群。后面是一辆接一辆的拉着帐篷的大车。这些生动的迁移画面一如它们在蒙古史诗和 13 世纪西欧旅行者的作品中被描写的那样。”（注 8，381—382 页）

11—13 世纪住在贝加尔湖周围和蒙古大地上的蒙古部落操各种部落方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写过《编年史集》的伊朗学者、国务活

动家拉什达金（13世纪末—14世纪初）和写过历史演义作品《蒙古秘史》的蒙古无名作者（不早于1240年）把所有的蒙古部落分为两类：森林捕猎型的，大概住在沿贝加尔湖地区；草原畜牧型的，沿着从中国到阿尔泰山的牧场放牧。居住于这个地区的森林和半森林半草原区域的部落中有这样一些人，按Г. Н. 鲁缅采夫和Л. Л. 维克多洛夫的意见，“在他们的姓名中使用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专有名词同后来的布里亚特人有关”（注8，382页）。

在《蒙古秘史》里，森林部落名录中显然提到了布里亚特人的祖先：霍里—秃马特人、亦乞列斯人、巴尔浑人（巴尔古特人）、布里亚特人（布里亚人）。拉什达金提到了霍里—秃马特人、布拉加钦人、凯列姆钦人、亦乞列斯人和巴尔古特人。

学者们认为，当成吉思汗的国家出现在蒙古时，它打击的目标首先指向反抗蒙古可汗和他的近臣奴役的布里亚特人和叶尼塞的吉尔吉斯人的祖先。

《蒙古秘史》讲述了蒙古人征讨沿贝加尔地区森林部落的故事：“拙赤在兔年（丁卯，1207年——作者注）（拙赤，一译术赤——译者注）以布合为向导，率右路大军出征森林百姓。闻此消息，斡亦刺惕（森林百姓之意，蒙古西部某些部落的总称，中国明史称为‘瓦剌’，清代称为‘卫拉特’，还有斡亦刺、外刺、猥刺、厄额鲁特等称呼——译者注）之头人忽都合别乞代表自己的图们——（万户百姓或万名士兵之意——译者注）斡亦刺惕人前来归降了大军。忽都合别乞归降后，又亲为拙赤引路，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图们——斡亦刺惕人那儿，使大军很快打到了失黑失惕河一带。拙赤一路降服了斡亦刺惕、布里亚特、巴尔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斯、康合斯、秃巴斯等部，挺进到图们——（万户百姓或万名士兵）吉尔吉斯疆土时，吉尔吉斯头人也迪、亦纳勒、阿勒迪额儿、斡列别克的斤等向拙赤表示领会首听命，并向国王献上白海青、白骏马、白貂等。拙赤将所有的森林部落置于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注8，384页）

这样，布里亚特人最先成为成吉思汗的敌人，这里既有一些个别的部落，也有后来部分融入布里亚特人的巴尔浑人（即巴尔古特人）。布里亚特人的祖先——霍里—秃马特部落同成吉思汗的军队进行了长期的

抗争。在蒙古人的大部队撤离后，他们发动了起义并俘虏了蒙古人的代理人部落酋长豁儿赤和派去为他收钱的叛徒胡都合一别乞。后来，为了击溃霍里一秃马特人，成吉思汗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一个老战友孛罗忽勒，但他中了埋伏，被霍里一秃马特人所杀。

于是在派出了一支新的平息叛乱的蒙古军队后，才击溃了霍里一秃马特人。这支部队是在一名斡亦刺惕酋长的带领下沿着野兽走的小路到达起义者后方的。

森林部落始终也没有同侵略者媾和。Г. Н. 鲁缅采夫和 Л. Л. 维克多洛夫认为，在蒙古人向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居住的土地发动进攻之后，某些贝加尔湖沿岸部落，包括某些霍里一秃马特群落中的人迁移到了北方，然后融入雅库特民族之中。

布里亚特部落向蒙古统治者纳贡，但似乎没有直接参与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军队向东、西方的征讨。布里亚特人祖先的这种角色，他们名义上对蒙古统治者的依附看来在布里亚特人的语言中也能反映出来，他们的语言当然属于蒙古语系。

布里亚特方言中保留了许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对 13—14 世纪蒙古人口头流传的作品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而且现在在其他的蒙古语言中也是见不到的。此外，按照语言学家的意见，布里亚特人的语言体现了布里亚特人蒙古语系的祖先对突厥部落的同化过程。所以，含有许多古旧的蒙古词汇的布里亚特语言里有不少突厥词汇，而这些词汇在其他蒙古语言里是没有的。

17 世纪之前，布里亚特人是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贝加尔湖沿岸，半定居式的放牧占主要地位。当他们在自己村里圈养牲口时，要为过冬的牲口准备饲草。而在外贝加尔，布里亚特人过着典型的游牧放牧生活。他们饲养牛、羊、马和骆驼。畜牧业向他们提供了肉、衣服和建毡房用的材料。的确，在西部布里亚特人那儿还保留着农业，他们种黍子、荞麦和大麦，同时，为了播种要用锄头耕地。

狩猎在布里亚特人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布里亚特人捕猎的特点是采取围猎这种集体行动的方式，围猎时女人和男人一样参与其中。对于大型动物熊、驼鹿等人们用羽形矛击杀，而小动物则用箭射。在沿贝加尔湖地区和外贝加尔所发现的岩画上有这样的围猎场景，其中

有一部分显然是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完成的。

布里亚特的先人有发达的采矿业、冶金业和锻造业。他们能熟练地制作士兵的武器，捕猎的工具，斧子、刀子、煮饭和熬盐的锅，以及带有银压膜花纹的马具。

后来形成了布里亚特民族的那些部落同埃文基人（中国称鄂温克族—译者注）、图瓦人、吉尔吉斯人的易货贸易进行得十分红火，也包括同中亚细亚的国家和蒙古的易货贸易。布里亚特人的祖先用黍子、牲畜、铁产品作交换，从埃文基人那儿得到毛皮。通过中亚细亚商人的帮助，他们把牲畜和毛皮运到中亚细亚和中国，换回了珠宝、丝绸和棉织品。

在沿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这个部落名称原来只涉及一部分居住在该地区的部落，到17世纪时，已经扩散到边区所有的操蒙古语的部落。此前被认为是斡亦刺惕人一部分的一些部落也融入布里亚特人之中。蒙古人本身形成了布里亚特民族中一个强势阶层。在俄国人出现在沿贝加尔湖地区和外贝加尔之前，布里亚特人是东西伯利亚人数最多、军事上最强的民族，是他们“向众多的当地人”征收“小块土地的实物税”。

# 叶尔马克在西伯利亚

## ——首次“夺取西伯利亚”的历史

用自己和敌人的血  
洗刷掉狂暴生活的罪恶，  
因为胜利，赢得了祖国的感谢——  
死亡对我们并不可怕；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事业：  
西伯利亚臣服于沙皇，  
因为我们——不是碌碌无为地活在这个  
世界！

——康德拉基·雷列耶夫

哥萨克军官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在使外乌拉尔土地并入莫斯科罗斯时完成的光荣事业和他在额尔齐斯河岸边会战中的悲剧性死亡，将永远留在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中。难怪人民创作了无数表现叶尔马克生与死的故事和歌曲。

诗人——十二月党人康德拉基·费奥多洛维奇·雷列耶夫在他的历史诗篇《沉思》和《叶尔马克之死》中塑造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在前言中，诗人依据古老的西伯利亚编年史描绘了传说中哥萨克首领的肖像：“编年史作者把这个英雄说成是一个宽肩膀，威武、健壮的人，他中等个儿，有一张扁平的脸，快速转动的眼珠，黑络腮胡子，深色、卷曲的头发。”（注 16，39 页）雷列耶夫的出色诗篇鲜明地刻画了哥萨克英雄的形象，这些诗歌已成为在罗斯广为流传的民间歌曲。

鲁斯兰·格里高利耶维奇·斯科雷尼果夫教授 1979—1980 年发表

的研究成果在复原叶尔马克真实的生平历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给著名的西伯利亚历史学家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的信中, 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写道:“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些新的档案资料,但不多。最主要的是,顺利地把直接归入外交事务衙门档案命令文件里有关叶尔马克出征的材料清理了出来,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首次西伯利亚考察情形的认识。”(注 11, 12 页)我们在叙述“夺取西伯利亚”历史时使用的正是 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 A.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院士和国内许多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

需要马上指出的是,有关叶尔马克出征西伯利亚之前的生活信息却很少。根据古老的北方编年史,叶尔马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故乡是州中心——北德维纳河边一个叫勃洛克的村子。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这位著名的哥萨克首领最可能的出生地。

叶尔马克生于何时?一些哥萨克老兵晚年时才确认,从 1565 年起在叶尔马克手下服役不低于 20 年。如果叶尔马克 60 年代中期成为哥萨克首领,那么当时他的年龄不小于 25—30 岁。许多古老的编年史中都说,著名的哥萨克首领“被称为叶尔马克,是通过一只旅途中的铁三脚架(铁锅——作者注)体现出来的,或按伏尔斯基河(伏尔加河——作者注)沿岸流传的说法——手动磨坊(磨盘——作者注)”(注 12, 408 页)。许多写过叶尔马克远征史的历史学家都赞同叶尔马克只是一个外号这种说法。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研究者断言,叶尔马克多半是在殉难者叶尔马拉亚日出生的,那天恰好是 7 月 26 日,他因此得到了叶尔马拉亚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简称叶尔马克。因为当时人们都用伟大的殉道者或圣徒的名字给在那天(按教堂日历)出生的孩子命名。

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谈到了著名的哥萨克首领年轻时就得到的(按保存到现在的最早的西伯利亚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叶尔马克追随者所说的话)外号——达克马克。“达克马奇”这是一种轻便的木锤头,可以用来夯实土地,而动词“达克马奇奇”则意味着“用拳头打、敲”。(注 12, 412 页)这就是说,这个外号指明了享有这个称呼的人在拳头中的力量和顽强。

叶尔马克为什么离开故乡到南方伏尔加河沿岸的哥萨克村镇去?或

许，是由于沿海地区的荒年和饥饿的原因。有一点很清楚，他开始在镇上服役时，成了有经验的老哥萨克的小兄弟，或叫“丘尔”（意义不详，或是当时人们对小字辈的戏称——译者注）。他向老一辈人学习射箭，使用火绳枪、枪和马刀，了解在草丛中搜寻飞奔而过的鞑靼人的踪迹的技巧，还要学习在河中驾驶平底木船的方法。在平日和出征时，他要完成所有的粗活儿：收拾东西、煮饭、洗衣、修鞋。

叶尔马克完全有可能在最终攻占喀山的战役中参加了哥萨克军队，而且是攻入被鞑靼人抛弃的阿斯特拉罕城的哥萨克中的一员。16世纪60年代中期，他被推选为首领。这说明，叶尔马克此前已成为一名有威望、有经验的战士。同他一起开始哥萨克军旅生涯的许多人都死在同鞑靼人作战的“荒凉的田野”上。或许，叶尔马克不止一次负伤，由于敌人马刀的砍击和箭、子弹的射击而伤痕累累。但看来，他在战场上比较幸运，所以哥萨克都信任他。

但当1569年夏天来临，土耳其舰队载着帝国的精兵从亚速夫要塞出发，沿顿河往上向顿河口进发，而鞑靼骑兵沿河岸与之齐头并进时，叶尔马克不能袖手旁观了。

土耳其人想占领阿斯特拉罕，破坏所有伏尔加哥萨克的村镇并封锁莫斯科的贸易渠道伏尔加河。督军彼得·谢烈勃良内公爵率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向阿斯特拉罕出发。当谢烈勃良内到达阿斯特拉罕时，一支伏尔加哥萨克的船队已急急忙忙赶到了。哥萨克很清楚，这场直接逼近他们家乡的战争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威胁。

土耳其人无法将自己笨重的大船拖到伏尔加河。沙皇和哥萨克舰队兵临阿斯特拉罕让土耳其精兵彻底丧失了胜利的信心。因为不想在草原上过冬，土耳其精兵发生了哗变。土耳其人被迫向亚速夫返航，沿途不断遭到哥萨克舰队的攻击。

许多历史学家推测，叶尔马克和他的伏尔加哥萨克队伍参与了一次著名的战役——16世纪克里米亚汗国同莫斯科罗斯长期对抗中一次重要的事件。这指的是发生在距离莫斯科45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的马洛基村附近的一次战役。当时是1572年夏天，包括3800名顿河和伏尔加哥萨克在内的俄罗斯军队彻底击溃了克里米亚汗国，大、小诺盖汗国的骑兵，报了鞑靼人去年烧毁莫斯科城厢的一箭之仇。在开阔

地战斗中击溃鞑靼汗国之后，莫斯科公国使强大的克里米亚汗国从此一蹶不振。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与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年为争夺利沃尼亚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由沙俄一方对抗由丹麦、挪威、瑞典以及波兰—立陶宛联邦所组成的联盟——译者注）最后一场战斗有关的历史文件中。伊凡雷帝企图通过与条顿骑士团、列齐·巴斯巴利达（15世纪末—18世纪波兰的传统称呼——译者注）和瑞典的战争夺回俄罗斯在利沃尼亚旧有的城市和波罗的海的港口，首先是纳尔瓦。在第三次出征俄罗斯边界时，波兰—立陶宛国王斯捷凡·巴托里决定占领俄罗斯重要的边界要塞普斯科夫。普斯科夫的陷落将会导致整个利沃尼亚（中世纪后期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大部分领土的旧称——译者注）被波兰人占领。

考虑到莫斯科罗斯面临的致命危险，为了吸引哥萨克参与西方的军事行动，沙皇向顿河和伏尔加河沿岸派出了急使。沙皇伊凡雷帝命令由500名顿河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参与普斯科夫的“围攻战”，这支队伍由哥萨克军事长官米哈伊尔·切尔卡什宁率领，他在1572年马洛基村击溃鞑靼人时就已声名远扬。从第一天受到围攻到最后解围，哥萨克成功地保卫了要塞，尽管在战斗中牺牲了自己的军事长官。

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和他的伏尔加哥萨克部队到达了西部边界的斯摩棱斯克地区。他的队伍乘坐平底木船沿着河流和两河之间的连水陆地，向第聂伯河进发，在接近斯摩棱斯克时加入了一位优秀的莫斯科督军德米特里·赫瓦罗斯基宁公爵的部队，他曾指挥过在斯摩棱斯克招募的一支劲旅。

波兰马基列夫的要塞司令准确地查明了赫瓦罗斯基宁部队中15位头领的姓名。名单中指出了最后几位：“14. 瓦西里·亚诺夫，顿河哥萨克督军；15.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哥萨克首领。”在赫瓦罗斯基宁的部队中，只有叶尔马克直接指挥哥萨克军队，而不从属于来自贵族的首领。首领瓦西里·亚诺夫指挥几支装备火绳枪的顿河哥萨克骑兵连，而叶尔马克是伏尔加哥萨克木船舰队的指挥官。

1581年春天，赫瓦罗斯基宁率领部队从斯摩棱斯克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向奥尔沙（白俄罗斯的省辖市，坐落在第聂伯河岸边——译者

注) 和马基列夫进发。赫瓦罗斯基宁想对国王的军队造成威胁, 以阻止它向普斯科夫推进。同沿第聂伯河行进的部队相比, 突显了叶尔马克船队的重要性。哥萨克乘坐的平底船快于地面部队, 为了保障赫瓦罗斯基宁的主力部队渡河, 他们用火力清除了岸边的敌人。

6月25日, 哥萨克占领了奥尔沙附近的渡口, 赫瓦罗斯基宁的部队渡过了第聂伯河。然后, 哥萨克的船队突然出现在马基列夫面前, 国王的三个连队企图赶走他们, 但随着赫瓦罗斯基宁团队到来, 他们被击溃并退回到要塞中去。

俄罗斯军队扫清了马基列夫要塞四周后在要塞南边集中起来, 在叶尔马克船队的护卫下再次渡过第聂伯河。俄国军队的行动延缓了波兰军队接近普斯科夫, 帮助被围困的要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督军赫瓦罗斯基宁和卡德廖夫被派往诺夫哥罗德抵挡波兰一立陶宛军队的进攻。仍在他们指挥下的叶尔马克的部队前往被围困的普斯科夫城下参与军事行动。所以在波兰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阿斯特拉罕的哥萨克企图在秋雨连绵的黑夜“从湖边”突往普斯科夫。英勇的普斯科夫保卫战最终耗尽了波兰一立陶宛军队的力量。1582年1月15日, 沙皇外交官在诺夫哥罗德城下的亚姆·扎波尔斯科同列齐·巴斯巴利达(波兰)签订了关于停战十年的条约。

1582年2月, 俄国人同瑞典人的最后几场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斯捷凡·巴托里国王要求莫斯科与瑞典停战, 并威胁, 如若不然就撕毁停战协定。寒冬将近时, 赫瓦罗斯基宁的团队被解散。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被督军解雇后返回了自己在伏尔加下游的过冬地。

在接近喀山时, 叶尔马克听说了伏尔加沿岸民众发动起义并进攻沙皇军队的消息。此时, 沙皇政府开始追捕伏尔加的哥萨克首领伊万·卡尔佐、鲍戈丹·巴尔鲍什和其他一些人。此前一年, 这些人在莫斯科政权的秘密纵容和鼓励下同诺盖的鞑靼贵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残酷战争, 因为后者参与了向罗斯的掠夺性进攻。

这些军官摧毁了位于亚伊克河口(乌拉尔河的旧称, 1775年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令改名为乌拉尔河——译者注)的诺盖汗国的首都萨莱奇克。诺盖人本想利用沙皇军队在西部边界的失利从南方向罗斯发动进攻, 可首都被毁使他们的希望大大减弱。大诺盖汗国可汗立刻向

莫斯科派出使团以巩固和平。

1581年8月，当叶尔马克同罗斯西部的敌人作战时，上面提到的那些伏尔加的哥萨克首领攻击并抢劫了来自中亚细亚的诺盖大使和与之同行的商人。与诺盖大使一同返回莫斯科的还有贵族的儿子B. И. 别列别李津，他是春天带着贵重礼物、肩负使团使命从莫斯科被派往诺盖汗国的。因为当时在西部边界罗斯同许多敌人的艰苦战争正在继续，莫斯科当局不希望同诺盖可汗的关系复杂化。

在萨马拉（俄罗斯奥伦堡和萨马拉省的一条河流，伏尔加河左边的支流——译者注）地区索斯诺夫岛附近的一个渡口，哥萨克同300个诺盖骑兵护送下的B. И. 别列别李津大使、诺盖大使和商业驼队相遇。哥萨克向大使宣称：“以前转运鞑靼人的货物，鞑靼人要分给一半。”大使猜不透他们的意图就同意了。哥萨克把诺盖大使、商人和他们的货物渡过了伏尔加河，而后埋伏中的哥萨克骑兵连从伏尔加河的两边向诺盖人发起进攻并抢劫了他们。俄罗斯大使请求伊万·卡尔佐饶恕诺盖大使和商人。哥萨克放过了诺盖大使和他的30名随从，而杀死了其余的诺盖人和商人。他们拒绝把被俘的鞑靼贵族放还给别列别李津，因为他们想用他们换取赎金。

后来，伏尔加的哥萨克首领伊万·卡尔佐、鲍戈丹·巴尔鲍什在伏尔加河渡口击溃了一支600名骑兵组成的诺盖队伍，他们是在奔袭俄罗斯城市杰姆尼科夫和阿拉德尔后满载战利品和俘虏的返回途中被攻打的。被俘的诺盖人供述，他们是为诺盖王公乌鲁斯（米尔咱·乌鲁斯·伊本·伊斯马仪，1578—1581——译者注）服务的，乌鲁斯已向莫斯科政权表明了自己的和平诚意。但在莫斯科，人们不愿同诺盖贵族争论，也把这些哥萨克军官宣布为“贼人”，尽管按照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的话说（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的果敢行为（摧毁萨莱奇克）使诺盖汗国的当权者有所醒悟，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冒险”（注12，478页）。

在这之后，伊万·卡尔佐、鲍戈丹·巴尔鲍什和其他一些首领离开伏尔加河下游，消失在亚伊克河地区。所以，民间那些讲述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参与袭击使馆驼队的历史歌曲和故事都是诗人虚构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官方编年史在不小的程度上促使人们去创作这样的传说。比如由菲拉列特（1619—1633 年间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译者注）大牧首倡议而编写的莫斯科编年史，在叶尔马克死后总共不过 50 年里面就出现了有关叶尔马克领导下的哥萨克在伏尔加河上摧残波斯外交使团和布哈拉贸易驼队的记载，以及后来叶尔马克和哥萨克先到卡马河又从那儿去往西伯利亚的事迹。

但是，外交事务衙门的真实文件指出，在伏尔加河上抢劫波斯使团是叶尔马克去世 3 年后发生的（注 12，464 页）。在一些 17 世纪后半期至 18 世纪初到过俄罗斯的外国人写的书中，引用了一些俄国通报者的话，他们传播的是一些绝对虚假的关于叶尔马克的信息，他们把他说成是一个在伏尔加河上从事劫掠的哥萨克队伍的头目。

在亚伊克会聚后，哥萨克召集了军事会议以决定向哪儿出征或在哪儿寻找“雇佣”。这时，富有的彼尔姆盐商斯特洛干诺夫家的代表来到了亚伊克。《斯特洛干诺夫大事记》指出，1582 年 4 月 6 日，斯特洛干诺夫家族派“自己的人带着信和许多礼物”去叶尔马克那儿，“以便让他们去他那儿，去他们丘索瓦亚的小城的领地和城堡帮助他们”。而在《西伯利亚大地的传说》一书中说：“马克西姆·斯特洛干诺夫请求他，叶尔马克，保护他不受那个佩雷姆王公的侵害。”（注 12，480 页）

问题在于，曼西人的部队从乌拉尔河向沿卡马河地区的侵扰就没停止过，况且他们还得到了被斯特洛干诺夫家族挤走的沿乌拉尔地区曼西部落的支持。1580 年曼西贵族别戈别里·阿格达耶夫同“沃古尔和奥斯恰克人”一起抢劫了丘索瓦亚河岸边的俄罗斯村庄，“抓走了周围村庄的人，烧毁了村子，还抓走了许多在地里……干活的人”（注 6，99 页）。而 1581 年，王公基海克攻占并烧毁了卡马盐城，破坏了沿卡马河地区的村镇和乡村，抓走了村镇的居民。斯特洛干诺夫家族中谢苗·阿尼基耶维奇和马克西姆·雅科夫列维奇的世袭领地遭到了严重的毁坏。后来，只是在残酷的战斗之后，基海克才被斯特洛干诺夫家族的私人卫队所击溃（注 17，27 页）。

佩雷姆曼西人好战的王公阿坡雷盖雷姆在得到库楚姆的同意后越过乌拉尔山攻入彼尔姆地区。马克西姆·斯特洛干诺夫向控制了卡马河上的奥勒尔（盖儿盖丹）要塞的堂兄弟尼基塔求救，但尼基塔只打算保

卫要塞而拒绝了他。于是马克西姆向莫斯科报告说，佩雷姆王公烧了他许多村庄，“现在佩雷姆王公和瓦古里奇人（曼西人——作者注）就在丘索瓦亚城堡附近”。而下一个急使向莫斯科汇报说，和阿坡雷盖雷姆一起来的总共有 700 名士兵，他们烧了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在卡伊瓦河（彼尔姆边疆区的河流，丘索瓦亚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奥勃瓦河（彼尔姆边疆区的河流，卡马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和亚伊瓦河上（彼尔姆边疆区的山地，泰加森林地区的河流——译者注）上所有的大村镇以及丘索瓦亚河与瑟尔瓦河边的所有村子”。

随后又送来了一份关于禁止盐场作业的报告：“瓦古里奇人住在他们的大村镇附近，那是一个妖怪待的地方，他们的人不让农民出城堡，也不让耕地和砍柴。实际上来了一些个儿不高的人，偷偷地赶走了牛、马，还打人，其实是抢去了他们村镇上的作业场，不允许熬盐。”（注 12，463 页）斯特洛干诺夫请求沙皇允许招募哥萨克保卫他们的土地，但利沃尼亚战争还在进行，莫斯科不同意。

看来，叶尔马克成功地说服了在亚伊克集中的大部分哥萨克同意受雇于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并因此被选为主要的行军头目。失宠的首领伊万·卡尔佐、萨瓦·巴尔德廖夫和尼基塔·巴恩支持他的建议。只有鲍戈丹·巴尔鲍什和另外几个首领留在了亚伊克。过了 4 年他们在那儿建立了一个设防的城堡，以后成了亚伊克哥萨克军队的中心。

1582 年，在伏尔加哥萨克军事会议决定接受斯特洛干诺夫家族的建议之后，叶尔马克的哥萨克们准备好了平底木船，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亚伊克到卡马河艰难的行程，按照《斯特洛干诺夫大事记》所记载的传说，于 6 月 28 日基尔和约恩（公元 3—4 世纪埃及和叙利亚的圣徒——译者注）日到达丘索瓦亚的码头。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业，因为要许多天划着船逆流而上，要把平底船沿着连水陆地从一条河的上游拖到另一条河的上游。就像通常一样，出征期间顿河和伏尔加河哥萨克队伍里有必须严格遵守的严酷无情的法规，违者直接被扔出船外。

这时，库楚姆派自己的长子、汗国的继承人阿列依王子向彼尔姆发动了进攻。阿列依的军队由数千鞑靼骑兵和几千汉特—曼西步兵后备军组成。阿列依直接扑向丘索瓦亚的小城镇，但他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在

丘索瓦亚被击退的阿列依只好从陆地向卡马河进攻。但叶尔马克比王子更快，他的哥萨克船队早于鞑靼人出现在卡马河上斯特洛干诺夫的要塞奥勒尔的周边。遇到抵抗后，阿列依王子继续向卡马盐城进发。

攻到卡马盐城近郊后，鞑靼人杀死了所有路上碰到的人，然后放火烧掉了城市。接着，鞑靼人逼近彼尔姆边区的中心切尔德尼并发起了疯狂的进攻，驻军勉强击退了这次进攻。在返回乌拉尔渡口的路上，当鞑靼人再次经过丘索瓦亚地区的小城市时，他们抢劫、杀死周围的农民，烧掉他们的住所，还抓了许多俘虏。

看来，阿列依对彼尔姆领土的进攻对促使叶尔马克下决心开始“夺取西伯利亚”起了不小的作用。就像我们看到的，叶尔马克出征西伯利亚是从反抗鞑靼人入侵的保卫战开始的，而这样的战争从拔都犯境起 300 多年的时间里在俄罗斯并不少见。

在向西伯利亚进发的初期，叶尔马克多半并没有把占领西伯利亚将其并入罗斯作为自己的目的。现在看来，他最初的打算就是获取战利品和因在彼尔姆的烧杀抢掠而惩罚库楚姆。应当认为，叶尔马克一定要把西伯利亚并入俄罗斯国家的想法是在迅速向库楚姆的首都推进的过程中，在哥萨克到达该城的最初几个月中完全成熟的。然而，影响叶尔马克采取这个命运攸关的决定的还有他早年的生活和在沙皇军队服役的经历。

在组织叶尔马克出征方面斯特洛干诺夫家族起了怎样的作用？自然，他们首先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要在乌拉尔山那边获得一些立足点以进行利润丰厚的皮货贸易。但恰恰在 1582 年 9 月，阿列依王子还没有撤离彼尔姆，所以对他们来说，叶尔马克的哥萨克留在丘索瓦亚这些小城是必要的。

因此，认为斯特洛干诺夫家族要让自己的 300 名来自卡马城的“立陶宛、德国、鞑靼、俄罗斯”士兵加入即将派往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队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而那些编年史家的分析是比较靠谱的，他们估计，哥萨克主要头目叶尔马克的队伍的人数在小头目伊万·卡尔佐、雅科夫·米哈伊洛夫、尼基塔·巴恩、马特维伊·缅谢里亚科、巴格丹·勃良兹卡的带领下去往西伯利亚时有 540—600 人。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向哥萨克提供了粮食、火药、铅弹和部分小口径火炮。毫无疑问，斯特洛干诺夫家族给叶尔马

克配备了“伴随者”——向导，他们熟知沿丘索瓦亚河航行、然后过山口、再沿西伯利亚的河流到达赫切依镇的路径，这个镇原来属于西伯利亚的斯特洛干诺夫家族。不排除“伴随者”当中有不止一次乘小船去过乌拉尔山口的当地曼西人。

斯特洛干诺夫家族有可能向叶尔马克提供了讲“巴苏尔曼语”（对伊斯兰教徒的一种蔑称——译者注）的翻译。不过，考虑到伏尔加哥萨克同诺盖人的接触，他们当中完全有可能有会讲鞑靼语的人。

但是斯特洛干诺夫家族起初曾因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受到过沙皇本人的严厉训诫。事情是这样的：乌拉尔地区最主要的要塞切尔德尼的督军 B. И. 别列别李津向沙皇紧急报告，说西伯利亚可汗和佩雷姆王公的军队在“谢苗日（9月1日）”向要塞发动了进攻，而斯特洛干诺夫家族非但不来帮助，反而把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派到了西伯利亚。沙皇于1582年底向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发去了新的上谕，在里面他以将失去信任相威胁，命令立刻将叶尔马克从西伯利亚撤回。他责备斯特洛干诺夫家族，说他们雇佣的这些伏尔加河的哥萨克首领“早先挑拨我们和诺盖汗国的关系，在伏尔加河渡口打杀诺盖使团，劫杀汗国商贩（中亚细亚商人——作者注），也抢劫我们的人，给他们造成损失”。但在沙皇这封威胁要贬斥的信中对叶尔马克的哥萨克的态度却很温和：建议把他们分别安置在切尔德尼的国家要塞和卡马盐城，责成他们“守卫彼尔姆地方”（注12，512页）。

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并没有努力将叶尔马克撤回，依我们看，这证明，叶尔马克在独立作出向西伯利亚进军的决定时，就没有考虑他们的意见，也没有请求他们的允许。

1582年9月1日叶尔马克由30—35只船组成的舰队沿丘索瓦亚河向上到达乌拉尔山口。这支舰队中每艘船载有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还有弹药和粮食储备。这些船的每一面都有8—10支桨，每只船有一个尾舵。后来被叶尔马克从西伯利亚派到莫斯科的急使向外交事务衙门递交了一份从伏尔加向西伯利亚进军的详细的路线图。用他们的话说，叶尔马克的队伍溯伏尔加河向上，“再沿卡马河向上，从卡马河向右拐入丘索瓦亚河并通过丘索瓦亚河往上；从丘索瓦亚河进入谢烈勃良卡—银河（而银河是从西伯利亚国家流入右边的丘索瓦亚河的），再顺银河向

上；于是队伍从银河穿过连水陆地到达巴罗恩丘克河……而从巴罗恩丘克河向下抵达塔基尔河（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土拉河西边的支流——译者注），再从塔基尔河顺流而下到达图鲁列卡河”（注 12，517 页）。对于哥萨克来说，雨季和满河的大水有助于他们顺利地通过这些河流的上游地区。因此他们能够毫发无损地将重载的船只驶到乌拉尔山口。

在乌拉尔山那边的隘口同当地居民的首次接触险些酿成悲剧。一只前哨船行驶在哥萨克舰队的前面，有一次它竟然驶到舰队前面 1 俄里远。船驶近岸边时，由于指挥官的疏忽被紧随其后的曼西士兵所俘获，曼西人相信后面还有舰队。当及时赶到的哥萨克从船上开火时，曼西士兵逃到了森林里，把自己的俘虏扔在了岸边。

同鞑靼人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发生在土拉——那儿后来建成了土拉城堡，但当时哥萨克没有抓到“舌头”。从冲突中逃脱的鞑靼人比叶尔马克先到卡什雷克并向库楚姆报告了哥萨克舰队出现的消息。

在托博尔河下游岸边，哥萨克成功地抓获了一名“舌头”——鞑靼人达乌扎克，他是库楚姆的近臣之一。叶尔马克审讯了他，又把他派到库楚姆那儿。用编年史家的话说，达乌扎克告诉可汗：“俄国士兵太厉害了，当他们用自己的箭射击时，火光直冒，烟雾喷出并传出巨响，但看不到箭头，而一旦伤及却可以致命；任何军用挽具都抵挡不住它们：它能穿透所有的东西。”（注 15，676 页）在托博尔河口登陆后，哥萨克冲垮了卡腊查（人们这样称呼库楚姆的高级顾问，这是西伯利亚汗国宫廷最有影响的人物）的营地。

为了保卫首都，库楚姆召集了鞑靼骑兵和汉特、曼西部落首领的步兵预备队。这支集合起来的军队，在可汗的侄子马麦特古尔（马赫麦特—古尔）领导下使位于额尔齐斯河斜岸丘瓦什岬的哥萨克营垒陷于瘫痪。叶尔马克决定在最后的战争到来之前让疲惫不堪的哥萨克休息一下。舰队在位于山河之间天然界线处的小城阿基克—姆尔兹过了一夜。库楚姆多如牛毛的军队使某些人惊恐不安。于是举行了哥萨克军事会议，会上主张继续出征的意见占了上风。

著名历史学家 C. M. 索罗维约夫引用了编年史家所记载的他们的论据：“弟兄们！我们往哪儿跑？已经是秋天了，河水正在结冰；我们不

会逃跑，不接受坏名声，我们不能因此而受责备，但寄希望于上帝：他会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弟兄们，不要忘记我们对诚实的人许下的诺言！我们不能屈辱地退却。如果上帝青睐我们，那么即使死去，在那些国家里人们也会记得我们，光荣永远属于我们！”（注 15，676—677 页）

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引用了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西伯利亚历史学家 C. Y. 列缅佐夫著作中叶尔马克的一段话，它充分地反映了哥萨克的心情：“弟兄们，伙计们！等到了秋天，我们怎么能逃跑呢？看看四周，河水正在结冰！弟兄们，如果你们能亲眼看到，库楚姆在我们俄罗斯彼尔姆的大地上犯下了多少罪恶！城市荒废了，东正教徒遭到鞭打和杀害！即使死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为了耻辱我们也不能退却！”（注 12，527 页）叶尔马克讲话之后，胆怯的人彻底闭了嘴。

鞑靼人在丘瓦什岬山脚下设置了鹿寨。哥萨克的船驶近了鹿寨。放了几个排炮以后，哥萨克上了岸，但遭到了马麦特古尔弓箭手的射击。随后，鞑靼人穿过鹿寨向哥萨克发起进攻，但遭遇了排炮的迎击。被马麦特古尔派到前面的汉特人的部队在首轮排炮轰击后就四散逃窜了。他本人被子弹击中落马坠地，并且差点当了俘虏，但鞑靼人把自己的头目抢了回来并把他送到岸边的灌木丛里，那儿藏匿着一条小船，把马麦特古尔扶到船上，鞑靼人迅速驶离。

头目受伤在鞑靼营地引起了恐慌。鞑靼骑兵首先逃跑，步兵紧随其后。在山上观察战斗的库楚姆见到哥萨克获胜急忙同近臣弃卡什雷克而去，先逃到额尔齐斯河左岸，然后往南方向伊希姆草原逃去。

虽然库楚姆指望阿列依王子在彼尔姆的行动会迫使莫斯科当局把叶尔马克从西伯利亚调回是正确的，但说库楚姆认为莫斯科当局不想同西伯利亚汗国作战是因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担心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进攻俄罗斯却没有得到证实。他对叶尔马克的看法是错误的：恰恰是叶尔马克的行动打乱了西伯利亚汗国所有的计划，因为叶尔马克出征西伯利亚就像是一场独特的反抗鞑靼人侵扰的民族保卫战。

战斗之后叶尔马克没遇到抵抗就开进了空城卡什雷克（哥萨克这样称呼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在那儿，哥萨克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这首先是“软动产”——贵重的貂皮。他们还缴获了数不清的武器和诺盖人的马群。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在解释如此轻松战胜库楚姆时

说，西伯利亚汗国和与之合流的佩雷姆公国的比较能作战的部队还在彼尔姆，还没从征伐中返回卡什雷克。这种解释使得原先存在的那种说法不攻而破：哥萨克攻占卡什雷克用了2—3年的时间，还曾在山林里过冬。现在已没人怀疑，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克服重重困难从丘索瓦亚河到达额尔齐斯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会战之后过了4天，汉特人和他们的“王公”巴亚尔从额尔齐斯河下游右边的支流杰米扬卡河给叶尔马克送来了礼物——毛皮和食品（主要是鱼）。他“亲切、殷勤地”迎接他们，“体面地”放回了他们。曼西人的使者——“伊什别尔杰伊王公和伙伴们”在汉特人之后也从雅斯卡尔宾斯基诸省来到了胜利者面前。之后，早先躲避哥萨克的当地的鞑靼人、苏克廖姆“王公”和某些鞑靼贵族也都带着礼品来了。叶尔马克同样殷勤地接待了他们，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村庄并答应他们不受敌人，首先是库楚姆的危害。再往后，住在孔达河与塔夫达河左岸区的汉特人开始送来了毛皮和粮食。叶尔马克给所有的人定下了每年应交的赋税——实物税的数额。他还从部落首领和酋长那儿得到了“保证”，即发誓，他们治下的男人将及时缴纳实物税。从此，所有交实物税的部落和氏族都被认为是莫斯科沙皇的臣民。

但库楚姆和马麦特古尔始终注视着哥萨克的行动。12月初为了捕捞冰下的鱼叶尔马克将巴格丹·勃良兹卡大尉和他的哥萨克派往阿巴拉克湖，该湖位于距卡什雷克15俄里的额尔齐斯河岸边。在那儿，毫无防备、全神贯注于捕鱼的哥萨克遭到马麦特古尔大队人马的突然袭击。只有几个留在额尔齐斯河岸上看守马匹的哥萨克幸免遇难。

这时，叶尔马克了解到鞑靼的大部队正逼近卡什雷克。此前，阿列依王子带着战利品和俄国俘虏已从彼尔姆返回。说实在的，叶尔马克的部队在丘索瓦亚河与切尔德尼城下损失惨重，但他不想躲在卡什雷克避难，而是出城迎击鞑靼人。

会战发生在阿巴拉克湖，这是叶尔马克“夺取西伯利亚”阶段最大的一次战役。哥萨克无法利用大船带给他们的优势，而鞑靼人的马队由于积雪太深也不能快速向哥萨克发起进攻。

编年史家证实，战斗是殊死的和残酷的。命运似乎不止一次垂青鞑靼人。这一次，马麦特古尔从远处指挥战斗，他把所有新招募的鞑靼部

队都投入到战场上。日落时，鞑靼人挺不住了并开始溃退。哥萨克坚持住了，叶尔马克赢得了自己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这样一来，1582年12月之前，叶尔马克就征服了沿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下游广阔的领土。但他非常清楚，为了巩固这些被占领的土地，需要补充新的部队、粮食和弹药。看来，阿巴拉克湖会战之后，叶尔马克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要把将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土并入俄罗斯国家作为出征的目的。于是，叶尔马克们开始在象征沙皇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战斗。按照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的意见，从保存在兵器陈列馆中的几面叶尔马克的旗子中，“看来，只有最古老的一面同叶尔马克的部队一起走过了从伊尔吉兹河（在俄罗斯萨马拉州和萨拉托夫州，伏尔加河左岸的支流——译者注）到额尔齐斯河的漫长道路。一些无名的女裁缝用蓝粗布缝制了这面宽幅红布包边的旗子，红布上绣着奇妙的图案，旗子的角上有花状的结子。旗子正中心的蓝底儿上缝着两个用白粗麻布做的被染成蓝色的动物，它们是‘因洛克’和狮子。这些动物后爪着地，四目相视。兽中之王狮子自身体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神话中的动物‘因洛克’被塑造成一匹额头上长着一只长长的尖角的马。这是理智、纯洁和庄严的象征。莫斯科的统治者乐意在金币上塑造‘因洛克’的形象，尤其是在自己国家的印章上”（注12，539页）。

这些徽章式的动物——“因洛克”和狮子被固定在沙皇伊凡雷帝的宝座上，上面是沙皇的双头鹰。因此，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在罗斯西部边界和西伯利亚的战斗是在象征沙皇国家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是俄罗斯国家的军人，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的利益而战。

叶尔马克决定派急使去莫斯科。1583年春天，年轻的哥萨克伊万·亚历山大洛维奇·切尔卡斯（也就是乌克兰移民。据另外的资料，人们叫他切尔卡斯·亚历山德罗夫·加尔萨克，他是哥萨克《创作》一书的作者，也就是一本描写“夺取西伯利亚”的书，大约创作于1600年）（注18，249页）等人，乘坐两艘不大的平底船踏上了漫长、危险的航程。根据传说，他是叶尔马克所信赖的人，一个勇敢和聪明的人。巴尔德尼的儿子，萨瓦·萨佐诺夫也作为信使被哥萨克首领伊万·卡尔佐派往莫斯科。

同切尔卡斯和巴尔德尼一起出发的有25名哥萨克。叶尔马克、他

手下的头目和所有的哥萨克通过信使向伟大的国王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献上被他们攻占的西伯利亚帝国并请求宽恕他们过去的罪行。叶尔马克的信使沿着鄂毕河下游的道路把征收的实物税运往莫斯科，斯特洛干诺夫家的伙计们不止一次带着货物走过这条路。哥萨克从额尔齐斯河驶向鄂毕河，跨越乌拉尔山到达索毕河，再到伯朝拉，最后抵达莫斯科。

哥萨克从西伯利亚运来的珍贵貂皮使莫斯科衙门里的官员们大开眼界。根据一个西伯利亚编年史家的记述，哥萨克向官员们献上了2400件上等的貂皮、50件海狸皮和20件玄狐皮。

当局收下了哥萨克的书信并读给沙皇听。信可能经过使馆办公室秘书的改写，以便更能讨伊凡雷帝的欢心。信以这种高雅的形式写成，显然是要颂扬上帝对沙皇的垂青：“秉承仁慈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洁的圣母和全俄伟大显灵者的意志，托虔诚的全俄君主、沙皇、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洪福，沙皇的臣民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和他的伙伴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注12，556页）

信件给了沙皇良好的印象。哥萨克信使受到了亲切的接待，一切开销全由官方承担。所有参与“夺取西伯利亚”的人都得到了宽恕。赐给来人金钱、呢子、绸缎，并允许他们在城郊的特种常备军营地住宿。所有留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都发给薪水。在民间逐渐开始流传关于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得到沙皇慷慨赏赐的说法。传说沙皇脱下自己的大衣赏给叶尔马克，还有两副沉重的铠甲，叶尔马克在阵亡之夜穿的就是这两副铠甲。传说还谈到，这些铠甲正是哥萨克首领在额尔齐斯河水中死亡的原因。

但总的来说，衙门里的官员并不十分相信哥萨克。因此，为了从哥萨克手中收回夺得的地区，沙皇决定将自己的督军谢苗·巴尔霍夫斯基和伊万·格鲁霍夫公爵派往西伯利亚，在1584年1月7日的沙皇上谕中提到了这件事。暂时不允许叶尔马克的信使返回西伯利亚，在督军抵达后叶尔马克应立即返回罗斯。

1583年3月，为了在额尔齐斯河下游鞑靼村庄收取实物税，叶尔马克派出一支由50名哥萨克组成的马队沿额尔齐斯河往下，向北方去收税。起初，额尔齐斯河沿岸的鞑靼人进行了抵抗，不过一座鞑靼小城遭到猛攻并被占领，被俘的“头领”被处决，其余的长者宣誓效忠。

哥萨克强迫他们亲吻溅满鲜血的马刀。哥萨克把收集的实物税和粮食送到了叶尔马克处。在没有遇到实质性抵抗的情况下，其他的鞑靼小城都接受了俄国国籍。

沿额尔齐斯河再往下住着一些汉特人。哥萨克顺利地到达杰米扬卡河（额尔齐斯河东边的支流，位于秋明州南部——译者注），在那儿经过3天的围攻夺取了杰米扬卡河口以下30公里处的一座设防的小城。

浮冰期过后，哥萨克乘坐在杰米扬卡建造的轻型平底船沿额尔齐斯河往下，去沿岸汉特人的村庄收取实物税。1583年5月20日，在靠近额尔齐斯河河口的地方占领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杀死睡梦中的卫兵后，他们闯入住在萨马尔山区和额尔齐斯河陡峭岸边的“白山奥斯恰克人的首领”萨马尔的院落。听到哥萨克逼近的动静，他招呼另外8个酋长和他们的士兵来相助。萨马尔和他的亲兵在夜间的战斗中失利了。哥萨克在村里待了一周，主持了周围所有汉特人的效忠仪式。宣誓效忠的萨马尔的后人巴伊巴拉克·萨马洛夫直到17世纪初还在统治白山地区。

住在鄂毕河沿岸的戈特公国的汉特人是哥萨克这次出征的同盟者。在戈特的领土上住着一个很大的部落。戈特“王公”阿拉切伊亲自来到了哥萨克这儿并声明自己将同俄国人结盟。哥萨克也宣布将周围所有的地区交给他治理。众所周知，阿拉切伊的后代根据沙皇的敕令得到了鄂毕河下游的许多村庄和各种特权。

哥萨克的队伍沿鄂毕河下游只到达了白山地区，鄂毕河在那儿绕过西伯利亚干宽谷拐向了北方。哥萨克有可能是在寻找传说中的“金人”。用编年史家的话说，汉特人那儿“曾经有很大一处地方供奉着一尊同自己的儿子坐在一把椅子上的古代裸体女神”（注18，251页）。

德国皇帝的大使西吉兹孟德·戈贝尔施泰因（他于1516—1518年和1526—1527年在罗斯任职）于1549年出版了一本《莫斯科伟亚（彼得以前西欧对莫斯科国家的称呼——译者注）纪事》，里面通过莫斯科信使的话记述了这样的事：在乌拉尔山那边的鄂毕河河口有一尊老太婆形状的“金人”偶像，她“用手把儿子揽在肚子上，那儿好像还能看到一个小孩，人们说，那是她的孙子”（注12，575页）。在戈贝尔施泰因绘制的莫斯科伟亚地图上，在鄂毕河下游和乌拉尔山区之间的区域画上了一个女神，下面的题词是“金婆婆”。

但是那儿的汉特人村庄都空了，因为当地居民在汛期都要去湖边捕鱼。再往北边的鄂毕河岸边也没人住，所以5月29日哥萨克决定返回卡什雷克。

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叶尔马克死于1585年。在许多编年史汇编中都提到，1584年春天叶尔马克完成了对鄂毕河下游的征讨，攻占了汉特人的小城纳泽姆并俘获了它的“王公”。如果考虑到叶尔马克的死亡日期的上述说法，可以认为编年史中的记载是真实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哥萨克首领尼基塔·巴恩和他的卫队正是在这次征讨中阵亡的。

1584年夏秋之际，叶尔马克完成了对居住在塔夫达河及它左边的支流佩雷姆河岸边的曼西人的征讨。这次征讨是出于要找到一条通往莫斯科的便捷道路的考虑。佩雷姆公阿坡雷盖雷姆没参与阿巴拉克河上的会战，因此保全了自己所有的军队。他只是注视着叶尔马克同库楚姆和马麦特古尔的战斗，等待着这次冲突的结局。

离开卡什雷克及它的郊区之后，哥萨克的船队驶向塔夫达河和佩雷姆河。居住在塔夫达河下游的鞑靼人投入了同哥萨克的战斗。在巴钦卡河上发生了一场“大战”，在战斗中鞑靼首领——拉布达河边村庄的统治者和前来给鞑靼人助阵的曼西士兵的头儿——巴钦卡村庄的“王公”被击毙。哥萨克乘胜追击，企图尽快赶到佩雷姆河，因为阿坡雷盖雷姆在那儿精心构筑了主要的防御区，要固守到底。在衡量了继续前进的利弊之后，叶尔马克下达了返回卡什雷克的命令。

或许，有一件事影响了他的决定，那就是所有的曼西“王公”和萨满都坚持认为从佩雷姆到罗斯没有路，虽然本地曼西人清楚地知道，从外乌拉尔沿塔夫达河支流洛济瓦河存在通往彼尔姆的道路。看来，当地的“王公们”不希望在他们的领土上恢复库楚姆的政权，他们不愿意俄罗斯人离开西伯利亚。在返回卡什雷克的途中，哥萨克在托博尔省的塔夫达地区收集了“粮食和实物税”。

俘获王子马麦特古尔是一次胜利。他在汗国宫廷的影响早就引起了许多贵族的嫉妒，一个鞑靼高官背叛了他。有这样一个传说，这个鞑靼人谢因·巴赫塔在库楚姆那儿担任“大实物税贵族”，就是替库楚姆可汗管理征收实物税的事情。他向哥萨克透露了马麦特古尔在瓦加伊河过

夜的消息，那儿离卡什雷克总共 100 俄里。叶尔马克召集了 50 名精兵并将他们派往瓦加伊河。

哥萨克发现了马麦特古尔的游牧地并于黎明时闯进了鞑靼人的营房。他们包围了王子的帐篷并俘获了他。西伯利亚可汗的杰出统帅马麦特古尔的被俘对强大的库楚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马麦特古尔被送到卡什雷克时，叶尔马克恭敬地迎接了他，通过翻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劝说他同意归顺沙皇并在沙皇军队服役。

1584 年春天，一支由督军谢苗·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尔霍夫斯基公爵和伊万·吉列耶夫、伊万·瓦西里耶夫·格鲁霍夫为首的 300 人的特种常备军部队应当从莫斯科出发去帮助叶尔马克。为了保证春季攻势的成功，沙皇于 1584 年 1 月 7 日向斯特洛干诺夫家族发去上谕，命令为巴尔霍夫斯基公爵的队伍建造 15 艘平底船，“备齐所有的船舶储备品，每艘船要能装下 20 个人和储备品”（注 12，505 页）。

但由于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 3 月 18 日去世，队伍的出发耽搁了。过了春汛直到秋汛时，巴尔霍夫斯基才越过乌拉尔山的连水陆地。部队在丘索瓦亚和谢烈勃良卡—银河陡峭的岸边损失了许多人和装备，常备军在隘口扔掉了一部分辎重。巴尔霍夫斯基的队伍乘坐船队中剩下的几条船于 1584 年 11 月抵达卡什雷克。

抵达卡什雷克后，巴尔霍夫斯基评估了卡什雷克四周的形势，决定立即把自己的主要助手伊万·吉列耶夫派往莫斯科，以便向当局递交一份关于西伯利亚状况的真实报告并请求派遣援兵。叶尔马克指派被俘的王子马麦特古尔同吉列耶夫一起出发。吉列耶夫带着俘虏和一支人数不多的哥萨克押送队乘马越过乌拉尔山口抵达莫斯科。在那儿王子受到亲切接待，后来成了俄国的团长。

一般都认为，巴尔霍夫斯基公爵向叶尔马克转达了莫斯科当局要哥萨克头目返回莫斯科的命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叶尔马克没有执行该命令，虽然答应他回到莫斯科会有各种奖赏。最有可能的是，巴尔霍夫斯基在评价了卡什雷克俄国人复杂的处境后不再坚持叶尔马克的离去，因为他清楚，没有叶尔马克他无法指挥哥萨克。叶尔马克拒绝离开占领的边区证明了他为所从事的整个事业的命运、为战友的生命担忧的高度责任感。叶尔马克决定不弃不离，同他们共同承担与“夺取西伯利亚”

有关的一切生活中的意外。

应当再次指出，“夺取西伯利亚”的成功在许多方面正是依赖于叶尔马克的个人品质和他在哥萨克中赢得的威望。毋庸置疑，在那些残酷的年代对破坏传统的哥萨克出征纪律的人采取的是最坚决的处理措施。哥萨克的法律无情地惩罚那些土匪、强盗、欺压百姓者和煽动自己人叛乱者：把沙子灌到他们怀中，捆起来扔到水里。按照哥萨克民间故事的说法，在“夺取西伯利亚”期间，用这种方法处死了20多个人。相比这些惩罚措施，哥萨克首领的崇高威望对于这项纪律的执行有更重要的意义。

叶尔马克之所以在哥萨克中间享有威望是因为他善于用话语和自身的榜样打动人们。同库楚姆作战的严酷现实和战斗中随时死亡的可能迫使哥萨克谨慎地处理在外乌拉尔的婚姻和子女问题。根据传说，叶尔马克在这方面也给大家做出了榜样，接受了俄国国籍的鞑靼贵族把自己漂亮的女儿带到了哥萨克那儿，要把她许给头儿做妻子。叶尔马克拒绝了提亲，命令哥萨克将父女送回他们的故乡并向他们提供护卫。

1584年秋天，以西伯利亚卡腊查（15—18世纪某些鞑靼语民族中最高封建封号之一——译者注）为首的鞑靼人大规模的起义在西伯利亚爆发。叶尔马克攻占卡什雷克之后，卡腊查要么是真的，要么是欺骗叶尔马克，反正他带着自己的氏族、士兵、仆人和奴隶离开了库楚姆去了南方的丘雷姆湖（位于新西伯利亚州中部，新西伯利亚市的西边——译者注），开始了在塔拉河（位于新西伯利亚州的西北部——译者注）与鄂毕河之间的游牧生活。

卡腊查向叶尔马克请求帮助他反对哈萨克斯坦汗国的统治。叶尔马克将伊万·卡尔佐和40名哥萨克派到他那儿去。为了使来人放松警惕，卡腊查为伊万·卡尔佐举行了欢迎宴会。夜间，鞑靼人背信弃义地向哥萨克发动了进攻并将其全部杀死，被派去侦察和了解伊万·卡尔佐命运的头领雅科夫·米哈伊洛夫也被害。驻扎在叶尔马克占领的辽阔领土上的一支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因为处在众多鞑靼人和汉特人的包围中也悉数被歼灭。

卡腊查切断了驻扎在卡什雷克的哥萨克和特种常备军同其他城市、村庄和经营地的联系，这使得粮食无法运进卡什雷克，饥饿开始在哥萨

克和常备军中间蔓延。包括 C. M. 巴尔霍夫斯基公爵在内的许多人都因疾病和饥饿而死亡。叶尔马克严禁哥萨克和常备军放弃卡什雷克。的确，巴尔霍夫斯基队伍中来自维亚特卡、彼尔姆和喀山的特种常备军试图以小组形式出城去周围弄食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冻死在森林里，而其余的则被鞑靼人杀死。

1585年3月12日，鞑靼人和汉特人的联合部队在卡腊查的统率下包围了卡什雷克。哥萨克只是到了5月初在指挥官马特维伊·缅谢里亚科的带领下出城向卡腊查的营地发动进攻。在开始的战斗中，暴动者的首领在失去了两个儿子后逃跑了。黎明时，鞑靼人试图再次向住在被占营地上的哥萨克进攻，但被击退。

卡腊查和几个亲信逃到了伊希姆，而其余的暴动者则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卡什雷克围攻战结束了，当地的居民又开始给哥萨克和特种常备军运来了食品。但艰难、饥饿的冬天和围困不会白白地过去，城里俄国士兵的数量大概减少到了300名或更少，其余的人都死于饥饿和疾病。

卡什雷克解围之后过了几周，来了几位布哈拉商人的“信使”——人们这样称呼所有向西伯利亚运送稻米、干菜、布匹和其他商品的中亚细亚商人。后来他们把马、牛和羊赶到西伯利亚的城市来出售，这些牲畜是他们从游牧民族，卡尔梅克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等处获得的。

“信使们”告诉叶尔马克，从南方沿瓦加伊河来了一支商人驼队，但“库楚姆不放他们到西伯利亚来”（注12，593页）。要知道，处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库楚姆事实上切断了从中亚细亚到卡什雷克的商业通道。编年史家按照传统的说法写道，“信使们”暗中受了库楚姆的委托，要将叶尔马克从卡什雷克诱骗出来。叶尔马克相信了这些谎言，在对哥萨克的船只进行了整修之后，于7月出发去迎接驼队。

渴望保护布哈拉商人，理解同中亚细亚进行贸易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再次突出了叶尔马克的国家意识和始终不渝地关注、捍卫罗斯利益的责任心。后来，为了在新建的西伯利亚城镇发展同布哈拉的贸易，莫斯科当局采取了极其有效的措施：“布哈拉和诺盖商人带着货或马来到你秋明，——1596年莫斯科当局从莫斯科给俄国人在外乌拉尔建立的第一座城市秋明的督军们写道，当布哈拉和诺盖商人同秋

明的俄国人和住帐篷交实物税的鞑靼人交易时，你们不能向他们收税；任何海关税都不要向他们收取。要有爱心，要厚待他们，不能让他们感到屈辱，不能对他们有任何的强迫，以便今后他们敢于带任何货物过来。”莫斯科后来不止一次给西伯利亚其他城市的督军发去了这样的指令（注 46，201—202 页）。

最后一次出征时，叶尔马克那儿还剩下多少士兵？编年史家在估量他们的数量时有分歧。他们认为有 150 名哥萨克。依我们看，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的看法比较有根据，他认为，他们不超过 100 人，因此叶尔马克的队伍应乘坐 5—6 条船出发。

卡腊查和库楚姆在别基舍夫城召集了部分士兵，该城位于离卡什雷克不远的额尔齐斯河上。但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已乘船到达那儿，在他的敌人把所有的力量整顿好之前，他们又往前到了额尔齐斯河的上游。所以在哥萨克的猛烈进攻下，只有少数鞑靼人从别基舍夫成功逃脱。

叶尔马克沿额尔齐斯河向上进发，在靠近伊希姆河口的地方再次击溃了鞑靼人的部队。然后，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叶尔马克的部队用了 5 天的时间向位于库楚姆汗国南部边界的设防村庄古拉雷发动了毫无成效的进攻。为了珍惜士兵的生命，叶尔马克决定停止进攻。

然后，哥萨克没遇到抵抗就占领了沿额尔齐斯河再往上的小城达沙特干。一般认为，叶尔马克到达额尔齐斯河支流什石河（距卡什雷克 400 公里）口后就往回返了。用编年史家的话说，在达沙特干叶尔马克再次得到了虚假的信息，说布哈拉驼队正沿瓦加伊河往下去，于是他急忙前去迎接。

1585 年 8 月 5 日，叶尔马克的队伍在额尔齐斯河岸边瓦加伊河口附近停下来宿营。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按照传说，鞑靼人的探子确认，叶尔马克派出的哨兵睡着了，就将此消息报告了库楚姆。于是可汗带着自己的队伍冒着暴雨蹚过河向哥萨克营地发动了突然进攻。为了不弄出动静，鞑靼人直接掐死了睡梦中的俄国人。但叶尔马克醒了过来，他突破敌人的队伍来到岸边，跳上了停在那儿的小船，但一名手拿短枪头的敌军士兵随之冲了上来。在搏斗中，叶尔马克战胜了敌人，但因咽喉受伤而死去。

传说就是这样说的，某些编年史家也是这样描写的。但又有些新的历史事实被发现。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有一本被遗忘的写有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姓名的追荐亡人名录，它保存在17世纪上半期的一套追悼书中，于20世纪70年代被来自西伯利亚的历史学家E. K. 罗曼达诺夫斯卡娅发现。这本书是应17世纪20年代尚存活于世的叶尔马克老战士的请求而编写的。里面谈到了最后一次战斗中的阵亡者：“渎神者（库楚姆的士兵——作者注）夜间偷窥了他们（哥萨克——作者注）的营地并发起了进攻，受到渎神者惊吓的（哥萨克——作者注）落荒而逃，而留在营地的另外一些人（命中注定要留下来——作者注）雅科夫、罗曼、两个彼得、米哈伊尔、伊万和叶尔马克则被杀死，流尽了自己的血。”（注12，599页）所以在最后一次出征时100名哥萨克中回到卡什雷克的大概只有90名。

依我们看，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的观点完全是根据的，他认为，如果哥萨克陷入慌乱，就会被全部歼灭。看来，即使在遭到夜间突袭的情况下，几乎所有100个人也能上船并起锚。可能哥萨克在夜间宿营时，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船舷边，在遭遇进攻时，立刻回到船上自己船桨边的固定位置。叶尔马克的旗舰多半是最后一个离岸的。他掩护自己的队伍撤退，但受伤落水。关于著名哥萨克首领死亡的最新版本就是这样的，它更符合新发现的历史文件。

叶尔马克死后，根据哥萨克军会议的决定，莫斯科督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鲁霍夫和哥萨克首领马特维伊·缅谢里亚科带领一支100—150人的联合部队从卡什雷克出发，乘船沿额尔齐斯河向下到达鄂毕河下游。队伍经过几百俄里到了别廖佐沃（在汉特—曼西自治区的西部，鄂毕河西边——译者注）那边，在到达奥勃多尔后拐向鄂毕河左边的支流索毕河。然后，部队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翻越了尤格拉石头山（北乌拉尔山），从山口下到乌萨河，最终到达伯朝拉。缅谢里亚科的哥萨克和格鲁霍夫的特种常备军在伯朝拉河口的布斯托捷尔城堡度过了冬天。1586年的早夏，队伍重新上路并到达莫斯科。

第一次“夺取西伯利亚”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著名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的生命也完结了。叶尔马克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立下的功勋是伟大的。叶尔马克的光荣，哥萨克首领主持“夺

取西伯利亚”的英雄业绩传遍了罗斯大地。他和他的战友的形象很快就出现在史诗中并非偶然。这些英雄的先驱者是作为壮士歌中的勇士保留在人民的记忆中，而整个西伯利亚远征就是一部英雄史诗。叶尔马克和他的战友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作为俄国的光荣为人民所传颂。因此，在人民的记忆中，叶尔马克的作为，他的斗争，对鞑靼国王的胜利可以同伊利亚·穆拉缅茨（古罗斯壮士歌中的主要英雄之一——译者注）一生的功绩相提并论，因为伊利亚·穆拉缅茨正是一位同草原居民、这些罗斯永恒的敌人斗争的勇士。

事实上，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部队为俄罗斯人民开辟了一条迎着太阳通往东方的道路。循着叶尔马克他们的足迹踏上征途的有新土地发现者——哥萨克，俄罗斯实业者——猎人和捕兽人、商人，最后还有农民——庄稼人。开拓辽阔无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时代到来了。

## 第二次“夺取”

你是个可爱的地方，你属于我吗？  
对于我，你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不是我本人要与你相会……  
是那不自由的常备军生涯，  
胁迫了我这个心地善良的青年娃，  
在遥远的他乡为国家服务，  
是多么的可怕。

——俄罗斯民歌

哥萨克离开西伯利亚时不晓得伊万·曼苏洛夫督军领导的一支 700 人的队伍带着几门大炮已被派去救他们，且已越过乌拉尔山口正向被放弃的卡什雷克进发。部队的装备很好并携带了大批的粮食储备。但叶尔马克死亡和哥萨克放弃库楚姆首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西伯利亚汗国。库楚姆的继承人阿列依王子率领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北方急进并占领了卡什雷克。与此同时，早先被库楚姆推翻并杀死的叶基戈尔可汗的侄子赛义德·艾赫马特（赛义加克）已出现在汗国的境内。由于许多鞑靼人加入到他这一方，他的势力与日俱增。库楚姆的卡腊查也站在他这一边。赛义加克很快就将阿列依赶出了卡什雷克并控制了汗国的首都。

当曼苏洛夫接近卡什雷克（旧西伯利亚，就如同哥萨克和莫斯科当局对小城市的称呼一样——作者注）时，他在岸边看见了大量的鞑靼士兵。他决定不投入战斗，尤其是当整个部队因叶尔马克的死亡和哥萨克撤出卡什雷克而沉浸在痛苦之中时。曼苏洛夫试图赶上哥萨克的船队，但当他沿额尔齐斯河航行时，严寒降临了。他决定在鄂毕河上过

冬。他的特种常备军很好地装备了冬季的服装和用具。在鄂毕河右岸靠近额尔齐斯河口的地方他们建起了外乌拉尔第一座俄罗斯城堡——一座鄂毕小城（8年后，当鄂毕河上方苏尔古特城建立时，城堡被放弃）。

当地汉特人试图围攻俄罗斯城堡，但当围攻者携带的木制偶像被准确的炮火击碎时，所有的汉特部队都散去了。不久，周围一部分汉特、曼西部落给曼苏洛夫送来了实物税。卢古依“王公”是鄂毕河下游最强大的部落首领之一，小城里亚宾、别廖佐沃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伊凡三世时的沙皇政权承认了里亚宾“公国”的地位，但当地部族已多年不向莫斯科纳贡了，尽管罗斯和鄂毕河下游地区的贸易一直在继续。

卢古依知道，在第一座俄国城堡建成后，随后还将修建其他的城堡，因此他沿冬季的道路带一队士兵向罗斯进发。半年之后他到达莫斯科，外交事务衙门的长官接见了。作为对他声明忠于莫斯科沙皇的交换，长官颁发给他一份可以使俄国公职人员免受侵害的保护证书。1586年8月，卢古依携带国王的保护证书返回了家乡。

等到春天，曼苏洛夫带队离开鄂毕河的小城，沿鄂毕河航行，在尤格拉地区越过乌拉尔山返回了莫斯科。曼苏洛夫的出行证实，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摸清了西西伯利亚的水路和沿河各省的情况，并制定了处理同当地部落相互关系以及与他们进行军事斗争的策略。

1586年，在督军瓦西里·鲍里索维奇·苏根和伊万·缅斯内伊率领下的一支队伍在“文官”（省督办公厅长官）达尼拉·丘尔科夫的陪伴下被派往西伯利亚。这支队伍的人数大概不少于700人。他们当中包括获得哥萨克首领官衔的伊万·亚历山大洛夫·切尔卡斯、萨瓦·巴尔德利亚和其他一些叶尔马克的旧部，是他们最早将“夺取西伯利亚”的消息带到莫斯科的。莫斯科当局将马特维伊·缅谢里亚科和他的数百名跟随叶尔马克出征并返回的哥萨克划拨给这些督军指挥。苏根是个年轻人，没有什么战斗经验，而缅斯内伊是一位著名的常备军指挥官，在后来的利沃尼亚战役中表现出色。

翻越乌拉尔山之后，苏根应当在土拉河畔建城堡，而不是继续向西伯利亚腹地进发。他占领了被放弃的鞑靼古城成吉—土拉（秋明汗国或西伯利亚汗国以前的首都），但督军们认为，这个地方对修建城堡来

说太窄了。于是在土拉和秋明之间的新址上建成了一座四角形的城堡——秋明城堡，西伯利亚现存最古老的城堡之一（现在的秋明）。通向它的道路被陡峭的土拉河岸和深深的壕沟护卫着，当地的鞑靼人没抵抗就投降了并开始缴纳实物税。

一年后，莫斯科又向秋明派去了 500 名军役人员。首脑达尼拉·丘尔科夫同数百名常备军一起陪同他们乘船沿土拉河、托博尔河向卡什雷克进发。上面不允许他进攻卡什雷克，但委托他就近建城堡。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距卡什雷克 20—25 公里的托博尔河口、额尔齐斯河下面建成了托博尔斯克城堡——一座木制堡垒和几间军役人员的办公室。说实话，建在低处的城堡春汛时经常被淹没。1610 年，托博尔斯克城堡移到了托博尔河口对面，额尔齐斯河东岸右边的一块高地上（注 18，254 页）。

库尔久姆卡河从一面护卫着上面建有城堡的那座山。它注入额尔齐斯河时形成了一个岬，其后仿佛有一个自然的港湾。最初建成的是一个不大的城堡，几年后在旧城堡旁边出现了一座市镇。于是旧的堡垒被展宽了：督军们和军役人员一起建成了托博尔斯克市，还在城郊附近建起了一座不大的城堡。人们把这座城市叫作新西伯利亚。就这样，托博尔斯克城堡变成了托博尔斯克市，后来在 17—18 世纪时成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首府（注 12，611 页）。

赛义德继续坐镇卡什雷克，卡腊查和哈萨克汗国的可汗支持他。库楚姆同样依靠布哈拉可汗的支持。赛义德可汗试图同新西伯利亚的俄国督军建立联系。1588 年，赛义加克与卡腊查、乌拉兹·穆罕默德苏丹、哈萨克可汗杰维盖尔的侄子在托博尔斯克城堡附近、额尔齐斯河岸边打猎，丘尔科夫邀请他们赴宴以进行和平谈判。

当被邀请人在数百名士兵陪伴下来到托博尔斯克城下时，丘尔科夫同意不超过 100 名鞑靼人进入城堡，并建议他们在坐到豪华宴席桌前时解除武装。当鞑靼人分坐在桌旁时，他们同忠于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发生了冲突。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认为，很难推测，仿佛丘尔科夫有意将可汗诱入圈套。但哥萨克不原谅卡腊查背信弃义杀害伊万·卡尔佐的行为，他们解决了可汗的卫兵，又扑向尊贵的客人并将其绑了起来。然后向城堡边可汗的卫队发动进攻并彻底消灭了他们。在战斗中首领马特

维伊·缅谢里亚科阵亡，但他毕竟为死亡的结义兄弟报了仇。赛义德可汗和哈萨克苏丹被带到莫斯科，在那儿他们决定为沙皇服务（注 12，612—613 页）。

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引用了事件的另一个版本，根据这个版本，叶尔马克的人不是进攻客人的发起者：宴会上丘尔科夫开始责备客人有反对俄国人的险恶意图并提议，为了消除猜疑共同干杯。客人作为穆斯林拒绝喝酒精饮料，于是才将他们抓了起来，而卫兵则被杀掉。留在城堡墙外的鞑靼人一哄而散（注 18，254—255 页）。不管怎么说，反正卡什雷克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俄国人成了额尔齐斯河下游唯一的主人。

托博尔斯克最初是依附于秋明的，到了 1590 年，它已开始“自成一体”（注 19，253 页）。从这时起，莫斯科当局在处理同重新归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各省统治者的关系时，只通过托博尔斯克的督军进行。而在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时期，“一切关于海关事务的命令在寄给所有西伯利亚各市督军的同时，也要写信告知托博尔斯克市的督军，以便各种事务在西伯利亚各市的督军之间都相互知晓”（注 19，253 页）。

尽管这件事遭到了西伯利亚其他城市督军的明确反对，但托博尔斯克督军的地位在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和瓦西里·叔伊斯基的上谕中得到了完全明确的证实。

“动乱时代”（俄国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译者注）结束之后，托博尔斯克地位彻底形成，起初几乎所有西伯利亚的城市都归到它的建制之中：上图拉、秋明、图林斯克、塔拉、佩雷姆、别廖佐沃、曼加杰亚、苏尔古特、纳雷姆、托木斯克和一些城堡：凯特城堡、叶尼塞城堡、库兹涅茨城堡。尽管 1629 年成立了托木斯克特区，托博尔斯克仍是西伯利亚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城市并凌驾于托木斯克特区之上。最重要的，托博尔斯克的督军仿佛是西伯利亚所有官吏的总头儿。

1590 年夏天，库楚姆突袭了自己过去在西伯利亚的领地。他抢劫了托博尔斯克区的许多村庄，他的士兵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瓦加伊河与伊希姆河之间的村庄里杀死了许多向莫斯科沙皇缴纳实物税的鞑靼人。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因此当1591年托博尔斯克督军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加里佐夫—马萨里斯基公爵征讨库楚姆时，他的队伍中就有许多托博尔斯克的鞑靼人。督军在伊希姆追上了库楚姆并击溃了他的部队。但可汗带着为数不多的同伙成功地逃到了巴拉宾草原。这样一来，在叶尔马克死后6年，俄国人又重新控制了沿额尔齐斯河和托博尔河下游的省份。

随后俄国军队沿额尔齐斯河向上进发。上面给督军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叶列茨基公爵的命令是这样的：“从额尔齐斯河向上，到塔拉河建起城市，以备将来给国家带来利润，开垦土地，把库楚姆挤走”（注18，255页）。他的1500名士兵的队伍由俄国常备军、哥萨克、被俘的“立陶宛人”，400名伏尔加河沿岸的鞑靼人，来自乌法、喀山和斯维亚什斯克的巴什基尔人，550名西伯利亚鞑靼人组成，其中300人由鞑靼军官指挥。

1594—1595年冬天，在额尔齐斯河右边的支流塔拉河河口建成了塔拉城堡。之后为了寻找库楚姆，叶列茨基三次向东南方派出了由俄国人和鞑靼人组成的混合部队。起初由9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在格里高利·雅瑟里指挥下沿额尔齐斯河向上走了大约100公里，得到了关于鄂木河（额尔齐斯河东边的支流，流经新西伯利亚州和鄂木斯克州——译者注）的信息：在这条河河口上面、额尔齐斯河岸边的“小黑城”有库楚姆的大本营。

然后由276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在“文官”鲍里斯·多莫日洛夫率领下沿额尔齐斯河向“小黑城”进发并占领了它。库楚姆的队伍迅速逃跑了。1596年早春，多莫日洛夫和一支483人的队伍滑雪向巴拉宾进发并征服了塔拉河和鄂木河河谷地区。在到达它们上游地区后，最终来到巴拉宾草原。由于解冻，他只好返回。在整个出征期间没有损失一个人。而库楚姆在同俄国人发生冲突时却损失了数十人，甚至数百人。而可汗却不投降，也不进行和平谈判。尽管马麦特古尔王子的母亲自愿来到塔拉，可汗的其他一些亲戚和他宫廷中一些有影响的贵族也已归顺。

莫斯科当局一直在询问塔拉督军库楚姆的藏身之地和他的想法。1598年5月9日塔拉督军的助手安德烈·沃依柯夫率领一支400人的队

伍（包括哥萨克和常备军组成的军役人员以及在职的鞑靼人）再次踏上讨伐库楚姆的征途。随督军出发的还有哥萨克首领切尔卡斯·亚历山大洛夫。他抓获的“舌头”供称，可汗在黑水地游牧，同他一起的有500名鞑靼士兵和50名布哈拉商人。俘虏也证实，库楚姆迁到了鄂毕河地区并在那儿招募士兵，准备再次进攻塔拉城。此时，还有一些消息也传到俄国督军这儿：卡尔梅克士兵的集中地距库楚姆的游牧地两天的路程。

沃依柯夫日夜兼程向库楚姆的大本营进发。于8月20日在鄂毕河上游、别尔基河（鄂毕河右边的支流，源头位于萨莱尔岭的西麓——译者注）口往上一点、距塔拉河东南方500多公里的地方追上了他。在战斗中170多名鞑靼人阵亡，100人在鄂毕河淹死，50名俘虏被绞死。沃依柯夫饶恕了库楚姆被俘的5名小儿子，8名后宫妃子和13个女儿以及5名高官。但库楚姆本人又一次逃脱。沃依柯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我乘木筏沿鄂毕河航行，渡过鄂毕河，在森林里搜寻库楚姆，但哪儿都找不到。”（注12，630页）

历史学家认为，库楚姆和为数不多的仆人逃到了斋桑湖地区卡尔梅克人那儿，在草原上过了一段时间的游牧生活。库楚姆到底死在哪儿完全无人知晓。或许，他儿子一封信中所透露的信息是准确的：布哈拉人把他父亲骗到卡尔梅克人那儿并杀死了他。库楚姆之死意味着西伯利亚汗国的终结，西伯利亚永远成了莫斯科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593年在俄罗斯北部各县和沿乌拉尔地区专门组建的一支队伍被莫斯科派去攻打强大的佩雷姆公国，它的首脑阿坡雷盖雷姆王公是库楚姆积极的同盟者和俄罗斯的敌人。从切尔德尼出发的部队由督军H. B. 特拉哈尼奥托夫和П. И. 戈尔恰克夫率领，由从罗斯北方各县招募的军役人员、斯特洛干诺夫家的军人和沿乌拉尔地区的曼西人组成。还在1592年时，斯特洛干诺夫家就得到沙皇的指令，为了出征要出100人，全部装备“火枪、弓箭、火石和羽形矛，带上所有的武器”，以便把他们派到西伯利亚同督军特拉哈尼奥托夫一起乘船出发。此外还责成斯特洛干诺夫家再派50名“携带火绳枪的骑兵投入到佩雷姆的战斗中”（注6，103页）。

阿坡雷盖雷姆的反抗被粉碎了，他治下的领土并入了莫斯科罗斯。

他的小儿子达乌达伊王公和他的孙子乌乔特当了俘虏并被送到了莫斯科。

1593年夏天，俄国士兵开始在佩雷姆河口附近、塔夫达河岸边修建堡垒——佩雷姆小城，它应对洛济瓦小城和托博尔斯克之间的道路起到保护作用。小城竣工后，П. И. 戈尔恰克夫的一部分士兵留下充当卫戍部队，另一部分军队在H. B. 特拉哈尼奥托夫率领下退回托博尔斯克。佩雷姆最初的居民中除了常备军和哥萨克还有从卡尔戈波尔、彼尔姆、维亚特卡遣来的农民。沙皇给戈尔恰克夫的命令规定要建农民城镇，使之成为新西伯利亚的城市，要将划拨给迁居农民的院落地和用于耕种的份地区分开。在佩雷姆定居的常备军和哥萨克得到了用于耕种的份地。当局在新建的其他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也实施这种政策。

到16世纪末在整个鄂毕河下游地区都出现了俄国设防的城镇。同特拉哈尼奥托夫一起从托博尔斯克开到佩雷姆的部队得到了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的补充，于1593年夏天乘船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向下到尤格拉地区去建立俄国设防的城镇。北索斯瓦河左岸一块距离它注入鄂毕河的地方约20公里的土地（北纬64°附近）被特拉哈尼奥托夫选作新城的地址。

有一条从罗斯到鄂毕河沿岸的道路从那儿经过，被称作泽梁路或俄罗斯的跳板。这条路从伯朝拉河和它的支流起，经过“石头山”通往西戈瓦河上的尤格拉小城里亚宾，接下来沿北索斯瓦河到达鄂毕河。它旁边有一座废弃的被称作别廖佐沃小城的尤格拉堡垒，所以新的俄罗斯小城被叫作别廖佐沃城堡（注17，34页）。

1594年冬天，“文官”伊万·兹缅耶夫的队伍从别廖佐沃出发去征讨住在南边孔达河上的沃古尔人。问题在于，孔达的沃古尔人一直同戈特的奥斯恰克人（汉特人）作战，而他们的首领阿拉奇的儿子伊基切伊·阿拉切耶夫从叶尔马克远征时就是俄国人的盟友。其结果是，孔达公国丧失了独立，开始向沙皇缴纳实物税。在鄂毕河下游流域轮流居住的有奥斯恰克人和沃古尔人，而在鄂毕河口游牧的则是聂聂茨人。

在所有戈特王公的帮助下，鄂毕河下游的奥波多尔土地也被兼并了过来。1595年在那儿，在极圈建立了奥波多尔城堡（契形城堡，现在的萨列哈尔德市），它的军役人员向周围的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征

收实物税。

1594年2月，为了巩固莫斯科疆域以外、额尔齐斯河口上面沿鄂毕河两岸的土地，督军Ф. П. 巴梁津斯基和B. 阿尼齐科夫率领一支由军役人员组成的不大的队伍从莫斯科向鄂毕城出发。为了加强从莫斯科派出的这支队伍的力量，督军特拉哈尼奥托夫将一支由别廖佐沃军役人员和戈特汉特人组成的队伍从别廖佐沃派往鄂毕城。联合部队在接受了俄国国籍的奥斯恰克“王公”巴尔达克率领下顺鄂毕河溯流而上，在“公国”中心、鄂毕河右岸苏尔古特卡河注入鄂毕河附近的地方建起了新城苏尔古特。一些军役人员按莫斯科的指令放弃了鄂毕城转到了那里。

苏尔古特建立之后，俄罗斯部队和实业者开始积极向鄂毕河中游和上游推进。同聂聂茨人有血缘关系的塞尔库朴部落联盟以“花斑汗国”（塞尔库朴人和凯特人在纳雷姆河和托木河流域的部落联盟的俄国称呼，一直存在到16世纪，是西伯利亚汗国的同盟者和东方邻居——译者注）（俄国人那时把塞尔库朴人称作奥斯恰克人，看来是由于他们的物质文化和作业种类的相同）而著称，苏尔古特成了沿鄂毕河地区同该联盟斗争的支点。同库楚姆有联系的塞尔库朴贵族的首脑沃尼亚“王公”领导着这个联盟。1596年，库楚姆特意将部队开近花斑汗国的领土以便共同完成对苏尔古特的进攻。正是为了防止沃尼亚和库楚姆可能形成的同盟，1595年在花斑汗国的中心修建了纳雷姆城堡并将整个地区纳入俄国的管辖之中。实业者和哥萨克从城堡出发沿河向上推进，继续寻找“有利的”地方和能收“实物税的小块土地”。

现在鄂毕河中、上游饱受库楚姆鞑靼人侵扰的部落深信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并希望得到它的保卫以免受不安分的南方邻居的侵袭。因此在鄂毕河中游俄国人一般不会遇到抵抗，俄国政权几乎扩展到了托木河。凯特河（从右边注入鄂毕河，在纳雷姆上面约100公里处）两岸的所有居民都服膺于新政权并同意缴纳实物税。1596年督军莫尔恰诺夫在凯特河下游建立了凯特城堡。

恰特贵族、巴拉宾和杰列宁的鞑靼人表示愿意接受俄国国籍。艾乌什金（托木斯克）的鞑靼王公托亚恩来到莫斯科，请求在他的领土上建立俄国城堡，以保卫他们不受吉尔吉斯人（指的是哈萨克和卡尔梅

克可汗的士兵——作者注)的侵扰。同时他承诺协助俄国代表做周围部落的归顺工作。

1604年,一支由托博尔斯克和秋明的俄国军役人员、佩雷姆的常备军、托博尔斯克的鞑靼人和戈特的汉特人组成的队伍在督军Г. И. 比谢姆斯基和В. Ф. 德尔科夫带领下,从苏尔古特出发,沿鄂毕河到达托木河,在距河口65公里处修建了托木斯克城堡,使之成为控制鄂毕河中游最重要的基地(注2,16页)。为建城堡选择的地点位于托木河右岸一座山高高的突出部,也就是托木河左岸托亚诺瓦村对面乌沙伊基河注入托木河之处。不久,在托木斯克城,就像在其他西伯利亚城一样,随着士兵的到来,出现了俄罗斯农民和手工业者。17世纪初,托木斯克成了莫斯科罗斯最东边的城市。

在托木河上游,沿孔多马河和姆拉苏河住着定居的朔尔人,就出身和文化来说,与北方的阿尔泰人相近。俄国人称他们为铁匠,因为这个地区有丰富的铁矿,而朔尔人擅长炼铁和用铁制作盔甲、铁锅、冷兵器(箭、刀等)。

俄国哥萨克和实业者在这个地区发现了萨莱尔岭和铁匠阿拉套(中亚细亚几条山脉的总称——译者注)并到达了阿巴坎山脉的西麓。这是俄国人在这个地区遇到的第一块乌拉尔山以外的山地,已到达了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东南边界。

1607—1609年几个托木斯克的哥萨克被派往“打铁的鞑靼人”那儿以查明能否在那儿收取实物税。侦察员回来时带回了非常令人沮丧的消息:“要塞里住着一些巨人,这些古铜色的巨人能绕过和避开沼泽。冬天大雪铺地,要征服他们除了炎热的夏天再无可能。”(注18,260页)

然而1609—1610年冬天,哥萨克首领伊万·巴甫洛夫带领一支由40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开到了“打铁的鞑靼人”那儿,但被迫无功而返。1610年夏天,他在临近孔多马河口处建立了阿宾斯基小城倒是事实(现在的阿巴古尔市)。

1615年底,一支200人的哥萨克队伍在首领巴仁·康斯坦丁诺夫和中尉伊万·普辛带领下去征讨“铁匠”。部队分成几个小组到达姆拉苏河谷和孔多马河谷。哥萨克占领了几个村庄,抓了几个人质,开始强

行征收实物税。5000 鞑靼军队赶来援助当地居民并包围了哥萨克。哥萨克在艰苦的围困中坚持了两个半月，最终以付出重大伤亡为代价突出包围返回托木斯克。

为了巩固托木河谷的俄罗斯政权，1617 年 5 月在孔多马河口“铁匠鞑靼人”——克什特姆人（他们的王公具有明显的反俄倾向）的土地上建起了库兹涅茨克城堡（现在的新库兹涅茨克市），这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在朔尔山地区的地位。当时在鄂毕河右岸的支流丘雷姆河流域建起了两座小城堡——梅莱斯和阿钦斯克。这些小城的哥萨克和常备军保护当地的居民不受吉尔吉斯王公和蒙古可汗的侵扰。

只是到了 1625 年，库兹涅茨克的哥萨克才到达了托木河的上游。1624—1625 年，他们越过萨莱尔岭，从孔多马河谷往西到达丘梅什河谷并沿河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

1625 年，哥萨克从孔多马河流域向南进发，向鄂毕河右面的组成部分——比亚河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居民征收实物税。而两年之后，当从“基钦土地”（也就是姆拉苏河和孔多马河上游）上的居民那儿征收到第一批实物税时，对朔尔人的征服才告完结。1627 年冬天，哥萨克首领彼得·多罗费耶夫的队伍滑雪来到孔多马河，从那儿向比亚河左岸进发并向土巴拉尔人（突厥语系民族，现归入北阿尔泰人——作者注）课税。

可能是在 17 世纪 30 年代初，哥萨克从阿尔泰部落那儿了解到比亚河的源头在捷列茨科耶湖。1632 年春天，贵族的儿子费多尔·普辛带领一支军役人员的队伍乘大船从托木斯克出发去向比亚河上游河谷地区的居民收税。船队到达托木河口后沿鄂毕河向上航行。9 月初，沿河航行了 500 多公里后，普辛到达了丘梅什河口。在那儿，武装的鞑靼人阻止他们继续前进。经过 5 天的战斗，哥萨克才被放行，队伍返回了托木斯克。

贵族的儿子彼得·萨班斯基发现了比亚河源。他和一支哥萨克队伍从托木斯克出发到达比亚河，然后循河到达源头，即捷列茨科耶湖。1642 年冬天，П. 萨班斯基第二次到达该湖并在其北岸修建了堡垒。在那儿过冬时，哥萨克建造了小船并考察了这个位于陡峭的悬崖岸边的山地湖泊南面的情形。

他们通过询问当地居民得知，丘雷什曼河从南方注入湖中，于是向居住在该河河谷的民众征收实物税。比亚河的流冰消融后，萨班斯基沿比亚河和鄂毕河返回托木斯克。因此，在他此次远征之后，俄国人开始熟知整个鄂毕河流域（3650公里）。一年后，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队伍来到比亚河流域向比亚河和卡通河之间一块“新的山外土地”上的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注18，260—261页）。

西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并入俄罗斯的进程非常复杂。问题在于，17世纪30年代中期在蒙古西部形成了准噶尔汗国，它希望得到向叶尼塞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图瓦人，丘雷姆的突厥人、北阿尔泰人，巴拉宾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征收实物税的权力。所以，西西伯利亚南方各县（塔拉县、托木斯克县、库兹涅茨克县等）的当地部落多年来在向沙皇国库缴纳实物税的同时，还要向准噶尔可汗纳贡。

俄罗斯农民积极地开发和经营边界各县，还修建了堡垒群，用以防备巴拉宾草原、鄂毕河上游和阿尔泰部分归并地区上的俄罗斯领地不受南部游牧民族的骚扰，这使得俄罗斯领土以外的这些地区在18世纪前25年结束时得到彻底的巩固。

额尔齐斯河上的达特梅茨克农庄有142户农民，它坐落于塔拉城堡南边60俄里处，18世纪初时已成为俄国在这个地区最南部的村落（注17，39页）。为了保卫鄂毕河两岸、托木河上下的俄罗斯村庄和恰特人、铁列乌特人的村庄，1684年夏天在乌尔达姆河（位于托木斯克州）口、鄂毕河高高的岸上建起了乌尔达姆城堡。它三面被木板墙围住，有两座带进出门的塔楼、三门炮和一杆要塞火绳枪（一种安装在轮船和要塞墙上的小口径火炮）。在这座城堡的保护下，乌尔达姆的农民村镇兴盛起来，到1690年那儿已有77户农民家庭。

同样为了这些目的，1703年在靠近鄂毕河支流乌姆列瓦河（流经新西伯利亚州和托木斯克州）河口的地方建起了乌姆列瓦城堡，城堡周围随之出现了农民村镇。1709年在鄂毕河源头建起了比卡顿斯克城堡（后来的比斯克市）。不久，游牧民毁了它，但1718年在比亚河口稍往上的地方它又被修复了。在乌姆列瓦河上面沿鄂毕河建起了一系列不大的俄国堡垒，包括1713年修建的乔瑟城堡（后来的科雷万），它的周围后来出现了一些俄国人的村镇。

1716年在乔瑟城堡南边、靠近鄂毕河右边的支流贝尔德河河口的地方建起了贝尔德城堡，但俄国人控制沿鄂毕河地区的做法引起了准噶尔统治者强烈的反应。1709年8月，库兹涅茨克被围，第二年比卡顿斯克城堡被攻占和焚毁。准噶尔统治者指望得到向巴拉宾草原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库兹涅茨克县和托木斯克县的当地村庄征收贡品的权力。

西伯利亚总督M.加加林向莫斯科报告，准噶尔领地上有金矿，叶尔羌河地区正在开采。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命令，为了探索金矿，1715年7月，И.Д.布赫加列茨中校率领一支2902人的队伍乘坐59艘船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向上航行，一支庞大的龙骑兵队伍乘马沿河的两岸并进。

在伊梅舍夫湖附近，布赫加列茨建起了伊梅舍夫要塞。不久该要塞被准噶尔人包围。长久的围困和在被困者中发生的疾病迫使布赫加列茨放弃了要塞，沿额尔齐斯河退到了鄂木河河口。1716年布赫加列茨在鄂木河河口建起了鄂木要塞。第二年代替布赫加列茨的斯杜宾上校恢复了伊梅舍夫要塞。为了保证伊梅舍夫要塞和鄂木要塞之间的联系，斯杜宾当年又在额尔齐斯河上建起了热列津斯基要塞。而到了1718年，在额尔齐斯河上建起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

1720年，利哈廖夫少校率领一支440人的队伍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到达斋桑湖。在返程途中他们在额尔齐斯河右岸、乌里巴河（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译者注）注入它的地方建起了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要塞（哈萨克斯坦城市——译者注）。这样在18世纪20年代之前，俄罗斯以外的额尔齐斯河右岸地区——从鄂木河河口到乌里巴河口都得以巩固。俄罗斯的领地从额尔齐斯河往上到达了把西伯利亚低地和土尔克斯坦（史地学上中亚细亚及中央亚细亚一个宽广地区的旧称——译者注）隔开的塔尔巴哈台山脉这条天然的边界。

后来，在巴拉宾草原逐渐出现了俄罗斯村庄。为了保卫南部新的边界免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就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城堡体系。18世纪建立的“西伯利亚线”就是这个堡垒系列中的一条。还在17世纪时，为了保卫土拉河和伊谢季河上的耕作村镇沿托博尔河修建的小城奠定了“西伯利亚线”的基础。从17世纪末起，每年春天都

有“由军人、军役人员组成的队伍乘马”从托博尔斯克被派往“托博尔斯克城堡和伊谢季城堡”“去执行防卫任务”（注6，160页）。另一条堡垒线17世纪时沿着瓦加依河与伊希姆河分布，终结于阿巴坎城堡和科尔基诺城堡（伊希姆）。这样，在17世纪时就建起了两条从东、西两个方向环绕草原边界的堡垒线。而到了18世纪，堡垒线就继续向南推进了。

从16世纪末起，数以百计的能人被派到乌拉尔山那边的西伯利亚，他们中有大量的北方沿海居民、俄国北部欧洲部分的居民，这是些大胆的、精力充沛的、完全不知农奴制为何物的人，他们占了俄国移民总数的80%还要多。越来越多的机敏的商人和他们的雇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和伏尔加河北边的城市）把自己的贸易和工业活动同西伯利亚大地联系在一起。17世纪时，某些贵族、地主和修道士把农奴放到西伯利亚去挣代役租。许多历史学家不支持17世纪时西伯利亚的俄国移民中有许多逃亡农奴的观点。看来，逃亡的农奴更多的是跑到了罗斯南边的乌克兰。

应当指出，富饶的西伯利亚大地给俄国人留下了强烈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让我们看一看，一位17世纪西伯利亚的编年史家是用怎样热情洋溢的语言来描述它的：“石头山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树：雪松和其他的树；这里居住着各种动物，它们可以给人提供肉食，以及装饰品和衣服……有许多歌喉甜美的鸟类，以及种类繁多的花草。有许多河流从石头山流出……那儿河流的存在是上帝的意志，太令人惊奇了……宽阔的水面太美了，河水是甜的，各种鱼多得数不清；河流源头的偏远之地土壤肥沃，收获颇丰，放牧的地区辽阔无比。”（注6，17页）

另外，还有许多编年史家，许多自愿和非自愿来到西伯利亚为国家服务的著名的宗教和国务活动家或被莫斯科当局流放到那儿的人也用同样激情澎湃的语言描述了西伯利亚的大自然。毫无疑问，西伯利亚的大自然给俄罗斯的农民和实业者、哥萨克和特种常备军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民间古老的农民和哥萨克的歌曲和传说中。

16世纪末，俄国当局彻底解决了发现一条从国家的欧洲部分到达西伯利亚的比较方便的道路的问题。商人们为了绕开喀山汗国而开辟的北路由于遥远和难以通行已不再适用。军役人员为了传递信息和转寄一

些小件货物（毛皮）只走伯朝拉路，这条路沿北索斯瓦河或索毕河一直通到鄂毕河下游，更多地使用这条道路的只有商人和实业者。

1619年11月29日，当莫斯科当局允许人们既可以走通常去托博尔斯克的道路，也可以沿泽梁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和所有沿海城市去往西伯利亚的城市和别廖佐沃时”，北方的泽梁路又活跃了起来。过后，明确了所允许的线路：沿乌萨河、索毕河和瑶里河（在科米共和国）到“石头山”，经过连水陆地翻越“石头山”到索毕河另一面，渡过索毕河到达鄂毕河（注6，82页）。整个17世纪商人和实业者都顺利地使用这条路。而且，1619年通往曼加杰亚的海路被禁之后，17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托博尔斯克督军尤里·扬舍耶维奇·苏列舍夫公爵成功地开辟了一条被官方认可的经“石头山”从伯朝拉到鄂毕河下游的商业路线（所谓的“翻越石头山之路”）。与其他的托博尔斯克督军不同，他不担心商人和实业家通过新的道路前往西伯利亚。

其实这条道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段——翻越乌拉尔山的隘口。正是在这个地方，商人、实业者和军役人员常常遭到别廖佐沃和布斯托捷尔城堡的萨莫亚齐人（俄北部萨莫迪民族的旧称，即萨莫耶德人——译者注）的袭击。例如，1641年8月23日，“许多萨莫亚齐人骑着鹿在石头山的最后一块连水陆地、瑶里河上面”向企图翻山给国家运送貂皮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凯特和纳雷姆的军役人员“发动了进攻……他们开始用箭射击”。“我们，——哥萨克在呈文中写道，您的国家的奴仆，开始为了您的国家的贡品——貂皮而战斗！我们，您的奴仆，日夜奋战，我们，您的奴仆，弹尽粮绝……他们杀死了我们四个人，还有两个为了保护您的官家财产充当桨手的实业者，而我们，您的奴仆，遍体鳞伤，他们抢走了您的充实国库的貂皮。”（注6，85页）当时，这种事件并不少见。然而，“翻越石头山之路”在整个17世纪仍然是一条“西伯利亚大道”，百姓和商人沿着它朝两个方向，去西伯利亚或去罗斯。

为了保持同西伯利亚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和往那儿运送大量的物资（首先是粮食和其他的食品），通过卡马河水路是比较合适的。说实话，经过塔基尔连水陆地的丘索瓦亚道路（叶尔马克的队伍走过的道路）过于艰险了（哪怕是提起巴尔霍夫斯基公爵的常备军部队在穿越它时

所遭受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就足矣)。因为这条道路的很大一部分要经过无数条风大浪急的山地小河。但在1590年之前人们还得广泛地使用它,而1583年时,为了保卫连水陆地建成了上塔基尔小城。该城存在了7年,后来由于修建了洛济瓦小城,“它被放弃荒废了”。

切尔德尼的道路比较轻松:从卡马河左边的支流维舍拉河沿连水陆地过山隘到洛济瓦河,接着沿塔夫达河到土拉河和额尔齐斯河。因为这条路是主路,所以1590年时在路上修了洛济瓦城。冬天,人们走滑雪路到达这里之后,要在这儿等到通航的开始,当冰消融后,人们乘坐在洛济瓦建造的平底船和小木船沿洛济瓦河、塔夫达河和托博尔河到达托博尔斯克。

经过切尔德尼和洛济瓦城的道路在一个时期里成了政府的主要道路,莫斯科同重新归并的边区的主要交往都通过这条线路进行。通过这条路人们把钱币和毛皮以及储备粮运往莫斯科,商人、彼尔姆人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人也都使用它。人和运送建造新的西伯利亚城镇(比如佩雷姆、别廖佐沃、魏尔霍图利耶)的材料时都走经过切尔德尼的路,这使得对这些地区所有必需品的供应得以实现。

但不久又找到了一条更加便捷的陆路通道:从索利卡姆斯克经洛济瓦河直接到达土拉河。根据建议走这条路的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城郊居民阿尔杰弥亚·巴宾诺夫的姓,它被称作巴宾诺夫路。正是这条路到17世纪末成了官方所允许的通往西伯利亚的主要道路。洛济瓦城被铲平了,它的居民就迁到了1598年在土拉河上游新建成的魏尔霍图利耶,该城成了通往西伯利亚的主要门户。

但在这条通往西伯利亚的主要陆路通道上,人们必须战胜泥泞、无法通行的沼泽和森林,而在翻山的隘口——经常是大雪堵塞。甚至到1661年时,去托博尔斯克流放的霍尔瓦提(克罗地亚——译者注)神父尤里·克里扎尼奇和押送者及同路人在这条道上几乎被狼撕碎,而后来又险些被暴风雪埋葬(注20,117—120页)。

经过魏尔霍图利耶的道路主要是季节性的。海关手册证实,载货车队从乌斯秋格和索利卡姆斯克出发沿冬季道路行进是为了在泥泞路开始之前到达魏尔霍图利耶,不能迟于3月底或4月初。4月底之前,到达那儿的商人和军役人员一直要等到河流解冻,5月乘坐从当地居民那儿

买来的平底小木船和上了箍的小船把货物和储备品沿河往东方运送。夏天由于河流水位下降，魏尔霍图利耶得到了暂时的平静，这种平静通常持续到冬天。17世纪前半叶商人和实业者主要是从罗斯去西伯利亚时使用魏尔霍图利耶路，而返回时走北泽梁路。随着曼加杰亚海路的终止和曼加杰亚作业场的衰败，商人和实业者去罗斯时也要途经魏尔霍图利耶，冬季时要翻越“石头山”，以便通过这条冬季道路到达索利卡姆斯克和乌斯秋格。

1600年在魏尔霍图利耶和秋明中间修建了图林斯克城堡以保证这些城市间官家物资的运输，它也应当保卫当地的村落和俄国移民免受诺盖贵族和其他草原游牧民的侵扰。迁到那儿定居的有来自秋明的军役人员，而从喀山则迁来了55户农民家庭和6户车夫家庭。

沿着一条老路也可以到达秋明，当时喀山汗国的商人们广泛地使用这条路。这条路经过乌法草原，1586年正是在乌法草原上建立了乌法城，因为“许多喀山人要从建在别拉亚河上的那座城市出发去西伯利亚”（注6，109页）。无怪乎俄罗斯人把经卡马河到乌法的路和经草原“田野”到伊谢季河上游的道路叫作“老喀山路”。看来，这是一条商队从布哈拉（中亚一座古老的城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州的中心——译者注）到布尔加王国（681—1018年间的保加利亚封建国家——译者注）走过的非常古老的道路，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作者曾提到过它（注6，94页）。

莫斯科当局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这条路：派出急使，紧急派遣军队等（注2，18—19页）。1594年从喀山派到托博尔斯克攻击库楚姆的部队走的正是这条路。而乌法的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长久以来一直在使用这条路，他们用3个星期的时间驾着马车把蜜运到秋明去销售。布哈拉商人在往罗斯转运商品时使用的也是这条路。

1649年在卡马河左边的支流瑟尔瓦河上建成昆古尔城之后，草原道路就从这儿通向乌法河的支流比谢尔季河，而从比谢尔季河的上游通向丘索瓦亚河的上游，然后道路向两个方向分开：东北方通向伊尔比特（后来那儿举办过西伯利亚著名的博览会），而西南方则通往伊谢季河上游，1668年那儿建成了关卡。

西南方的这条路同未来的通往叶卡捷琳堡的大道的走向基本吻合。

经过喀山把秋明同莫斯科直接联系起来的昆古尔路的重要性到 17 世纪末之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所以莫斯科当局在给魏尔霍图利耶督军的信中写道：“现在从西伯利亚出来，经过魏尔霍图利耶关卡又加上一条遥远的要重新绕过一些村庄的道路，途经乌特卡（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塔基尔河西南 83 公里处——译者注）和昆古尔到达卡马河，再到俄罗斯各城市，各种官衔的人都沿着这条新的绕远的道路行进——西伯利亚贵族子弟、军役人员、商人和外国人，各种各样的人从罗斯带着俄国货物，从西伯利亚带着西伯利亚商品，带着软动产（指毛皮），沿着夏天和冬天的道路川流不息地来往。”（注 6，110 页）

## “金子般沸腾的土地”曼加杰亚的命运

还在彼得的事业之前，  
俄罗斯——海洋强国，  
就扬着粗麻布的帆，  
顶着狂风拼搏。

当时，罗斯—罗谢亚  
就是那个离乡远航的海洋强国：

它派出自己的军役人员、商人和猎人，  
乘坐小木船、恰伊泵（16—17世纪查波洛什哥萨克人使用的  
无甲板平底独木舟——译者注）、果奇（11—12世纪单桅、单甲  
板、人划的木船——译者注）  
和有甲板的残破的大船，  
沿伏尔加河

驶向格鲁曼特（土拉州的小城——译者注）、曼加杰亚和  
里海。

——米哈伊尔·费诺夫

最早描写曼加杰亚大地，也就是位于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下游之间的塔兹河和普尔河（位于秋明州）流域的是一个诺夫哥罗德的爱书人，他于15世纪末编写了一本名为《东部陌生人》的书。书中描写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被称作“莫洛干杰伊”或“莫尔刚杰伊”的聂聂茨人部落。14世纪或许更早一些到过鄂毕河下游的诺夫哥罗德士兵把关于他们的信息带到了罗斯，这些信息中既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还有一些传说。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海上住着一些被叫作莫尔刚杰伊的萨莫耶德人。鹿肉和鱼是他们的食物，人也相食。客人从某处去他们那儿做客，他们就杀死自己的孩子待客，他们也吃。如果客人死在他们那儿，就把客人吃掉，而不把他埋掉，自己人也一样。他们人个头儿不大，给人一种扁平的感觉。鼻子很小。但弓箭手很灵活，善射，速度惊人。他们乘鹿和狗拉的爬犁出行，穿貂皮和鹿皮。”

接下来在故事中出现的关于萨莫耶德部落的情景就是虚构的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夏天的某个时候住在海上；另外一些人“肚脐往下毛茸茸的，而从肚脐往上仿佛是另外的人”；第三部分人冬季要死两个月，夏天醒来；第四部分人没有眼睛，而“他们的嘴在两个肩膀中间”；“靶场上射击用的小管子是铁的，而在另一个靶场上箭头是铁的。他们把箭头安在铁管上，用锤子敲打箭头。”爱书人还讲述了同聂聂茨人无声的贸易：人们把用以交换的货物放在毛皮的旁边并走开，要等着货主的决定——他要这些货物还是不要。他还讲了许多关于这个北方国家居民的一些真实的和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注 11，6、7 页）。

聂聂茨部落的名称——莫洛干杰伊（莫尔刚杰伊）在描述时多次被弄混，他们居住的国家开始为人所知，其实是毛加杰亚或曼加杰亚。根据历史学博士 M. И. 别洛夫的意见，在科米—泽梁语中，曼加杰亚意味着靠近大海——曼加杰亚海的土地，在旧时航海家的观念里，曼加杰亚海包括鄂毕湾和塔兹湾以及紧靠亚马尔半岛的喀拉海的格达区。在诺夫哥罗德人讲述的这个故事里还引用了一些绝对真实的信息：在“一些陌生的国度里”有大量的貂、北极狐和鹿（注 10，39 页；注 21，4 页）。

此外，在故事中和“莫尔刚杰伊人”的国家一起被提到的还有处于无森林的冻土带的国家巴尔特或巴伊特（在注入叶尼塞河左边支流图鲁汉河的两条巴伊赫河地区——译者注），那儿的“人住在地里（也就是住在—半陷入土中的窑洞里——作者注），而吃的是貂肉，除了貂，他们那儿任何别的野兽都没有。而穿的则是貂皮衣服、貂皮靴筒，戴的是貂皮手套，他们没有别的衣服，任何商品都没有”。

在故事中，巴尔特国坐落于“大鄂毕河上端”，但这儿多半说的是极地国家。Л. С. 别尔克院士认为，看来，他是对的，就是说巴尔特国

位于叶尼塞河西边和北极圈的北边，那儿住过来自巴伊族（注5，260页）的叶尼塞的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根据著名的研究极地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 M. И. 别洛夫的意见，故事的作者所说的巴伊特国指的是“图鲁汉斯克边区，这是因为在那个有两条注入图鲁汉河的巴伊赫河（大巴伊赫和小巴伊赫）的地方后来出现了图鲁汉斯克城堡”（注14，377页）。我们无论采用巴尔特（巴伊特）所处位置的哪种说法，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故事的作者在15世纪末时已知道，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之间的两河地区存在一个辽阔的极地国。

前面已经提到过，15世纪末时俄国人已开始积极地向鄂毕河下游和鄂毕河以外的地区渗透，并于16世纪末已完全将额尔齐斯河下游和鄂毕河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入莫斯科罗斯。还提到在鄂毕河下游流域所建立的别廖佐沃城堡和奥波多尔城堡。这已经是北方最接近游牧的萨莫耶德人（聂聂茨人）所居住的盛产毛皮的曼加杰亚的地方了。

16世纪中期，英国人对盛产毛皮的“Malgomzaia”的故事也很感兴趣。而在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1584—1598年）统治时期，在莫斯科市场上，曼加杰亚的貂皮和伯朝拉的貂皮被认为是同等贵重的毛皮。曼加杰亚边区对实业者、毛皮商和海象牙商、征收实物税的哥萨克有巨大诱惑力，通往那儿的艰难道路既有海路，也有水路和陆路。

看来在16世纪60—70年代，或许再早10年，曼加杰亚的海上通道就形成了。通常去往塔兹河地区都是由一批实业者（开采者、渔人、猎人——译者注），主要是沿海居民来完成的。为了航行到曼加杰亚，沿海居民使用的是一些不大的船——小果奇。这是吃水量小的平底的用桨划的帆船，适于一支不大的队伍（10个航海者足矣）把它拖过连水陆地，沿着海岸的浅水处航行和在河口航行。它们的载货量从6—7吨到10吨（从375普特到6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

海路是从北德维纳河或古洛依河（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长235公里，注入白海的梅津湾——译者注）河口开始的。看看实业者们是怎样来描述它的：“他们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霍尔莫戈尔（北德维纳河下游的村庄，1925年前为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霍尔莫戈尔区的行政中心和最大的居民点——译者注）、皮涅加去往曼加杰亚到古洛依河口和卡宁诺斯角，经过科尔古耶夫岛（位于聂聂茨自治区首府纳里扬马尔西

北约 250 公里处——译者注) 和俄罗斯拐角、麦迪恩拐角 (第一个拐角是伯朝拉湾西面的一个岬, 而第二个麦迪恩拐角从东面限制了伯朝拉湾——作者注), 通过尤戈尔海峡 (涅涅茨自治区北部陆地和瓦伊加奇岛之间的海峡——译者注), 经过缅斯内伊岛到达喀拉湾 (拜达拉塔湾——作者注) 和浑河 (莫尔德亚赫河, 亚马尔河在西部沿岸的河口——作者注), 经过干涸的连水陆地 (最多有 800—1000 公里——作者注) 到达绿河 (肖亚哈河, 亚马尔河在东部沿岸的河口——作者注), 鄂毕河 (鄂毕湾——作者注) 和塔兹河口。” (注 22, 1062 页)

用海员的话说, 天气好的情况下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拜达拉塔湾要用一个月到两个月。从那儿出发到浑河河口, 沿河经连水陆地到绿河耗去 20 个昼夜。从绿河河口到曼加杰亚的航程也要两三个礼拜。当然, 只有当航行地区是顺风 and 好的冰面状况时, 这些航行期限才能有保证, 而实际情形并非经常如此。

道路的通畅完全取决于天气: “如果老天不给顺风, 那么所有的果奇就都返回布斯托捷尔城, 而如果到达浑河和绿河的时间晚了, 那些河面就会结冰, 自己的肚子和储备就会干瘪, 人们只能滑雪回到别廖佐沃县。” “而遇上大堆的冰, 那么就要花上 6 个星期左右扬帆荡桨绕过冰堆, 有时绕不过冰堆, 就离开那些地方返回布斯托捷尔城。”

例如, 皮涅加人佛姆卡·巴里索夫就在布尔洛夫河岸边 (在瓦兰杰伊—伯朝拉湾和海普德拉湾之间的沿岸地区) “遇到了巨大的冰层, 他们用了 4 个星期的时间想从那儿穿过冰层, 直到冰被冲到大海里, 他们才来到尤戈尔海峡”。

1626 年, 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军役人员在拐角处碰上了大雨和从北面来的迎头风, 果奇上的帆被撕破了, 在浅水处运货的木船被打碎了, 抛锚的果奇的位置移动了, 被冲到了浅滩 (从岸边延伸的水下浅滩——作者注)。由于风, 他们停留了 6 个星期, 直到刮起顺风。圣母升天节 (8 月 15 日) 后返航, “因为已经晚了, 海要上冻, 冰开始增多”。所以俄国海员在去往曼加杰亚和返回时必须克服 “因大量的冰导致的无法通行的恶劣地段和所有的障碍” (注 6, 89—90 页)。

从西边翻越乌拉尔山的支脉后有两条北方的水路可以到达曼加杰亚区。实业者和商人走这些水路要翻过 “石头山”。第一条路线从大乌斯

秋格出发经过维切格达河、维米河、乌赫塔河、伊日马河和伯朝拉河。第二条路线从霍尔莫戈尔开始沿皮涅加河、古洛伊河、梅津河和它的支流去往伯朝拉河的支流齐里马河。如此，两条路线均通往伯朝拉，接下来它们中的一条沿河向上，沿着它的支流，然后向索毕河（鄂毕河左边的支流，发源于极圈乌拉尔山东坡，在卡特罗沃日城附近注入鄂毕河——译者注）方向到达乌拉尔山支脉。人们为了在那儿过冬，16世纪时曾修建了洛果沃伊小城。行路人从那儿经过途中的连水陆地通过狭窄的隘口往支脉对面东部的山坡进发，来到另外一条河——索毕河的源头，沿河到达别廖佐沃城堡。16世纪末，因为走这条路的实业者的人数急剧增加，根据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命令，1595年为了课税在索毕河注入鄂毕河的地方建起了诺索沃伊城堡（在后来修建了奥波多尔斯克市的地方，现在是萨列哈尔德市）。

另一条更加北边的路线在到达伯朝拉河之后沿河下行到它的支流乌萨河，再沿乌萨河到乌拉尔山的支脉，然后过哈鲁达河（流经汉特—曼西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并从那儿到达从左边注入鄂毕河的辛亚河。从别廖佐沃到曼加杰亚的水路沿鄂毕河、鄂毕湾经过奥波多尔斯克和纳德姆，接下来沿塔兹湾和塔兹河往前延伸。

毫无疑问，顺着河流和连水陆地经过别廖佐沃的道路比走曼加杰亚的海路更加通畅。17世纪初在被称作“群岛”的鄂毕河三角洲行船是一件复杂的事。“而鄂毕河口，陛下，无人知晓，河网密布，岛屿密集”，1616年商人康德拉基·库洛奇根和托博尔斯克的常备军康德拉基·克列拉在托博尔斯克的询问中这样宣称。

“游牧的萨莫亚齐人”为了捕鱼夏天会来到冬天时无法居住的岛上，他们对登陆的俄国人并不总是持友好态度。无数的浅滩对于在三角洲航行的船舶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太浅了，不仅大船或果奇，就是小船也无法通行。”那些报信人宣称。

从托博尔斯克和别廖佐沃到曼加杰亚的水路非常艰辛。那时从托博尔斯克到曼加杰亚3000多公里长的航程是很艰险的。这段航程持续的时间从两个月到四个多月不等。一切都取决于天气和风向。从别廖佐沃到塔兹河口这段路特别复杂，尤其是秋天，严寒来临之前，当鄂毕河口和鄂毕湾刮起风暴时，船常常搁浅，与水底石头的碰撞对船的损伤很厉

害。当船被风暴吹到沿子午线向北 760 公里的海湾的边缘时，情况就更糟糕了。

商人、实业者和军役人员在三角洲“群岛”有时等顺风等好久，然后才能驶向“加老弥亚（大海、公海之意——译者注）”，即鄂毕湾。看来，船沿风急浪大的鄂毕湾航行时要贴着岸边，以躲避河口处的坏天气，先往北到达把鄂毕湾和塔兹湾隔开的“俄罗斯拐角”，然后转向东南。在拐角后面，黑山和柱河作为船的停泊地经常被提及，柱河稍往下一点儿有一处叫作黑沙嘴或“黑浅滩”的地方。然后过亚班钦海峡（可能指的是大陆和现在被叫作纳霍德卡岛之间的海峡）。紧接着船在很深的古洛夫湾的入口处从右边绕过古洛夫岛到达塔兹河口。从那儿去曼加杰亚顺风扬帆要 4 个昼夜，而碰上顶风沿着塔兹河往上就要借助“纤绳行走了”（注 6，115—116 页）。

沿海的航海家沿曼加杰亚海路航行的某些资料至今还保存着。1601 年玛特廖娜·阿法纳西耶夫娜·库兹明娜在给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报官信”——呈文中请求给她帮助，因为她的父亲和兄弟——德维纳县耕种官地的农民——1597 年因为曼加杰亚之行损失了自己所有的用于装备果奇（平底船）的资金。显然，在返程途中库兹明一家碰上了风暴并遭遇不幸（“大海给他们以重创”）。而皮涅加的沿海居民伊万·乌格留莫夫和梅津的沿海居民费杜尔·纳乌莫夫则因为“经常去往曼加杰亚”而得到沙皇鲍里斯的嘉奖（注 10，110 页）。

外号普列汉的实业者，皮涅加人廖金·伊万诺夫·舒宾是著名的极地航海家，他本人记述过一次塔兹河之行的情况。1601 年夏天，他同 35 名航海者乘坐 4 艘果奇从北德维纳河口出发。他们“乘着海上的顺风从西往东航行……左边是大海，右边是陆地，最终到达伯朝拉河口”。由于顶风和恶劣的冰面状况，舒宾只好在布斯托捷尔城过冬。一部分海员从那儿沿着冬季的道路越过“石头山”往东进发。

随着新的航海期的到来，舒宾继续他的出行。此次和他一起出发的有“莫斯科维金”（伊万·尤里耶维奇·莫斯科维金，俄新土地发现者，生卒年代不详。1639 年同哥萨克队伍到达鄂霍次克海，发现了它的沿岸地区和萨哈林湾。此后许多人的父称和姓都带有莫斯科维金这一别称——译者注），别尔维伊·塔鲁金，布斯托捷尔人谢苗·伊萨科

夫·谢列勃良尼克和阿尔希泊·巴日尼克，连水陆地人（皮涅加连水陆地的居民）米哈伊尔·杜拉索夫，以及40名其他的商人和实业者。

“到达伯朝拉河口后，舒宾宣称，去往曼加杰亚要通过大海才能抵达河、海的天然界线尤戈尔海峡，乘帆船驶往尤戈尔海峡（约150米里亚。各国不同的距离长度单位，旧俄等于7俄里）需两天两夜，要横渡海湾，直穿大海。”他还通报了航行地区的某些水文地理资料。据他说，从伯朝拉河口到尤戈尔海峡的海底很不平坦，“一些地方很深，而另一些地方很浅，一俄丈深（2.134米），在有的地区船都立起来了”。就是说，船都是在海岸附近航行，因为巴伦支海东部离岸较远的地方的平均深度几乎都在7—8俄丈。

舒宾在尤戈尔海峡也发现了海底的这种特性（“忽深忽浅”），就是说，果奇在这儿是紧贴岸边航行的。他还提到了瓦伊加奇岛，他发现这是个石岛，上面没有树木，“周围的俄国人不往曼加杰亚去，因为到大海上去太远，而且冰层堆积”。

果奇驶过海湾后来到喀拉湾（拜达拉塔湾），然后来到“从南边注入尼亚尔佐姆斯克海（喀拉海——作者注）的浑河。而浑河不宽，可以用石头扔过河去，河也浅。”而后航海者却面临着困难的工作：把果奇上的货卸下，把货物和果奇本身经过连水陆地拖到绿河。关于这件事舒宾是这样描述的：“到达湖泊，到达浑河的尽头，人们开始用浅水木船在湖之间搬运储备品。木船能装10俄石或更多的物品，1俄石相当于4普特（64公斤——作者注），而人们引领木船从一个湖泊到另一个要通过沼泽地的泉水，要拖过四处横流的水，两个人拖一艘木船，而两湖之间的沼泽地有1俄里长的，有的不到1俄里，而要把卸过货的空船拖过那些沼泽地则要所有的人一起用大绳拽。”然后沿绿河到达鄂毕湾，再到塔兹湾。直到10月1日，航海者才抵达曼加杰亚。

舒宾发现，亚马尔半岛是一个冻土带地区：“岛的两边光秃秃的……长着一些小树，有1/4俄尺高（18厘米——作者注），人们把那种树叫作低矮的小灌木。”舒宾的通报大概是最早的关于瓦伊加奇岛、喀拉海和亚马尔半岛自然状态的可靠信息（注22，1088—1090页）。

在出征塔兹河地区的同时，沿海居民在奥谢特洛夫基河（后来改名为曼加杰伊卡河）注入塔兹河的地方建起了贸易一经营（指捕鱼、

开采、狩猎——译者注)居民点。1968—1970年和1973年,在四个夏天适合野外作业期间,以历史学博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别洛夫为首的南北极科研所的历史地理考察团曾在这个地区工作,苏联科学院考古所的学者也参与了这一工作。考察团发现了沿海居民的贸易一经营定居点建筑物的木制残骸,人们用树林年代学方法确定了它们的年龄。所发现的建筑物中最早的年代是1572年,但学者们认为,这些居民点产生的年代可能早得多。

根据曼加杰亚督军И.Ф.达涅夫提供的资料,这些居民点的沿海居民同当地居民很快就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还娶当地女人为妻。这个居民点或许还有隐僧修道院或小教堂(注23,34—35页)。沿海地区另外一些设防的过冬地、塔兹河上游的“泽梁城”早在17世纪初就已存在了。来自沿海地区这些小城的商人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并“将向他们索取的贡物偷偷据为己有”(注6,142页)。

沙皇政权试图将鄂毕河下游和鄂毕河以外地区的毛皮生意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1598年,为了调查“曼加杰亚地区”,莫斯科当局已经从托博尔斯克派出了一支以喀山事物府(西伯利亚的所有事物在1637年转交新成立的西伯利亚衙门管理之前都归这个事务府管辖)长官费奥多尔·齐雅科夫为首的一支不大的队伍。在魏尔霍图利耶,按照北方沿海地区向新土地和斯匹次卑尔根岛(位于巴伦支海中挪威所属的斯瓦尔巴群岛——译者注)航行时所造船的样子为这支队伍建造了4艘果奇——有甲板的帆桨海船。

齐雅科夫沿着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到达了鄂毕湾,但看来,他没到塔兹河,而是在纳德姆城过冬了。冬季开始前,尤里·多尔古申和一批沿海地区的实业者也到了那儿。看来,在1599年夏天,这支联合队伍沿着纳德姆河、普尔河(位于纳德姆河与塔兹河之间,注入鄂毕湾——译者注)以及它们的支流、它们之间的连水陆地最终来到了塔兹河。收缴了实物税后,齐雅科夫于1600年冬天返回了莫斯科。

之后,大型的俄国政府考察团来到了曼加杰亚,他们的任务是:“在曼加杰亚,在塔兹河口建立城堡,以便将曼加杰亚和叶尼塞的萨莫亚齐人置于国家、沙皇铁拳的掌控之下并每年向他们征收实物税。”(注24,51页)

数百名托博尔斯克的哥萨克在督军米罗·米哈伊洛维奇·沙霍夫斯基公爵和“文官”（督军办公厅长官）达尼尔·赫拉普诺夫的带领下参加了这个考察团。1600年夏天，队伍从托博尔斯克乘船出发到达别廖佐沃，在那儿又有50名别廖佐沃的哥萨克以及一些当地的商人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在那儿建造了海船——四艘果奇。考察团乘坐的四艘船和另外两艘用来装载储备食物的河船——运货用无甲板大木船驶向了鄂毕湾。

在鄂毕湾，两条货船被冲到岸边，船体受损并进了水，“面粉和燕麦粉被水浸透，米粒和盐沉了底”。聂聂茨人赶来相助。“他们（考察团成员——作者注）骑鹿出发，把自己所有剩余的储备都给了萨莫亚齐人，而他们是滑着雪到达曼加杰亚的。”众所周知，队伍开往普尔河并在那儿遭到袭击：“叶尼塞的萨莫亚齐人偷走他们的东西，他们在普尔河那边——行程的终点击溃了米罗公爵的队伍，抢去了服装、火药（小口径的炮和火药——作者注）、铅弹和储备，而米罗公爵和达尼尔逃脱了”，他们损失了30个人。受伤的沙霍夫斯基和60名哥萨克于1600年8月骑鹿返回了别廖佐沃。

但是沙霍夫斯基有可能在晚秋时同幸免于难的哥萨克又骑着鹿去了塔兹河。最有可能的是，冬季在曼加杰亚路线做向导的人把他领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北方沿海居民在塔兹河上建立的居民点。在那儿安顿下来之后，公爵开始修建曼加杰亚城堡。达尼尔·赫拉普诺夫和其他的考察团成员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只知道在塔兹湾的东岸同聂聂茨人有过一次小规模冲突，期间死了8个哥萨克。

或许，实业者在同当地居民交往时的残暴行为引发了聂聂茨人的不满。И. П. 马基多维奇和В. И. 马基多维奇也不排除实业者本身教唆聂聂茨人残害军役人员的可能，因为他们把军役人员看作其采办毛皮的竞争者（注18，258页）。

1601年3月，莫斯科当局派出了以督军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马萨里斯基-鲁别茨公爵和萨夫鲁科（鲁基）·普希金为首的第二支队伍去帮助沙霍夫斯基公爵。这支队伍由常备军、哥萨克和被俘的立陶宛人组成，总共300人。人们建议他们用“泽梁商人和维米人……作为驾驭者（向导），他们了解曼加杰亚和叶尼塞的道路并且会翻译”

(泽梁人——这是科米人，维米人——维切格达河支流维米河沿岸居民点的居民——作者注)。显然，“叶尼塞”还不是莫斯科当局对其一无所知的河流，而是东方曼加杰亚以外的一个地方。

在给督军的训令中告诫他们在塔兹河上或再往东边一点儿建立城堡：“……在初寒之前到达曼加杰亚和叶尼塞……不是去过冬，过鄂毕河和大海要谨慎，在坚固的地方建城堡要小心，泊船须注意，不要把一艘船单独停在岸边，关注天气。”训令要求督军到达塔兹河上的居民点，并以居民点为依托修建城堡，即重复沙霍夫斯基公爵所做的一切（注 23，36 页）。

在托博尔斯克城，马萨里斯基和普希金领到了一支速射火绳枪和 200 发圆弹、三支要塞火绳枪、25 普特（400 公斤）的火药、10 普特（160 公斤）铅弹。每个哥萨克得到了 1 俄磅（410 克）铅弹。总共有 9 艘果奇、两艘海船和两只平底小木船（扬帆划桨的河船）出海。在别廖佐沃又给轮船补充了一支速射火绳枪和三支要塞火绳枪和大量的圆弹。

来到塔兹河口时，督军应当通过泽梁人的帮助了解一下，在哪儿建城堡好。1601 年夏天到达塔兹河后，督军们查明，沙霍夫斯基已成功地建立了城堡，但不是在河口，而是在河右岸往上 300 公里的地方。这意味着，马萨里斯基和普希金完成了建立曼加杰亚的工作。

例如，有这样一份有趣的文件证实修建曼加杰亚城是在沙霍夫斯基参与考察团期间开始的：1655 年哥萨克拉扎里·阿尔古诺夫在给西伯利亚衙门的呈文中描述了他父亲萨瓦·阿尔古诺夫服役的情况，他是从“别廖佐沃被派出的……他和米罗·沙霍夫斯基公爵及达尼尔·赫拉普诺夫沿着冬季的道路滑雪往曼加杰亚去；萨莫亚齐人对他们许多军役人员大打出手，抢了他们的储备，此后，他们忍受着饥饿和各种困苦往曼加杰亚进发。来到曼加杰亚后，他们抓了萨莫亚齐人做人质，抢夺了毛皮（把部落首领家中的人当人质，而后又主持了他们效忠莫斯科罗斯沙皇的仪式——作者注），建立了城市”（注 10，112 页）。

一个出征的参与者于 1601 年绘制了一幅鄂毕湾和塔兹湾的地图，历史学博士 M. И. 别洛夫确定该图为 1601—1603 年间绘制。在这幅标题为“带有天然界线的曼加杰亚海湾”的图纸上，作为一个巨大的半

岛被展示出来的是“萨莫耶德土地”和它“顶端的”岛屿，无疑，事实被歪曲了。很明显，作者可能把这块“土地”同亚马尔半岛和它北端的别雷岛混为一谈了。在陆地部分标注了几条流入鄂毕湾的河流，以及湾本身和注入它的普尔河和塔兹河。在图纸上还画出了格达半岛东部沿岸地区。这张图纸第一次给出了更加接近真实的关于西西伯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认知，是俄国人在研究、开发鄂毕河河口和叶尼塞河河口之间的西伯利亚北部地区时取得重大成就的明证（注 18，259 页）。

从曼加杰亚建立起，在塔兹河流域进行的实业者的“软动产”生意和毛皮交易都被置于莫斯科中央当局所派出的海关的严格监管之下：海关为国家从商人和实业者所有的收入和利润中收取十一税。

曼加杰亚作为“沙皇金子般沸腾的世袭领地”不仅在罗斯，而且在国外也声名远扬。曼加杰亚县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泰加森林和冻土带上，这里产的貂皮受到极高的评价。17 世纪前半叶，每年从这儿输出的皮子达 10 万—15 万张。17 世纪时，最便宜的皮子在莫斯科也值 5 个卢布，它相当于一个在西伯利亚供职的哥萨克一年的薪金。

根据 1968—1973 年在曼加杰亚旧城所进行的考古挖掘的结果非常令人信服地重新勾画出城市的面貌，它的居民活动的特性，可以描绘出它在整个 17 世纪期间的历史。

曼加杰亚城是莫斯科罗斯在北方边区一个相当强大的设防据点，它分布在高高的河岸上，很适于防守。起初，1601 年在建造时，它被建成了一个木栅栏形状的“带有角楼的城堡”——护卫墙是用垂直、并排、紧密安放的尖头圆木构成的，各个角上有一些不大的塔楼。

城堡是这样建造的，护卫墙的南边紧靠着陡峭的河岸。城堡内部修建了督军室、聚会厅、监狱、常备军岗棚——守卫室。督军、他们的书吏和卫兵在聚会厅处理行政、审判和司法事务，那里保存有督军的公款，也在那儿给军役人员发放钱款、面包和盐。包办贸易澡堂（古罗斯时期的公共澡堂，之所以叫贸易澡堂，是因为洗澡只要 2 个戈比，如同用洗澡作交易——译者注）和得到在小酒馆销售葡萄酒的权力要通过聚会厅的书吏。有趣的是，考虑到沿海居民和所有实业者、哥萨克火爆的脾气，督军在聚会厅接见人时要用铁栅栏把自己围上以避免他们（注 23，59 页）。

人们在城堡里修建了圆顶的三位一体大教堂——一年四季为教民服务的温暖的帐篷形教堂。三位一体的神父被认为是曼加杰亚神职人员中职位最高的。众所周知，曼加杰亚这个三位一体的教堂好像具有一种贷款机构的功能。比如1642年，海关首脑伊万·托尔斯托乌霍夫就来到教堂要求借给国王200卢布给军役人员发放薪水（注23，45页）。

曼加杰亚的商人和实业者从各种不同的源泉获取贷款，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教堂的金库：曼加杰亚“三位一体的金库”和图鲁汉斯克的尼古拉教堂好像是尘世的银行（注25，311页）。

1606年新的督军达维德·日列勃佐夫和库尔久克·达维多夫被派往曼加杰亚时，喀山事务府在命令中责成他们在曼加杰亚建造新的“城市堡垒”。曼加杰亚要塞是1607年用云杉、落叶松和雪松建造的，它旨在保卫要塞内部的建筑物。带有塔楼的要塞围墙总长度达到279米，是用长3—4米、宽2.7—2.8米的圆木制成的木墙构成的。它的高度达到屋顶，几乎有6米，西边的一段墙——几乎有10米高。在修建这段墙时，监狱的部分墙体保留了下来，从“城市”围墙的北面和西边形成了保护内城的外面的第一道防线。

根据“1625年曼加杰亚城清单的记载”，角塔有5座：达维多夫塔，“建在塔兹河上”，高度达屋顶，有9.23米；祖布佐夫（牙齿之意）塔，高8.52米；拉基洛夫塔，高7.66米；乌斯宾斯基塔，高8.88米（所有这4个塔都没有开门）；以及可通车马的高度为11.39米达屋顶的斯巴斯基（救世主）塔。

曼加杰亚内城装备了9杆铁制要塞火绳枪，都安置在塔的上层：斯巴斯基塔上有3杆，每层1杆，可以向城郊方向开火；乌斯宾斯基和拉基洛夫塔上的武器可以向北方射击；两层的祖布佐夫塔上每一层上的武器都可以向南方和东方，即向着城郊和沿塔兹河河岸开火，最后，两层的达维多夫塔上的武器能够向西方和南方，向塔兹河方向射击。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环形的射击区域。

在西伯利亚，带城门的主塔通常被称作救世主塔。在这些塔的大门上都安放了救世基督的圣像和几幅代表城市教堂的圣像画。

拉基洛夫塔取名于相邻的拉基里哈河，达维多夫塔——根据主持建造要塞的达维德·日列勃佐夫和库尔久克·达维多夫来命名，祖布佐夫

塔——看来是因为塔上有一些齿状的雉堞。

要塞围墙的外面是工商区，也是城市主要的居住地区，被道路分成了许多街区，而且狭窄的街道和胡同是用轮船甲板（看来是来自破拆的轮船）上的松木板铺成的，这些板子放置在一些特殊的支架——井字形的木架上，这些木架比地面稍高出一两排圆木，以防止地面解冻时板面垮塌。

在工商区还建起了综合性的商场楼，由许多库房、货栈（那儿遍布商铺，存放着打算销售或外运的储备商品）和为进城的商人和实业者落脚准备的房间组成。商场的一座楼房上甚至还安装了塔钟，考古挖掘时还发现了这些塔钟的某些零件。

曼加杰亚的商场在许多年里顺利地应对了大量商船队的涌入，为城市、为曼加杰亚督军管辖下的广大区域加工制作了大量的货物和商品。

在工商区设有海关官厅。在曼加杰亚，海关首脑和他的书吏除了征收海关税这项基本职责外，还管理向城市供应鱼、野味和肉的事物。为此目的，雇佣了一个劳动组合，负责在春秋两季往城里运送山鸡、野兔和鱼（小水鸭、马克鲟鱼和鲟鱼），为督军、他们的家庭和仆人、聚会厅和海关的书吏、曼加杰亚卫戍部队的常备军储备大量的鱼、野味和肉，还有相当一部分捕到的鱼流入了市场。海关还雇了一些“驾驭者”——向导在曼加杰亚和1607年在叶尼塞河上建成的图鲁汉斯克之间的路上陪伴人员和货物，专卖事宜也在海关的管辖之下。

海关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它的领导——海关首脑不是由督军委派或选举产生，而是由喀山事务府发布命令，再由西伯利亚衙门任命。通常都是委派来自乌斯秋格、托季马或斯维亚加的商人担任曼加杰亚城的这个职务。

城市的贸易澡堂和小酒馆是曼加杰亚工商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工商区最早的乌斯宾斯基教堂可能是1603—1606年间修建的。人们认为，内城角塔中的一座就是以这座教堂来命名的。这个教堂的一个建造者声名远扬，这就是雅罗斯拉夫城郊人阿尼基·伊万诺夫·斯克雷宾。用他和另一些商人的钱修建的乌斯宾斯基教堂成了工商区的宗教中心。村社的村长把村社的公款保存在教堂里，村社的大会也在此举行。乌斯宾斯基教堂后面分布着城市墓地（注23，76—77页）。

17世纪20年代末，在工商区西部边缘地带、离救世主门不远处建起了第三个教堂，为了纪念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这个教堂被称作沿海奇迹创造者米哈伊尔·马列因和马卡里·日尔多沃茨基教堂。

除开曼加杰亚的教堂，在离要塞围墙不远的城郊西部建起了死难者瓦西里·曼加杰伊斯基小教堂。瓦西里·曼加杰伊斯基作为穷人和不幸者的捍卫者在17—18世纪的西伯利亚受到广泛的敬重。实际上，他是作为实业者——新土地发现者的捍卫者和庇护者而受尊重的。据传说，对瓦西里·曼加杰伊斯基的崇拜发生在他死后，他是在受到偷盗的不公正指责后遭督军刑讯而丧命的（注21，19—20页）。

考古挖掘的结果证实，曼加杰亚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和安置边区行政机关的地方，而且是工商手工业中心。主持北极研究所考古考察团的B. H. 切尔涅佐夫1946年秋天访问了旧曼加杰亚遗址，他写道：“也可以认为，曼加杰亚不仅靠外来货生存。大量的陶器、钉子、青铜铸造品的残渣、铁制的小件手工制品、生皮子和熟皮子等证明，城里存在面向当地市场的手工业者。”

然而，贸易活动仍然是城里最主要的营生。考古挖掘时在那儿找到的威尼斯的玻璃、中国的瓷器和纽伦堡的硬币证明了它的规模。在自己报告的末尾，B. H. 切尔涅佐夫指出：“曼加杰亚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和贸易繁荣的城市。”（注10，113—114页）

这种见解在1968—1973年历史、地理考察团的工作总结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而且，考察团查明，工商区的手工业超过了贸易。海象骨、猛犸骨和木制品制造业尤其发达。17世纪40年代，在曼加杰亚工商区冶炼业得到了广泛发展，有一件事尽管令人惊奇，但却是一个考察团认定的不争的事实：当时，曼加杰亚的手工业者曾冶炼出自诺里尔斯克（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泰梅尔半岛南部，叶尼塞河东边90公里处——译者注）的铜和镍矿石，并将其中一部分从叶尼塞下游地区运往塔兹河。

荷兰地理学家尼古拉·维特森在自己1692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北鞑鞑和东鞑鞑》一书中写道，17世纪前10年曼加杰亚的居民住户达到了500家。每年有许多实业者和商人到那儿去。“在过去曼加杰亚督军统治时期，”海关首脑И. 萨波林于1654年在呈文中写道，“许多

商人的果奇载着粮食储备和俄国商品通过海路从西伯利亚来到曼加杰亚，每年果奇的数量有 50 艘左右，甚至更多。许多实业者沿着叶尼塞河、图鲁汉河和其他一些间接水道从事这一行当，开采业……规模巨大……而商人、陛下，和实业者在曼加杰亚过冬的有 1000 人左右，或更多，商铺里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即使没有集市都堆满了各种商品，春天，陛下，连水陆地上挤满了各种人，市场火爆。”

1646 年，商人和实业者在自己的一封呈文中写道：“在过去许多年里，陛下，商人和实业者从罗斯和西伯利亚来到曼加杰亚的有 600—700 人之多，从各个作业场载着貂皮的平底木船（渔船——作者注）有 100—150 艘，而从叶尼塞……来的各种商人和实业者的平底小木船也有 20 多艘，为了生意参加市场聚会的各种各样的人有 2000 人左右或更多，而那些行业，陛下，规模巨大：……一个人的收获量 [‘收获量’这个单词指的是工业组合中的股份，即一个分成制农奴（14—15 世纪俄国破产农民接受封建地主贷给的钱款和粮食之后即成为分成制农奴——译者注）一组合体成员在一个狩猎季节能得到的供给品——作者注] 是 50 份，而一个人在交易时的份额是 2000、3000、5000 或更多。”（注 25，298—299 页）

可以想象，成百上千的商人和实业者都聚到城里来购买贵重的毛皮——“软黄金”和用其交换商品是多么热闹：到处挤满了冒险家和亡命徒，他们的活动常常同死亡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由于寒冷和饥饿、冻土带和泰加森林原著居民的弓箭和梭镖），酒馆里人满为患，而习俗是相当得野蛮和放肆，很像 19 世纪、20 世纪国内许多文学作品中生动描写的后来西伯利亚金矿淘金工人那种特有的风俗。

考古挖掘证实，在城里的居民中广泛存在赌博现象。考古挖掘时找到了一些骨质的筹码——色子和一些上面画有小圆圈和点点的片状色子，可能当作纸牌来玩。众所周知，骨牌和纸牌玩起来非常狂热，赢钱、赢毛皮、赢其他的贵重物，尽管督军和教会始终在查禁赌博。例如，1630 年，在沃洛格达和大彼尔姆主教的世袭领地上就进行过一次专门的审判，以查明谁“在玩投骰子戏和纸牌”。还把雅库茨克督军给地方海关官员的命令作为当局对赌博的态度：“过冬地的商人和实业者……不准涉骨牌和纸牌，谁都不准玩投骰子戏。”

但是，看来，在曼加杰亚这个环境里所有这些禁令都很难奏效（注 26，42—43 页）。因为曼加杰亚的督军们把赌博看作当局的财源。在两个城市贸易澡堂里允许开设“谷物房”（当时的赌博以骨或谷粒为色子，所以有此称呼——译者注）以便玩投骰子戏。里面有一些房间可以进行抵押赌博（玩牌赌博）。这些游戏屋按专卖的方式出售，由此一笔不小的钱款进入了督军的金库。按专卖出售的还有位于工商区中心的那些小酒馆。小酒馆有三种专卖形式：“经营蜜汁饮料的、经营啤酒和家酿啤酒的、经营克瓦斯和甜酒饮料的。”（注 26，10 页）

西伯利亚督军所采取的许多措施表明，依靠实业者和商人中的不良动机聚敛钱财的做法很有市场。例如，1654 年曼加杰亚督军伊格纳季·科尔萨科夫在修建从曼加杰亚到图鲁汉斯克过冬地的道路时就打着服务路人的旗号命令在图鲁汉斯克连水陆地设立“连水陆地澡堂”，里面有卖“酸克瓦斯和甜酒饮料”的小吃部和能玩投骰子戏、“纸牌赌博和各种抵押赌博”的游戏屋（注 6，120 页）。

17 世纪前 20 年人们从海上去往曼加杰亚到底有多么急切是很难判断的，因为 1642 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那些年曼加杰亚的档案，当时整个曼加杰亚要塞毁于火灾。个别的有关类似出征的资料保存了下来。像 1609 年夏天，以霍尔莫戈尔人叶列缅伊·萨温为首的一批商人和实业者来到曼加杰亚。1612 年梅津人舍斯达克·伊万诺夫和他儿子阿尔杰米从曼加杰亚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众所周知，父子俩在科尔古耶夫岛停留了下来，他们在那儿搜寻损毁的外国轮船上的武器。看来，这艘船是试图驶往东方去的。舍斯达克是从海上去往曼加杰亚的。

德维纳商人康德拉基·库洛奇金和常备军康德拉基·克列拉不止一次到过曼加杰亚，他们宣称：“多年里，许多商人和实业者都想乘果奇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往曼加杰亚。”1619 年之前颁布的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命令中有一纸提到了许多去往曼加杰亚的海上航行：“……商人希望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到曼加杰亚去。”（注 22，1054、1064、1067 页）

从当时保存下来的海关手册的记录可以证实，1630 年，即曼加杰亚海路封闭 11 年之后，经过曼加杰亚和叶尼塞连水陆地（越过该陆地去往叶尼塞、图鲁汉斯克）的商人和实业者就有 2350 人，城市海关向

他们征收了 27047 卢布的现金税和收缴了他们向海关呈验的 1984 捆貂皮（每 40 张貂皮为一单元，称作“袋”或“捆”，总共 79360 张皮子）中的 1/10 作为毛皮税。可见，在过去的 10—15 年间曼加杰亚的商人和实业者的活动更加急切了（注 10，115 页）。

无数来到曼加杰亚的商人和实业者为了获取暴利奔赴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这使得这座城市变成了组织许多远征和完成一些同发现新的盛产毛皮兽的北方地区有关的冒险事业的中心。

塔兹河流域的毛皮兽很快就被打光了，于是实业者试图往东，到叶尼塞河左边的支流图鲁汉河去。1607 年正是在图鲁汉河口建起了图鲁汉斯克过冬地，后来被称作新曼加杰亚。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曼加杰亚的存在，沙皇政权才控制了一个新的获取毛皮的地区。曼加杰亚仍然兴盛，“曼加杰亚的果奇”和其他一些海船、河船也照旧驶往塔兹河。

17 世纪初对罗斯来说是一个困难和痛苦的历史阶段，无怪乎被称作“动乱时代”。莫斯科帝国在同波兰和瑞典入侵者的残酷斗争中坚持了下来。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莫斯科当局对西欧贸易公司试图往西伯利亚和罗斯北部欧洲部分渗透的做法所采取的态度。沙皇政权非常痛苦地接受了传到莫斯科的有关外国轮船出现在喀拉海的消息。

托博尔斯克的督军伊万·谢苗诺维奇·库拉根和伊万·布雷根公爵同样也切身地需要把进入曼加杰亚的贸易通道作一调整：从海上改为陆路，经过乌拉尔山到魏尔霍图利耶，然后沿（土拉）河到托博尔斯克，再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到达鄂毕湾。他们经常提醒莫斯科当局外国人从海上向西伯利亚渗透的危险：“我们，您的奴仆，——他们给沙皇写道，德国商人把茶叶运到曼加杰亚和叶尼塞，因为叶尼塞河很合适，河里鱼很多，沿河住着耕作的鞑靼人（由于不了解，他们这样称呼所有沿叶尼塞河居住的埃文基人和其他当地居民——作者注），河里的野兽也很宝贵，而他们很顺利地带来了德国商品。”（注 6，91 页）

莫斯科当局随后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这就是 1616 年发布的关于完全禁止从海上去往曼加杰亚的命令，而得到 170 位曼加杰亚商人支持的曼加杰亚督军伊万·彼特洛维奇·比尔金却证实了这条禁令的危害，其中包括他否定了库拉根关于外国军舰出现在喀拉海的通报的可靠性。

督军比尔金在西伯利亚威信很高，他在曼加杰亚建了许多新的楼房：新的聚会厅、督军院里的房屋，附近还建起了曼加杰亚的商场。历史学博士 M. И. 别洛夫认为，正是由于他（指比尔金）的反对，1618 年才允许人们沿喀拉海去往曼加杰亚（注 10，119 页；注 23，58 页）。

但库拉根在其他的西伯利亚督军的支持下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619 年在得到莫斯科同意后，去往曼加杰亚的海路被他们彻底封死。而且，第二年，莫斯科当局命令在亚马尔半岛浑河和绿河之间的连水陆地修建关卡以阻止所有违犯禁令的人。

1620 年沙皇给托博尔斯克和曼加杰亚督军的命令说：“那里有禁区，严厉地告诫实业者和缴纳实物税的鞑靼人，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德国人（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所有的外国人——西欧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作者注）到叶尼塞和曼加杰亚去，不能同他们做交易，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能给他们指路。如果谁同德国人开始贸易或给他们指路，那么那些人将在我们这儿彻底失宠。”（注 22，1076 页）从白海（俄联邦科拉半岛和奥涅加半岛之间的内海——译者注）到鄂毕河的一条直达海路就这样被禁止了，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让德国人了解从布斯托捷尔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曼加杰亚的道路”（注 10，93 页）。其结果就是：中断了北方沿海地区同曼加杰亚，也就是同西伯利亚的直接海上联系。

在禁令实施后的年代里，莫斯科当局坚持提醒托博尔斯克的督军，必须严格遵守不准从海上去往曼加杰亚的命令。1622 年（按旧的莫斯科创世纪元计算，就是 7131 年）9 月 18 日，喀山事物府给托博尔斯克督军的命令这样指出：“按过去说，就是 128 年（1619—1620 年）4 月 24 日，我们寄给你们一封信，吩咐你们从托博尔斯克或曼加杰亚派出 50 名军役人员或根据需要派出军役人员到浑河和绿河的关卡去。在两河之间的连水陆地上仔细地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要坚固、要靠近缴纳实物税的人，在那些看好的地方建小城堡和各种要塞。要从该小城堡派出 5 或 6 个人轮流到海上去探听德国人的消息，千万要谨慎，绝不能让从海上来的德国人找到无论是走水路或陆路去往曼加杰亚的通道。俄国商人和实业者从海上和从北方沿海城市……去往浑河、绿河和曼加杰亚或从曼加杰亚返回那些地方都不允许。而且将来每年春天，冰雪开始

消融之时，要向那个城堡派出军役人员，他们要在城堡待到谢苗日或巴克洛夫日（也就是到10月中旬——作者注）。”（注24，54页）

从白海到曼加杰亚的直达航线被禁使得沿着河流和鄂毕湾的南边从托博尔斯克和别廖佐沃到曼加杰亚的货物转运扩大了。如果说1619年之前莫斯科当局使用这条路首先是为了把一批批的军役人员和卫戍部队的粮食运往曼加杰亚，那么，海上航运被禁之后，在通过这条路去往曼加杰亚做生意方面，罗斯中部省份的商人和沙皇的客人开始成了主要角色。比如，1640年，4个沙皇的客人、5个另外的客人——大商人的雇员和4个殷实的商人在曼加杰亚做买卖的事情尽人皆知。在通过曼加杰亚的生意获利不菲的客人中可以指出这样一些知名的商人，像纳杰亚·斯维什尼科夫、奥希普·叶列佐夫、彼得·温宾、基利尔·巴索夫、瓦西里·古谢里尼科夫、伊萨克·列维亚金、天季姆·乌索夫等（注10，120页）。

最早保存下来的关于走水路去往曼加杰亚进行贸易的资料是1626年的。当时“许多商人带着粮食储备乘坐果奇”（注10，120页）同海关首脑格列勃涅夫和图林斯克城郊人瓦西里·谢苗诺夫一起从托博尔斯克前往曼加杰亚。

1628年夏天，136位商人和实业者从曼加杰亚出发到达奥波多尔斯克，从那儿经过乌拉尔山脉的城堡继续前往罗斯。他们乘坐的贸易船队的轮船从曼加杰亚出发，其中有北方沿海地区的梅津人、皮涅加人、雅罗斯拉夫人等。

有趣的是，这些私商同官家在粮食贸易方面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他们运到曼加杰亚和图鲁汉斯克的粮食的数量多到使粮价急剧下跌。托博尔斯克的督军甚至要求莫斯科当局不要再往曼加杰亚运送粮食储备。原来对官家来说，在曼加杰亚从商人手中购买粮食比自己运来的更便宜。例如，1626年运到曼加杰亚的粮食如此之多，甚至闭市后曼加杰亚的督军也能买到4120普特的粮食。这最终导致沙皇当局拒绝了官家的粮食贸易（注10，121页）。

那些年里，顺鄂毕河下游去往曼加杰亚的航路非常火爆。例如，1630年11月一支由28艘果奇组成的贸易商船队载着345位客人从托博尔斯克抵达曼加杰亚的消息轰动一时。而且许多商人、果奇船主运到曼

加杰亚的货物价值 1000 卢布或更多，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目。商人运到曼加杰亚的货物有驼鹿皮和牛皮、渔网、衣服、鞋子、线、蜡烛、粮食、米、滑雪板、呢子、珠串、小铃铛、项链和锅。

禁止私商买卖的“违禁品”有：军事装备、武器、铁制品、酒类。为武装卫队提供这些商品和装备是官家的特权。如果在商人那儿发现了“违禁品”，那么他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扣留充公（注 10，259 页）。看来，尽管有禁令，还是有不顾惩罚向北方的本地人提供“违禁品”的商人和实业者，因为这种走私供货会带来暴利。

商人、他们的雇员和实业者运到北方的大多数商品都用来交换毛皮——貂皮、银狐皮和海狸皮。所猎获的貂皮的 1/10 要向海关纳税，可以通过海关记录的税额来判断曼加杰亚毛皮交易的规模：1630—1637 年之间，这个 1/10 每年平均达到 146 捆（5840 张）貂皮（注 10，122 页；注 23，80 页）。

托博尔斯克的哥萨克苏汉·叶尔莫林去往曼加杰亚的途中所见为 17 世纪 30 年代这类航程的特征提供了佐证。他说，1631 年从曼加杰亚驶往托博尔斯克的途中，他看见了 7 艘果奇，这些载着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商船是去往曼加杰亚的。在鄂毕河口群岛附近，大约是 9 月 7 日，他同一些也是驶往曼加杰亚的官船偶然相遇。他指出，那年鄂毕河的封冻发生在 10 月底（圣母节两星期之后）。叶尔莫林的船从曼加杰亚到奥波多尔斯克走了三个半礼拜，“海上的天气阻碍了他们”，而从奥波多尔斯克到托博尔斯克——四个半礼拜，因为严寒开始了。他在路上总共花了 8 个星期，在那个时代对于这种航行来说，这个期限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

1633 年一支由 20 艘果奇组成的商船队载着 387 名商人和实业者从托博尔斯克驶往曼加杰亚，其中的粮食和其他货物重达 14224 普特（227.6 吨），价值 10385 卢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并非所有的果奇都能到达曼加杰亚。比如像大家所知道的，1624 年从托博尔斯克被派往曼加杰亚供职的军役人员就谈到了去往那儿的道路的艰难：“他们的果奇在海湾被打碎了……他们费尽气力爬上岸来到冻土带，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们在岸边找到了被打坏的浅水河船，经历了千难万险把这艘船开到了曼加杰亚城。”（注 6，117 页）这

种情形并不少见。

30年代，贵族子弟托米尔·彼特洛夫携带给曼加杰亚卫戍部队的粮食给养乘官船去往曼加杰亚。遇到暴风雪时，船和所有的货物都沉没了。直到1638年夏天托米尔·彼特洛夫才顺利地把粮食运到曼加杰亚（注10，123—124页）。

整个17世纪30—40年代，果奇沿鄂毕河下游和鄂毕湾去往曼加杰亚的这种艰难的航行每年都在继续。许多轮船在鄂毕湾遇到暴风雪沉没了。曼加杰亚地区的毛皮兽资源逐渐枯竭，于是实业者试图在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寻找新的盛产毛皮兽的地方。涌入城市的实业者和商人减少了，即使有，也是从勒拿河顺道往西去。因此，关于40年代航行前往曼加杰亚这段历史只有一些个别的零星的资料保存了下来。

1640年总共有64名海员前往曼加杰亚，他们多数是梅津人、皮涅加人和维米人。1641年，勒拿河的哥萨克瓦西里·费费洛夫和同伴一起从曼加杰亚去往奥波多尔斯克，然后继续往西去。1642年10月，许多商人的果奇在鄂毕湾被冻住。

1643年7月13日有4艘果奇从托博尔斯克前往曼加杰亚。两艘船装载着在曼加杰亚将作为薪水发给军役人员的“官粮”，乘坐第三艘船的是长官格里高利·杰里亚耶夫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侄子，第四艘船上载有商人、实业者和“储备粮以及各种货物”。

8月15日轮船从鄂毕河口向鄂毕湾驶去，“到了海上遇见了顶风，停了两天两夜，又从那儿扬帆出海，两天时间到达拐弯处（到达了去往塔兹湾的拐角——作者注）。在拐弯处，天气开始同果奇作对，官船和商船被风浪打沉，官家的给养和商人被分别吹到海上和岸边，一些人划着果奇上带的小船慢慢地靠了岸。而长官格里高利·杰里亚耶夫的果奇被抛到岸边时还是完整的，但储备品都损失了。他的果奇在浅滩上被沙子淤平，此时，他们只能停下来，人们把那条船从沙子里扒出来，又用了两个星期把它从浅滩拖出来”。

在岸边留下15个人照看抢出来的商品和储备后，长官格里高利·杰里亚耶夫用自己的果奇载着被救者和所有的船一起驶往曼加杰亚。“他们将怎样对付斯托尔波夫河（位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塔佐夫半岛——译者注）流域的黑山？在这儿遇见了从侧面刮来的北风。果

奇被风刮到了光秃秃的岸边，陷在浅滩出不来。他们就在那儿待了8个星期——被萨莫亚齐人围住了。从那次劫掠起（海上的，也就是那次船舶遇险后——作者注），直到离圣诞节前最后一次荤食日还有10天时，他们乘窄长的雪橇沿岸边前往曼加杰亚。萨莫亚齐人开始向他们靠近，同他们的战斗不可避免了。”

“他们从那儿前往塔兹河口，从黑山到塔兹河口走了8个星期，他们忍饥挨饿，因为萨莫亚齐人不让他们通过并抢走了储备。军役人员和实业者由于饥饿开始死亡，总共死了50个人，长官格里高利·杰里亚耶夫的两个女儿和一个侄子死了，他的人（格里高利的）也死了一些。”

杰里亚耶夫从塔兹河口派出了最强壮的军役人员前往曼加杰亚通报船难后被救人员的困苦状况。长官派出的军役人员“由于饥饿勉强挣扎着来到城里”，得到他们传来的消息，曼加杰亚督军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派自己的儿子带着粮食去迎接杰里亚耶夫。救援队用雪橇把长官和他的妻子、其他的同路人送往曼加杰亚。在离曼加杰亚总共还有一昼夜的行程时，长官去世了，只有包括长官妻子在内的20个人回到了城里。过了一段时间，长官妻子由于疾病和忧伤也去世了（注24，80—82页）。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从曼加杰亚出发后因为耽误了一两天就只好取消出航往回返。例如，1656年8月5日，军役人员杰敏基·基什科夫带着国家的貂皮官产乘果奇从曼加杰亚出发。但9月11日就返航了，在向督军伊格纳季·科尔萨科夫汇报时说：“阁下，他们为此而返回来：他们刚到海上，阁下，你的督军谢苗·拉里奥诺夫（由曼加杰亚出海返回——作者注），就遇到了他们，使他们在海上耽搁了一夜和一个半天，而阁下，那时恰好是顺风，他们怎么能够错过那个顺风啊！此后他们在海上停留了3个星期，没有从黑浅滩出海的顺风，而他们出海的粮食和储备也没了，果奇被打沉了，他们没必要等顺风了，因为害怕严寒（害怕冻在冰里——作者注）。”（注6，116页）

由于这样一些和许多其他的困难和事故，从别廖佐沃沿河流和海湾去往曼加杰亚的道路逐渐停止使用。1666年，托博尔斯克的督军们向莫斯科建议终止沿这条路用果奇往曼加杰亚运送粮食和盐巴。督军们给

西伯利亚衙门写信说，多年来，他们往塔兹河派出的运送粮、盐的果奇在7艘和7艘以上，但它们中的一部分在途中就沉没了。比如1663年，5艘果奇在路上被打沉，因此损失了船上5260普特（84.16吨）的粮食和24普特（384公斤）的盐。由于派往曼加杰亚的果奇没有返回托博尔斯克，公家承担了损失。

督军们指出，在叶尼塞和图鲁汉斯克有相当便宜的粮食和盐，就地购买就可以保证曼加杰亚卫戍部队的食品供应。粮食是从叶尼塞中部的叶尼塞斯克用河船运到图鲁汉斯克的。督军们断言，走水路往图鲁汉斯克比从海上沿鄂毕湾和塔兹湾航行安全得多。因此他们请求莫斯科当局禁止类似的航行。

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根据西伯利亚衙门的指示，托博尔斯克督军、俄国著名的制图家、西伯利亚地图的绘制者、御前大臣彼得·伊万诺维奇·戈都诺夫1667年下达了关于停止沿鄂毕湾和塔兹湾航行的命令：“今后不再进行果奇航运，而是经叶尼塞斯克供货。”（注10，125页）而到了1672年，根据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指令，曼加杰亚城被放弃，它的卫戍部队转到了图鲁汉斯克。

关于城市被放弃的原因，学者们各执己见。某些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毛皮兽行业的萎缩和沿鄂毕湾和塔兹湾运粮的困难是放弃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17世纪后半期北极地带出现的严寒在决定曼加杰亚的命运时也发挥了作用。

历史学博士М. И. 别洛夫坚信，曼加杰亚被放弃是“由于尤拉茨克的萨莫亚齐人（在普尔河、塔兹河、叶尼塞河下游过着游牧生活的吉尔吉斯人和部分涅涅茨人——译者注）的暴动”，也就是因为感受到被沙皇督军的暴虐所激怒的当地部落的压力。以我们看，如果留下来仍然能够保证获得大量的海关税和实物税的话，那么无论当地部落什么样的起义和进攻都不能迫使沙皇政权同意放弃这座城市。看来，问题还是在于行业的没落和输入沙皇国库的“软动产”的减少。可以认为，否则的话，当局就会派出军队迫使“尤拉茨克的萨莫亚齐人”俯首听命。

况且后来在曼加杰亚还建了一个不大的城堡，18世纪30年代的文献曾提到过它（尽管有时受到周围聂聂茨部落的敌视，它还是存在了下来）。伟大的北方考察团的队伍在考察从海上由鄂毕湾到叶尼塞河口

的道路时把它作为一个落脚点来使用。18 世纪时，一支由数十名向聂聂茨部落收实物税的哥萨克组成的队伍曾驻扎在曼加杰亚的这个城堡。

曼加杰亚——“金子般沸腾的国王的世袭领地”，实业者、商人、手工业者和航海者的城市，英勇的极地探险和俄国人在遥远的年代里的地理发现的见证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 叶尼塞和泰梅尔的先驱者

在勒拿河、鄂毕河、叶尼塞河流经之处，  
许多民族捕获珍贵的野兽为我上贡，  
他们刚刚为自己找到庇护，  
就笑傲北风之神的残酷，  
并勇敢地追击这个怪物；  
在勒拿河、鄂毕河、叶尼塞河流经的地方，  
冰从海底升起腾空向上，  
撕碎了忧郁的乌云，  
爬上高高的云端远望；  
勒拿、叶尼塞、鄂毕，  
驯顺，为我所需。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西伯利亚第二条大河叶尼塞的名称从何而来？历史学家 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俄罗斯人从居住在鄂毕河流域的汉特人和曼西人那儿了解到，从鄂毕河往东有另一条大河——“大水”（天涅西河、天涅苏河）。叶尼塞这条河的名称由此而产生（注 18，261 页）。1583 年，沙皇伊凡雷帝在一封信中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要求给英国商人特权的请求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女王要求允许英国商人在俄罗斯北方港口进行访问和贸易，允许英国向梅津河、伯朝拉河、鄂毕河河口派遣轮船）。沙皇在信中指出：“关于鄂毕河、伊斯列恩特河、伯朝拉河，关于那些河流的事，要拒绝他们。”在这封信中提到伊斯列恩特河，也就是叶尼塞河时，好像是在谈论一条早就为俄国人所熟知的河流

(注 5, 264 页; 注 12, 551 页)。

前面已提到过, 在寻找新的盛产毛皮兽的地方时, 曼加杰亚的哥萨克和实业者向东到了叶尼塞河左边的支流图鲁汉河。1607 年在图鲁汉河口建起了图鲁汉过冬地, 后来被称作“新曼加杰亚”或图鲁汉斯克。也是在那年, 在叶尼塞河下游修建了叶恩巴茨(印巴茨)过冬地。

数百名实业者和商人越过长达 60 俄里的叶尼塞连水陆地到曼加杰亚来到图鲁汉河进而到达叶尼塞河并在叶尼塞河下游开发了一块新的盛产貂皮的冻土带地区。为了向“全罗斯沙皇”的新臣民收缴实物税, 又向那儿派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

沿图鲁汉连水陆地到叶尼塞这段路由于要反复倒运装载物, 所以特别复杂, 因为通过这段路的不同地段要使用不同吃水量的船。实业者和军役人员从曼加杰亚出发沿塔兹河向上航行, 沿着它的支流沃洛羌卡河和一些小的拉索哈(小河汉)才能到达塔兹河与叶尼塞河的分水岭。此时必须把货物从果奇和平底木船上倒到小船上, 沿着湖泊和小河汉直接把小船引领到长约 1 公里的连水陆地。

然后用小推车把货物“拖”过去, 或“放自己身上”倒过去。接下来又要把它们挪到小船上, 沿着湖泊系统和叶尼塞斜坡上的河汉航行到注入叶尼塞支流图鲁汉河的另一条沃洛羌卡河的河谷。应在夏天水位下降前通过图鲁汉连水陆地的湖泊和河汉。必要时, 可以借助帆布拦河和修筑土坝来提高河里的水位(注 2, 47 页; 注 5, 262 页)。

先驱者在临近新曼加杰亚的地方发现了下通古斯卡河河口, 这条河是叶尼塞右边一条很大的支流。实业者调查叶尼塞河下游直到它注入叶尼塞湾地区已是 3 年以后的事了。

在这些年里, 俄罗斯人也出现在叶尼塞河的中游。1605 年督军莫尔恰诺夫从凯特城堡派出了一支哥萨克队伍去寻找新的盛产毛皮兽的“小块土地”。哥萨克沿鄂毕河右边的支流凯特河往上航行, 沿河的水路“非常难走, 因为河既窄, 又很曲折, 而且令人头疼的是, 河里有许多对航行有危险的沉没的树墩”。河里有的地方甚至两条平底小船都难以错过。河中一处叫作“钟沟”的地方有“一大片浅滩, 水流湍急。”事情是这样的, 后来商人在这个地方对面的雪松上挂了一口不大的钟作为一个指明危险处的航行标记(注 6, 112 页)。

过了布满沼泽地的分水岭，哥萨克来到叶尼塞左边的支流卡斯河。这支队伍成功地向卡斯河和瑟姆河（也是叶尼塞河的支流，但更往北点）下游的汉特人征收了实物税。不久，那儿出现了一支来自曼加杰亚的哥萨克队伍。两队哥萨克产生了摩擦，每支队伍都想把收缴实物税的权力归为己有。最终，受到当地居民支持的曼加杰亚人得到了这个权力。问题在于，曼加杰亚人规定的税额比凯特城堡的哥萨克规定的少一半。

通常认为，是曼加杰亚的哥萨克最早发现了叶尼塞右边又一大支流——石泉通古斯卡河河口。而在1618年时，凯特的哥萨克来到凯特河上游，通过连水陆地（被称作马科夫斯基）到达凯米河并沿河前行，用了一天的时间到达叶尼塞河。

在叶尼塞河的东岸，俄国人首次遇到了居住在从叶尼塞到鄂霍次克海沿岸和阿穆尔河流域的西伯利亚广阔地带的通古斯人（现在被叫作埃文基人）。正因为如此，叶尼塞右边三条大的支流都被叫作通古斯卡河：下通古斯卡河、石泉通古斯卡河和上通古斯卡河（安加拉河）。埃文基人告诉哥萨克，最后一条河的河口在从哥萨克去往叶尼塞的出发地往上，航行终结的地方。那年的夏天，哥萨克就已经来到了上通古斯卡河的河口。

1618年一支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的队伍从托博尔斯克被派往叶尼塞河，它的首领是在去往叶尼塞的连水陆地修建了马科夫斯基小城堡的贵族子弟彼得·阿尔贝乔夫。但一个设防点对保证连水陆地的安全通过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从那年的秋天到1619年冬天期间，在凯米河口上面、叶尼塞河的左岸，哥萨克修建了叶尼塞斯克城堡。该城堡成了叶尼塞中部重要的支撑点和俄国新土地发现者进一步向东渗透的基地。

的确，通古斯王公们对军役人员修建这些城堡进行了抵制，塔谢伊王公进行的抵抗尤为顽强。但通古斯部落的主要首领和族长很快就停止了对他的支持。哥萨克在两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向居住在安加拉河下游和它左边的支流塔谢耶沃河沿岸的埃文基人征收了实物税。但最终降服这些“不安分的”通古斯人则是1628年彼得·别盖多夫中尉在安加拉河上、雷波纳亚河口的一次战斗中完成的。最有可能的是，此后他与通古斯王公们签订了协议，按照协议他们有权单独向自己部落的人收取实物

税并将其上缴税务人员。可以认为，这个地区的原住民从此彻底地归并到了俄罗斯国家中（注 17，44 页）。

马科夫斯基连水陆地完全不是一条从鄂毕河到叶尼塞河的理想道路，为了战胜这段路程需要 2—3 天。如同目击者所说，必须要“经过大片的泥泞、沼泽地和小河”转运货物，有的地方还铺设了道路：“整个沼泽地泥泞无比……为了这些数不清的烂泥、沼泽和小河，在连水陆地建了大量的桥”，“而在连水陆地的另外一些地方有山，而黑压压的森林随处可见。小河里也有一些清静的地方可以停下来休息”。人们在连水陆地转运货物使用驮载的马匹，甚至是狗，“而越过到处是泥泞和沼泽的连水陆地从来不用四轮大车”（注 6，112 页）。

17 世纪 30 年代起，从鄂毕河经叶洛古依连水陆地去往叶尼塞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从额尔齐斯河口沿鄂毕河向上，然后沿它的支流瓦赫河，再往下到沃洛羌卡河，最后到达长 15 俄里的叶洛古依连水陆地。用两天时间通过连水陆地后就来到了注入叶尼塞河支流叶洛古依河的另一条沃洛羌卡河。首先使用这条路的是去往下通古斯卡河和石泉通古斯卡河开采地和从开采地返回的商人和实业者。这条路缩短了去往叶尼塞斯克下面的地方的距离。重要的还有另一点，它不用绕道就可从纳雷姆、凯茨克（即凯特城堡）和叶尼塞斯克旁边经过，因此就避开了这些行政当局的监管。

一时间，曼加杰亚的督军们对这条路也很感兴趣，他们正试图找到一条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从曼加杰亚到托博尔斯克的道路。很长一段时间，从曼加杰亚转寄的邮件都走这条路。但使用这条路最主要的还是带着“收购的软动产”从下通古斯卡河、石泉通古斯卡河返回的商人以及来自下通古斯卡河开采地的实业者。

因此，在 17 世纪 40 年代时，凯特的督军们就抱怨：“在凯特城堡收不到路人的税和代役租，今后将无从支付凯特军役人员和神父的薪水，凯特城里各种小额的难以预计的数额的支出也无法承担，因为……人们把来自叶尼塞斯克的商人和实业者都从瓦赫河放走了，没有人从凯特城堡经过。”（注 6，114 页）

叶洛古依这条路从未得到官方的允许，甚至在 1702 年时莫斯科当局就注意到，走叶洛古依连水陆地的西伯利亚军役人员沿途同当地居民

交易，也不纳税，还违法携带商人冒充自己的下属。此后官方颁布了不准使用这条路的禁令。然而，就像经常在罗斯发生的那样，禁令成了一纸空文。米勒尔院士证实，在他那个时代（18世纪30年代）托博尔斯克的商人去往图鲁汉斯克仍然走这条路。

此外，实业者为了从鄂毕河去叶尼塞河也走沿鄂毕河支流特姆河这条路，因为特姆河的上游与叶尼塞河的支流瑟姆河的上游紧挨着。18世纪20年代，实业者也从叶尼塞去往苏尔古特。叶尼塞斯克的督军们为了切断这条路甚至被迫在瑟姆河口设了关卡。

实业者们还从苏尔古特经“湖泊和陆路”去往塔兹河上游并在那儿建立了苏尔古特过冬地。说实话，苏尔古特路没有成为实业者和商人的主要道路看来是由于塔兹河流域开采业的枯竭。

17世纪前半叶，从鄂毕河到叶尼塞河的路上出现了许多俄国农村：经马科夫斯基城堡到达叶尼塞地区，再从叶尼塞斯克沿安加拉河和叶尼塞河往下去。1669年凯米城堡和别拉亚城堡建成后，俄国移民开始积极地向凯米河和别拉亚河流域迁徙，移民在那儿找到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优良的牧场和适于建筑用的“红木林”。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口之间、沿安加拉河下游（卡恩草原从这儿一直延伸到南方）和它的支流塔谢耶沃河地区很快就住满了移民。

1623年夏天，叶尼塞的哥萨克波兹杰伊·菲尔索夫下到石泉通古斯卡河河口并在那儿向当地的埃文基人收缴了实物税，然后他沿河向上行驶了几乎500公里，克服了两处大的急流到达了从右边注入它的丘尼亚河。他同住在那儿的埃文基人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最终还是向他们收缴了实物税，然后返回了叶尼塞斯克。他多半是从埃文基人那儿听说，石泉通古斯卡河与分布在东边的其他一些河流不搭界。在石泉通古斯卡河注入叶尼塞河的河口地区没有建重要的据点，可能是因为那儿缺乏能通往下一条西伯利亚大河的连水陆地（注18，272页）。

1623年之前，一队哥萨克对从安加拉河口向上500公里的地段成功地进行了考察。第二年，以贵族子弟安德烈·杜宾斯基和哥萨克首领瓦西里·秋明涅茨为首的一支队伍沿安加拉河向上行驶了几乎1000公里，到达了舍曼斯基石滩。这些考察是沿安加拉河深入到“布拉特人（一个著名的后来以布里亚特人的名义出现的部落）的国家”的最早的

尝试。

1626年夏天，哥萨克首领马克西姆·别尔费里耶夫沿安加拉河同样行驶了这样远的距离，并向当地居民征收了实物税。由于安加拉河的水位下降，他无法越过舍曼斯基石滩，于是回到了叶尼塞斯克。别尔费里耶夫写了一篇名为“故事”的总结，他在里面讲述了自己在征途中收集到的关于“布拉特小块土地”，即布里亚特土地的资料。用他的话说，这块土地人口众多，盛产貂、海狸和牲畜，“贵重的布哈拉商品（即来自中亚细亚、中国和印度的商品——作者注）——印花布、丝织品、丝绸……很多，而银子，他说，也很多，马、牛、羊和维尔布特（骆驼——作者注）不计其数，播种的粮食为大麦和荞麦，布拉特人等着国家的军役人员去他们那儿……他们，这些布拉特人希望向您，伟大的国王，致敬，希望纳税，和军役人员进行交易”（注17，50页）。

第二年，他在巴都斯基石滩（即从去年所达到的边界顺流而上200公里的地方）为布拉特城堡奠基，1631年该城堡又往上挪到了奥卡河口（位于贝加尔湖南岸的西北——译者注）。

特种常备军中尉П. 别盖多夫1628年第一次来到西布里亚特时，先到奥卡河布里亚特人那儿，然后到了乌斯季—乌德布里亚特人那儿，他在那儿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收取了实物税。

1629年夏天，五十人长瓦西里·切尔缅尼科夫带着一支20人的哥萨克队伍来到布里亚特人居住的穿越安加拉高原（在伊尔库茨克州南部，安加拉河与基廉加河之间——译者注）的丘纳河（塔谢耶沃河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组成部分为比留萨河）河谷。队伍沿丘纳河上游到达了北纬56°的地方，于10月初返回了叶尼塞斯克。

然而，由于Я. 赫里普诺夫的部队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哥萨克1629年在布里亚特人的村庄使用暴力，所以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注17，51页）。1634年，布里亚特王公的部队会同从属于他们的通古斯人烧毁了布拉特城堡。1635年从叶尼塞斯克派出的H. 拉杜科夫斯基带领一支100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在奥卡河口修复了城堡，但1638年“布拉特”王公们再次“抗命干出坏事”。不久，通古斯的进贡者就不再追随王公们，于是布里亚特人开始同俄国人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

从安加拉河口往上沿叶尼塞河住着好战的游牧部落，他们得到蒙古

可汗的支持，因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土地并入俄罗斯国家的过程充满了血腥。

17世纪初，俄国人掌握的关于后来出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个地方的信息是相当模糊的。这个地方开始出名是因为用了王公的名字被称作“久尔金国”的缘故，王公的儿子（“久尔金之子”）在1608年的一份文件中曾被提起。俄国人认为它的居民是奥斯恰克人。他们从当地居民那儿了解到，“久尔金之子和他的奥斯恰克人过着向吉尔吉斯人纳税的生活”（注27，13页），也就是向游牧民纳贡。

哥萨克很快就找到了去往久尔金国的道路。他们第一次尝试向它的居民收取实物税是在1607年，当时凯特督军弗拉基米尔·莫尔恰诺夫“为了给国家收实物税把他们派往叶尼塞去找久尔金之子和他们的人”。但这种尝试不成功，因此俄国商人到那儿只是为了贸易。

为了巩固俄国人在久尔金国的地盘，1623年被派往叶尼塞斯克的第一任督军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赫里普诺夫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他派从莫斯科来的临时归他指挥的安德烈·阿努弗里耶维奇·杜宾斯基和一些军役人员“沿叶尼塞河往上去寻找新土地。”这次考察发现，在叶尼塞的“新发现的卡钦国”（现在人们称之为久尔金国），“在荒沟里，有的地方很合适，又高又漂亮，附近各种树林都有，有许多可耕地和干草牧场，国家可以在那些地方建城堡”（注27，17页）。此后，1624年的9月25日，赫里普诺夫往托博尔斯克寄去“一张图纸……给出了在久尔金国可以建城堡的地区和地方”。需要往首都运送叶尼塞的貂皮的安德烈·杜宾斯基带着这张图纸被派往莫斯科。

1625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在莫斯科决定在久尔金国的红色荒地上建城堡。完成沙皇这项使命的重担又落在了那个安德烈·杜宾斯基的肩上。1626年12月13日，“国王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命令：为往卡钦国红色荒地派遣之故，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及其他的西伯利亚城市召集4名哥萨克首领及400名士兵……在叶尼塞河的那块红色荒地上建城堡，国王命令安德烈·杜宾斯基把那些从托博尔斯克新招募的哥萨克首领和士兵派到那个卡钦国，而发给他们的火绳枪，国王指出，从莫斯科调拨。”（注27，18页）

接到沙皇的命令后，在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其他的西伯利亚城

市为考察团只招到了 300 名哥萨克，即以下三类人：6 名五十人长、24 名组长和 270 名普通哥萨克。从莫斯科派人给他们送来了火绳枪，在托博尔斯克给每人装备了半俄磅（1 俄磅等于 409.51 克）的火药和半俄磅铅弹。此外，还给他们发了 206 支梭镖。队伍还配备了攻城的重炮：一杆步兵团的火绳枪（炮）和与之配套的 27 发两俄磅重的圆弹；在叶尼塞斯克又让带上了一支要塞火绳枪及配给的 100 发铁弹。部队为大炮领到了 40 普特的火药和 20 普特（1 普特等于 16.38 公斤）的铅弹。还随身携带了给土著人的礼物：5 俄尺（1 俄尺等于 0.71 米）呢子，17 俄磅的锅装铜，半普特碟装干锡和半普特石头“阿杰古伊”（类似玻璃珠串），还带上了储备粮，播种用的黑麦、燕麦和大麦。为了在叶尼塞斯克制造 10 艘果奇，杜宾斯基还带上了造船用的工具和一套船舶用具。

考察团乘坐 16 艘平底木船和 6 艘小船于 1627 年 6 月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深秋到达马科夫斯基城堡。再通过冬天的道路非常艰难地但成功地把所有的给养转运到了叶尼塞斯克。尼古拉日（12 月 19 日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纪念圣徒显灵者日，圣徒尼古拉被认为是旅行者和航海者的保护神——译者注）刚过，建好的轮船就立刻从那儿沿着开冻的叶尼塞河出发了。“重载的平底船走了 3 个星期到了大石滩，在石滩木船减轻了，人们把储备品从所有的船上倒到了岸边。”在石滩总共“用了两个星期打捞这些木船，捞完后，自己身上剩下的那点衣服已被水泡得破烂不堪”，从石滩到红色荒沟又走了 3 个星期，1628 年 5 月底才到那儿。

在通过这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地方时，哥萨克被迫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所有的落脚点都修建了临时的堡垒。到达预定地点后，他们一登岸就迅速建起了“木板小城”，“把周围一圈地方……用短柱子加固，他们自己从 1 俄里甚至更远的地方把用作短柱子的白桦木扛过来”，然后“把泊船处清理出来”，引导人们从叶尼塞河把短柱子送到城堡。

就这样，考察团给自己提供了防止意外袭击的一定的安全保障，然后军役人员“开始动手搬运作为短柱子用的白桦木，开始建城堡，而另一些人……为了得到建教堂和大房子用的松木和首领伊万·卡尔佐一起（共 160 人）作为前锋乘坐平底木船沿叶尼塞河向上，在红色荒沟上面遇到了森林，采伐了建……城堡、教堂、聚会厅和制作小物件的松木。采伐那些树木用了两个星期，把树木从森林拖到叶尼塞河有 1 俄里

之遥，然后把这 1200 根大块方木扛上并运送到……用白桦木和松木建起了城堡，在城堡周围挖了壕沟”，盖起了教堂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注 27，22 页）修建所有其他的官方设施。

7 月 26 日，当城堡的建设工程尚未完工时，卡钦和阿林的鞑靼人“手拿盾牌，身着铠甲向城堡发动了进攻”。俄国人战胜之后，“卡钦和久尔金的男人们离开那座城堡沿叶尼塞斯克向上往草原去了”。8 月 15 日，杜宾斯基为了追击进攻者派出了一支以伊万·卡尔佐为首的 140 名哥萨克的队伍，他们抓获了许多进攻者。

10 月 15 日，杜宾斯基关于红色城堡（现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建设初步完工的呈文递到了托博尔斯克，该城堡一直到 18 世纪初都是俄国人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主要据点。红色城堡不仅可靠地庇护了北边的领土，而且插入了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王公们的领地之间，阻碍了他们向住满了加入俄国国籍的当地居民的地区和俄国城堡的进攻。

由于所处位置离俄国人已经开发的地方很远，所以在自己存在的最初年代，红色城堡在从叶尼塞斯克给它的军役人员运送粮食方面遇到了困难。新城堡建立两年后，莫斯科当局试图放弃它。幸运的是，这件事没成功。

1629 年，两支哥萨克队伍从这个城堡被派往东方。他们乘小船下到叶尼塞河右边的支流卡恩河（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中部）的河口，然后沿河溯流而上：一支队伍到达中游，第二支队伍到达上游，他们向居住在河两岸的当地居民征收了实物税。

1636 年哥萨克首领米罗斯拉夫·卡尔佐夫征服了卡恩国并在那儿建了城堡，保证了俄国人在卡恩河流域的统治地位，然后又试图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役人员的力量征服布拉特国。与此同时，布拉特人恢复了对卡恩国的袭击。作为回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军役人员于 1645 年出发对布拉特国进行征讨。督军往那儿派出了一支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俄罗斯和鞑靼军役人员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由首领米罗斯拉夫·卡尔佐夫和叶里谢伊·久缅佐夫指挥的 330 名军人。8 月 4 日这些首领让两个最强大的布拉特王公奥兰和诺姆恰的部队遭受了彻底的失败。战斗中有 70 名布拉特人被打死，诺姆恰本人和奥兰的两个儿子也阵亡了。奥兰和另外三个儿子逃跑获救，他的妻子和战斗中受伤的儿子伊杰恩及

妻子被俘。1647年奥兰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留下来当了人质，督军 П. И. 普罗塔西耶夫为此释放了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7月26日督军准许首领叶里谢伊·久缅佐夫带着哥萨克步兵及布拉特人到乌德河去建城堡，“以保障他们，布拉特人，避免不安分的国家的骚扰，避免战争，还为了……实物税”（注27，43页）。这个城堡被称作乌金斯克城堡。

但奥兰的投诚并不彻底。布拉特王公们继续同俄国人作战。奥兰本人于1651年突然带着自己的部落从乌金斯克城堡附近迁到了遥远的游牧地。1652年安德烈·布尼亚科夫派遣俄国和鞑靼的军役人员进攻暴动的王公们。布里亚特人被击溃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了俘虏。1653年造反的王公们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俄国人的政权得以继续向东北方扩展。

事实很清楚，单靠暴力和“残忍”让布拉特人按时交纳实物税是不可能的。应当剿“抚”并用，安抚用“薪水”来体现，也就是给最好的人以物质奖励、让他们用恭顺换取一顿酒宴。按习惯做法，由官家用一餐丰盛的酒食款待把实物税交到城堡来到纳税人。

督军们在许多场合下被迫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保证当地部落的服从。有这样一件事是非常典型的：1648年军役人员安德烈·索罗金在阿林人中散布谣言，说“国王威胁要杀死所有的阿林人（从种群上说，是卡钦人组成部分中哈卡斯人的一支，分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北边——译者注）和卡钦人（叶尼塞省、卡钦草原、米努辛斯克县的突厥部落——译者注）”。督军米哈伊尔·杜尔诺沃把阿林和卡钦王公们所控制的村庄里的最优秀的人召集起来，把安德烈·索罗金带到众人面前“揭发”，当着所有的人揭露这个“叛徒”。然后他正式宣布，“国王对鞑靼人一如既往，没有任何仇视”，对索罗金进行了刑讯和鞭笞。结束时，督军用酒食款待了王公们，使其很有面子地离去（注27，58页）。

督军们积极地吸引鞑靼人为沙皇服务，例如督军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卡拉梅舍夫就迎合鞑靼人的愿望，由当局选出50名最优秀的人，吩咐他们“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军役人员一起在骑兵服役，去为国家服务，去完成任何的派遣，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守卫”（注27，66

页)，其他一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督军也是这样做的。

总的来说，任何一个自愿受洗的当地人都有权为沙皇服务，因此依靠这些新入教的人不断有人加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役人员的队伍，人数不多，但却是经常性的。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军役人员积极支持城市近郊的鞑靼人为沙皇服务的意愿。“只是国王关照——他们在莫斯科宣称——不要免除他们的国家实物税，而是用发放国家薪水的方式赏赐那些王公们和村庄里最好的人……今后不希望他们有任何的造反举动，他们同军役人员一起为国家服务会得到最大的帮助；将来出了任何差错，不仅不免除国家实物税并且不给他们发放国家薪水，因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有许多不安分的地方。”（注 27，65 页）

政府接受了合理的建议，允许鞑靼人服役并给供职的鞑靼人付薪酬，尤其是当吉尔吉斯部落和准噶尔人的队伍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地发动进攻时，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1604 年，在鄂毕河右边的支流托木河上建起托木斯克之后，又有一条从鄂毕河流域到叶尼塞河的道路被托木斯克的军役人员查明。托木斯克的哥萨克沿着丘雷姆河（鄂毕河右边的支流）和它的支流盖姆丘克河出发到达了这条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连水陆地（后来人们把它称作盖姆丘克连水陆地）。沿着这条路他们来到叶尼塞河时已是 1609 年了，然后又沿它的河谷向上行驶了 300 公里。在被他们发现的一条不大的河流杜巴河（卡泽尔和阿梅尔两条河融合而成，叶尼塞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流域，他们向当地居民征收了实物税。但不久，这些突厥语系的当地部落又脱离了俄罗斯。不过，托木斯克的哥萨克搜集到了自己城堡南部和东部地区的信息以及这个地区不同种族居住的村落的信息。

在 1616 年托木斯克军役人员的呈文中有一张居住在托木斯克南部和东部的各民族的名单，其中提到了“黑卡尔马基人和白卡尔马基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叶尼塞的吉尔吉斯人——作者注）、马德人、布拉特人（布里亚特人——作者注）、萨彦人、杜宾人……巴卡萨雷人、基泽雷人（基泽列茨人——作者注）”（注 18，264 页）（叶尼塞的吉尔吉斯人、巴卡萨雷人和基泽列茨人——这些突厥语系的部落，组

成了后来的哈卡斯民族——作者注)。

居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南边叶尼塞河流域的当地居民并入俄罗斯国家的过程延续了好多年。在 17 世纪末之前，俄国人被迫同吉尔吉斯王公们发生冲突，而后者得到了蒙古西部的蒙古和准噶尔可汗的帮助和支持。到 1640 年为止，强大的布里亚特王公奥兰不止一次地侵入卡恩河流域。俄罗斯军役人员必须保护俄国农民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免受敌人的掠夺性侵扰。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堡建成之后，吉尔吉斯部队大约每年都袭击它的郊区，还不止一次地围困城堡，杀死和俘虏周围的居民。只是到了 1642 年，以 H. 都哈乔夫斯基为首的托木斯克军役人员和 M. 卡尔佐夫、C. 卡洛夫斯基率领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才在白尤斯河（丘雷姆河的支流）那边的一次战斗中使吉尔吉斯王公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结果，一些不大的突厥人部落（阿林人和卡钦人）最终融入了俄罗斯国家。

1636—1637 年卡恩城堡建成之后，俄国军役人员在卡恩河谷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巩固。1645 年 8 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首领 M. 卡尔佐夫和 E. 久缅采夫的队伍会同阿林、卡钦和卡恩村的民间武装对东方进行了三个星期艰难的讨伐（已经提到过这件事），使布里亚特王公奥兰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迫使其宣誓效忠俄罗斯国家——给出了“永久效忠的誓言”。

1657 年，一名蒙古额尔德恩·可汗（蒙古人的分支霍朵霍伊人王公的西伯利亚诨号，也作“金沙皇”——译者注）拉乌扎恩尝试侵占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库兹涅茨克和托木斯克，对俄国边界地区的城堡和村镇实施了毁灭性的袭击，只是由于其父的死亡和准噶尔可汗的威胁才迫使他退却。额尔德恩·可汗衰落之后，将吉尔吉斯和图宾（图瓦）王公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准噶尔可汗成为俄国人在叶尼塞河上游最危险的敌人。

莫斯科当局认识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敌对的游牧民占领的危险，所以不止一次地采取措施加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防卫。1660 年命令托博尔斯克的督军们在托博尔斯克这一级别的城市里招募合适的有家室的军役人员，将其“紧急”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永久定居”。被

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永久定居”的还有首领、两个中尉及180名军役人员组成的骑兵和步兵（注27，69页）。还从托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派来了部队以临时加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防御。

1660年，吉尔吉斯王公们在准噶尔可汗的支持下又恢复了对俄国城堡、接受了俄国国籍的当地部落所在村镇的掠夺性袭击。在这些掠夺性袭击中最积极的是1620—1640年同俄国人作战的领导人之一伊舍雅的儿子叶列尼亚克。

1667年，叶列尼亚克和准噶尔可汗的队伍包围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但被击退了。1679年他们再次围住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要塞。当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准噶尔可汗的队伍包围着，而周围的村庄在燃烧，情形几乎是无可挽回了，军役人员于是自作主张将被流放的乌克兰上校瓦西里·姆诺加戈列什内伊从监狱里放出，他是因被怀疑有分离主义倾向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

人们委任他指挥城市的防御战。他向“国王的叛徒们”进攻，“作战勇猛，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亲自指挥城市保卫者用大炮进行轰击：“给炮手下命令，教给怎样瞄准，自己也瞄准。”当危险过去之后，他因作战有功得到了贵族子弟的称号和一大笔报酬。而1692年，姆诺加戈列什内伊是讨伐图宾王公山德科的指挥官，这次讨伐以彻底击溃敌人而告终（注27，64页）。

1673年，吉尔吉斯的部队到达凯米河上的别里斯城堡，但在那儿被以A.克列奥比内伊为首的英勇自卫的哥萨克击退。1677—1678年，图宾人的突厥部落联盟队伍占领了卡恩城堡，而后又围住了塔谢耶沃城堡。

1680—1682年，托木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部队完成了对南方的征讨。但直到1692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部队（由750名士兵组成，其中有182名来自农民和城郊居民中的志愿者以及87名来自当地部落的志愿者）才在瓦西里·姆诺加戈列什内伊的指挥下击溃了进攻卡恩国的图宾王公们的队伍。

1701年，一支由728名士兵组成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队伍在C.萨姆索诺夫的指挥下向南进攻到达了阿巴坎河口，在那儿同吉尔吉斯人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库兹涅茨克和托木斯克的队伍也完成了对草原的讨

伐。因为准噶尔可汗在同满洲人的斗争中遭受了重大失败，所以吉尔吉斯王公们失去了他们的支持。最后，准噶尔统治者带领一部分来自阿巴坎草原的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去了伊犁河谷，其余的后来成为哈卡斯民族主干的当地居民接受了俄国国籍。

而阿巴坎城堡（1707）和萨彦城堡（1709）的建立、1707年米努辛斯克在图宾领土上的建成使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的俄国人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有了彻底的保障。在结束关于沿叶尼塞河上游的国家并入俄罗斯的讲述时应当指出，尽管住在这个地区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到1710年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已有8万居民了（注17，45、46页）。

荷兰商人和外交家伊萨克·马萨因商务和外交事务于1601—1609年曾在莫斯科居住，他于1612年根据显然是俄国的资料出版了一幅不晚于1609年的西伯利亚地图。关于使用俄国资料这件事他并不否认，他说，他是从喀山院（俄国地区性衙门，它是在征服喀山以后成立的，负责管理以前的喀山王国、阿斯特拉罕王国和西伯利亚王国——译者注）的一名秘书或秘书助手处弄到这幅“俄罗斯北部、萨莫耶德人和通古斯人的国家的地图的”，他把地图的俄国称谓改成荷兰文后在自己的祖国出版了它（注10，83页）。

伊萨克·马萨的地图和通报明显地证实，17世纪前10年俄国人已经了解叶尼塞河口、叶尼塞湾和泰梅尔半岛至少到皮亚西纳河（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长818公里，流域面积182平方公里）口的西南沿岸地区。伊萨克·马萨宣称，在“动乱时代”根据西伯利亚督军的命令进行了两次勘探性考察：一次是为了调查叶尼塞东部的领土不晚于1604年进行的陆地考察。很可能是这样的，这次出征的参与者从曼加杰亚出发到达图鲁汉河口，然后越过叶尼塞河到达它的下游，再沿平原到皮亚西纳河，开启了认识西泰梅尔之门。陆地考察的参与者抵达了山区（高耸于平原之上的普托拉纳高原的西北部），在所搜集到的多金属矿中发现了银矿。

第二次考察大约是1605年春天进行的，它的发现得到了伊萨克·马萨地图资料的证实。考察团乘果奇从鄂毕河口出发到达鄂毕湾，再从湾口往北出海。“一个叫卢卡的首领”主持了考察。据某些资料，他是

莫斯科的客人（殷实的商人）。果奇在海上拐向东方，虽经过格达湾，但没发现它，然后海员们在进入叶尼塞湾的地方看见了两个不知名的岛屿（后来人们给它们起名为奥列尼岛和西比亚科夫岛）。

根据伊萨克·马萨的通报，卢卡的果奇进入叶尼塞河口后往东沿泰梅尔半岛西岸到达别依西德（皮亚西纳）河口。海上考察队的任务是“仔细研究海岸和岸上所有他们认为值得研究的东西。他们完成了命令他们所做的事”。

两支队伍在叶尼塞河口会合了。海上考察队的头目卢卡和部分海员在这次出征时死亡（看来，他们死于坏血病）。考察队返回后，西伯利亚督军前往莫斯科并带去了关于考察结果的报告。“他的报告，伊萨克·马萨说，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保存在莫斯科国家的宝库里，可能以后对其进行研究。但我们担心，在此之前它就会丢失，那的确将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旅行者找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罕见的岛屿、河流、鸟、野兽——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叶尼塞的范围。”

报告的确失踪了，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考虑到20世纪时对泰梅尔西南沿岸进行过地质学方面的仔细勘查，而且没有发现银矿，那么可以得出结论：17世纪初的探矿员出了差错，但俄国人在遥远的年代对这片海岸进行过考察这个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注18，265、266页）。

国内著名的极地研究学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B. Ю. 维泽援引了几段另一个版本的伊萨克·马萨关于卢卡出航的通报：“西伯利亚的总督发出了命令，要求制造几艘带甲板的轮船，春天沿鄂毕河出海顺海岸前往叶尼塞河，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沿叶尼塞河航行。同时他派了几个人从陆路走，命令他们待在河岸上，直到他们发现这些船只……”

“那些走海路的人被告知，只要映入他们眼帘的东西就要仔细地考察。同时，一个叫卢卡的人被派作他们的首领，上面命令他把途中所见到的一切都画下来。他们抵达了上述河口并在那儿相互碰了面，就是走陆路的同乘船沿河下行的人见了面……到达西伯利亚后，他们把所有这一切向总督作了详细的汇报，总督把汇报写成书面报告寄给莫斯科的沙皇。这个报告藏在莫斯科的宝库里，直到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应当对报告进行研究，因为里面包含了对在叶尼塞流域所遇见的岛屿、河流、鸟和动物的描述。”（注28，46页）我们看到，B. Ю. 维泽证实了马萨关

于俄国人在 17 世纪初对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河口之间以及鄂毕湾和叶尼塞湾之间的海岸进行了考察的真实性。

根据曼加杰亚督军最早的实物税手册的记载，1607 年图鲁汉斯克城堡建立之后，曼加杰亚的军役人员马上就通过叶尼塞河右边的支流汉泰河地区和在离叶尼塞河口不远的地方注入叶尼塞湾（按现今的地图应是注入东边的哈坦加湾——译者注）的大赫塔河地区来到叶尼塞河口。他们向这些地区生活在氏族制度下的艾涅茨人征收了实物税。

在汉泰河上修建了汉泰过冬地。实业者沿着叶尼塞河右边的支流库列伊卡河（它的河口在图鲁汉斯克下面总共 70 公里的地方）和托古伊河（汉泰河的组成部分之一，按雅库特语即科图伊河）来到汉泰河流域。汉泰河首次被提及是在 1611 年实物税手册的名录中（注 10，128 页）。

曼加杰亚的哥萨克和实业者从大赫塔河流域渗透到了皮亚西纳河谷和艾涅茨人在此游牧的皮亚西纳冻土带，并发现了很久之后开始被称作“皮亚西诺湖”的皮亚西纳河一湖（皮亚西纳河注入皮亚西诺湖，因此有该称呼——译者注）的源头。

我们所得到的最早的关于实业者和商人沿叶尼塞湾和泰梅尔沿岸地区航行到皮亚西纳河口的俄国通报是 1610 年的。这一年的 6 月，以康德拉季·库罗奇金和奥西普·舍普诺夫为首的德维纳商人乘坐在图鲁汉斯克建造的轮船来到叶尼塞河口以便继续往东方去。他们好长时间都无法从海湾出海。“叶尼塞河口，库罗奇金讲述道，布满了海冰，而冰层早就存在，任何时候都不消失，厚度有 30 俄丈（1 俄丈等于 2.134 米）左右或更多（大约 60 米——作者注）。”（注 22，1015 页）

库罗奇金第一个指出建立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叶尼塞河口的海上直达通道的可能性。此外，他还考察了叶尼塞河下游的通航条件，搜集了这个地区以及从图鲁汉斯克往南，叶尼塞沿岸泰加森林地区大自然的资料。关于这件事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从叶尼塞河下到海湾，那个北冰洋的海湾，德国人就是乘船经此海湾从自己国家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而叶尼塞河很深，大型船只可以从海上进入叶尼塞河，河很适合通航，有森林、黑森林（阔叶林——作者注）和可耕地，那条河里的鱼就像伏尔加河里的鱼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那条河上住了许

多人。”

8月初，在等待冰面状况改善等了5个星期后，海湾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把冰从海湾吹到了海上。库罗奇金和舍普诺夫的果奇出海后沿泰梅尔海岸向东北方驶去。经过了两天夜的航行，船到达了皮亚西纳河。到17世纪20年代，俄国实业者在皮亚西纳河牢固地站住了脚。他们还沿大赫塔河建了几个实业者过冬地，而将近1626年时，人们就提到了皮亚西纳河上的实业者过冬地——奥尔洛夫小城（注10，129页；注18，266页）。

毫无疑问，实业者继续考察了泰梅尔沿岸地区并发现了后来以俄罗斯水兵哈里顿·拉普捷夫命名的约300公里的海岸，是哈里顿·拉普捷夫在1739—1742年间记录了亚洲大陆最北边的这个半岛。

1940—1941年间，苏联地质水文考察团乘坐“北方号”轮船在泰梅尔东北沿岸附近法捷伊（俄国航海家，1778—1852——译者注）群岛北边的岛上发现了小船的残骸、古代的东西，其中包括火绳枪、子弹、散弹、铜锅、锡盘、贴身十字架、耳环、宝石戒指、衣服残片和俄国式的鞋、猛犸骨棋子，以及不晚于1617年的俄国模压银币。在那个地区西姆斯海湾的岸边，地质水文家找到了三具人的遗骸、农舍的废墟、文件——颁赐的特权书状的碎片、大量的个人物品，其中有两把刻有名字的刀，一大团银狐和貂的毛，航海仪器——日晷和罗盘，古老的俄罗斯硬币。根据刻在刀柄上的题词甚至成功地查明了刀的主人的名字：这就是阿卡基·姆拉缅茨和伊万·姆拉缅茨，也就是来自罗斯那个地方的人，据传说，那儿诞生了古俄罗斯壮士歌中的勇士伊利亚·姆拉缅茨。

按照许多研究者的意见，所找到的物件证明，大约由10名商人和实业者组成的考察团可能在17世纪前25年（在1617—1625年）就曾乘坐一艘果奇从西边经过了亚洲大陆最北边的角（后来人们为了纪念1742年把泰梅尔岸边这个地段标在地图上的俄国极地研究者谢苗·伊万诺维奇·切柳斯金，将其称为切柳斯金角）。

考察团在这个海角东南大约54米里亚（1米里亚等于7俄里）的地方停下来过冬并用漂木在西姆斯海湾的岸边建造了小木屋。至少有3个人在过冬期间死去。夏天一部分过冬者乘小船驶往法捷伊群岛北边的

岛屿（西姆斯海湾的东边），他们多半也没活下来。

国内极地地理学家 B. A. 托洛茨基于 1971 年夏天进行考古挖掘时发现了 17 世纪的文献，然后对其作了分析。1975 年他据此对在泰梅尔找到的物质残片的来历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找到的物件属于一个考察团，他们于 17 世纪 40 年代乘两艘果奇带着从勒拿河流域收缴的毛皮货出海往西去。在泰梅尔东北岸附近两艘果奇先后遇难，幸存的海员去了南方，企图找到有人烟的地方。在西姆斯海湾岸边找到的一个完整的仓库里的许多毛皮成为支持这种假说的证据；另外，在找到的东西中没有用来大规模交换毛皮或者保障实业者过冬的物件。在 17 世纪的书籍和文献中，经常提到载有毛皮货——“毛皮官款”的船驶往勒拿河河口的事情，这些货物是从科雷马河、因迪吉尔卡河、亚纳河河口和其他一些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河流地区收缴的。

荷兰地理学家尼古拉·威特森在自己的著作《北鞑靼和东鞑靼》中记述了 17 世纪时俄国人从东方去往泰梅尔的航行。

依我们看，B. A. 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比前面提到的更有说服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泰梅尔的发现都可以证实：俄国的商人和实业者在 17 世纪前 30 年乘坐海船在最艰险的冰冻条件下在一些北极地区进行过英勇的航行，此前还没有任何船只到过这些地区（注 18，268 页）。

## 西伯利亚大河勒拿河和它的 支流是怎样被发现的

虽然永久的冰雪覆盖了北地，  
那儿的北风之神用冻结的翅膀吹倒了你的旗帜，  
但冰山之神壮美而奇异：  
在那儿，洁净的勒拿河像尼罗河一样，  
把各民族连接在一起，  
像辽阔的大海，  
最终无边无际。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住在下通古斯卡河的埃文基—布里亚什人（在埃文基语中，布里亚什为流浪汉和敌人之意，可能是邻居对他们的称呼。其居住地在维柳伊河的源头，伊利姆别伊河注入下通古斯卡河的地区，17世纪时约800人——译者注）为了用毛皮交换俄国的工业品经常造访图鲁汉斯克。据他们说，从叶尼塞河右边这条巨大的支流的上游往东流淌着另一条大河叶留叶耐河，那儿住着不同的民族。这是最早的不甚准确的关于雅库特人的信息。在埃文基语中，这条河的名称意味着“大河”，“一条适合多种经营的富裕的河流”。哥萨克和实业者开始把它叫作勒拿河（注18，269页）。

在发现勒拿河这件事上，实业者宾达（冰达）起了重要作用。宾达《故事集》的原本，甚至拷贝都没保存下来。100多年后，1733—1743年间俄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大型的科学院北方考察团，这支队伍的参与者、院士、历史学家基拉尔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尔和自然科学家

约翰·格尔克·葛麦林在叶尼塞边区和雅库特讯问最早的新土地发现者——曼加杰亚和叶尼塞的哥萨克与实业者的直系后裔时搜集到了关于这位先驱者和他沿勒拿河漫游的信息。

他们成功地查明，宾达是 1619 年前后出现在曼加杰亚实业者——“古俄的流浪人（不属于任何社会阶层的人）”中间的。“冰达”（宾达）——这是个外号。按历史学家 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的说法，这个单词指的是德国鹿皮上衣（一种用鹿皮做的里面是各种颜色的貂毛的不开衩的衣服）下摆边上镶的毛皮。这些历史学家认为，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伟大的新土地发现者多半叫作捷米特·索佛诺维奇（注 18，268 页）。

宾达从叶尼塞斯克城堡来到曼加杰亚，在组织了一个 40 名实业者的劳动组合后，同他们一起去了“开采地”，也就是为了猎取毛皮并用其换商品去了图鲁汉斯克。1620 年，宾达带领自己的实业者劳动组合乘小船沿下通古斯卡河溯流而上。

下面我们将引用约翰·格尔克·葛麦林院士日记中的一些片段，里面谈到了他们在雅库茨克和雅库特进行的考察，学者特别讲述了激发宾达完成自己这次非同寻常的旅行的动机：“现在我可以完成这本书了。但因为我还没从雅库茨克返回，所以应当回到往这儿来时已经走过的那条路。在这件事情上，一个俄国的企业家应当对我有所帮助（就像世代相传的有关曼加杰亚的哥萨克的口述故事所说的），就是他由此第一个发现了雅库特这个地方。”

宾达，一个俄国的流浪人，想同 40 名部分从俄罗斯、部分从西伯利亚召集来的人在西伯利亚寻找自己的幸福，因为他听说了许多关于开拓疆土的故事，并且他也想同另外一些成了大事、为人称道的人一样声名远扬。

他来到叶尼塞河，沿河往下走到曼加杰亚（看来，这儿说的是新曼加杰亚，即图鲁汉斯克——作者注）。他在那儿听说，往上不远处注入它（叶尼塞河）的下通古斯卡河地区住满了异族人，在河的源头对面有另一条非常大的河，沿河也住着许多民族。不久，他决定循河上行，对整个地区进行探索。

他为此给自己准备了所需的船只，但第一个夏天，他出行的距离没

有超出下卡乔马河地区。随后，通古斯人用砍倒在河上的许多大树挡住了他的去路，不允许他来这儿。

这样一来，他应当下决心就在那个地方过冬，为此，他给自己建造了供居住的茅舍，这个茅舍被冠以下宾达过冬地的名称直到现在还为人所知（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宾达在下通古斯卡河左边的支流伊利姆别伊河河口上面的石滩处遇到的漂木阻塞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俄国人以为这是通古斯人所为。在石滩上面不远处建成的过冬地 18 世纪中叶还被当地居民称作下宾达过冬地——作者注）（注 18，270 页）。然而，甚至茅舍也无法阻止通古斯人，他们经常向茅舍发动攻击。但宾达就像他希望的那样，常常用装备的枪炮不费力地就把他们赶了回去，因为他们除了弓箭一无所有。

第二年夏天，他再次出航。但去年冬天通古斯人被他驱赶得又往西了，他们对他的力量了解得越清楚，那么他们就越认为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更坚决地阻止他，使他不能更接近他们，成为他们的全权主人。他们就这样折磨他，使他一个夏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达卡乔马河中部，他只好又停下来建起了茅舍，在里面住了一个冬天。茅舍被冠以上宾达过冬地为人所熟知（这个过冬地位于卡乔马河中部稍往下一点儿的地方——在北纬  $62^{\circ}$ ，从下宾达过冬地沿河往上总共只有几十公里——作者注）。

通古斯人发现，他们无论在水上，也无论在他的茅舍处都奈何他不得。当他第三个夏天再次出发往上去时，他们让他平静地待在自己冬天的营地，一点也没干扰他（他从上宾达过冬地上行几百公里，到达北纬  $58^{\circ}$ ——作者注）。

他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就抵达了下通古斯卡河地区，切丘伊州或者说勒拿河上通古斯卡河与切丘伊城堡（自然，这个城堡当时还不存在，它是由俄国哥萨克于 17 世纪 30 年代建成的——作者注）之间的区域就是由此发端的。看来，他就是从这儿，或者通过机灵的探子，或者通过另外的人得到了一些安全的信息，因为自从他踏上陆路的旅程就担忧安全问题（也就是决定经过切丘伊连水陆地去往勒拿河——约 20 公里的路程——作者注）。

然而他并不知道，通古斯人聚集了他们所有的力量，给了他可能给

予的强烈的抵抗，迫使他在位于那个地段的尤利耶夫山中建起了过冬的茅舍，他应当在里面等待冬天他所面临的自己的命运的降临……

就这样，他在第四个春天来到了勒拿河（现在的基廉斯克市的下面——作者注）。他刚把必要的船只建好就沿勒拿河往下去往雅库茨克市所在的地区（该市是9年后宾达和同伙去往勒拿河后建成的，在那儿宾达遇见了雅库特人，对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民族——作者注）。

然后，他应当从那儿返回，沿勒拿河向上到上林斯克（就是说他航行到了那个可以乘轻便船到达之处——北纬 $54^{\circ}$ ——作者注），而从那儿过（住满布拉特—布里亚特牧民的——作者注）草原到安加拉河，沿着它、沿着通古斯卡河（上通古斯卡河，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下安加拉河——作者注）到达叶尼塞斯克，他在那儿把自己的发现编成了一本书面通报并据此提出了向上述区域移民的根据。

И. П. 马基多维奇和 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如果宾达和他的同伙1623年秋天到了安加拉河（可能接近乌达河口），那么他们就有时间造一些轻型船只并在冰冻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开始航行。因为安加拉河上游结冰晚，通常是在12月的下半月。在安加拉河的弯曲处，在奥卡河一条大的支流河河口的下面，实业者可从一些大巴都（石滩）旁经过，石滩过后，水流开始平稳，河流往西急转奔叶尼塞河去了。

Г. Ф. 米勒尔院士在自己的著作《西伯利亚史》中也写到了宾达（或冰达），对葛麦林的故事作了一些细节上的补充。比如他指出，宾达和他的同伴利用冬季在茅舍居住这段时间去猎貂。他们不必清除河上（就像他们认为的）心怀敌意的通古斯人设置的障碍物，因为春汛随便就把这些东西冲走了。米勒尔准确地说，在沿勒拿河向上出征时，宾达到达了库廉卡河（位于伊尔库茨克州、上林斯克地区，勒拿河西边的支流——译者注）口，从那儿越过草原到达安加拉河。就是在那儿，宾达结束了自己从图鲁汉斯克开始的多年的、卓越的旅行（注11，170—173页）。

苏联地理协会主席列夫·谢苗诺维奇·别尔克对宾达远征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评价。1927年他写道：“这次旅行的确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地理功勋。”（注11，169页）真的，让我们深思一下能够表现宾达（冰

达)和他的同伴作为的数字吧!在3年半的时间里,他们走过了大约8000公里的新水路,奠定了俄国人发现东西伯利亚的开端。宾达考察了下通古斯卡河长约2300公里的一块地段并查明,它的上游和勒拿河的上游是彼此接近的,而不久后,俄国哥萨克和实业者就经过他发现的切丘伊连水陆地开始深入到了勒拿河。他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沿勒拿河上下走了大约4000公里并仔细考察了2500公里的一段流域。宾达第一个向俄国人指出了一条从勒拿河上游到安加拉河的方便之路,他还考察了从安加拉河口起几乎1400公里的地段。他证实,安加拉河与上通古斯卡河是同一条河流(注18,271页)。

总的来说,的确不清楚,哥萨克和实业者中谁是第一个深入到伟大的西伯利亚河流的。历史学博士M.И.别洛夫通报了以格里高利·谢苗诺夫为首的常备军和实业者队伍1622年从曼加杰亚出发沿下通古斯卡河的出征。出征持续的时间很长,并且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只是过了3年,在克服了急流和浅滩后,队伍才到达下通古斯卡河的源头。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谢苗诺夫被迫返回。只有实业者马特维·巴尔芬奇耶夫和伊格纳季·哈涅普捷克决定继续东进。他们成功地到达了勒拿河中部游牧的什里亚基尔人(属于通古斯部落)那儿。另外一些早期出征勒拿河的人也很有名。在巴尔芬奇耶夫之前,曼加杰亚的实业者伊万·左林和西多尔·瓦佳尼科夫就尝试在勒拿河中游建立自己的貂皮开采地。在那些年里,实业者弗拉基米尔·西施科也到了那儿(注14,388、389页)。

军役人员和实业者往勒拿河的进一步渗透沿着两条道路进行:北路经下通古斯卡河,南路经上通古斯卡河。1628年,一支30人的哥萨克部队在安东·多勃雷斯基和马尔德·瓦西里耶夫率领下以实业者阿里姆普·捷奥菲洛夫·鲁巴奇科为向导从下通古斯卡河向乔纳河和维柳伊河进发,深入到了勒拿河和阿尔丹河,向许多通古斯和雅库特部族的人收取了实物税,在损失了15个人后于1632年回到了托博尔斯克。

1629年应实业者的请求,一支由托博尔斯克、别廖佐沃和曼加杰亚的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在162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立陶宛囚波兰人”萨姆松·纳瓦茨基的带领下到达下通古斯卡河以保护他们抵抗不允许外来人染指貂皮经营地的“外国人”。这支队伍应当“到达某个实

业者希望去的地区——开采地”，“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要给实业者提供防御”（注6，151页）。

下通古斯卡河上游开始并入俄国，通往勒拿河流域的连水陆地通道也开始处于俄国人的掌控之下。1630年又有几组哥萨克沿维柳伊河和勒拿河来到此地，他们在这儿建了一些小城堡和过冬地。就在这些小城堡和过冬地的周围，步安东·多勃雷斯基和马尔德·瓦西里耶夫的后尘急急忙忙赶到勒拿河流域的商人和实业者也建起了过冬地。

1633年，一支以沃因·沙霍夫为首的38人的托博尔斯克的哥萨克队伍抱着与萨姆松·纳瓦茨基考察团同样的目的开到了乔纳河、维柳伊河和勒拿河。这支队伍在6年期间在维柳伊河边区建立了不少过冬地，向通古斯和雅库特部落收取了实物税，向俄国实业者收取了所获“软动产”的什一税（注2，28页）。

根据萨姆松·纳瓦茨基、安东·多勃雷斯基和马尔德·瓦西里耶夫远征参与者提供的资料和向埃文基人的询问，曼加杰亚督军A.Ф.巴里津在返回莫斯科后写了一份有关通往“大河”勒拿河的报告，并附上了对它的描述和路线图，于1633年将其转交给了喀山院。

督军在自己的方案中建议把俄国的领地扩展到遥远的东方、“太阳升起的东方、亚历山大大帝通道、超高的卡拉库尔丘陵，”扩展到“住有独脚人和独手人的地方”（注6，151页）（中世纪时人们认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出征印度时到了中国和东海，就是到了世界尽头——作者注）（亚历山大生于公元前356年，卒于前323年，马其顿国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译者注）。

北边这条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的道路也很不一般。哥萨克和实业者沿着下通古斯卡河西边的支流捷捷亚河奔赴它的上游，然后春天时用2天、夏天时用5天通过连水陆地去往注入维柳伊河的支流乔纳河的丘尔卡河。顺丘尔卡河下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河很小，不适合行船，只有春天雪化了，大河才存在”。路从丘尔卡河往乔纳河延伸，从那儿到达勒拿河的支流维柳伊河（注6，124页）。

俄国人在南方更加积极地向勒拿河流域渗透。1628年，叶尼塞的军役人员瓦西里·布加尔开始了3年的远征，期间发现了从叶尼塞流域出发到那儿的最南边的道路。B.布加尔和10名哥萨克经过居住有尚武

精神的布里亚特部落的奥卡河河口后，沿安加拉河右边的支流伊利姆河和它的支流伊基尔马河向上到达了它接近库塔河（勒拿河左边的支流）之处。然后他越过不高的分水岭来到库塔河，沿河而下到达勒拿河上游，再沿勒拿河往下到达它右边的支流恰亚河口（北纬 58.12°）。

此前一年，叶尼塞的哥萨克马克西姆·别尔费里耶夫抵达安加拉河，他是被派去向住在那儿的布里亚特人征收实物税的。1628 年春天他返回叶尼塞斯克后及时提醒 B. 布加尔同“不安分的”布里亚特人打交道的危险性。

沿途有来自另一支队伍 30 名哥萨克加入到布加尔的行列中，他们是被叶尼塞督军指派沿伊利姆河去往勒拿河的。布加尔成功地同加入到他队伍中的军役人员达成了关于分配收缴的实物税和通过狩猎、贸易获取毛皮的协议。为了今后能在勒拿河上游定期收缴实物税，布加尔建立了两个过冬地：一个在勒拿河右边的支流基廉加河河口，另一个在沿河向上的库塔河口。他在第一个过冬地留下了 4 个“执勤人员”，在第二个过冬地留下了 2 个“执勤人员”后，于 1630 年返回了叶尼塞斯克。后来在这些据点建立了基廉斯克城堡和乌斯季库特城堡（注 2，28、29 页）。

这时，为了进一步向勒拿河推进，在通往这条河的连水陆地附近建起了一个重要的据点——伊利姆城堡。根据历史学博士 M. И. 别洛夫的说法，看来，城堡建成的时间比先前人们以为的 1630 年稍微早一些。他写道，关于勒拿河的资料奠定了叶尼塞督军办公厅编纂的土地“目录”的基础，这份目录是根据叶尼塞督军 С. И. 沙霍夫斯基的命令由办公厅依据到 17 世纪 20 年代末为止收集到的关于去往勒拿河的水路和陆路（骑马）的可信资料以及当地居民的资料编成的。早在 1629 年夏天办公厅的人们就知道“勒拿河通过自己的河口注入大海”。就是说，叶尼塞的军役人员还在 1629 年之前就到过叶尼塞河下游。

“目录”中指出了两条去往勒拿河的路线：从安加拉河东边的支流奥日河出发走陆路（骑马须两天）；“从左边走连水陆地到库塔河”。“目录”中关于库塔或伊利姆连水陆地是这样说的，从伊利姆河用 4 天时间越过连水陆地，然后沿库塔河下行到勒拿河。叶尼塞的军役人员在那儿，在伊利姆河“有可耕地之处和靠近合适的居民区的地方”建起

了过冬地。历史学博士 М. И. 别洛夫由此得出结论，“伊利姆过冬地的建立比此前人们认为的时间更早”（1629 年夏天之前）（注 10，141—142 页）。

1629 年夏天，叶尼塞督军 С. И. 沙霍夫斯基派遣哥萨克首领伊万·卡尔金率领一支 33 人的哥萨克队伍去往伊利姆河为“国家收取实物税和送去监狱的给养”。卡尔金还考察了勒拿河连水陆地与分水岭处的行船小河（位于伊利姆河和库塔河之间）并且发现了从伊利姆河到库塔河的更近的道路。他就在伊利姆河那个地方——伊基尔马河口上面建立了（或者说，如果按照 М. И. 别洛夫的说法，扩建和巩固了）过冬地，河船可以航行至此。这个过冬地开始被称作勒拿河连水陆地，而后来改为伊利姆斯克（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西北部——译者注）。

随着时间的转移，伊利姆城堡成了实业者重要的宿营地和贸易点。1639 年那儿就建成了带库房的市場，“库房用来存放他们的储备粮和用以交易的俄国商品”，但按照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С. В. 巴赫鲁申的意见，看来，富裕的莫斯科商人和其他一些俄国城市的商人在那儿建立私人库房和住所的时间还要早。而“按照俄国商人的承诺”建成的小教堂既是村社聚会的场所，也是宿营地的宗教和社交中心。叶尼塞的海关官员也在宿营地组织征收海关税。稍晚些，勒拿河独立的海关建成后，海关首脑向连水陆地派出了自己的地方官（15—18 世纪俄国征税兼执行司法及警察职务的人——译者注）（注 6，123—124 页）。

毫无疑问，通过勒拿河连水陆地的道路是相当复杂的，尤其是当到达注入（库塔河支流）库巴河的姆卡河时。在姆卡河上必须制作木排用以航行，因为姆卡河“是一条多石的小河，人们沿河用木排拖运 20 普特（320 公斤——作者注）的大件相当费力，那些木排在旋涡中经常倾覆”，库巴河和库塔河就是如此之小。“在库塔河注入勒拿河的河口渡过姆卡河和库塔河要乘坐木排，——1645 年督军瓦西里·普希金报告说，乘小船绝对无法通过，因为那些河流，陛下，尽是石头，特别小，轮船沿河行走只有一个季节——春天，春汛到来之时……而实业者制作的在河里用的木排很小，只能载 20 普特左右重的东西，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要通过小道慢慢地把木排从石头上拖过去，而此前要用帆船把小河拦起来。”（注 6，124 页）

1629 年底，伊万·卡尔金乘雪橇来到勒拿河上游。他的哥萨克取代了布加尔留在库塔河口的人并在那儿建立了固定的乌斯季库特过冬地。1630 年春天他乘坐建好的小船沿勒拿河顺流而下到了“雅果里斯克人（雅库特人）”那儿。看来，他到达了北纬 62°附近的雅库特村落（那儿现在可能是雅库茨克市），在镇压了当地 5 个联合酋长的反抗后在那儿收取了实物税。

根据他的描述，雅库特人“饲养牲畜、骑马、人口众多、每人一副盔甲、善战”（注 18，274 页）。然后他下到阿尔丹河口并沿河向上走了大约 400 公里，用了 30 个昼夜来到靠近（它左边的支流）阿姆加河口处。大量居住在阿尔丹河谷的雅库特人对卡尔金的队伍进行了反抗。他抓了当地部落酋长——王公们的妻子和子女作为人质，迫使他们接受了莫斯科沙皇的国籍并交纳了实物税。

卡尔金返回了勒拿河上游并继续向雅库特人和通古斯人收取实物税。此时他编纂了第一本关于库塔河和维柳伊河河口之间 2000 多公里地段上河流情况的目录。他在其中列出了勒拿河右边 6 条大的支流：基廉加河、恰亚河、切丘伊河（丘亚河）、维季姆河、奥廖克马河、阿尔丹河和左边 3 条：伊切拉河、别列杜伊河、维柳伊河。

1630 年，叶尼塞常备军中尉、贵族子弟彼得·伊万诺维奇·别盖多夫被派到勒拿河。此前他已经为“国家服役 9 年，无论冬夏，也无论骑马、乘船和滑雪”。1628 年，他降服了上通古斯卡河的通古斯人并向他们征收了实物税。第二年，别盖多夫“从布拉特石滩沿通古斯卡河向上，沿奥卡河、安加拉河到达乌达河口”，以便向布拉特王公们和乌卢斯的人（布里亚特人）收取实物税。

别盖多夫非常成功地选择了建城堡的地区。城堡成为俄国人继续往北到极地海洋，往东去往鄂霍次克海，最后往南下到阿穆尔河的基地。

1630 年秋天，别盖多夫和 20 名哥萨克一起经过乌斯季库特过冬地，沿勒拿河来到“奥纳河口”（看来是位于东经 107°的阿纳伊河）并考察了 500 公里的一段河流，差一点就到达源头。在向当地布里亚特人征收实物税时同他们发生了冲突，哥萨克建的一个不大的堡垒也被布里亚特人包围。

在堡垒留下一个组长和 9 个哥萨克后，别盖多夫和其余的人下到库

廉卡河口（位于北纬 $54^{\circ}$ ）并来到勒拿河—安加拉高原的草原上，以便向在那儿游牧的布里亚特人收实物税。在遇到激烈的抵抗后，别盖多夫急忙返回勒拿河上游，而后回到了乌斯季库特过冬地。

1631年春天，叶尼塞督军日丹·孔德列夫派中尉别盖多夫带领30个哥萨克前往勒拿河并委托他们在那儿建城堡。别盖多夫顺安加拉河而上，经过勒拿河连水陆地到达了大河。他顺勒拿河而下，而派A.杜比纳带7个哥萨克沿勒拿河右边的支流基廉加河向上。别盖多夫到达了勒拿河中游并考察了这条河流南部的弯曲处。1632年秋天他在弧形（勒拿河弯曲处）的顶端（东经 $130^{\circ}$ 附近），“在一个又窄、又低每年都被春汛淹没的叫作丘科夫田野的地方”建成了林斯克城堡。

1632年6月底，为了考察勒拿河下游到它注入极地海洋这一地段，别盖多夫派出了以参加过A.杜比纳远征勒拿河上游的以伊万·巴杰林为首的9名哥萨克。所以巴杰林成为在长达4400公里的大河的几乎所有河段上航行的第一位俄国人。

1632年8月，别盖多夫派以阿列克谢·阿尔希波夫为首的一支叶尼塞哥萨克队伍沿勒拿河向下出发。阿列克谢·阿尔希波夫曾在遥远的北方、北极圈附近勒拿河左岸建成了成为向“遥远的海外河流”出征的重要据点——日甘斯克冬营地。

1633年再次来到雅库特代替别盖多夫的卡尔金于1634年将城堡从低矮的河岸迁到了较方便的地方，但没有改变这个“位于许多条大道去往别的小块土地”之处的据点的地势。1636年替换了伊万·卡尔金的巴尔芬·哈德廖夫成了林斯克城堡的头目。自此，城堡开始被叫作雅库特小城。

城堡仍旧经常受到春汛的威胁。因此1643年根据督军彼得·戈洛文的命令人们将它迁到了艾尤克草场，该草场位于勒拿河上面距旧城堡70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的地方（注17，47页）。新雅库特城堡有333俄丈（720米）长的围墙和5个塔楼。城堡内有两个教堂、一个督军府、石头库房和其他一些建筑物（注29，56页）。

1633年春天，别盖多夫派去的哥萨克试图乘小船沿维柳伊河航行，以便向居住在勒拿河北边这条大支流岸边的埃文基人收取实物税。在维柳伊河河口他们同以斯捷潘·卡雷托夫为首的曼加杰亚哥萨克相遇，他

们是沿着马尔德·瓦西里耶夫开辟的道路到达那儿的。

还在1630年时，马尔德·瓦西里耶夫就同30名哥萨克从新曼加杰亚沿下通古斯卡河溯流而上到达了它接近乔纳河之处（在北纬 $61^{\circ}$ 附近），再沿乔纳河往下到达维柳伊河并顺维柳伊河到达勒拿河。接着，他沿勒拿河向上到了它的中游并宣称，住在那儿河谷里的居民比俄国人所熟知的叶尼塞地区更加稠密。尽管他没有几个军役人员，但他还是收集了数额不大的实物税并将其送往莫斯科。他在叶尼塞和莫斯科向当局通报了关于勒拿河有大量貂的消息。

因此竞争者在维柳伊河河口遭遇了：曼加杰亚卡雷托夫的队伍和别盖多夫的人。卡雷托夫在维柳伊河河口扣押了别盖多夫的船并将他们争取到自己这方面。他带领自己现在这支联合队伍的一部分人沿勒拿河向上到达了阿尔丹河口并于1633年第一个沿它左边的支流阿姆加河溯流而上。卡雷托夫试图向居住在阿姆加河与勒拿河之间的雅库特人征收实物税，而此前他们已经向别盖多夫的人纳贡了。所以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于是在1634年，一支多达1000名士兵的雅库特人的队伍围住了当时已经有200名俄国哥萨克、实业者和商人的林斯克城堡。围困很快就被打破了，一部分雅库特人逃到了遥远的地方，而剩下的人继续同哥萨克对抗。1636年，雅库特人再次包围了林斯克城堡，但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在同反抗者斗争的过程中，哥萨克熟悉了整个勒拿河中游地区。1635年别盖多夫在奥廖克马河口建起了一个成为远征基地的城堡，远征的目的就是要在沿奥廖克马河和它的主要支流恰拉河，以及大帕托姆河（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东北角，勒拿河东边的支流——译者注）、维季姆河地区收取实物税。他第一个到达了帕托姆高原的北部和西部边缘。

在自己给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呈文中，别盖多夫写道，当时，“陛下，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俄国人到过那些地方”（注24，93—94页）。

对勒拿河流域所作的有经营价值的开发在俄国人出现在那儿的最初年代就进行得异常迅速。如果说在1634年有200名实业者打算从开采地去往雅库特城堡，那么8年后的夏天已经有3000人到了那儿，同时，

许多实业者没去雅库茨克，而是留在了过冬地（注10，142页）。从17世纪40年代起，在获取毛皮方面勒拿河流域已经在西伯利亚占据了首位。

并入俄罗斯国家版图的勒拿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的广阔领土连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大部分雅库特居民很快就领略了同俄国实业者和商人进行和平交往所带来的益处。贸易交换、使用俄国商品、部族间战争的终止所产生的效益成为雅库特加快融入俄罗斯的主要动因。

1638年，根据国家的指令在勒拿河流域建立了以雅库茨克为中心的新的西伯利亚省。莫斯科当局决定制止来自西伯利亚不同城市的哥萨克某些派别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他们在勒拿河上为了把尽可能多的缴纳实物税的“外国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那些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和曼加杰亚的军役人员为了自己无尽的贪婪相互争斗，在勒拿河搞到貂皮的实业者互相掐得你死我活，对新的毛皮实物税缴纳者怀疑，使其为难、发生纷争，驱赶他们离开国王。”（注6，152—153页）正是这类“纷争”和由此而导致的国库的亏空迫使莫斯科当局成立了雅库特省，把新发现的土地从其他西伯利亚督军手中收回并禁止叶尼塞、曼加杰亚、托木斯克和其他地区的军役人员前往勒拿河。

1638年8月，沙皇首席督军、御前大臣彼得·戈洛文，第二督军马特维伊·格列鲍夫和书吏官叶费姆·菲拉托夫从莫斯科来到勒拿河上的雅库茨克。为了协助他们，任命了两位（管理督军办公厅的）文书官叶纳利伊·巴赫捷雅罗夫和瓦西里·波雅科夫（未来的第一个阿穆尔大型考察团的首领）。和督军们一起前往的还有395名常备军和哥萨克，后来又增加了木匠、造船匠、铁匠、军械匠、翻译、4个神父。督军们到达雅库茨克已是1641年夏天了（注30，76页）。

沙皇给首任勒拿督军的命令中谈到了建立单独的雅库特省的必要性并就此指出：“西伯利亚城市和城堡里缴纳实物税的人拥有的经营之地首先是用来获取毛皮的，这些地开始归了俄国人，结果西伯利亚的俄国人较之先前大为增加，而现今用来缴纳实物税的经营之地又忙于耕种，将来在那些比较近的西伯利亚城市里国家实物税的征收将成问题……而那条伟大的勒拿河又合适又宽阔，各个地方既有游牧民也有定居的人，河里有许多貂和各种野兽……那条勒拿河将是另一个曼加杰亚。”（注

10, 143 页)

重要的是，在给戈洛文的其他的委托中还指示他编一本记述去往勒拿河道路的书。为了执行这项命令，督军办公厅于 1640—1641 年间绘制了一份地图并附上了“与图纸相对照的从叶尼塞城堡向上到勒拿河连水陆地所经过的河流、石滩的目录，顺这些河流、石滩可以到达为国王服务之地——伟大的勒拿河……御前大臣和督军 П. 戈洛文、M. 格列鲍夫，秘书 E. 菲拉托夫，148 年（1639—1640 年）”。这仿佛是一份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完成了对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南路考察的总结性文献（注 6, 122 页）。

## 西伯利亚东北沿海地区的俄国果奇

你们是我的可爱的哥萨克，  
哥萨克，你们是忠实的仆人！  
你们，我可爱的哥萨克，

正效力于白沙皇（从伊凡四世起，东方民族——突厥人和蒙古人这样称呼俄国沙皇——译者注）。

——古老的哥萨克民歌

为了寻找包括勒拿河河口东西两侧北冰洋沿岸在内的新的盛产毛皮兽的“小块土地”需要组织海路和陆路的考察团，这使得 1632 年建立的雅库特城堡立刻成了这一活动的基地。1633 年夏天，叶尼塞斯克的五十人长伊利亚·别尔费里耶夫（别尔菲尔耶夫）率领的一支由叶尼塞斯克和托博尔斯克的军役人员以及实业者组成的超过 100 人的队伍完成了从勒拿河河口出发的第一次海上远征。

队伍沿勒拿河下到了河口并在那儿分开了。果奇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列波洛夫的带领下多半是沿着奥列尼奥克河三角洲的小河汉向西驶去。哥萨克们发现了奥列尼奥克湾，第二年又发现了奥列尼奥克河河口。作为第一批到达奥列尼奥克河口的俄国人，列波洛夫和他的哥萨克们沿河而上，构筑了过冬地并且在 3 年多的时间里向居住在河谷地区的埃文基人收取实物税。

别尔费里耶夫乘坐另一艘果奇沿贝科夫河汉向东南驶去并来到了布奥尔哈亚湾。绕过海湾东部的海岬后，他发现了亚纳湾并于第二年又发现了亚纳河河口。1635 年秋天，他第一个到达它的上游并建立了上扬斯克过冬地（现在的上扬斯克市）。他是在亚纳河下游认识了最原始的

猎人和养鹿人——犹加吉尔人的第一个俄国人，而在河的上游他则向住在那儿的雅库特人征收了实物税。

1637年9月，И. 列波洛夫来到亚纳河加入了И. 别尔费里耶夫的队伍。第二年夏天，别尔费里耶夫在离职去雅库茨克时派列波洛夫继续往东去。后来在雅库茨克衙门办公室的决议中记载了列波洛夫是怎样为在极地海洋的航行做准备的：“他们到一块新的土地去为国家服务，他们造了船，自己弄到了船上的全套器具，在新土地上收缴实物税时要凭纳税的情况发给商品，他，伊瓦什卡，和伙伴们都是用自己的钱买的商品。他们，伊瓦什卡和伙伴们为国家服役6年多，没领国家的薪水和粮食。”（注24，118页）

1638年秋天前，列波洛夫完成了对亚纳湾的发现和考察。他第一个驶过了后来以1733—1743年伟大的北方考察团的参与者、海军军官德米特里·拉普捷夫命名的海峡并航行到了东西伯利亚海。列波洛夫发现了因迪基尔卡大河的河口并沿河向上走了600公里，用了“两个底部”，也就是从河口出发两天的路程（注24，131页），在它左边的支流乌扬季纳河河口土面建起了乌扬季纳过冬地。在那儿度过了两年多后，直到1641年夏天才返回雅库茨克。

第二年他再次被派到北冰洋沿岸，他乘果奇从勒拿河河口出发漂洋过海又来到奥列尼奥克河，他在那儿建了过冬地并一直服役到1647年（注2，32页）。

1636年，叶尼塞斯克城堡的哥萨克组长叶里谢伊·尤里耶维奇（布扎）带领一支10名哥萨克的队伍从叶尼塞斯克沿安加拉河来到勒拿河下游。在封河前他得以从乌斯季库特到达1635年在勒拿河右边的支流奥廖克马河河口建造的奥廖克明斯克市。

1637年春天流冰过后，布扎抵达雅库茨克，他依靠“自愿加入的军役人员和实业者”把自己的队伍扩大到了50人。正如后来他在呈文中所写：“在雅库茨克城堡，陛下，我借了巨债，我，你的奴仆，花高价购买了船和果奇，带帆和锚的平底小木船，全套的船上用具。我，你的奴仆，把火绳枪和弹药、储备粮、大渔网和各种养畜场借给为了你的国家在遥远的地方服役的那些军役人员和实业者。”（注24，96、97页）

布扎和队伍沿勒拿河往下来到海上，经过三角洲西边的支流，用一天的时间来到奥列尼奥克河口。他沿河向上行驶了500多公里并向在那儿遇到的游牧的埃文基人收取了实物税。他在奥列尼奥克河建了过冬地并在那儿过冬，到1638年春天他骑鹿返回勒拿河下游，到了它左边的支流莫洛多河的河口，该河的上游在东经120°，接近奥列尼奥克河。

关于他下一步出征的信息是矛盾的。И. Е. 费舍尔院士在他1774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历史：从发现西伯利亚到俄国人用武力占领这片土地》一书中写道，布扎在勒拿河（大约北纬70°）建造了两艘果奇后于1638年夏天通过勒拿河三角洲东边的支流驶向大海，趁着顺风用5天的时间沿海岸向东航行去寻找一条不知名的仿佛发源于中国的大河拉马河河口。他绕过布奥尔哈亚湾东边的（与海湾同名的）海岬，来到亚纳湾并到达亚纳河（又名扬基）河口。他的队伍用3个星期的时间沿河溯流而上，到了雅库特人居住的地方。布扎在那儿收缴了大量的作为实物税上缴的珍贵的貂皮，就在雅库特人那儿过了冬。

1639年，布扎和他的部队乘坐4艘在过冬期间建造的果奇再次出海并完成了对亚纳湾的考察。他在从亚纳河口往东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的湖泊”——一个从海上包围着亚洛克湖的、乔恩顿河注入其中的宽阔的海湾。布扎在那儿遇见了协助俄国先驱者向亚洲东北部、而后向堪察加迅速推进的犹加吉尔人。他们在他们的住地建起了过冬地，在那儿住了不低于两年，于1642年返回了雅库茨克。

按照研究西伯利亚新土地发现者远征史的历史学家H. H. 奥格洛波林在自己作品中所引用的另一种说法，叶里谢伊·布扎从勒拿河出发往东航行时没到达亚纳河河口，只到了注入布奥尔哈亚湾的奥莫拉亚河河口。他从那儿把储备品倒到雪橇上，用了8个星期的时间越过库拉尔山岭到了亚纳河上游。

因此，H. H. 奥格洛波林认为，布扎是发现奥莫拉亚河和库拉尔山岭的第一人（注2，32页；注18，277页）。

为了证实H. H. 奥格洛波林的说法，历史学博士M. И. 别洛夫引用了布扎最后一次出航的参与者、哥萨克德鲁干·普洛科菲耶夫的话，他在自己的呈文中写道：“他们从雅库特城堡出发顺勒拿河往下出海，他们沿海航行，到了奥莫拉亚河口，在那儿，严寒阻碍了他们，没有到

达亚纳河河口。”哥萨克想尽快到达东方这条大河，所以决定走陆路向亚纳河进发。“他们经过了，——德鲁干写道，石头山（库拉尔山岭——作者注），用了8个星期到达了亚纳河顶端并来到亚纳河上游雅库特人那儿。”（注10，151页）

有一点很清楚，布扎和他的同路人所完成的海上航行和陆地旅行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他本人在呈文中写道：“在为你，我的国家，服役时，我，你的奴仆，和军役人员、实业者在奥列尼奥克河、亚纳河和乔恩顿河承受了各种贫穷，吃树根、草皮，因各种对自己吝啬的狠毒玷污了灵魂，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注24，98页）

那些年代还开辟了一条从雅库茨克经上扬斯克山脉到亚纳河上游的陆路。1635—1636年军役人员谢里万·哈里托诺夫“骑马经冬天的道路”从雅库茨克到了亚纳河上游并在那儿建起了过冬地。

1637年春天，一支30人的哥萨克马队在叶尼塞军役人员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古巴里亚的带领下从雅库茨克出发。队伍越过将勒拿河流域和亚纳河流域分开的上扬斯克山脉，用4个星期时间来到亚纳河上游。在那儿，他们扩展和加固了过冬地——未来的上扬斯克（注2，32页）。

接下来，哥萨克沿亚纳河谷走下去，在那儿向当地的雅库特人收取了实物税。波斯特尼克成功地收集到了某些关于分布在东方的一些河流和居住在那儿的部落的资料。为了在亚纳河右边的支流阿德恰河河谷收实物税，波斯特尼克派出了一支以托博尔斯克哥萨克伊万·洛基奥诺夫·叶拉斯托夫（维尔科夫，后来因功被授予贵族子弟的称号）为首的队伍。被派出的人员到达了它左边一条大的支流鲍鲁拉赫河，就是说他们最早深入到了亚纳高原（注18，278页）。

1637年夏天，波斯特尼克乘马沿亚纳河右边的支流杜奥斯达赫河河谷继续向东进发。在犹加吉尔向导的协助下，哥萨克用4个星期的时间越过了在20世纪以西伯利亚研究者И. Д. 切尔斯基命名的山脉，到达了因迪吉尔卡河。在那儿，他们在匆忙中建起的（后来被称作扎什维尔的）过冬地顶住了同犹加吉尔人的“激烈的战斗”，粉碎了进攻者的反抗，向他们征收了实物税（注2，32页）。哥萨克紧急建造了一批小船，他们乘船沿河而上，向当地的犹加吉尔人征收了实物税。返回过

冬地后，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在那儿留下了16个人，他和其余的人踏上了回雅库茨克的道路。

雅库茨克的督军们根据他的话向莫斯科报告了关于新土地的情况：“而犹加吉尔，陛下，大地人口众多，因迪吉尔卡河鱼类丰富，将来，陛下，在因迪吉尔卡河和犹加吉尔大地上会有100名军役人员，那儿的人不用粮食只凭鱼和野兽也可饱腹。许多河流，陛下，都注入因迪吉尔卡河。沿着那些河流到处都居住着徒步的和使鹿的人（过着游牧生活的北方原住民，他们住在泰加森林中功能齐全的锥形兽皮帐篷里——译者注），在那些河里和原野上有各种貂和野兽。犹加吉尔人那儿，陛下，有银子，而他们从哪儿弄到的，他，波斯尼奇卡，并不知道。犹加吉尔人向他讲述了另外一些土地的情况。”（注24，100—101页）所以说是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带来了第一批关于科雷马河与更东边的巴基恰河（说的是阿纳德尔河）的资料。

1638年5月，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再次越过上扬斯克山岭来到亚纳河。在山里他向俄国人所陌生的民族——拉姆特人（现在人们叫他们埃文尼人）收缴了第一批实物税。在亚纳河他被迫调停犹加吉尔人和雅库特人之间的矛盾并向敌对双方收取了实物税。第二年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又一次越过山岭来到因迪吉尔卡河谷，在那儿的过冬地留下17个哥萨克后，他本人带着收来的实物税返回了勒拿河，而返回时走的那条路到17世纪末成了从勒拿河到因迪吉尔卡河中游的主要的陆路。

其余留在因迪吉尔卡的哥萨克于1640年在伊万·叶拉斯托夫带领下沿河而下并于因迪吉尔卡河中游向犹加吉尔人收取了实物税。第二年夏天叶拉斯托夫到达了河口。从当地部落酋长那儿他打听到从因迪吉尔卡河往东有一条叫阿拉杰亚的河，那儿也有犹加吉尔人。他建造了果奇，漂洋过海来到它的河口，也就是说他是俄国人中第二个（列波洛夫之后）无可争议地完成了在东西伯利亚海航行的人。除了犹加吉尔人以外，俄国人在阿拉杰亚河还遇到了一个陌生的民族——使鹿的楚科奇人。

叶拉斯托夫沿阿拉杰亚河向上到了森林的边缘（北纬69°附近），在那儿建立了过冬地并过了冬天。1642年6月浮冰过后，他派部分哥

萨克带着收缴的实物税乘果奇出发，他和其他人步行来到阿拉杰亚河上游并在那儿向俄国人不熟悉的民族——住在阿拉杰亚高原附近的使鹿的犹加吉尔人收取了实物税。深秋时节，他骑鹿从阿拉杰亚河出发，在考察了几乎整条河流（1590公里）后，来到因迪吉尔卡河流域，在那儿度过了另一个冬天。只是到了1643年夏天，他才从海上把实物税运到雅库茨克。

1641年夏天，五十人长费奥多尔·丘尔金和以维日姆采夫、雅科夫·特维里亚科夫为首的两组实业者组成的队伍乘3艘果奇试图从海路去往因迪吉尔卡河。丘尔金的果奇在亚纳河口和圣角海岬（从西边进入德米特里·拉普捷夫海湾之处）之间遇难。17世纪时航海者把果奇遇难之地叫作“丘尔金遭劫处”（即丘尔金海船遇难地——作者注），而近处的海岬被称作丘尔金海岬（现在的楚尔金海岬）。

丘尔金的果奇，看来，被抛到了紧靠海岬的宽阔的浅滩上。实业者的果奇往前走了不远，但他们也被抛到了“浅滩”（从岸边延伸出去的水下浅滩）。得救的哥萨克和实业者试图走陆路去往因迪吉尔卡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于途中。

雅库特的军役人员季莫费伊·布尔达科夫讲述了陷入冰层中的极地航海者的命运，他曾于1651年秋天率领“一支5艘果奇的船队”沿北冰洋航行。在赫洛马河口的对面“黑夜降临了，四周漆黑。翌日清晨，大海开始结冰”。“于是我们，季玛什卡，布尔达科夫写道，开始把5艘果奇在一般水（河口淡水与海水相区别——译者注）中集合在一起……而离岸边不远。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3天，冰开始变得有手掌厚，人们想用雪橇把东西拖到陆地，在谢苗日（11月1日）……风开始从陆地吹向海洋，把我们和冰一起吹到了海上……把我们和冰吹到海上总共5个昼夜，在海上风停了，海上的冰也不动了，一夜之间大海开始结冰。第三天，冰上能站人，于是我们开始冒死探查陆地，一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

他们成功地碰到了军役人员安德烈·格列洛瓦的果奇，他的果奇也冻在了冰上。但过了几天，突然“从海上来了一股水流并开始将冰冲破，还把我们冲到海上5个昼夜，然后风小了，人开始冻僵了”。航海者“不希望冰层刚一结厚就因缺乏劈柴和食物必须白白地死在那些果

奇上，不想因喝咸海水得坏血病。而海上的冰即使无风也在水中乱走，还引起了大块冰堆的阻塞”。航海者决定再次尝试寻找上岸的路径。从果奇上卸下的食物储备被冰打碎了，人们乘坐雪橇，拉着绳索从一块冰上挪到另一块冰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9天才上了岸。“上岸之后，他们制作了雪橇和滑雪板”，最终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忍受了饥饿、寒冷、衣不蔽体的痛苦后”到达了乌扬金斯克冬营地（注6，127—128页）。

因此先驱者所走陆路的标记就是无数个墓地上的十字架，而对死在海上的人来说，黑暗的极地旋涡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

1641年，外号叫雅里洛（雅里尔科夫）的哥萨克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泽梁率队从雅库茨克出发沿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开辟的道路到达因迪吉尔卡河。第二年春天以德米特里·泽梁为首的一组军役人员和实业者乘坐在冬营地建造好的果奇从下因迪吉尔卡过冬地出海去寻找新的“小块土地”和因迪吉尔卡河口东边任何俄国人都没航行过的河流。

从1646年1月记录下的对这次远征参与者之一的叶尼塞哥萨克费奥多尔·丘基切夫的问话中得知：“米奇卡·雅里尔科夫和他们，军役人员，总共15个人，在那个因迪吉尔卡河上制造了两艘果奇后，乘这些果奇顺因迪吉尔卡河向下走了两个星期到了海上，从因迪吉尔卡河口扬帆向东沿大海到了阿拉杰亚河河口，再扬帆向上用了两天半时间到了犹加吉尔王公诺奇强的领地……他们，军役人员，乘坐那些果奇沿阿拉杰亚河向上走了6天到达了森林地带并在那儿建立了冬营地……楚科奇人骑鹿来到他们军役人员的冬营地卖鹿……而那些楚科奇人住在阿拉杰亚河与卡维姆河（科雷马河——作者注）之间的冻土带……卡维姆男人骑鹿来到他们军役人员那儿并告诉他们，从阿拉杰亚河到卡维姆河阿尔基什姆（鹿队）乘鹿要走3天。而此前没有任何俄国人到过他们那儿……他们还谈到了自己，说他们的人很多，而他们那儿的河里貂、其他各种野兽、鱼不计其数。他们军役人员在那条阿拉杰亚河上度过了冬天，春天冰消融了，米奇卡·雅里尔科夫和他们，军役人员，总共11人从阿拉杰亚河口乘船向东到了卡维姆河。”（注31，57—58页）

就是说，首次从因迪吉尔卡河往东方的航行是以发现阿拉杰亚河为

终结的。几乎是紧随泽梁之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塔杜辛的队伍也抵达了阿拉杰亚河。

1641年冬天一支由15名哥萨克组成的马队在军役人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塔杜辛似乎还有他的助手伏达罗伊·加弗里洛夫的带领下从雅库茨克出发向东去往因迪吉尔卡河上游。队伍考察因迪吉尔卡河流域走的是一条俄国人不熟悉的“向导”指出的新路：沿着阿尔丹河右边的支流，越过松达尔—哈亚塔山脉的北部，沿因迪吉尔卡河左边的一条支流穿越了奥伊米亚康高原。

在路上逗留了两个多月之后，队伍向因迪吉尔卡河上游进发，到了后来奥伊米亚康村所在的区域（如同20世纪人们所查明的，这个地区是北半球最寒冷的省份）。斯塔杜辛在那儿遇到了一支从中游上来的哥萨克队伍，他建起了冬营地并开始收实物税。

斯塔杜辛和加弗里洛夫从奥伊米亚康冬营地向雅库茨克官厅寄出了一份关于奥伊米亚康地区的官样文章的复文（通报），对于大多数上因迪吉尔卡河地区来说奥伊米亚康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叶莫康（奥伊米亚康——作者注）没有留下一个人，军役人员居无住所，食无来源。而叶莫康河（上因迪吉尔卡河——作者注）从石头山流出（从松达尔—哈亚塔山脉北边的支脉——作者注），而沿叶莫康河地区没有可耕地，无论柞木、草地都没有，全是索格雷（泰加森林，沿沼泽地长满瓔珞柏果和帚石南的低矮的小树林——作者注）、沼泽、石头。叶莫康河里没有鱼，也没有野兽……沿河两岸哪儿都不见人。拉姆特（埃文尼人的旧称）通古斯人只从那儿经过，而不住在那条河上。”（注24，120页）

哥萨克从周围的雅库特人那儿查明，从山岭南麓再往南，朝向大海流淌着一条鄂霍塔河。斯塔杜辛派安德烈·格列洛瓦带队去往大海，而他本人和其余的哥萨克乘坐建好的果奇下到了北极圈并考察了因迪吉尔卡河右边的支流、在宽阔的高山河谷之间串流的马玛河下游地区。在官样文章的复文中，斯塔杜辛和加弗里洛夫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自然清楚，有一条叫马玛的大河，那儿住了许多人，都是定居的，而不是游牧的。那条河里鱼和野兽众多，貂和各种兽不计其数，还有聂利玛鱼和马克寻鱼（俄国北方河流所产，类似白鱼——译者注），河两岸草地连绵，柞木成林，而帐篷是木制的，所以里面不能举火。我们听说，这条

河里有鱼、兽和貂，那儿的人是定居的，他们会猎貂，我们到那条河是为了弄清另外一些人的情况，为了收取实物税。”（注 24，121 页）

然后，斯塔杜辛和哥萨克下到了因迪吉尔卡河口并于 1642 年秋天走海路到达阿拉杰亚河河口，在那儿加入了几个月前到那儿的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泽梁的队伍。1643 年 6 月底，联合部队再次出海，驶向东方。按照这次航行参与者哥萨克伊万·库兹米奇·别里亚纳在呈文中所说：“在海上走了两个星期，来到了，陛下，卡维姆河（科雷马河），又沿卡维姆河向上走了 12 天。”（注 31，77 页）

北亚沿岸 500 公里地区、科雷马湾、科雷马河河口就这样被发现了。沿科雷马河向上航行时，哥萨克发现了科雷马河下游东部边缘地区。为了收取实物税，7 月 30 日在科雷马河中部建立了第一个俄国冬营地。根据所发现的第一本科雷马纳税人手册所披露，第二年，即 1644 年春天，在科雷马河下游“犹加吉尔土地上”，在它右边的支流大阿纽伊河河口的对面建起了下科雷马冬营地。正是这个冬营地从 1646 年起成为俄国人继续向东推进时、沿科雷马河流域向南去往拉马海（鄂霍次克海）时组建考察团的基地（注 18，279—280 页）。一年后，哥萨克在河的上游建立了上科雷马冬营地。

由于发现了科雷马河河口，某些历史学家就给军役人员谢里万·哈里托诺夫戴上了冠军的头衔，按照他们的说法，谢里万·哈里托诺夫于 1640 年从亚纳河“漂洋过海”，第一个到达科雷马河（注 2，33 页）。但最早的非常详尽的关于科雷马河的资料是 M. B. 斯塔杜辛于 1645 年底在返回雅库茨克后披露的：“科雷马河是伟大的，和勒拿河一样注入大海，迎着那股风，向着东方，向着北方。沿科雷马河住着一些外国人，科雷马男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使鹿和步行，许多人都是定居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科雷马河旁边有一条外号叫丘赫奇亚的河，它通过自己的河口注入大海，和科雷马河流过来的方向一致。丘赫奇亚河两岸住着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外国人，丘赫奇亚人（楚科奇人）像萨莫亚齐人一样有名，使鹿、定居。”

斯塔杜辛紧接着又公布了一些重要的有关位于科雷马河东方的巴基恰河（人们最初这样称呼阿纳德尔河）的资料：“丘赫奇亚人那儿没有貂，因为他们住在海边的冻土带，而优良的黑貂都在科雷马河。从科雷

马河到它上面那条河，人们所说的巴基恰河，从科雷马河到那儿顺风扬帆的话要走大约3昼夜还要多，那条河很大，出产貂，沿河住了许多外国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貂很好，都是黑色的，野兽也是当地的，狐狸是红色的，还有银狐。除此之外，那些河里任何动物都没有，因为那地方非常冷。而他们，军役人员和实业者就住在那些河上，靠吃鱼为生，因为河里有鱼，而且各种鱼多得是。”（注31，59—60页）

在询问谈话中，M. 斯塔杜辛断言，他觉得，“船去那个科雷马河走的是左边”，也就是他在北边看见了一个从勒拿河口延伸到科雷马河口的大岛的南岸。斯塔杜辛说，“在人们心目中，那个岛上的山被雪覆盖，山沟、小溪很美。那个石头岛，海中的山脉……科雷马河这边的丘赫奇亚（即楚科奇人）人冬季从自己的住地，从那条河骑鹿去那个岛要一天的路程（从冰上过去——译者注）。他们在那个岛上打死了海兽——海象”（注31，60页）。一个在楚科奇人当中住了3年的犹加吉尔女人卡丽芭向斯塔杜辛证实了关于去往科雷马河途中有这个岛的信息，他在询问谈话中也提及过。

看来，斯塔杜辛把在哥萨克和先驱者中间流传的关于科雷马河口对面一些岛屿的混乱的信息同自己的观察、猜想融在了一起。并不排除他可能看见了那些年代还没发现的熊岛群岛（位于科雷马湾的北边）中某一个岛，比如离陆地较近的克里斯托夫斯基岛。在形成关于东西伯利亚海岸对面北冰洋上有一个大岛的地理传说这件事上，海市蜃楼、被观察者当作山的大群冰块堆积等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某些沿海居民的讲述也对传说的产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们还真的造访过那些当年尚不为俄国先驱者所知的岛屿。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人们在北冰洋上进行新的探索、考察的传说注定在斯塔杜辛的航行之后还要流行100多年（注18，280页）。

返回雅库茨克时，斯塔杜辛在科雷马河留下了以谢苗·杰日尼奥夫为首的13名哥萨克，他们后来被迫在自己的小城堡里经受聚集了500名士兵的犹加吉尔人的围困和进攻（注2，33页）。

关于科雷马河流域有丰富的毛皮资源的消息甚至在雅库茨克的哥萨克和实业者中间引起了骚动。问题在于，想到科雷马毛皮资源地去的人太多了。1645年，雅库茨克督军试图禁止哥萨克离开雅库茨克并拒绝

给实业者发放通行证。作为回敬，哥萨克和实业者抢夺了停在勒拿河上的“督军的船只”并顺流而下到了河口。督军始终无法阻止被抢去的船只出海驶往东方。部分被抢去的船只沉没了，但许多船到了科雷马河（注 14，391 页）。

泽梁和斯塔杜辛开辟的从雅库茨克到科雷马河的海路经过俄国哥萨克、实业者和商人的努力经营变成了一条活跃的极地贸易之路。1643 年夏天，伊万·叶拉斯托夫、费奥多尔·丘基切夫、特列齐雅克·奥列克谢耶夫等完成了从阿拉杰亚河口出发经东西伯利亚海和拉普捷夫海去往勒拿河的航行，并且收缴了“毛皮官款”，即作为实物税收的毛皮和由哥萨克在狩猎和交换时得到的毛皮。由于顶风和结冰，航海者被迫在日甘斯克冬营地过冬。

就在那年，以伊万·克列班诺夫和伊万·奥热果伊为首的商人走海路从因迪吉尔卡河口来到日甘斯克，而第二年夏天商人博格丹·叶夫多基莫夫·泽梁和叶比凡·伊万诺夫·瓦雷金乘果奇走海路从勒拿河河口来到因迪吉尔卡河。1645 年深秋，米哈伊尔·斯塔杜辛乘商人阿法纳西·安德烈·沃龙的果奇从科雷马河来到日甘斯克。这样的航行几乎持续到 17 世纪末（注 10，153、155 页）。

以深度不大为特征的拉普捷夫海和东西伯利亚海有助于这些海上出征的成功。这些海的沿岸地区有许多能够滞留海上浮冰的浅滩。那个时候哥萨克和商人的果奇的吃水量不大，在 1.5—2 米，所以能够在分布于沿岸浅滩的冰之间的浅水处通过，尤其是当从岸边刮起风把浮冰从岸边挤走时。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乘果奇在极地海洋上航行是危险和困难的。为了顺利地极地航行，航海者必须具有勇气、耐力和技能。要付出不小的体力和精神上的努力以克服极地日常生活中的困苦。

国内研究航海的历史学家 H. П. 扎果斯金教授在 20 世纪初对西伯利亚海员、先驱者于 17 世纪发现无边无际的极地海洋和东西伯利亚海所作的贡献给予了中肯、高度的评价（作者在 21 世纪初完全同意这个评价），因此，此处引用这个评价是非常适宜的：“让当代那些依靠蒸汽的力量冲破臣服于他们的海洋的强大的海上巨人，哪怕偶尔用感激的话语谈起那些不幸的、即使在彼得时代也显‘陈旧的’西伯利亚果奇吧！17 世纪俄国的勇士在乘坐这些幸运的旧时代的果奇航行时坚定地

培养出自身那种海洋精神和海洋品质，这些精神和品质过去和现在永远是从事海洋事业的俄罗斯劳动者所特有的，并在那个世纪末以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年轻的沙皇改革者（彼得大帝——作者注）激情澎湃的天性中爆发。”（注 44，463 页）

## 外贝加尔和贝加尔的西伯利亚哥萨克

在光荣的父亲湖——贝加尔海以外，  
从上色楞格城堡出发，  
沿母亲河向上，  
只有勇敢的好汉被派去，  
他们是善良的青年，  
勇敢的小伙，  
色楞格的哥萨克。

——古老的哥萨克民歌

俄国哥萨克——先驱者出现在外贝加尔是 1638 年，他们是从北方，从勒拿河上游到那儿的。正是在那一年，叶尼塞哥萨克马特维·别尔费里耶夫率领一支由 36 名哥萨克和实业者组成的队伍来到勒拿河上游右边一条大的支流维季姆河的上游。队伍乘“纤绳”小船沿河溯流而上。在建好的冬营地度过冬天后，别尔费里耶夫在第二年夏天到达了维季姆河左边的支流、从包恩特湖流出的齐巴河河口。这样一来，M. 别尔费里耶夫在考察了维季姆河 1000 公里的地段后，首次穿越了斯塔诺夫高原，到了维季姆高原。

他从当地埃文基人那儿搜集了关于住在什尔卡尔河（石勒喀河）开采铜矿和银矿的达斡尔人的信息。他们告诉他，从这些矿场走 5—6 天“可以到一条河的河口，而这条河（阿穆尔河——作者注）延伸到大海……”这条河上“住着许多躬耕的达斡尔人”（注 18，281 页）。

哥萨克开始明白，住在齐巴河往上 150 公里注入维季姆河之处的埃文基人在达斡尔人那儿用银子和丝绸交换貂皮，而达斡尔人住在南边，

到他们那儿要翻山走 3—4 天的路。这次侦探出征结束后，M. 别尔费里耶夫编了一本维季姆河的路线图，这幅图被人们使用了不下 200 年。

为了巩固俄国在沿贝加尔地区的存在，1641 年几乎在勒拿河上游的最南端建起了上林斯克城堡。在勒拿河上游度过冬季的俄国人在勒拿河上游（北纬 55°）左边的支流伊尔加河口从当地布里亚特人那儿得知了关于贝加尔湖的情况，那时哥萨克按埃文基语的叫法把它称作“拉马”——大水、海之意。通过他们，哥萨克查明，勒拿河“从源泉流出的”源头就在靠近贝加尔湖的地方，而这个地区有丰富的银矿。

1632 年，曼加杰亚督军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巴里津呈递给莫斯科一份关于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的道路的清单，里面提到了有可能用 20 个星期或更多的时间到达“红海伟大的贝加尔海峡”。按照 П. С. 别克院士的意见，出现在清单中的这个地方（贝加尔海峡）是“我们的文献首次提到贝加尔湖”（注 28，55 页）。

1640—1641 年，督军彼得·戈洛文和马特维伊·格列鲍夫编了“一份清单”，清单图纸载明，“从库塔河向上沿勒拿河到头，沿旁边那些注入勒拿河的河流，穿过可耕地从一条河到一条河有多少航路。通过询问，通古斯王公莫热乌尔科谈到了布拉特人、通古斯人、拉马湖和一些别的河流”，里面还引用了一些重要的关于贝加尔湖和居住在它两岸的居民的信息。通古斯王公告诉督军们：“去年，148 年（1639—1640——作者注）夏天，俄国人——哥萨克乘船沿拉马湖行驶，目的是要探寻它的源头……而那些哥萨克从哪里来？他们早就在湖中航行吗？他们不知道……布拉特人把拉马叫作贝加尔湖……拉马湖中有一个叫奥伊霍恩（奥尔洪岛——作者注）的岛，穿过拉马湖去岛上要一天的航程，那个岛上住着许多布拉特人，有马和各种牲畜，他们那儿生长的粮食是黍子……在拉马湖的另一面住着骑马的布拉特人，通古斯人是骑鹿的，被叫作通古斯卡河和安加拉河的叶尼塞河发源于贝加尔湖……拉马湖的淡水是静止的，里面有各种鱼和海兽，拉马湖通往大海的海峡在哪儿，通古斯人也不知道。”

就是说，清单的编纂者认为，贝加尔湖和大海之间存在着联系。接着，清单宣称，“有 12 条河口”的色楞格河注入拉马湖，谈到了尤其使督军感兴趣的通往中国的道路：“通过那条色楞格河或曰沿着它往上

走水路 10 天可到中国。从色楞格河左边有一条去往那条河的道路，骑马走陆路大约 8 天可以到那儿，那条河流向中国，通古斯人不知道那条河的名字。那条河上的姆加雷人（看来是蒙古人——作者注）开采银矿，而在银矿附近，在那条河上有中国的边境城市，姆加雷人把银子运往布拉特人那儿，而布拉特人从姆加雷人那儿用貂皮换银子。”

在清单中还提到了石勒喀河（阿穆尔河），说它“通过河口注入大海，沿河居住的布拉特人从事畜牧业”（注 28，88—89 页）。毫无疑问，清单中这些信息成为向贝加尔湖派出哥萨克队伍以便把该地区并入莫斯科国家的根据。

至于贝加尔湖的名称，它多半起源于雅库特语。因为雅库特人出走北方前就住在贝加尔湖附近。他们的语言中现在还保留着“巴伊基亚尔”这个单词，它意味着“大海”。很可能，布里亚特人从他们那儿学会了这个词。有趣的是，中国人把贝加尔湖叫作北海——“北方的大海”（中国学者认为，“贝加尔”系北海一词的音转，见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4 页；另据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 页：贝加尔湖原系突厥语，意为“水产丰富的湖泊”。中国汉代称北海，元代称“菊海”，清入关前称北海，18 世纪初图理琛《异域录》称“柏海尔”，《大清一统志》称“白哈尔湖”——译者注）。

哥萨克康德拉季·拉里奥诺维奇·米雅欣的考察向控制沿贝加尔湖地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第一个到达了基廉加河的中游和上游地区，基廉加河是勒拿河上游右边的一条支流，从在西边环绕贝加尔湖的山中流出。1640 年 10 月，他骑鹿越过勒拿—安加拉高原并向住在基廉加河左边支流河谷中的埃文基人收取了实物税。而 1641 年初，米雅欣从勒拿河上游到了基廉加河的源头并收取了毛皮实物税。是他通报了从西面环绕贝加尔湖有两条河从中流出的“拉马山脉”（现在那儿分成了两条山脉：滨海山脉和贝加尔山脉）。

哥萨克五十人长古尔巴特·阿法纳西耶维奇·伊万诺夫第一个发现了从勒拿河上游到贝加尔湖的道路。他和一支由 73 名哥萨克和实业者组成的队伍从勒拿河上游左边的支流库廉卡河河口被派往南方并于

1643年7月到了贝加尔湖的西岸，在纬度 $53^{\circ}$ 之处小海（贝加尔湾）外面发现了奥尔洪岛。

同当地布里亚特人的冲突以哥萨克的胜利而告终，之后K.伊万诺夫派出了一支以谢苗·斯卡拉霍特为首的由36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乘建好的平底木船沿贝加尔湖北岸出发。斯卡拉霍特到了湖的最北端，发现了上安加拉河口并在那儿建立了冬营地。1643年底，斯卡拉霍特带着队伍中一半的人从冰上几乎走到了巴尔古津河河口，在同布里亚特人的战斗中他和自己的同伴全部阵亡。留在上安加拉河口过冬地的哥萨克被布里亚特人包围，但半年后他们冲出了包围并于1644年夏天到了布拉特城堡。

古尔巴特·伊万诺夫在奥尔洪岛建立基地的同时，向沿湖自愿接受俄国国籍的布里亚特人征收了实物税。9月中旬前他编了一本“贝加尔湖的地图，包括注入贝加尔湖的河流和属于贝加尔湖的土地”——这是第一本贝加尔湖的地图册，很遗憾，这份图纸没留存下来（注18，282页）。到1645年春天，他又搜集了许多关于沿湖地区的资料并编制了勒拿河上游和贝加尔湖的地图册。

无疑，贝加尔湖独特的大自然风光给哥萨克和实业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是这样一种，就像留给17世纪著名的宗教活动家大司祭阿瓦古姆那种印象，他从1653—1663年在托博尔斯克和达乌利亚（17世纪时，俄国人所谓的达乌利亚或达斡尔地方系指包括石勒喀河流域和黑龙江中上游一带在内的中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译者注）流放地度过了10年，在他所写的《传记》中曾回忆起在贝加尔湖逗留的时刻：“当靠岸时起了风暴，在岸上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避风浪之地。它四周的山很高，森林无法通行，悬崖是石头的，像一堵墙，环视要折弯了脑袋！悬崖绵延两万多俄里，哪儿都没见过。它们上面仿佛是帐篷、会客室、大门和柱子，篱笆是石头的，还有院子——一切都是上帝的杰作。那儿生长着葱头和大蒜——比罗曼诺夫的蒜头个儿大，很甜。那儿还生长着靠上帝的救济长成的大麻，而院里草鲜花香。鸟儿成群，鸭子和鹅在海中游荡，像雪花飘飘。里面有鱼——鲟鱼、折乐鱼和凹目白鲑、鸦巴沙（一种淡水鲑鱼），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鱼。水是淡水，里面的北欧海豹和兔子（海上的——作者注）很大——在大海里（生活

在梅津河时)没见过这样的。里面的鱼密密麻麻:鲟鱼和折乐鱼很肥——在锅里不用炸:反正有油。所有在基督那个世界里为人搞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在满足时赞扬上帝。”(注45,126页;注6,133页)

1643年,为了寻找银矿从叶尼塞斯克往贝加尔湖派出了一支以哥萨克首领瓦西里·卡列斯尼科夫为首的由100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年底他到达了湖的北岸并在靠近安加拉河源头建造的城堡里过了冬。1644年夏天,他乘平底木船到达上安加拉河口并在冬营地建立了城堡。大概正是从那儿,第二年,1645年为了在外贝加尔寻找“新土地”他派出了哥萨克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莫斯科维金和另外3个哥萨克。他们在湖冰上乘张着帆的雪橇到达了巴尔古津湾,然后沿巴尔古津河河谷向上进发。当地居民中的向导带领哥萨克翻过伊卡特山岭(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北部,贝加尔湖东边不远处——译者注)往东去。道路异常艰辛,因为山中覆盖的积雪厚达2米多。

莫斯科维金来到维季姆河的源头并拐向南方,然后经过叶拉夫宁湖(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乌达河与维季姆河分水处——译者注)地区泥泞、多沼泽的地段到达了乌达河源头,而沿这条河可以到色楞格河。哥萨克没有发现银矿,蒙古也不许他们进入,但莫斯科维金带回了关于鄂嫩河的信息,他们离该河只剩下6天的路程,沿该河乘船可以在6天内到达注入“冰冻的海”的石勒喀河。他了解到这条河很大,沿河住着种粮食和蔬菜的定居的人(注18,283页)。

由于首领瓦西里·卡列斯尼科夫的独断专行,1644—1647年间哥萨克同当地布里亚特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因为叶尼塞斯克方面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所以1647年5月底为了帮助他派出了以贵族子弟伊万·巴哈波夫为首的一支100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巴哈波夫对外贝加尔边区并不陌生,1644年他就曾第一次同30名“自愿者”到过下色楞格河地区并在那儿征收了实物税。

巴哈波夫沿着湖的西岸和南岸到了色楞格河。无数次同布里亚特人的小规模冲突伴随着他的出征。巴哈波夫要再次征收实物税导致了下色楞格河和乌达河地区当地布里亚特人的持续反抗,直到1655年布里亚特人才彻底放下了武器。返回贝加尔湖之后,巴哈波夫在湖的西南部建

立了城堡。

1648年叶尼塞斯克哥萨克首领伊万·卡尔金的队伍沿贝加尔湖的东岸到达了巴尔古津河河口，并于夏天在离河口大约50公里之处建成了巴尔古津城堡，该城堡成为先驱者进一步向外贝加尔地区推进的主要基地。第二年他向居住在沿上维季姆河支流和叶拉夫宁湖地区的埃文基人收取了实物税。他，可能只有他的哥萨克到过维季姆河中游左边的支流姆亚河河谷。几个被他从叶拉夫宁湖派往东方的哥萨克越过雅布洛诺夫山到达了石勒喀河，但由于食物缺乏他们被迫于1650年返回。他们的讲述充实了此前先驱者所搜集的关于流向东方不知名的大海的一条大河——石勒喀河—什尔卡尔河（阿穆尔河）的资料。

在17世纪中叶已经有几支先驱者的队伍驻扎在外贝加尔地区。其中的一支在雅库茨克奠基者、贵族子弟彼得·别盖多夫带领下于1653年完成了沿色楞格河向上、往南的出征，然后又拐向东方沿希洛克河进发，在那儿建立了伊尔盖恩城堡（伊尔盖恩湖附近）和石勒喀城堡（在未来的涅尔琴斯克地区）。

与贝加尔毗连的土地并入莫斯科罗斯版图的进程比较快。问题在于，尽管最初当地部族对先驱者进行了抵抗，但相当部分的原住居民在同蒙古封建主袭击的斗争中宁愿依靠俄国人。在贝加尔地区建造的这些设防城堡在很长时间里保护了俄国人和当地居民免遭敌人的侵犯（注2，37页）。

17世纪中叶，俄国人建立了一系列据点（这是指除上述城堡之外的城堡）：安加拉河上游的巴拉干斯克、维季姆河上游右边支流处的杰列姆宾斯克（1659）、乌达河口的乌金斯克（1665）（从1783年称上乌金斯克，1934年改称乌兰乌德至今）、色楞格河右边的支流希洛克河河口处的色楞金斯克（1665）、涅尔琴斯克（中国称之为尼布楚——译者注）和其他一些城堡。

1658年在涅尔琴河注入石勒喀河之处修建的军事—行政中心（未来的涅尔琴斯克）设有独立的督军府，它的建立对控制外贝加尔地区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城堡的建立使得俄罗斯之外通往达乌利亚和阿穆尔的道路的畅通得到了保证。

俄国人在贝加尔地区的地位得到彻底的巩固是同伊尔库茨克的建立

联系在一起的。1652年，И. 巴哈波夫起初在安加拉河左边的支流伊尔库特河河口附近的恰奇伊小岛上建起了收缴实物税的冬营地。9年之后，在安加拉河右岸、伊尔库特河口对面建起了很快成为伊尔库茨克市的城堡，在随后的100年中它变成了东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

## 哥萨克和实业者向鄂霍次克海沿岸进发

莫斯科维金不仅是第一个到达太平洋沿岸，发现了鄂霍次克海，可能看到了尚塔尔群岛的俄国人，而且把第一批关于阿穆尔河的可靠资料带到了雅库茨克。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已经足够多了，因此在给最早的新土地发现者排位时，他有权获得一席之地。

——И. М. 扎别林《消失的会见》

17世纪30年代，俄国哥萨克和实业者为了寻找“新土地”以勒拿河城堡和冬营地为基地，从勒拿河口沿海路向东方进发，或直接走陆路向东，或沿勒拿河和它右边的支流向南。从当地部落传到他们那儿的是一些混乱的消息：东面有一片辽阔的海洋，而在南边山脉的那边流淌着一条宽阔、水大而深的河流“奇尔卡尔河或什尔卡尔河”（显然，这无疑说的是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

1636年1月11日，托木斯克的哥萨克首领、五十人长德米特里·叶毕发诺维奇·卡贝洛夫，军役人员法玛·费杜洛夫和叶尼塞书吏盖拉西姆·季莫费耶夫向托木斯克督军伊万·伊万诺维奇·拉莫达诺夫斯基公爵递交了一份呈文，内称他们确认知道“西维柳伊河上的道路，那条河上住着许多通古斯人……而从那些通古斯人那儿没给您阁下收到实物税，在那些土地上也没有您阁下的军役人员”（注30，24页）。递呈文者请求公爵允许他们去往那条河并为考察提供武器和粮食。

督军派了10名哥萨克骑兵和40名哥萨克步兵随同卡贝洛夫一起出征。1637年，卡贝洛夫带队从托木斯克前往“勒拿河小块土地”，队伍中甚至包括书吏和铁匠“以便处理火绳枪的维修和所有的船舶事务”（注32，21页）。大概在雅库茨克没人能告诉他通往这条神秘的河流

（在其两岸有可能获取许多“软动产”）的道路。无论这看来多么奇怪，但哥萨克首领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1638年春天，卡贝洛夫带着从雅库茨克找的外号奇斯德伊（纯洁之意）的翻译谢苗·彼特洛夫沿勒拿河下到了它右边的支流阿尔丹河的河口，然后用5个星期的时间利用撑杆、纤绳沿河溯流而上。7月底，在阿尔丹河右边的支流马亚河河口往上100公里之处卡贝洛夫建立了布达里冬营地并向四周的埃文基人和雅库特人收取了实物税。这个过冬地成了勘察队探索去往不知名的大海和河流的道路的基地。

正是在那儿，在布达里冬营地得到了最早的关于在注入大海的奇尔卡尔河下游有一座银山（阿扎尔山）（位于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左岸，北纬49度处——译者注）的信息。要知道那时的罗斯极其缺乏银子，正因为如此，1638年底当局决定从阿尔丹河派出一个专门的考察团去寻找这座山。

1638年深秋，卡贝洛夫向阿尔丹河上游派出一支哥萨克队伍去搜寻隐秘的“奇尔卡尔河”，但因食物匮乏被迫返回。通过询问当地居民哥萨克了解到，在朱格朱尔山脉的那边有大海，于是产生了派遣考察团去往奇尔卡尔河口寻找这个大海的想法。

1639年5月，为了侦探通往这个不知名的大海的道路，卡贝洛夫派出了一支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万·尤里耶维奇·莫斯科维金为首的由19名托木斯克和11名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哥萨克组成的队伍。队伍里有一名叫涅哈罗什卡·伊万诺维奇·卡拉波夫的哥萨克，他在稍晚些时候，1646年1月像莫斯科维金一样写了一本在莫斯科维金队伍中服役的《故事集》。通过这些《故事集》我们了解到，通往鄂霍次克海的道路是怎样被发现的。

现在我们引用卡拉波夫家的哥萨克涅哈罗什卡·伊万诺夫在《故事集》中所说的一段文字：“去年，147年（1639年——作者注）从阿尔丹河上的布达里城堡派出了托木斯克的哥萨克首领德米特里·卡贝洛夫、托木斯克的军役人员莫斯科维金家的伊瓦什卡·尤里耶夫，另外30名哥萨克去往大海洋（通古斯语叫拉马）为国家服役。他们穿过阿尔丹河向下到达马亚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朱格朱尔山脉的西北部——译者注）用了8个昼夜，而通过马亚河向上到连水陆地走了7

个星期，乘小平底木船从马亚河穿小河到笔直的连水陆地花了6天，再用一天穿过连水陆地到达乌利亚河的尽头，乘平底木船沿乌利亚河往下用了8个昼夜，他们在乌利亚河造了大船，漂洋到海，到了乌利亚河注入大海的河口（位于鄂霍次克海的西海岸，北纬49度，东经142度处——译者注）用了5个昼夜。在这儿，在河口他们建立了带小城堡的冬营地。”（注31，51页）

1639年6月，莫斯科维金的队伍到达马亚河不久就得知，作为翻译陪同哥萨克的通古斯人中有两个到过阿穆尔沿岸的女人。她们第一个告诉哥萨克，奇尔卡尔河下游还被称作“奥穆尔”或“阿穆尔”。于是俄国人第一次了解到“阿穆尔”这个新的称呼，后来著名的荷兰地理学家H. 维特森把它叫作“莫斯科词汇”（注33，18页）。

这条陌生的新线路既困难又危险。哥萨克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把船拖过了小河。途中，在克服连水陆地和河流濒山地段的瀑布时，哥萨克不止一次被迫扔掉旧的平底木船和大船并建造新的。这真是一条通往不知何方的道路。

哥萨克从布达里冬营地乘坐船体用木板钉成的平底小木船（平底的帆—桨河船）开始了航行。沿马亚河上行时哥萨克主要使用纤绳，但也用桨和竹篙。从马亚河起，他们开始沿着从左边（接近东经138.2°）注入马亚河的不大的小河努德米河航行。在它的河口哥萨克放弃了已经无法继续使用的小木船，看来是因为它的吃水量太大。他们建了两艘平底木船继续沿河上行。再往前，道路在被他们发现的朱格朱尔山脉中比较短的山隘间穿行，这是一座把勒拿河水系和注入鄂霍次克海的河流隔开的山。

在山隘他们被迫扔掉了平底木船。在乌利亚河支流的上游他们建造了新的平底木船并乘着它们到达了瀑布。他们把平底木船留在这儿，在瀑布下面制作了大兽皮艇和被卡拉波夫称为“大船”的能载30人的小船。

这样，1639年8月，莫斯科维金的队伍首次到达了人们称作拉马海（拉马来自通古斯语，大水之意，现在的鄂霍次克海）的海洋。俄国哥萨克和实业者通过自己不懈的追求，沿着无边无际的辽阔的西伯利亚向东、迎着太阳，最终到达了远东大海的沿岸地区。

莫斯科维金的哥萨克在乌利亚河口建起了几所小木屋，在木屋的周围用由许多尖头向上的圆木紧紧扎在一起的栅栏围起来，还挖了堑壕。这个不大的城堡成了历史上俄国人在远东沿岸地区第一个有名的村庄。

哥萨克开始熟悉远东的大自然，尤其使他们惊奇的是当地河里那丰富的鱼类和沿海泰加森林里的貂。在描写这次出征的《故事集》里有最早的关于太平洋鲑科鱼类的信息：大马哈鱼、北鲑鱼、北嘉鱼、银鲑鱼。卡拉波夫在《故事集》中指出：“他们从那个小城堡出发跨海去鄂霍塔河（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发源于松达尔—哈亚塔山脉——译者注）要3个昼夜，而从鄂霍塔河到乌拉克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发源于乌拉克高原的西麓——译者注）要一昼夜……那些河是貂的天地，各种兽很多，还有鱼，而鱼很大，西伯利亚没有这样的，用他们的语言叫作斑鲑、嘉鱼、马哈鱼、驼背女人，鱼多得数不清，只要把大渔网撒下去，无论如何也拉不上来一网鱼。河水很急，那条河里的鱼被急流杀死并被抛到岸上，岸边躺了一片，像一堆劈柴，水獭一类的兽和红狐狸就吃那些躺着的鱼，那儿没有黑狐狸。”（注26，51页）

沿乌利亚河居住着拉姆特人或者像哥萨克所称呼他们的“徒步的通古斯人”（他们不繁殖鹿，现在人们称他们为埃文尼人）这是一些生活在氏族制度下的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捕鱼者。卡拉波夫描述了他们的武器和工具：“在那条乌利亚河上有貂，他们那儿有其他各种野兽，他们打仗用弓箭，标枪和羽形矛的箭头都是骨头做的，而铁的很少；他们砍树、劈柴，制作帐篷用石质和骨质的斧头。”（注31，51页）

从当地拉姆特人那儿哥萨克了解到，他们冬营地北边有一些注入大海的河流，沿河两岸住着较多的当地居民。因此莫斯科维金于10月1日派20名哥萨克乘河船沿海岸往北航行。经过3昼夜他们到了乌拉克河口，而后又过了一昼夜到了称作“鄂霍塔”（来自埃文基词汇“阿卡特”：河流——作者注）的河流。哥萨克从那儿越海继续往东，沿北部海岸行驶了500多公里。在航行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几条不大的河的河口和与陶伊河河口在一起的陶伊海湾。

1639—1640年冬天莫斯科维金在乌利亚河口建造了两艘不大的、“8俄丈长的”用于海上航行的果奇（北方沿海地区传统的帆—桨船，长约17米，用于在北方海上航行），这是俄国人建造的最早的用于在

远东海上航行的海船。

哥萨克试图劝说埃文尼人自愿交纳实物税，但他们拒绝了并发动了猛攻，在消灭了城堡的保卫者后还企图夺取城堡。结果被哥萨克抓了几名人质，他们腿上被捆上了木块扔到了由一个哥萨克看守的“官方的办公室”里。当大部分哥萨克在河边的木头埠头上建造果奇时，8个拉姆特部族联合起来向城堡发动了攻击。

拉姆特人进入城堡，用“棕榈”（捆在木棍上的刀子）刺死了看管人质的哥萨克，身后拖着木块的人质奔向解救者。此时，一个哥萨克杀死了拉姆特“王公”。用哥萨克的话说：“所有那些通古斯人开始围着他哭泣。”这时，河边的木头埠头上的哥萨克及时赶到了城堡。措手不及被俘的哥萨克及时穿上盔甲扑向进攻者。向城堡的进攻最终被粉碎了，哥萨克还抓获了7个拉姆特人，其中有一个“著名的男子汉”（注30，35页）。

1640年春天，当地的部族首领“开始给莫斯科维金讲述，从他们那儿往夏天那个方向（往南——作者注）往右，沿海岛住着通古斯人的一支——定居的基里亚克人（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尼夫赫人的旧称——译者注），他们有养肥了的狗熊。在他们到来之前，大约500名留大胡子的达斡尔人乘平底木船来到乌第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中部，注入乌第湾——译者注）口打败了那些基里亚克人。他们穿大褂（区别于通常的通古斯服装——作者注），而打败他们是用了诡计：他们船上的桨手都是同村的婆娘，他们本身或100人或80人躺在那些婆娘之间，当接近基里亚克人时，突然从船上冲出来，就这样打败了基里亚克人。战斗时他们使用斧头，而他们全都穿着镶有金属饰件的盔甲（一种独特的盔甲——作者注）。他们的人把俄国人称作自己的兄弟。他们的人住在阿穆尔河沿岸，靠右边、朝向夏天那一面。他们家家户户有粮食、马、牲畜、猪、鸡，会酿酒、编织、纺线，带有俄国人所有的风俗（像俄国人一样——作者注）。在他们和那些通古斯人之间，不到穆尔河（阿穆尔河——作者注）河口之处住着孤僻的有自己世系的定居的通古斯人。而那些孤僻的人很富有，他们那儿貂、兽和鹿很多，在同大胡子的达斡尔人交易时用来交换粮食和米。他还谈到了银子，说那些留大胡子的达斡尔人也有银子”（注31，51—52页）。

这是最早的关于居住在鄂霍次克海西南岸和阿穆尔河口沿岸的民族可靠的资料之一，现在人们把坐着的也就是定居的基里亚克人叫作尼夫赫人。把圈着的狗熊养大同当地一种独特的风俗有关：在隆重的节日里要杀死养肥了的熊。关于这一点，人种志学家 Л. Я. 施泰因伯格指出，这些与熊有关的节日“在基里亚克部落的社会交往中起着这样一种作用，就像很久以前希腊奥林匹克竞技和其他的竞技所起的那种作用”（注 31，54 页）。“留大胡子的达斡尔人”——这是长得像蒙古人的通古斯人，他们是与蒙古人杂交的埃文基部族。

在得到所有这些信息之后，莫斯科维金于 1640 年春天利用被俘的埃文尼人作向导踏上了向南的航程。他沿着鄂霍次克海的西岸到了乌第湾，到乌第河口看了一下，从南边绕过尚塔尔群岛到达萨哈林湾。在乌第河口当地居民向莫斯科维金证实，在阿穆尔河及其支流齐耶河和奥姆季河（最有可能说的是结雅河和阿姆贡河）还有一些岛屿上的确住有基里亚克人和达斡尔人。

在萨哈林湾西岸的某处向导跑掉了，但莫斯科维金继续沿着海岸航行到了住有“通古斯人的一支——坐着的基里亚克人”的群岛（注 10，152 页）。

许多研究地理发现的历史学家认为，莫斯科维金看见的是阿穆尔河口北边入口处一些不大的岛屿（现在的奇卡洛夫岛和拜都科夫岛），以及萨哈林岛西北岸的一部分：“基里亚克土地出现了，还有炊烟升起，但他们（哥萨克——作者注）没有向导带路不敢进去。”还是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显然，莫斯科维金成功地深入到了阿穆尔河口地区。照他们的意见，在卡拉波夫的《故事集》里非常明确地说过，哥萨克“越过‘浅滩’——海边的沙嘴后看见了阿穆尔河口”（注 31，52 页）。

的确，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卡拉波夫搞错了，因为宽阔的阿穆尔湾同一般的河口不一样。因此他们认为，莫斯科维金到达的只是在尚塔尔群岛对面注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河口。而关于阿穆尔河原住居民的信息，他们说，莫斯科维金开始是从鄂霍次克海沿岸当地居民那儿了解到的。在他的《故事集》里曾提到过萨哈林岛的爱奴人（日本北海道的虾夷民族，以前俗称爱奴——译者注），但要知道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莫斯科维金和他的哥萨克压根儿就没有

登上萨哈林岛。不过无论怎样解释卡拉波夫的《故事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莫斯科维金哥萨克部队的功勋是显而易见的并引起了后代人的赞叹。

哥萨克的食物耗尽了，莫斯科维金返回了北方。11月他开始在阿尔多马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扬—麦斯克地区，注入鄂霍次克海——译者注）河口过冬，没有来得及去往乌利亚城堡。只是到了1641年春天莫斯科维金才同他的部队越过朱格朱尔山脉来到马亚河的一条支流并于7月中旬之前携带大量“软动产”——貂皮到达了雅库茨克。

莫斯科维金的发现引起了雅库茨克督军们对拉马海沿岸地区的兴趣。根据莫斯科维金的报告，古尔巴特·伊万诺夫绘制了最早一批关于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地图。尽管这些图纸很可能没有保存到今天，但古尔巴特1642年的呈文却提到了它们。

应当指出，作为一个有着看来是广阔视野的文人，古尔巴特·伊万诺夫不止一次地热衷于编辑东西伯利亚不同地区的地图。在上面提到的他的第一幅图纸编成后，雅库茨克督军又招他来编纂一幅新的要囊括更加广阔的领土的地图——包括勒拿河与它主要的支流（维季姆河、基廉加河、阿尔丹河和维柳伊河）、奥列尼奥克河以及通往当时哥萨克已经到过的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道路。

为了寻找新的通往“海洋”沿岸的道路，1641年秋天从因迪基尔卡河上的奥伊米亚康城堡往南方派出了一支由18名哥萨克和20名雅库特向导组成的马队。队伍由哥萨克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卡列雷伊率领。这支勘察队多半是沿着因迪基尔卡河左边的支流贵都孙河河谷进发的。鄂霍塔河的源头位于跨越松达尔—哈亚塔山脉的隘口之外，而贵都孙河的发源地距离鄂霍塔河的源头不远。道路接着向注入鄂霍次克海的鄂霍塔河源头延伸。正是卡列雷伊通报了这条沿“注入大海”的河流延伸的道路的信息。哥萨克总共用5个星期走完了这条长达500公里的道路。埃文尼人通常骑着鹿沿这条路迁徙。这大概是从俄国人已知的勒拿河流域通往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最近的道路。

1646年安德烈·卡列雷伊在询问谈话时讲述了这次著名的考察：“米哈尔科·斯塔杜辛从那条奥莫康河（奥伊米亚康河的别称——译者

注) 派他, 安德留什卡, 和比他们提前到那儿的 18 个军役人员和一些雅库特人及 20 匹马翻山去往鄂霍塔河的尽头……而那些通古斯人、拉姆特男人, 许多骑鹿的人组成鹿橇队 (把鹿套在窄长雪橇上行进的队伍——作者注) 沿着鄂霍塔河向下、向海边迁徙。于是他们那儿开通了一条大路, 他们沿着鹿橇队走过的道路向下穿过那条鄂霍塔河去往大海……”

“鄂霍塔河里有貂, 各种野兽也很多, 是一条多鱼的河。他们骑着马过河, 马匹在鱼群中勉强走过。河流很急, 急速的水流打死了鱼并将其抛到岸上, 于是满是鱼的岸边像是堆了一堆劈柴。而那些拉姆特男人沿河支起的坐着的 (定居用的) 帐篷就像俄国人巨大的市镇。他们所有的储备都是鱼, 鱼皮袋里的鱼干和鱼子。他们的储备品很丰富, 如同俄国人用库房存粮一样, 他们把大量储备的鱼堆放在帐篷里。而他们从奥莫康河到鄂霍塔河往返一趟总共要 5 个星期……他们打仗用弓箭, 标枪头儿是骨头的, 作战时骑鹿, 追赶时乘马。当时他们军役人员伤了两个人。” (注 31, 55、56 页)

1645 年来临了, 俄国哥萨克完成了第一次从阿穆尔河口到拉马海的航行, 这是一次最早记录在 17 世纪古老文献中的航行, 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在这一年的 5 月底, 当阿穆尔河口解冻时, 文官首脑 (雅库茨克督军办公厅长官) 瓦西里·达尼洛维奇·波雅科夫带领他的哥萨克沿结雅河和阿穆尔河经长久、危险的航行, 随之在阿穆尔河口过冬后来到了阿穆尔湾。再向北拐, 哥萨克来到了萨哈林湾。他们乘坐的带另外加长附加物 (船外壳板上面的船舷木板, 用以增加船舷的高度、船的容量和稳定性) 的河船是用过冬时准备的木材制作的。

这次沿着狂怒的、不友好的大海进行的危险航行持续了 3 个月。哥萨克沿海岸航行, 绕过了“所有的海湾”。风暴中, 平底小木船被抛到了一个大岛上 (很可能是尚塔尔群岛中的一个)。9 月初, 船到达了乌利亚河口。波雅科夫留了下来, 在这儿的的一个由莫斯科维金于 1639 年建造的小城堡里过冬。

第二年初春, 在乌利亚冬营地留下以叶尔米尔·瓦西里耶夫为首的 17 名哥萨克后, 波雅科夫的队伍乘雪橇和滑雪到达马亚河上游。哥萨克在那儿建造了小船, 然后乘船沿马亚河、阿尔丹河和勒拿河返回了雅

库茨克，完成了沿河路、海路和陆路，总长度达 8000 公里的最困难的一次旅行，损失了几乎 2/3 的队员，而且他们的道路所经过的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地区（注 18，300 页）。

1646 年夏天，一支以队长谢苗·什尔果夫尼克为首的由 40 人组成的哥萨克队伍从雅库茨克被派往拉马海沿岸地区，队伍中包括阿列克谢·菲力波夫。拉马海（鄂霍次克海）埃文尼部落首领“阿拉姆恩王公丘纳”作为向导随队出发。他早先来到奥伊米亚康，后被送到雅库茨克，他在那儿对鄂霍塔河作的记述非常有价值。

队伍走的道路基本上重复了莫斯科维金的路线。越过朱格朱尔山脉后，队伍沿着不大的西克沙河下到了乌利亚河。哥萨克直接在西克沙河河口建造了过冬地，西克沙名称的由来同它岸边生长着大量的球果（什克什）或者岩高兰浆果有关。直到春天队伍才沿着乌利亚河到达了拉马海沿岸。就在它的河口处，被波雅科夫留在那儿的哥萨克叶尔米尔·瓦西里耶夫等加入了什尔果夫尼克的队伍。哥萨克从乌利亚河口来到鄂霍塔河口（埃文尼人称为鄂霍奇河），他们在那儿粉碎了当地埃文尼人的反抗，在距离河口 3 公里的地方建造了城堡，联合队伍一行 54 人就在那儿过了冬。

就是鄂霍塔河口这个过冬地后来成为一个中心，从那儿开始了控制整个沿岸地区的行动。这并非偶然，鄂霍塔河口位于沿岸地区低地的中心，17 世纪前半叶正是这个地区聚集了最多的当地的部落。众所周知，这个地区盛产鱼类，实际上成为拉马海沿岸地区一个关键的位置。所以随着作为辽阔边区中心的鄂霍次克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增强，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把海也称为鄂霍次克海，于是它在地理地图上的称谓最终固定了下来。

1648 年 6 月，一支有 26 名哥萨克的队伍在叶尔米尔·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菲力波夫率领下乘坐在鄂霍塔河口建造的两艘果奇出海往东进发。果奇来到伊尼亚河口（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东北部与马加丹州的交界处——译者注）并进入该河注入其中的浅水海湾。在那儿他们被迫忍受拉姆特人的进攻。哥萨克在伊尼亚河坚持了 5 天，但他们发现，埃文尼人又在重新聚集起来向他们的营地发动进攻，于是撤到了海上。

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受损的果奇被抛到了岸边的沙砾地带。当风暴稍微平息一些时，哥萨克修好了船又重新出海。他们经过石头海岬（里相斯基半岛）继续往东，用了一昼夜的时间到了莫德克列伊海湾（在陶伊湾西岸附近，现在马加丹市位于海湾的沿岸地区）。哥萨克观察到了远处的斯巴伐里耶夫岛、达兰岛等。

哥萨克在莫德克列伊河（准确地说，它们是两条：大莫德克列伊和小莫德克列伊河）河口地区度过了3年。这儿的莫德克列伊埃文尼人拒绝自愿交纳实物税，于是开始了小规模冲突。在冲突过程中，哥萨克抓了一些人质，以便迫使埃文尼人缴纳实物税。

1649年4月15日，埃文尼人烧毁了冬营地，但这次哥萨克成了胜利者，因为他们缴获了许多拉姆特人的武器。哥萨克在一段时间里受饥饿的困扰，因为埃文尼人干扰他们捕鱼，他们要逼走这些外来人。直到1651年的7月15日阿列克谢·菲力波夫才和同伴们返回了鄂霍塔河。

哥萨克在那儿很难同埃文尼人和平相处。谢苗·什尔果夫尼克派急使前往雅库茨克，请求派遣100名哥萨克前来相助。他保证，如果埃文尼人开始缴纳实物税，那么“通过收取实物税将获得巨大的利润”。1650年，在谢苗·伊比舍夫率领下的一支新的队伍被派往鄂霍塔河，但直到1651年6月3日他们才到达鄂霍塔过冬地。当伊比舍夫他们的果奇到达河口时，用他的话说，有上千名埃文尼人挡住了哥萨克前往鄂霍塔河的去路。伊比舍夫冲入鄂霍塔河并找到了事实上被围困在过冬地的20名哥萨克，他们被坏血病折磨得瘦弱不堪。他们中已经没有已于1648年死去的谢苗·什尔果夫尼克。

谢苗·伊比舍夫教会了患坏血病的哥萨克怎样制作松柏果药酒，还从什尔果夫尼克队伍的地方官那儿接受了4年期间作为实物税收上来的“软官款（指貂皮）”并继续同埃文尼人中的“优秀男人”就今后自愿交纳实物税进行谈判。在哥萨克沿鄂霍塔河和古赫杜依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流经尤多马山脉和古赫杜依山脉之间的峡谷，注入鄂霍次克海——译者注）向上进发去收缴实物税期间始终伴随着新的小规模的冲突。

1652年3月，伊比舍夫把所有收上来的实物税发往雅库茨克，并指派一支22名哥萨克队伍押送这笔“软官款”。阿列克谢·菲力波夫

也在这支队伍中，他在那儿通报了自己海上出征的情况，这是俄国人继莫斯科维金的哥萨克之后第二次证据确凿的沿鄂霍次克海北部沿岸地区的航行。

最主要的是，菲力波夫编纂并向当局递交了一份“清单：从鄂霍塔河经海上前往伊尼亚河、莫德克列伊河时沿海岸都有什么地方，位于何处，有多少条通道，道路的地理位置，有怎样的大河、小河，在哪儿注入大海，那些岛上的海兽都卧在哪儿”，这是第一份鄂霍次克海北部沿岸地区的航海图志，里面描述了从鄂霍塔河到陶伊湾长达500公里海岸的情形（注30，22页）。正是在这份海图中第一次标出，在这个地区一些不大的河流的河口处有许多无处不在的长形沙滩（“浅滩”）。根据这份图纸可以确定哥萨克划船前进的速度：果奇靠“自己的动力”每天可行20—25公里。

海图指出，河里的鱼多还是少，河边有无土著人的宿营地，尤其重要的是标出了海象栖息处的位置：“从一条小河马沙河看得见海象栖息的马多苏海岬，那上面海象的栖息处绵延两俄里长……莫德克列伊河口对面的岛上有许多海象。”（注30，53页）

菲力波夫指出，鄂霍次克海有可能存在“野兽牙齿开采地”，也就是获取海象的獠牙。最终在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全面开始了猎取“鱼牙”的行动。现在能够指出的只是一个令人忧伤的事实：鄂霍次克海中已找不到一只海象，它们全都成了人们猎取有价值的长牙的牺牲品。现在海象只生活在太平洋（似应是北冰洋——译者注）中的楚克科海岸边，而且那里它们的数量也不多。

鄂霍塔河上俄国城堡的命运飘忽不定。1655年，贵族子弟安德烈·布雷金从雅库茨克被派去接替伊比舍夫。当他同自己的队伍到达乌利亚河口时，他却惊异地在那儿遇见了伊比舍夫。原来埃文尼人烧毁了鄂霍塔城堡，军役人员全都迁到了乌利亚河。布雷金只好通过战斗重新突入鄂霍塔河并在那儿建立了新的城堡。在他于1659年之前在鄂霍塔河逗留期间，他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捍卫俄国人在太平洋沿岸这个重要的据点。

不久，人们开始考察鄂霍次克海沿岸北部地区。1651年冬末，著名的新土地发现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塔杜辛的队伍从阿纳德

尔河乘雪橇和滑雪前往南方的品仁纳河（注入鄂霍次克海的品仁纳湾）。在品仁纳河流域哥萨克遇到了俄国人所不熟悉的一个新的民族——科里亚克人（堪察加半岛的民族之一）。1651年4月5日，队伍到达品仁纳河右边的支流阿尔盖依河（现在的奥克兰河）。那儿有科里亚克人设防的村落，哥萨克占领了它。斯塔杜辛和他的哥萨克费劲气力找来了木材，建造了适于海上航行的小船（很可能是大兽皮艇）。当地的科里亚克人告诉他，海那边有一条吉日加河，那儿有木材，貂也很多。

斯塔杜辛从品仁纳河口来到注入鄂霍次克海吉日加湾的吉日加河口。他在那儿建造了城堡并度过了冬天，同时要不断地击退武装的科里亚克人的进攻。的确，在他之前以伊万·阿伯拉莫维奇·巴拉诺夫为首的35人的哥萨克部队已经到过吉日加河。正是后者沿着科雷马河的支流奥莫隆河到了它的上游并越过已属于吉日加河流域的河谷，沿着河谷来到了大海。因此，是巴拉诺夫发现了把科雷马河同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连接起来的道路。

但让我们继续关注斯塔杜辛和他的部队。1653年夏天，斯塔杜辛和他的哥萨克离开了吉日加河，继续沿海岸航行。他们沿舍利霍夫湾西部沿岸航行，于夏末到达了陶伊河河口。就这样，哥萨克首次从轮船的甲板上仔细观察了鄂霍次克海北部沿岸大约1000公里地段的情形。在陶伊湾沿岸住着通古斯人，但在这儿收取实物税同样伴随着小规模冲突，有时还要扣押人质。

斯塔杜辛在陶伊河口建造了小城堡，在那儿度过了大约4年，向周围的居民收取了实物税，猎取了大量的貂。直到1657年夏天他才沿着海岸往西到了鄂霍塔河口，那儿已经有了俄国人的城堡。他从那儿开始往雅库茨克去，1659年夏天他经奥伊米亚康和阿尔丹走了一条最近的道路到达了雅库茨克。斯塔杜辛把自己沿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海路航行时走过的道路绘成了一张图纸（注34，46页）。

这样，在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牺牲和艰苦劳动的代价后，俄国哥萨克和实业者基本上发现了除堪察加半岛西部沿岸地区之外的所有的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带，而对堪察加西岸的考察则是后来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完成的。

重要的是，哥萨克考察并找到了一些从雅库茨克到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最近、最方便的道路。所有这些道路都沿着勒拿河的支流阿尔丹河及它右边的支流马亚河延伸，17世纪中期在马亚河上建起了马亚冬营地，从这儿可以顺着“秋天的道路”“轻装”骑鹿用4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通往大海的乌第河。从阿尔丹河口到濒海地区的路程总共需要3个月的时间。

另一条路顺马亚河向上到沃洛羌卡。乌利亚连水陆地从那儿开始，“载重雪橇”（就是雪橇拉着货物）用8—14周通过这段连水陆地到达注入乌利亚河的西克沙河，而后沿乌利亚河下到鄂霍次克海。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乌利亚河多急流，所以沿河航行不容易。哥萨克指出，“河水湍急，沿河危险之处甚多……”例如1651年，谢苗·伊比舍夫的船“被抛到了石头上……在乌利亚河中间”，“只是托上帝的福人被勉强救出”。此前，谢苗·什尔果夫尼克的船就在石巨人附近被打碎。可以用8个星期的时间从马亚冬营地沿乌利亚河到达海边。

17世纪下半叶人们经常使用从马亚河到鄂霍塔河的路线。这条路沿马亚河向上到达尤多马河河口，接着沿尤多马河向上到格尔比查河口。通往乌拉克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鄂霍次克地区，在鄂霍次克市西南20公里处注入鄂霍次克海——译者注）支流波鲁特纳亚河或直接通往乌拉克河的连水陆地从那儿开始，被称作“尤多马十字勋章”，那儿有一处建造船舶的“乌拉克木头埠头”。从乌拉克河去往大海有两条路：通过连水陆地到鄂霍塔河；第二条路沿乌拉克河向下到海边，根据（17世纪）葛麦林院士的计算，从那儿到鄂霍塔河口有10—15俄里。

路程的漫长、翻越“尤多马十字勋章”的难度常常使得人们决定使用更加便捷、但并不轻松的陆路从雅库茨克经阿姆加（阿姆加渡口）和阿尔丹（别拉亚渡口——即现在的鄂霍次克渡口，该渡口得名于从东面注入阿尔丹河的别拉亚河）到尤多马十字勋章，进而到乌拉克河。按照葛麦林的说法，“一些令人生畏的山脉从别拉亚渡口开始，乘四轮车翻山是不可能的，必须用驮载的马或鹿将货物倒过去”（注6，135—136页）。“总的来讲，关于这条路可以说，它是如此的不平静，无法想象有比它更难通行的道路，——堪察加半岛考察者C. П. 克拉舍宁尼科

夫（18世纪）写道，因为它要么与河岸并行，要么在多林的山间穿过；岸边布满碎石和圆的滑石，以至于当地的马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石头挪到另一块石头上时，无法不对它们发出由衷的赞叹。”（注35，529页）人们走这条路从雅库茨克到海边要耗费一个多月，到18世纪初它已成为一条主路，它的长度相当于800多俄里。毫无疑问，为了战胜这条艰险的道路，哥萨克和实业者要具有惊人的毅力和付出难以置信的代价。

## 从北冰洋到东部海洋海上通道的开辟

轮船在海上漂荡，  
在黑色的波浪间翱翔；  
人们翻越白色的山脉，  
在他们的嘈杂声中——我满怀希望……  
你，上帝，有无限的力量，  
没有你，我全身只剩下一根头发站岗，  
你拯救我脱离死亡！

——加夫利拉·杰尔查文

俄国哥萨克、实业者和商人环绕楚科奇半岛的航行确认了从北冰洋到东部海洋海上通道的存在，因此成为 17 世纪俄罗斯伟大的地理发现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这个杰出的成就同商人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霍尔莫葛列茨（波波夫）和哥萨克谢苗·伊万诺夫·杰日尼奥夫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关于后来得到霍尔莫葛列茨绰号的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的生平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只知道他是北部沿海居民，生在霍尔莫葛尔——北德维纳河上一个著名的后来在其附近诞生了罗蒙诺索夫的村庄。“波波夫（神父之意）”这个外号可能证明了他出身于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断定，他是识字的。人们后来把大笔货物和金钱都委托给他管理，至少他有处理这些与贸易有关的业务的起码的文化知识和计算能力。

17 世纪 30 年代，他进入了著名的莫斯科商人（“沙皇的客人”）阿列克谢·乌索夫视野并博得了他的信任。费多特·波波夫后来的命

运证明，他以自己的果敢、坚韧和应对实际问题的灵活性赢得了乌索夫的信任。

1638年，阿列克谢·乌索夫把自己一大批货物发往遥远的西伯利亚，他把这批货委托给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和乌斯秋格人鲁克·瓦西里耶夫·西维洛夫，而且前者被任命为商队的头目。有这样一种说法，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霍尔莫葛列茨是从在秋明、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叶尼塞斯克卖啤酒花开始他在西伯利亚的商业活动的（注31，91页）。

1641年6月，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在叶尼塞斯克领到了一张去往勒拿河的通行证——海关通行证。第二年，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的商队来到了雅库茨克。在熟悉了当地的条件之后，他很可能作出了把自己的贸易和开采活动转移到遥远的“小块土地”上去的决定。看来，他和鲁克·西维洛夫之间产生了某种分歧，他们瓜分了委托给他们的货物：几乎2/3的货物和款项转给了作为头目的费多特。——

1642年7月6日，雅库茨克海关首脑发给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霍尔莫葛列茨一份证书，里面指出，管家要前往“旁人的”河流奥列尼奥克河捕鱼、猎貂，随身携带“粮食储备和开采工厂（开采和捕鱼的装备——作者注），以及俄国商品”：700普特（俄担，1普特等于16.38公斤）的黑麦面，4普特锅装的绿铜，两普特锡，20俄磅（1俄磅等于409.51克）大小阿杰古伊（各色的玻璃珠串），10俄磅小玻璃珠，100俄尺白呢子，50个带饰穗的小铃铛，350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长的渔网，20副斯科洛特人（斯基泰人——译者注）的鞋底，25张捕捉黑貂的大猎网，60把斧头，两普特“纺成的”大渔网，100俄尺厚的和一般厚的粗麻布。所有的商品按海关的估价值1025卢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注30，229页）。

由著名的新土地发现者和航海者伊万·列波洛夫率领的商队顺利地到达了奥列尼奥克河，然而费多特进行成功的贸易和开采的希望落了空。当地的埃文基人奋起反抗，把商人和实业者从常有貂出没的森林赶到了冻土带。看来，费多特没有理顺同当地居民进行易货贸易的关系。当地部落的反抗迫使俄国实业者临时转移到了另外的河流，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很可能同他们一起离开了。他被迫迁到了勒拿河，又从那儿

去了位于东部的北方的河流。1647年冬天或春天他来到了科雷马河，他打算在那儿把在奥列尼奥克河开采地遭受的损失弥补回来。恰恰是在科雷马河他遇到了谢苗·杰日尼奥夫，这使他们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有着相同的人生道路。

谢苗·杰日尼奥夫的命运在许多方面对当时西伯利亚的哥萨克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最有可能的是，北方沿海边区是他的故乡，大约1605年他出生在瓦洛卡—皮涅加省（现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德维纳县一个叫作奥西诺夫斯卡亚的村庄。18世纪初杰日尼奥夫家族在那儿已经有自己的土地了。

谢苗·杰日尼奥夫像许多北方沿海居民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同西伯利亚结合在了一起，还是在青年时代，看来不晚于1630年，他已经开始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部队里服役，起初在托博尔斯克，而后在叶尼塞斯克。1638年他作为彼得·别盖多夫中尉哥萨克队伍中的一员被派往雅库茨克服役。同他一起从叶尼塞斯克前往雅库茨克服役的还有米哈伊尔·斯塔杜辛、瓦西里·布加尔、波斯特尼克·伊万诺夫等哥萨克，他们的名字永远载入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理发现的历史之中。

杰日尼奥夫到达雅库茨克后，给他按普通哥萨克的薪水发放钱、面包和盐。如同许多来自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一样，谢苗·杰日尼奥夫看来是结了两次婚，而且两次娶的都是雅库特女人。他可能会讲雅库特语。1639—1640年，杰日尼奥夫参加了为了向雅库特省当地居民收取实物税的出征。

当时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通常在服役时都兼顾私人开采。在雅库茨克城堡保存的“采购账簿”里有1638年或1639年初的记录：“从军役人员谢苗·杰日尼奥夫那儿买了4只没尾巴的貂，给了12弹簧秤国家配给的面粉。”（注36，111页）在抵达勒拿河最初的季节里，杰日尼奥夫收集了100只貂的实物税，比他的同事收得多。

1640年中，他和另外两个哥萨克被派往阿尔丹河左边的支流达达河和阿姆加河去压服造反的雅库特人，因为他们向认真缴纳实物税的本分的同胞发起了进攻，被抢劫者向雅库特当局控告了这些进攻者。杰日尼奥夫很快就返回了雅库茨克，看来同他在顺利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时没有对肇事者使用武力有关。应当指出，杰日尼奥夫在整个服役期间始

终致力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在极端情况下才诉诸武力。

1640年秋天，杰日尼奥夫被派去镇压暴动的雅库特王公萨海伊·阿特纳科夫。还在1640年夏天时，雅库特中心的几个部族就因不满收缴大量的实物税而包围了雅库茨克。由于无法将俄国人赶出城堡，王公们最终被迫同雅库茨克当局签订了和平协定，同意缴纳实物税。但有几个部落酋长和王公，其中包括萨海伊，不愿顺从。派到他那儿收取实物税的两个人被杀掉了，之后萨海伊和自己的氏族迁徙到了维柳伊河中部遥远的奥尔古特省。派去追赶萨海伊的队伍中了埋伏，死伤惨重。

此后，雅库茨克当局派谢苗·杰日尼奥夫去平息不安分的王公并收取实物税。关于杰日尼奥夫出征清剿不服从的萨海伊的详情没有传到我们这里，今天，我们只知道，杰日尼奥夫的队伍返回雅库茨克时毫发未损，把全部向萨海伊部族追缴的实物税——140只黑貂都运回了雅库茨克。就是说，杰日尼奥夫这一次多半是利用了某种和平手段征服了萨海伊王公，他可能只是用武力威胁了萨海伊一下，而后就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没有激怒雅库特人去对抗哥萨克队伍。

后来，杰日尼奥夫被编入德米特里·米哈伊洛夫·泽梁（雅里洛）的队伍。随着冬天的到来，队伍从雅库茨克骑马出发经上扬斯克山脉去往亚纳河。而且马和所有必要的装备都是杰日尼奥夫用自己的钱购买的。稍晚些，1662年他在呈文中就此事写道：“我，你的奴仆，为了你的国家的事业买了两匹马，给了85个卢布，还有衣服、鞋子和各种公务所需的工厂（装备），在雅库茨克城堡从商人和实业者那儿花了高价买来的：花掉了给我，你的奴仆，的差旅费中的100多个卢布。”（注36，131页）在一个普通哥萨克的年薪只有5个卢布时就可清楚地知道：在过去的两年中，杰日尼奥夫可能不仅仅收缴了国家的实物税，而且还用很有销路的货物跟雅库特人交换了皮货，也不排除他在完成当局的任务的征途中有机会猎取黑貂。

从雅库茨克沿阿尔丹河支流杜马尔赫河河谷到跨越上扬斯克山脉的隘口，然后向北到亚纳河源头之一的杜尔加拉赫河河谷的道路是非常艰辛的。经过5个星期的路程哥萨克到了早在1638年就建成的上扬斯克冬营地，它位于两条从上扬斯克山脉流出并形成了亚纳河的杜尔加拉赫河和萨尔丹克河交汇之处。

泽梁的队伍在亚纳河地区收缴了 340 张貂皮和黑、褐色狐皮作为实物税。1641 年春天，泽梁决定向位于亚纳河东方的河流进发。而同时派杰日尼奥夫带着毛皮官款在 3 个哥萨克陪同下可能沿着冬天的道路经上扬斯克山脉去往雅库茨克。了解到有一支不大的俄国部队在转移，用杰日尼奥夫本人的话说，在当地游牧的埃文尼人，“40 个拉姆特男人，或许更多”设置了埋伏。突然遭到进攻的哥萨克遇到了进攻者的“火力”袭击，杰日尼奥夫准确地射杀了进攻者的首领，但他本人也两次腿部中弹。头领死后，进攻者四散奔逃。毛皮官款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雅库茨克。他和他的同路人运到雅库茨克的还有属于他们的毛皮，但这是按文官首脑瓦西里·波雅科夫的命令被没收的，只有在哥萨克将呈文递交给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后方可发还。

1641 年 8 月，杰日尼奥夫一行 16 人的哥萨克队伍在米哈伊尔·斯塔杜辛率领下从雅库茨克出发前往因迪吉尔卡河左边的支流奥伊米亚康河，哥萨克到那儿时已是深秋了。然后杰日尼奥夫和队伍一起来到马玛河并乘果奇下到因迪吉尔卡河口。秋天他同斯塔杜辛一起越海到达阿拉杰亚河（流经雅库特共和国的东北部，在因迪吉尔卡河东部注入东西伯利亚海——译者注）口，在那儿斯塔杜辛的队伍同泽梁的部队合为一体并于 1643 年秋天同样走海路来到科雷马河口。

杰日尼奥夫很可能积极参与了（之后在那儿住了 3 年的）下科雷马冬营地的建设工作并以向当地部落征收实物税时的勇敢而著称。在科雷马的哥萨克中间越来越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科雷马河流域东边流淌着一条“山岭外的河流巴基恰（从 1647 年起，这条河开始被称作阿纳德尔河）”，沿河两岸的冻土带常有大量的貂出没。还有一些在科雷马河东边有海象栖息地的信息也传到了哥萨克那儿，这预示着可以获取丰厚的“鱼牙”（海象獠牙）。

许多聚集在下科雷马地区的商人和实业者开始听到了这些消息。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霍尔莫葛列茨（波波夫）决定组织一个大型开采考察团去寻找这条隐秘的巴基恰河。

霍尔莫葛列茨装备了 4 条果奇，能载 63 名实业者和商人出海。根据他的请求，杰日尼奥夫作为官方人士，负责在“新的小块土地上”收取实物税的莫斯科当局的代表被编入考察团，为此他从下科雷马城堡

管家哥萨克伏达罗伊·加弗里洛夫那儿得到了一份委托公函。在注明日期为1647年6月后的一份呈递给雅库茨克督军的报告中，加弗里洛夫说：“去年，154年（1646年——作者注）夏天有9个实业者较早地乘果奇从卡维姆河口（科雷马河）出海：伊萨伊卡·伊格纳奇耶夫·蔑杰涅茨、谢蔑伊卡·阿列克谢耶夫·卜思达杰列茨和伙伴们。他们从海上来到我们卡维姆河，在询问中他们说：他们沿着大海、沿着冰冻的海岸，在石头山（可能沿着海边的山脉）附近扬帆航行了两个昼夜后到达了海湾，在海湾他们找到了一些人（Л. С. 别尔克院士完全有根据认为，他们到了恰翁岛——作者注），他们被称作楚科奇人。同他们做买卖的地方有限，因为他们没有翻译，而下船登岸去他们那儿又不敢，人们只好把货给他们卸到岸上，摆在那儿，他们也把不多的并不总是完好的鱼牙骨放到那个地方；他们破冰的杵子和斧头都是用那种骨头制作的。他们说，海上那种野兽很多，它们就躺在那儿。今年，155年（1647年）6月……商人同业公会中的莫斯科人阿列克谢·乌索夫、管家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霍尔莫葛列茨和12名雇佣者（阿列克谢耶夫花钱装备起来的实业者——作者注）出了海，而另外一些实业者（自己花钱装备起来的人——作者注）也集合起来，除了它们之外还聚集了50个人，他们乘4艘果奇出发去探寻有鱼牙骨和貂的开采地。那个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和伙伴们来到我们的聚会厅口头请求（请求分拨——作者注）调拨军役人员随行。军役人员谢苗·杰日尼奥夫因利润一事叩见雅库茨克城堡的阁下，就在聚会厅递上了呈文，在呈文中向阁下告知了在新发现的阿纳德尔河上所获利润为47张貂皮（40——这是40张貂皮，而7个40——280张皮子——作者注）。由于谢蔑伊卡·杰日尼奥夫所获利润之故，我们将他拨给商人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让他们一起打听另外一些新的能给阁下带来利润的河流。还给了他们委托公函，一经找到不纳实物税的人，则将其扣为人质，向他们收取国家实物税，将其纳入高贵的沙皇体制之下，等等。”（注31，110—111页）

从委托公函可以得出结论，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霍尔莫葛列茨被任命为地方官，即负责将现金收入纳入国库的人。由于这一点，以及考察团成员中有负有征收实物税使命的人（С. И. 杰日尼奥夫），所以

这个纯粹私人性质的考察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科雷马当局委派的考察团。

1647年夏天，4艘果奇从科雷马河出海驶向东方。就是不清楚，他们能往东方走多远。由于恶劣的冰面条件考察团于那个夏天返回了下科雷马斯克。

研究俄罗斯新土地开拓者地理发现的著名历史学家 Б. П. 波列沃伊指出，只是到了1957年人们才成功地发现了两份 С. И. 杰日尼奥夫早先不为人所知的呈文，据此才首次弄清楚，1647年秋天他决定第二年返回勒拿河，而1647—1648年的冬天他是在猎取黑貂的开采地度过的。在下科雷马冬营地递交给科雷马管家伏达罗伊·加弗里洛夫的呈文中，杰日尼奥夫写道：“我，你的奴仆，为了自己巨大的刀子（需求——作者注）沿科雷马河向上航行。”（注33，26页）杰日尼奥夫到了科雷马河中部的多林地带并在那儿开始猎貂。1648年5月28日，在下科雷马冬营地他缴清了所猎40只黑貂中应上缴的1/10即4只。第二天他从实业者西索列金那儿收了13只黑貂，直到6月中旬他才开始出售自己的黑貂，看来，是在听取了加弗里洛夫的建议后又参加了新的东征。

问题在于，尽管有不成功的经历，但波波夫决定第二年再次向东航行。当杰日尼奥夫又一次请求任命他为1648年考察团当局派出的特别代表和实物税收取者时，雅库茨克的哥萨克盖拉西姆·安基吉诺夫也在此时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答应为国库收缴280张貂皮，此外还要“用自己的牲畜、轮船、武器、火药和所有的工厂（装备）为国家服务”（注31，112页），即自费购置武器、弹药和所有的必需品来装备一条船。

杰日尼奥夫同样也答应把收缴实物税的数量扩大到290只黑貂并且指责安基吉诺夫“把30名左右的贼人招到自己身边，他们想打击同我一起前往新河流的商人和实业者，抢劫他们的财产，还想打击我向其征税的外国人”（注31，113页）。科雷马当局支持杰日尼奥夫并继续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官方代表。于是安基吉诺夫的一个随从比亚特卡·涅洛诺夫向加弗里洛夫递交了一份诉状，诘难杰日尼奥夫在一些非法行动中要调用他的“皇家船舶”。但加弗里洛夫确信责难毫无根据，对其置之不理。然而安基吉诺夫和他的人装备了果奇并加入了波波夫—杰日尼奥

夫的考察团。

Б. П. 波列沃伊认为，新的航海考察是6月20日从中科雷马冬营地开始的。在下科雷马冬营地短暂停留后，考察团于7月初驶向北冰洋（注33，26页）。

除了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29名雇佣者外，参与出征考察的还有一些富裕的莫斯科客人的管家：瓦西里·古谢里尼科夫·阿法纳西·安德列耶夫和别松·阿斯塔菲耶夫以及他们的雇佣者。这些管家率领一支单独的队伍，他们分乘两艘或3艘果奇。

杰日尼奥夫直接率领的一支队伍由一只果奇上的全体船员组成，包括18名实业者和军役人员。他亲自参与了这支队伍的装备工作。后来他在呈文中指出，为了筹备这次去阿纳德尔河的远征他“花的都是自己的钱”，“由于海上抢劫（遇到风暴时的船舶遇难——作者注）一贫如洗，欠了大量的无法弥补的债务”（注36，178页）。看来，他为了这次考察投入了自己所有出售大批黑貂得到的钱，这些黑貂既有用俄国商品换来的，也有在科雷马开采地外出时猎获的。

1648年6月20日，7艘分别装载了90名（据另一种资料是105个人）哥萨克、实业者和商人的果奇从科雷马河口出海驶向东方。同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一同出海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雅库特女人，这是俄罗斯第一位参与了官方文献所提到的极地航行的女人。

在19世纪被称作龙格海峡（位于弗兰格尔岛和亚洲海岸之间，连接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译者注）的地方，也可能是在比灵斯海岬（靠近东经176°），两艘果奇在风暴中被冰打碎。损毁船只上的船员登岸后全部死亡：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科里亚克人杀死，一部分人死于饥饿。或许，8月份考察团中的5艘果奇到了把亚洲和美洲分开的后来被称作白令海峡的海峡。安基吉诺夫的果奇很可能在那儿被毁，但他所有的船员都被救起并被安置在其余4艘未受损的果奇上。

9月20日在楚科奇海岬，也可能已经在十字湾（位于阿纳德尔湾顶部——译者注）地区了，这些果奇靠近了楚科奇半岛海岸，在那儿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中，楚科奇人打伤了费多特·波波夫。过了几天，大约是10月1日（1648年），“他们把我，谢蔑伊卡，和那个费多特赶到了海上没了音信”——杰日尼奥夫后来在呈文中宣称（注18，292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考察团中的4艘果奇绕过了现在以杰日尼奥夫命名的海岬，即楚科奇半岛东北角的海岬，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冰洋进入了太平洋。看来，还是有两艘考察团的果奇在进入白令海峡后遇难，船上所有的人都死了。

以我们看，历史学博士 M. И. 别洛夫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他指出，打伤费多特·波波夫的地方就是楚科奇海岬：“1660年在阿纳德尔城堡代替杰日尼奥夫的古尔巴特·伊万诺夫决定从阿纳德尔‘嘎尔嘎’（长沙滩，位于阿纳德尔河口处、覆盖了从海上入河之处的俄罗斯浅滩——作者注）出海去往‘俄国方向’，也就是绕过楚科奇半岛前往科雷马河。在一整个夏天期间他乘一艘果奇沿海岸航行来到了在白令考察团到达之前被称作十字湾的大海湾。古尔巴特从十字湾到了大海岬，很有可能是到了楚科奇海岬。和古尔巴特·伊万诺夫在一起的有一个楚科奇女人，她是杰日尼奥夫1648年远征参与者雅科夫·别尔米亚科的俘虏，是她认出了这个海岬。这样就成功地确认了打伤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的‘战斗’发生在楚科奇海岬，因此，这个海岬是杰日尼奥夫的果奇最后一次从那儿出海的地方。”（注14，397页）

历史学家对有些事无法达成一致，例如杰日尼奥夫本人对“大石头角”的理解以及他在自己给雅库茨克督军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是什么岛和什么样的当地居民：“1655年4月4日……而那个角伸向大海相当远，而不是从科雷马河出来的第一个神圣的海角（指的是舍拉格斯基角——作者注）。住在那个海角上的楚科奇人很多。那个海角对面的岛上住着一些被叫作有牙齿的人（有牙齿的楚科奇人——因纽特人，他们以前住在基阿米达群岛上，下嘴唇的缺口上镶有用海象牙、石头、骨头制作的装饰品——作者注），因为他们用不小的骨制品穿透两颗牙齿长度的嘴唇。而我们，谢蔑伊卡和大伙都知道那个大海角，因为军役人员亚拉西姆·奥恩古基诺夫和同伴的船就是在那个海角被打碎的。我们，谢蔑伊卡和同伴把那些因海上抢劫（遇到风暴时的船舶遇难）遭难的人都接到了自己的船上并看到了岛上那些有牙齿的人。从那个海角到阿纳德尔河和嘎尔嘎很远。”（注31，127—128页）

某些历史学家（Л. С. 别尔克、历史学博士 Д. М. 列别杰夫）认为，杰日尼奥夫所理解的“大石头角”就是后来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

的海岬，而“有牙齿的楚科奇人”居住的那些岛屿，这是白令海峡中的基阿米达群岛。

另外一些人（Б. П. 波列沃伊）认为，杰日尼奥夫把整个楚科奇半岛看作“大石头角”，因此“有牙齿的人”居住的群岛——这是指阿拉卡姆车臣（俄联邦太平洋中的岛屿之一，位于楚科奇沿岸的白令海峡——译者注）和伊德格兰（白令海中谢尼亚温海峡中的岛屿，在楚科奇岬北边，半岛的东南端——译者注）。杰日尼奥夫使用同一种称呼“大石头角”视文本而定，完全可能含有两种意义，既指海岬，也指整个楚科奇半岛。

在1655年的另一份报告中（不早于4月15日）杰日尼奥夫已经推断出被他们发现的是东北方一个大半岛：“从科雷马河越海到阿纳德尔河，那儿有一个角，伸向海中很远，这不是那个位于楚科奇河流出地的角，米哈伊尔·斯塔杜辛没到那个角，那个角的对面有两个岛子，岛上住着楚科奇人，他们都镶着牙，用鱼牙骨（海象獠牙——作者注）穿透嘴唇，而那个角位于北方，朝向熬夜人（用北方沿海地区海员的话说就是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地区——作者注）。而从俄国方向看带有海角迹象：有河流流出，那儿有楚科奇人建造的宿营地，塔楼是用鲸鱼骨搭建的。海角绕了一个圈与阿纳德尔河连在了一起。沿吉祥的海岸从海角到阿纳德尔河要3昼夜，不会更多。从岸边到河边不远，因为阿纳德尔河就注入海湾。”（注31，131—132页）

的确，Б. П. 波列沃伊宣称，1957年成功地找到了早就在探求的上面所援引的1655年（不早于4月15日）报告的原件。把它的原文同平常人们所引用的版本，包括历史学家Г. Ф. 米勒尔使用的引文相对照就会发现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在杰日尼奥夫的原文中有一个重要的句子的含义是这样的：“海角朝着夏天（代替引文中‘和谁连在一起’——作者注）的方向，急（代替引文中‘绕了一个圈’——作者注）转向阿纳德尔河。”就是说按照杰日尼奥夫的认识，从楚科奇半岛最西面到阿纳德尔河口要3昼夜的路程，就阿纳德尔河口对楚科奇半岛西部的方位来说是朝向夏天的方向，即朝南（注33，28页）。

在白令海峡同波波夫的果奇分开之后，又有新的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杰日尼奥夫。“载着我，谢蔑伊卡，在海上，——他在1655年给雅库

茨克督军的报告中宣称——圣母节（俄历十月一日）后处处不自在，被抛到了阿纳德尔河前端的岸边。我们船上总共 25 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往山上去，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路，又冷又饿，光脚赤身。我，可怜的谢蔑伊卡，和同伴们向下来到距大海不远处的阿纳德尔河，无法捕鱼也没有森林。由于饥饿，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走散了。有 12 个人沿阿纳德尔河往上去了，走了 20 天没有见到人和阿尔吉什尼茨（鹿队——作者注），也没见外来人走过的路，于是往回返。走了 3 天的路程也没到达营地，只好就地过夜，开始在雪中挖坑。”（注 31，131 页）

人们认为，杰日尼奥夫的果奇很可能被抛到了位于楚科奇半岛西南方 900 公里的奥柳托尔半岛沿岸地区。这意味着，杰日尼奥夫第一个跨越科里亚克高原并于 1648 年 12 月初来到阿纳德尔河下游。队伍中的一半人（12 人）沿河向上去寻找当地游牧民的驻地，以求从他们那儿弄到吃的。20 天后由于没遇到任何人，他们只好往回返，但在离杰日尼奥夫和其他的人留下来的营地剩下 3 个白天路程的地方停了下来。这组人中只有 3 个人——福马·谢苗诺夫·别尔米亚克、西多尔·叶蔑里亚诺夫和伊万·泽里亚宁——到达了杰日尼奥夫的营地，而其余的人留在原处并请求给他们“送去睡觉的被褥和破翻毛皮衣，能让我们吃饱的东西以便能勉强走回营地”（注 36，219 页）。

杰日尼奥夫把福马·谢苗诺夫·别尔米亚克这个看来是最强壮、最耐劳的人派去寻找那些留在雪坑里的人并让他带去了“自己最后的被褥”。但别尔米亚克在原地没找到一个人，杰日尼奥夫认为，人被当地部落抓去了，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人都被冻死了并被雪所掩埋。

队伍中剩余的人留在阿纳德尔河河口过冬，他们中的 12 个人熬过了 1648—1649 年可怕的冬季。这期间有 3 个杰日尼奥夫的人死于坏血病。12 个活下来的人中有 10 个人的名字流传到今天：谢苗·伊万诺夫·杰日尼奥夫、福马·谢苗诺夫·别尔米亚克、巴维尔·加加乌林、西多尔·叶蔑里亚诺夫、伊万·布里亚耶夫、米哈伊尔·扎哈洛夫、杰列金·古洛夫、叶菲姆·蔑尔古里耶夫·蔑杰尼亚、彼得·米哈伊洛夫和阿尔杰米·萨尔达特科。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关于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和盖拉西姆·安基吉诺夫命运的信息。他们很可能落到了堪察加沿岸地区。我们将在后面叙

述发现堪察加半岛时讲述他们可能有的命运。

1649年夏初，杰日尼奥夫和同伴们建造了一些河船并且在浮冰过后将其放入水中，他们乘船沿河向上驶去。“他们12人乘船沿阿纳德尔河溯流而上，走了（500公里——作者注），到了阿纳乌尔人那儿（阿纳乌尔人是犹加吉尔人的一支——作者注）……向他们收取了实物税。”（注31，131页）

起初，阿纳乌尔人遇到这些陌生的携带武器的大胡子总是提心吊胆，事情到了发生冲突的地步。杰日尼奥夫后来这样描述这些冲突：“我们抓了两个人，战斗中我受了重伤，向他们收了实物税。根据实物税账簿按名征收，给国家收了实物税，此外，我，谢蔑伊卡，想从那些阿纳乌尔人那儿为国家抓几个‘舌头’。”（注36，223页）

看来，在俄国人和阿纳乌尔人之间逐渐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多半要归功于杰日尼奥夫，因为他始终赞同与当地居民建立的正是这种关系。况且，杰日尼奥夫他们中的某些人娶了阿纳乌尔女人为妻。比如他们中就有早先已经提到过的福马·谢苗诺夫·别尔米亚克。他的妻子在受洗后叫作乌斯吉尼娅，后来同他按东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

杰日尼奥夫在阿纳德尔河上游建立了冬营地。他又在阿纳德尔河中游，在其右边的支流马因河河口稍往上一点的地方，在一个高的小岛上，即现在马尔科瓦村所在的位置选了一处地方作为冬营地。附近长成了一片高而直的林子，可以用来造居住的房子、关人质的屋子、用作保存“软动产”和储备食品的库房。

1649年，哥萨克米哈伊尔·斯塔杜辛尝试从科雷马河口越海去往阿纳德尔河，但由于楚科奇半岛北部海岸无法通过的冰群阻挡了去路，他的果奇可能最多只到了卡柳钦湾（楚科奇海第二大海湾，深深嵌入楚科奇半岛北部沿海地区——译者注）就被迫返回。科雷马的哥萨克从犹加吉尔人那儿了解到，有一条陆路通过阿纽伊河谷可以去往阿纳德尔河，因为阿纽伊河的上游与阿纳德尔河的上游接近，但两河之间隔着山脉。

1650年3月初哥萨克谢苗·伊万诺夫·马多拉率领不大的一支队伍乘狗、鹿拉的车（雪橇）走这条路去往阿纳德尔河，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阿列克谢耶夫和杰日尼奥夫命运的消息，所以他被科雷马当局任命

为阿纳德尔河的总管。米哈伊尔·斯塔杜辛的一支不大的队伍也往那儿去了，这是一个有威势的、贪图功名的哥萨克——新土地开拓者，他试图在阿纳德尔河代表科雷马河当局。斯塔杜辛在阿纽伊山脉赶上了马多拉，他们一起到达了阿纳德尔冬营地。

杰日尼奥夫立刻承认了马多拉的首领地位，但不安分、酗酒的多面人斯塔杜辛在阿纳德尔河的存在使马多拉和杰日尼奥夫的生活变得非常复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斯塔杜辛和他的人离开去往品仁纳河为止。

1652年冬天，因为阿纳乌尔王公蔑盖尔卡带着自己的人抢劫缴纳实物税的和平居民，马多拉和杰日尼奥夫的联合部队向其发动了进攻，在一次冲突中马多拉阵亡。从此时起，С. И. 杰日尼奥夫成为联合部队的头目和阿纳德尔河的总管。

在出征和外出游玩期间他熟悉了阿纳德尔河谷和它的一部分支流的情况，而且返回以后杰日尼奥夫提交了阿纳德尔河及它的主要支流的图纸。他第一次描述了这个地区的大自然：“阿纳德尔河林木稀少，河两岸的黑貂也不多，小阔叶林从头到尾6或者7天（这一段路要走6—7天——作者注），除了白桦和白杨以外没有任何另外的黑松林（阔叶林）。从小马因河（马因河在分叉处形成了小马因河和大马因河——作者注）起除了河柳没有其他的树木，从岸边开始的森林稀疏，全都是冻土带和石头。”（注31，128页）

1652年，杰日尼奥夫在阿纳德尔河口成功地发现了一大片海象栖息地，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因为它预示着通过获取“鱼牙”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在那个160年（1652年），我们乘船出海，——他在给雅库茨克督军的报告中宣称，要在那儿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利润，我们找到了阿纳德尔河口处的嘎尔嘎（长沙滩，位于阿纳德尔河口处，覆盖了从海上入河之处的俄罗斯浅滩——作者注），海湾外面就是大海，就在那个嘎尔嘎上有那种兽的牙——海象的獠牙。我们，军役人员和实业者，捕猎野兽，获取海象獠牙。躺在嘎尔嘎上的野兽多得一眼望不到边，在海岬周边从海上望去有半俄里还多，离山有三四十俄丈（超过60—80米——作者注）。不是所有的野兽都从海水里上到陆地上，海里的野兽很多，就在岸边。不要指望那些野兽上到岸上，因为阿纳德尔河上面有收税人的冬营地和石滩（河流浅滩——作者注）高处的渔场，

而我们没有食物，只要不错过并及时赶到那个渔场，就不会因饥饿而死……而有一些实业者——北方沿海的分裂教徒，据他们说，在俄国北方沿海地区没有这么多的野兽。”（注 31，126 页）

1660 年，杰日尼奥夫结束了在阿纳德尔河艰难的服役。根据他的请求他被替换下来，他带着“骨头官产”货走 1650 年哥萨克谢苗·伊万诺夫·马多拉发现的陆路到了科雷马河，又从那儿走海路到了勒拿河边的日甘斯克。1662 年春天杰日尼奥夫来到雅库茨克，那年 7 月底前往莫斯科。

1664 年 9 月他来到首都时，也把价值等同白银的 17340 卢布“骨头官产”——289 普特的海象獠牙运到了那儿。第二年 1 月份，同他彻底清了账：要知道从 1641—1660 年谢苗·伊万诺维奇既没有得到薪水，也没有领到粮食。据西伯利亚衙门的决议说，“伟大的国王、沙皇和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听信了列恩边区（归属当时的叶尼塞斯克县——译者注）哥萨克谢恩卡·杰日尼奥夫呈文和摘录中所反映的情况，吩咐给他，谢恩卡，奖赏，把从 151—170 年 19 年间（1643—1662）国家的年薪和粮食发给他，为他的功勋，为了那些年间他在阿纳德尔河为他的国家服务，为国家征收实物税和找到了新的土地，因为在为国服役期间搞到了每普特价值 60 卢布的鱼牙 289 普特，替伟大的国家收取了实物税，抓了人质。在过去的 19 年里他在哪儿都没得到国家的年薪和粮食。为了他，谢恩基纳，多年的服役和忍耐，伟大的国王、沙皇和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要用国家年薪和粮食奖赏列恩边区哥萨克谢恩卡·杰日尼奥夫……总价值为 126 卢布 18 戈比 4 厘的呢子和现金”（注 24，285—286 页）。

此外，沙皇“为了他，谢恩基纳，的服役和找到了鱼牙、骨头，也因他负伤赏他一个哥萨克长官头衔。（注 18，294 页）”杰日尼奥夫还因为他个人猎取的海象牙（31 普特 39 俄磅）得到了莫斯科当局的 500 卢布。著名的极地研究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B. Ю. 维杰认为，这个数目大约是其实际价值的 1/3（注 36，290 页）。

哥萨克军官 С. И. 杰日尼奥夫在西伯利亚时还曾在奥列尼奥克河、维柳伊河和亚纳河服役。他护送貂皮官产前往莫斯科，于 1671 年底到达。谢苗·伊万诺维奇顺利地完成了最后的服役任务。他在莫斯科病倒

了，可能是多年在西伯利亚的劳累、焦虑，还有在出征和航行期间所积累的伤病的总爆发。他没有回到雅库茨克，再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别拉盖娅与儿子哥萨克柳比姆和阿法纳西，于1673年初去世。光荣的俄国航海家先驱者谢苗·伊万诺夫·杰日尼奥夫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尘世生命，他同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的考察团一道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地理发现——找到了从北冰洋到东部海洋的海上通道。

С. И. 杰日尼奥夫关于阿列克谢耶夫—杰日尼奥夫杰出的航海考察团的某些通报多年来一直躺在雅库茨克的档案馆里，但1736年在那儿被Г. Ф. 米勒尔院士发现并公之于众。但这并不意味着17—18世纪初地理学家和航海家对流经东北亚大海的认识没有反映这次航行的结果。

首先，在托博尔斯克督军、御前大臣П. И. 戈都诺夫主持下绘制的著名的1667年的西伯利亚地图集和1672年的补充图纸上标出了从科雷马河到阿穆尔河的海上自由通道。1661年被莫斯科当局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并在那儿住到1676年的霍尔瓦提（克罗地亚）神父尤里·克里扎尼奇就曾记述过这个自由的通道。

后来他依据在托博尔斯克搜集的地理资料用拉丁文写成了一本著作，名为《西伯利亚历史，或者西伯利亚王国、北冰洋和东部海洋沿岸游牧的卡尔梅克人的资料，以及某些关于珠宝商、炼矿人、炼丹术士骗术的故事》，他在书中说：“曾经有另一种疑问：北冰洋同从东部环绕西伯利亚，然后往南濒临达乌利亚和尼卡尼亚省（中国南方的省份，17世纪中叶正同控制了北京的新的满洲王朝作战——作者注）的东部海洋相连吗？……这疑团最近被勒拿河和涅尔琴斯克省的战士们解开了：他们在向当地土著人收贡赋时经过了所有这些地区并到达了海洋，他们确认，往东再没有坚硬的陆地，所说的那些海并没有任何东西使它们相互分离，不仅西伯利亚，而且达乌利亚、尼卡尼亚和中国也被连成一片的海洋从东边环绕。”

当尤里·克里扎尼奇宣称，轮船在北极坚硬的冰块中航行极其危险时，他所依据的确是他在托博尔斯克搜集的关于北冰洋的资料：“北冰洋里的冰任何时候都不完全融化，但在整个夏天水中漂浮着大量的相互碰撞的巨大的冰块，因此这些冰块（尤其是有飓风时）能毁掉任何一艘船。”（注20，175页）

“克里扎尼奇于 1661—1676 年间在托博尔斯克获取的这些信息，——Л. С. 别尔克院士写道，除了杰日尼奥夫 1648 年的航行之外不可能同任何其他事情有关，虽然克里扎尼奇没有点出杰日尼奥夫的名字并且这样描绘这件事，好像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是由于 17 世纪从陆路进行的考察。”（注 28，63 页）

在著名的荷兰地理学家、阿姆斯特丹市长尼古拉·维特森根据他 1664—1665 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搜集的资料于 1687 年绘制的鞑靼（在欧洲人们长期这样称呼西伯利亚）地图上，在楚科奇半岛那个地方标出了一块狭隘的陆地突出部，在这个突出部的北端写有“绕不过去的海角”的题词（并指出了这样写的原因：存在无法通行的冰川）。阿纳德尔河在这幅地图上是注入东部的海洋。

在维特森 1692 年出版、1705 年在阿姆斯特丹再版的《北鞑靼和东鞑靼》一书中，他引用了几种说法，它们都证实，作者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以及在与一些记者通信过程中的确获得了关于俄国人环绕亚洲大陆东北边区航行结果的资料。

让我们引用一段这本书中的几种说法：“有一次，载着莫斯科士兵的 7 艘船顺这条河（科雷马河——作者注）下行企图绕过冰角，也被称作绕不过去的海角或曰突出部，但所有的人都死了。”

维特森在自己的信中引用了他 1698 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从一个认识的荷兰商人那儿收到的一封信里的片段：“我在这儿同一个俄国人交谈时，对方告诉我，去年冬天他在莫斯科见到了一些哥萨克，他们曾经在西伯利亚最遥远的地方猎取黑貂。他们乘小船绕过了冰角，或曰最东边的突出部，就像你们的地图上所标明的，他们用了 3 天到达了突出部的顶端。那儿的海流湍急，所以他们只能紧靠海岸航行。但他们没有见到冰，因为这正值盛夏时节。就这样，他们绕过了海岬并到达了中国边界。”

我们再引用维特森书中的一段话：“一位著名的莫斯科商人对我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同哥萨克交谈时后者对他说，他们用 3 天时间到了冰海岬。它（海峡——作者注）有几处地方相当狭窄，两岸尽收眼底。这些哥萨克或士兵是从雅库茨克派去收税的，通常这样做时都是 10 或 20 人一组……他们接着说，他们总共 8 艘船，据他们估计，其中

4艘成功地绕过了冰海岬。但最后他们碰上了极其凶险的旋涡或速度更快的拍岸浪，因为北边的海流同南边的在那儿交汇，以至于这4艘船被碎成小块，所有的人都葬身鱼腹。”（注36，282—283页）

如果抛开那些明显的荒谬的成分，那么维特森这些说法非常接近哥萨克先驱者在《故事集》和《报告》中所披露的信息，是他们发现了楚科奇半岛东北沿岸和连接北冰洋与东部海洋的海峡。至少有一点很清楚，维特森熟知俄国这些新发现的信息，而通过他的书整个欧洲的地理学家才知道了这一切。

18世纪最初几年，关于费多特和杰日尼奥夫发现海峡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并进而传到西方。当地的楚科奇人对1711年从阿纳德尔城堡派到楚科奇半岛的雅库茨克军役人员波波夫的儿子彼得·伊利因说，“此前俄国人走楚科奇海来过他们那儿”（注29，126页）。果奇环绕楚科奇半岛航行的消息在18世纪初传开了，也传到了俄国实业者的耳中。

1726年在莱顿（荷兰阿姆斯特丹西南面的一座城市——译者注）匿名出版的一幅地图证明，阿列克谢耶夫—杰日尼奥夫海上远征的结果轰动西欧要早于Г.Ф.米勒尔院士的发现。在这幅地图上，亚洲东北方终结于圣诺斯海岬和一些岛屿，而旁边有题词：“俄国船只经过这儿是为了去往堪察加。”

在172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幅匿名地图上，在亚洲的东北部标出了一个岛屿，旁边的注释为：“从勒拿河和勒拿河东边的河流过来的俄国人乘船经过这儿是为了去同堪察加人做买卖。”

长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瑞典被俘军官斯特拉林伯格绘制的一幅地图于1730年在瑞典出版，他在莫斯科将其献给了彼得一世。这幅地图上因迪吉尔卡河口对面写有如下题词：“俄国人从这儿越过了堆满冰块的大海，这些冰块被北风推到岸边，又被南风赶了回来，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了堪察加。”（注28，63页）

最后，本人当时还是海军上校的维杜斯·白令是首次发现阿留申群岛、科曼多尔群岛和北美西北沿岸地区的人，曾经顺利地亚洲和美洲之间航行，他在自己一份1725年夏天寄自叶尼塞斯克的报告中写道：“如果确定要从科雷马河去往阿纳德尔河，经过努力从某个地方经过还

是可以的，新的亚洲地图证明了这一点，居民们说，从前人们走的就是这条路。”（注 28，64 页）

所有这一切都证实，阿列克谢耶夫—杰日尼奥夫环绕楚科奇半岛远征的资料对新的有关从北冰洋到东部海洋的自由通道的地理认识产生了确信无疑的影响，尽管是 17 世纪后半期和 18 世纪前 30 年的事，但仍早于米勒尔于雅库茨克衙门办公室的发现。

历史就是这样安排的，С. И. 杰日尼奥夫的名字和他环绕楚科奇半岛的远征成了中学教科书的内容并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熟知。我们还要向这个光荣的名单补充一个人——已经载入地理发现史的俄罗斯极地海洋考察团的组织者——勇敢、精明的北方沿海居民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

再有，1648 年以后哥萨克的果奇到过北冰洋和东部海洋之间的海湾吗？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俄罗斯古代文据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本《轮船和船舶储备品支出账本》（雅库茨克，1661）。学者们在里面读到了一段笔记：“6 月 6 日哥萨克组长伊万·鲁别茨被伟大的国家派往海外阿纳德尔河服役，和他一起派去的还有雅库茨克的 6 位军役人员。给了那些军役人员一艘 8 俄丈长的果奇（大约 17 米——作者注）。”

研究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地理发现的历史学家、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A. B. 叶费莫夫在评论这段笔记时完全有根据指出，当时把这样一艘果奇走陆路运到阿纳德尔河是不可能的。这个被发现的笔记促使他于 1951 年在 24 集的《地理问题》汇编（427—430 页）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沿着 С. 杰日尼奥夫 1648 年历史航行路线重复远征的问题”的文章。

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档案馆保存的雅库茨克作者文集中成功地找到了一份给伊万·米尔古力耶夫·鲁别茨（巴克舍耶夫）的公文，里面写得很清楚，鲁别茨应当走海路去往阿纳德尔河的海象嘎尔嘎。命令他“沿勒拿河和大海下行到因迪吉尔卡河、阿拉杰亚河、卡维姆河（科雷马河）和阿纳德尔河。途中没有接纳任何一个逃亡和没有通行证的军役人员、商人、实业者到自己船上并把他们送到阿纳德尔河”（注 33，34 页）。鲁别茨应当是在阿纳德尔河口接纳了最早一批阿纳德尔的哥萨克。

1661年8月初，鲁别茨的果奇在勒拿河下游遇风暴沉没，但大部货物都被成功救出，鲁别茨乘被派往科雷马河的伊万·赫瓦洛夫的果奇继续前行。他在下扬斯克东营地过了冬并于1662年7月中旬航行到了科雷马河口。在那儿他按照雅库茨克的指令得到了一艘补充的浮运船以在阿纳德尔河上服役，后来这艘船归属于阿纳德尔城堡。1662年8月31日之前，鲁别茨走海路到了阿纳德尔嘎尔嘎。可见，他是1662年8月通过了连接北冰洋和东部海洋的海峡。

鲁别茨应该是即刻就赶往了海象的猎取地。为此他从雅库茨克往嘎尔嘎运去了30支沉重的猎海象的织针（猎海象的标枪）、一普特重的弹簧秤、大锅和其他一些开采地所需的大宗物品。但嘎尔嘎竟然没有海象，看来是1652—1662年过度捕杀的后果呈现了出来。

他决定寻找新的海象栖息地。鲁别茨从实业者那儿听说，这样的栖息地有可能在阿纳德尔河口的南边，按照历史学家B. П. 波列沃伊的观点，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去了堪察加河口。关于他在堪察加历险的经历我们将在后面叙述。根据这些新的资料，B. П. 波列沃伊认为，至少在1662年时，已经有人成功地重复了波波夫—杰日尼奥夫考察团穿越亚洲和美洲之间海峡的那条神奇的航线。

## 首航阿穆尔河

在西伯利亚，在乌克兰，  
在达斡尔的地盘，  
在达斡尔的地盘，  
在光荣的阿穆尔河畔，  
在卡马雷河口那一边，  
白沙皇的哥萨克，  
他们将城堡构建，  
为沙皇把实物税收敛。

——古老的哥萨克歌曲

前面已经指出过，最早的新土地开拓者为了在南方寻找“新土地”沿着勒拿河支流奥廖克马河和维季姆河向上行进时正是从雅库茨克出发的。俄国人从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埃文基人和游牧的达斡尔人那儿得到了最早的关于大河什尔卡尔或奇尔卡拉河（阿穆尔河）的信息。这条河向东流经之地的大村庄里住满了定居的达斡尔人、蒙古人、农人和养畜家。

“实业者”阿维尔吉耶夫是最早翻越分水岭造访达乌利亚的人之一。他到达了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的交汇之处，也就是到了阿穆尔河开始的地方。当地居民开始同他进行易货贸易，交换他的商品——小玻璃珠子和用以猎貂的铁箭头。后来他被达斡尔人俘虏，一位“王公”要杀他，另一位保护了他。阿维尔吉耶夫最终被释放，他返回了雅库茨克并讲述了阿穆尔河的情况（注 30，84 页）。

关于富饶的阿穆尔边区的信息使雅库茨克的督军们坐卧不安。御前

大臣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是他们中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他于1643年派“文官首脑”瓦西里·达尼洛维奇·波雅科夫率领一支132人的队伍去往什尔卡尔河。其中有112名哥萨克，15名“猎人”——实业者，两名地方官，两名翻译和一个铁匠。

雅库茨克衙门为这次考察配备了“铁炮和半俄磅圆弹以威慑不平静的土地”（注28，83页），还分拨了造船器具，制帆用的帆布，火绳枪和弹药，以及铜锅、盆、呢子和小玻璃珠作为给当地居民的礼物。

当局授权波雅科夫“寻找那些再次偷逃实物税的人”、征税，以及寻找银矿、铜矿和铅矿，可能还要他组织采矿和贵金属的冶炼。

并不排除雅库茨克督军任命文官首脑、有文化的人担任考察团头目时考虑到了阿穆尔河和达乌利亚靠近中国，有可能在考察中需要同中国人进行外交谈判。

考察团往达乌利亚去时走的是一些没有人走过的道路。7月底波雅科夫和他的队伍乘坐6艘平底小木船沿阿尔丹河、它右边的支流乌丘尔河（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雅库特的河流——译者注）及后者左边的支流戈纳姆河（从这条河河口出发往上只成功地行驶了200公里，下面的道路就被无数的浅滩阻断了）溯流而上。秋天，当河水结冰时，队伍在损失了两艘木船后仍然没有到达勒拿河流域和阿穆尔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

波雅科夫作出了一个困难的决定，他把自己的队伍一分为二：以五十人长巴特利盖耶·米宁为首的一部分人和轮船、给养一起留在戈纳姆河过冬，告诉他们春天时去往阿穆尔河左边的支流结雅河。波雅科夫自己和他的90个人沿牛耶姆加河（戈纳姆河一条不大的支流——译者注）河谷滑雪去往跨越斯塔诺夫山脉的隘口。沿着积雪厚重的道路，身后拖着载有沉重军需品和武器的帐篷，哥萨克来到了位于东经120°处的波良达河（结雅河流域）的上游。经过了10天的行程，波雅科夫到达了结雅河左边的支流乌姆列干河。

在达乌利亚，俄国人在结雅河沿岸遇到的村庄都是由宽敞的木头房子组成的，房子的窗户用油纸糊住。当地的居民是定居的达斡尔人，他们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储存粮食、豆类，有许多牲口和家禽。他们穿丝绸和棉布衣服。同满洲人的贸易使得他们能用毛皮换取丝绸、印花

布和铁制品。他们同样用毛皮向满洲统治者进贡。

波雅科夫在关于考察团的报告中宣称，结雅河和阿穆尔河没有有价值的矿石和颜料，“他们不生产大红布。从可汗（满洲统治者——作者注）那儿运到他们那儿的有带花纹的绸缎、大红布、铜和锡，人们用毛皮交换……结雅河和什尔卡（在那种情况下指的是阿穆尔河——作者注）河生长着6种庄稼：大麦、燕麦、黍子、荞麦、豌豆和大麻，巴尔达恰（结雅河下游当地部族头领，支持满洲人，是满洲可汗皇太极的女婿——译者注）的人种植蔬菜、黄瓜、罌粟、豆子、大蒜、苹果、梨、核桃和俄国的坚果”（注28，84页）。

波雅科夫抓了几个有头脸的达斡尔人做人质，以强迫他们缴纳实物税。他把人质用锁链穿起来，残酷地折磨他们。从人质口中波雅科夫得到了关于那个地方、它的居民、相邻的满洲的真实情况。他还搜集到了结雅河左边一条大的支流谢列姆贾河的准确情报。

在第二份关于考察团的报告中，波雅科夫通报了不少有关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蒙古部落，与达斡尔人相近，住在结雅河和阿穆尔河左边的支流布列亚河之间，以及布列亚河以东地区——作者注）的生活信息：他们“那儿有许多马、牛、羊、猪，山猫和狐狸也很多，他们猎黑貂，从帐篷出来总共一天，能猎到10多只貂。阁下，他们猎貂就像另外的西伯利亚和森林中的外国人一样用箭射，而在另一些开采地则像俄国人那样用大猎网和库列姆尼克（网和机械捕猎器——作者注）捕捉，结果捕不到黑貂，他们不懂得那种方法。阁下，那些人捕到了貂将其卖给可汗（满洲统治者——作者注）用以换取带花纹的绸缎和大红布，那个可汗有自己居住的汗国，他的城市是木头的，而周围是土围子……”

“沿那条结雅河往下的另一块土地上住着久切尔族人，和达斡尔人一样是一个坐着的民族，种地、养牲畜。那条结雅河里有大白鳊鱼、鲤鱼，另外的各种鱼也很多，还有黑貂和其他的各种兽。从久切尔人那儿沿那条结雅河往大海去有另一块叫作纳茨卡亚的土地，那儿住的纳特基人，也是坐着的民族（满洲一通古斯部落，住在阿穆尔河的中游——作者注），他们不种粮食，牲口有也不多，全靠吃鱼。”（注28，85页）

波雅科夫在结雅河上的乌姆列干河河口建了城堡并在那儿过了冬。哥萨克试图从当地部落征收大量实物税的做法彻底激怒了达斡尔人，他们终止向哥萨克提供食品，致使他们冬天过得极其艰辛。冬天刚过了一半，哥萨克的食物就见了底，周围的村子已被劫掠一空，而来自戈纳姆河的援助河开后才能到达。饥饿开始在哥萨克中间蔓延。周围的达斡尔人躲在森林里，他们决定利用饥饿消灭外来人。哥萨克幸运的是，对城堡的进攻失败了。哥萨克饿到这种程度，他们开始吃被打死的敌人的尸体。

1644年5月24日载有食品的船只终于来了。波雅科夫和剩余活着的70名哥萨克沿结雅河顺流而下。住在结雅河河谷的达斡尔人，说实在的，千方百计要阻止俄国人登陆。6月，队伍来到了阿穆尔河。波雅科夫确信，结雅河河口是一个富饶的地区，那儿能很好地生长粮食和蔬菜，周围有许多水淹的草地，可以饲养大量的牲口。

波雅科夫在结雅河河口稍往下一点的地方建起了城堡并决定在里面过冬，开春后再沿阿穆尔河往上去往石勒喀河寻找银矿。他派了25名哥萨克乘坐2艘平底木船沿阿穆尔河往下去侦察。但侦察员很快就返回了，因为他们确信到阿穆尔河口非常远。在返程途中，当他们迎着曳船路水流行进时遭到达斡尔人攻击，被打死20个人。只有5个侦察员回归波雅科夫这儿，此时他的队伍只剩下大约50个人了。

波雅科夫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阿穆尔河河口进发，因为他清楚，带着一批极度虚弱的人逆流而上他将困难重重。从松花江河口开始就是以耕种为生的久切尔人的土地。哥萨克很快到达了从南方注入阿穆尔河的一条大的支流，哥萨克把它称作上阿穆尔河，而这实际是乌苏里江。

沿河往下的一片土地住满了果尔特人（现在他们叫作那乃人，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通古斯满洲语系民族——作者注），他们住在硕大的村庄里，每个村里都有100或100多顶帐篷。果尔特人主要从事捕鱼业，他们用鱼皮给自己缝制衣服。此外，他们还捕猎黑貂和狐狸。出行时他们只乘坐狗拉雪橇。

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下游的两岸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民族——基里亚克人（现在他们叫作尼夫赫人），他们夏天的住所建在木桩上。这也是一

些靠捕鱼和狩猎为生的人。他们出行乘坐狗拉雪橇，而在河里航行时则乘坐桦树皮做的小木船。

9月份到达阿穆尔河口后，波雅科夫留下来在离阿穆尔河左边的支流阿姆贡河（亨滚河）口不远处过第二个冬天。他根据阿穆尔河及它的主要支流的地理位置并按自己的理解分别对其命名。波雅科夫在报告中把阿穆尔河称作什尔卡河（到松花江流入它的地方为止），从那儿起到与乌苏里江汇合之处——舒恩卡尔河，而把从乌苏里江流入它的地方起往下的河流称作阿穆尔河。

在考察报告中他指出：“海上，群岛和海湾周边住着许多基里亚克人，他们生活在乌卢斯（以地域和血缘相结合的部落组织——译者注）之中，以鱼为主食，基里亚克人不向可汗交实物税，而在石头山住着通古斯人。”（注28，85页）

哥萨克同周围的基里亚克老乡混住在一起，从他们那儿买鱼、劈柴，搜集一些盛产毛皮的萨哈林岛和住在岛上的“毛发长、多的虾夷人”——爱奴人的信息。波雅科夫查明，从阿穆尔河口可以出海并向南部海洋航行，包括到达中国。因此，正是波雅科夫第一个了解到存在一个把萨哈林和大陆隔开的海峡。

这个冬天过得并不轻松，哥萨克必须战胜饥饿和寒冷。在离开阿穆尔河口之前，波雅科夫实施了对基里亚克人的进攻，抓了一些人质并收缴了实物税：480张貂皮和16件貂皮大衣（注53，28页）。

1645年5月底，阿穆尔河口解冻后波雅科夫出阿穆尔河口湾向北航行。关于他的队伍在鄂霍次克海经3个月的航行到达乌利亚河口并返回雅库茨克的事情前面已经进过。

波雅科夫在雅库茨克向督军们禀报了阿穆尔河的政治形势，他认为明显地有利于在这个地区扩展俄国的影响。要知道，在阿穆尔河中、上游只有部分当地居民向满洲纳贡，其余的不臣服并与之作战，而下游的人民在俄国人到来之前不向任何人交实物税。

波雅科夫首次对住在阿穆尔河流域的人民给予了评价，他顽强地劝说雅库茨克的督军们，使他们确信，必须把阿穆尔河土地并入莫斯科罗斯。“向那儿出征，可以把以耕种土地、收获粮食的坐着的人置于沙皇……统治之下，以向他们收取实物税，这其中可以给国王带来大量利

润，因为那片土地人口众多，粮食丰产，黑貂和各种野兽很多，种植各种农作物，河里鱼类丰富。”（注 18，300 页）

波雅科夫告诉督军们，按他的意见，有 300 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就可以把整个阿穆尔地区并入俄罗斯。他建议把他们中的一半人留在 3—4 个城堡里，派其余的人去镇压那些不缴纳实物税的不安分的外国人。关于俄国军队的供应，他建议依靠向当地居民征收来解决（注 53，29 页）。

以著名的新土地发现者——大乌斯秋格附近的农民叶罗菲·巴甫洛维奇·哈巴罗夫—斯维亚迪斯基为首的考察团继续了对阿穆尔河的考察。他的一生都在不断进行伟大的冒险，好在 17 世纪的西伯利亚为他的冒险提供了一切可能。

还在 1629 年时他就和 5 个雇佣者沿泰梅尔地区的沃洛羌卡河驶往开采地，赫塔（哈坦加）冬营地就在沃洛羌卡河口附近，哈巴罗夫在那儿担任了一年的地方官——海关税征稽员。1630 年 7 月，根据曼加杰亚村社大会（商人、实业者、手工业者大会）的决定，他被派到莫斯科递交全体村社对曼加杰亚督军 Г. И. 加加列夫的控诉呈文：“他在谁那儿，我们兄弟们那儿，叶罗菲·哈巴罗夫以全体村社的名义写道，要是找不到好货或貂皮，那么就抢光所有的东西：我们国家遥远的世袭领地，曼加杰亚大地竟成了，陛下，无法忍受的灾难之地，无论谁都没有给我们，您的孤儿，给外国人带来如此的屈辱，对其进行如此的强买强卖。”

他不惧怕将 83 名受尽加加列夫重利盘剥的人的清单呈递上去，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具体地指出了给每一个商人或实业者造成痛苦的那些数字。哈巴罗夫抱怨说，加加列夫甚至抢走了“圣像、经书、诵读之人、唱诗班歌手、教堂日历，没留下任何祈祷之物，颂扬上帝之物。在整个曼加杰亚城里，无论谁那儿都没有留下被子、衣服、枕头：所有东西都敛到自己那儿去了”（注 38，194—195 页）。

1632 年，哈巴罗夫离家来到勒拿河。他立刻就开始打听，“种什么庄稼，有什么盐和熬盐的设施”，他在维柳伊河发现了湖盐，而后在库塔河口，从那儿给叶尼塞斯克寄去了“盐的试验品”（盐的样品）。就在库塔河他找到了一个适合耕种的地方，在那儿，在“俄国人很少光

顾的空旷之处”，他着手办熬盐场，开垦了许多耕地，建了磨坊，并且办任何一个工厂都是“用自己的生活费”（注 38，213 页）。1633 年，他利用雇佣劳力在库塔河口组织起了晒盐企业，在一年的时间里生产出来 100 普特的盐（注 10，130、144 页）。

1641 年时，他开垦的土地有 26 俄亩，其中有“熟地，今年 149（1641）年种着黑麦……8 俄亩，种着春播作物的 1 俄亩，到 150 年播种 3 俄亩，除了那块熟地，可耕地 3 俄亩，可耕作的林地有 5 俄亩，草原上有 6 俄亩用作干草草场”（注 39，213 页）。

就在 1641 年，哈巴罗夫迁到新地方——基廉加河口，在那儿开辟耕地的请求得到核准，而且拒绝了通常在开垦西伯利亚生荒地时按规定国库所给予的贷款。一年的优惠期过后，他应当为国家耕种 1/10 俄亩的土地并用自己的种子种上它——这仿佛是土地的租金。

他使用雇佣劳力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活动，他有耕地的马，也在勒拿河连水陆地从事运输业。他的一个管家 1645 年为他建了一个磨坊并雇了工人。哈巴罗夫粮食贸易的规模巨大，这使他成为雅库茨克县最大的商人之一。有这样一些事实可以证明他的贸易业务的规模：1641 年他贷给商人伊万·斯维尔乞科夫 600 普特的面粉，第二年在雅库茨克卖了 300 普特。第一任雅库茨克督军彼得·戈洛文从他那儿“为国家征用日用品”，也就是将 3000 普特面粉收入国库。

除了从事农业之外，他继续进行贸易业务和放钱生利。这样一来，哈巴罗夫——当时的大雇主、企业家于 1649 年把大量的私有资金投入组织到组织和装备自己去阿穆尔河的考察团的事业中。

雅库茨克督军 П. П. 戈洛文完全毁了他：抢走了他全部的粮食，把他的熬盐场收归国有，将其投入监狱。直到 1645 年底他损失了自己不少钱后才从监禁中被释放出来。使他感到幸运的是，戈洛文于 1648 年被另一个督军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所代替。新督军和哈巴罗夫于 1649 年 3 月在伊利姆城堡举行了会见。

在了解了波雅科夫考察团的结果后，哈巴罗夫请求允许他组织新的阿穆尔河考察团。弗兰茨别科夫将国库的军事装备借给哈巴罗夫，包括几门炮和火绳枪、农具。新督军把自己的私房钱高利放给新考察团的所有参与者，并将雅库茨克实业者的船只划拨给考察团。在哈巴罗夫 70

人的队伍组成后，督军把从那些实业者那儿抢来的粮食给了这支队伍。1649年3月6日给哈巴罗夫颁发了委托公函。

所有这些非法索取和没收在雅库茨克引起了骚动，但弗兰茨别科夫逮捕了闹事的主谋。作为回应，实业者往莫斯科寄去了呈文，秘密控告督军。其实，此前（1649年秋天）哈巴罗夫已经从雅库茨克出发，沿勒拿河和奥廖克马河溯流而上，于夏末到达杜基尔河口（现在叫冬基尔河，位于外贝加尔的东北部，奥廖克马河东边的支流）。为了深入到达乌利亚，他选择了走所谓的杜基尔连水陆地这条路。

这条路顺着勒拿河支流奥廖克马河延伸，沿着后者航行时由于河中存在大量的石滩和“许多大的水浅、流急、多石的河床”所以异常困难。穿过山脉后，奥廖克马河形成了10处石滩。的确，石滩本身尽管使航行变得困难，但“大的河船”还是可以通行的，而过了石滩后沿河的“船路则通畅多了”。哈巴罗夫的队伍沿着杜基尔河到达了纽克季（纽克奇河）或纽季河（纽恩奇河）。从纽克季河“乘雪橇经连水陆地过山脉到阿穆尔河要12天”（据另外的资料，“徒步负荷”要8天）（注6，130页）。

1650年1月，队伍乘雪橇往南，沿杜基尔河向上，越过奥廖克马斯塔诺维克山（俄联邦赤塔州外贝加尔东部的山系——译者注）的支脉，于那年春天来到注入阿穆尔河的乌拉卡河（或叫乌拉河，阿穆尔河上游北边的支流）。人们在那儿造好了船并下到了阿穆尔河中。另一条连水陆地直达在乌拉卡河稍上面一点地方注入阿穆尔河的阿马扎尔河。这条河水少，到处是石滩和水浅、流急、多石的河床，在这条河上航行必须卸了船，沿河岸倒运货物。从奥廖克马河口经杜基尔连水陆地到阿穆尔河的路程几乎要12个星期整。据另一种资料可以用8个星期走完这条路。哈巴罗夫走过的这个杜基尔连水陆地在今后占领达乌利亚时起了主要作用，以至于不久就因此引发了同满洲人的战争。

1649年这儿已经有俄国的冬营地，对去往阿穆尔河的道路的进一步考察就是从这儿开始的。1653年，为了巩固这块连水陆地，在那儿建成了杜基尔城堡、仓库和去往阿穆尔河途中的落脚点。第二年，上面吩咐替代哈巴罗夫的小官吏奥努福里·斯捷潘诺夫在乌拉卡河口建城堡，但“同博克达人（即满洲人——作者注）的激烈冲突无法在这条

路上建立巩固据点”。1658年斯捷潘诺夫的哥萨克队伍被击溃（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件事）以及作为俄国在达乌利亚势力中心的涅尔琴斯克的建立使得杜基尔城堡在17世纪60年代前半期已经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被放弃。1670年左右，中国当局企图在杜基尔连水陆地附近建城堡，以便从那儿去往奥廖克马河并沿河侵入俄国领土。

中国人后来试图在另一条波雅科夫经过的去往阿穆尔河的连水陆地上对抗俄国人。1675年沙皇使臣斯巴伐里在纳乌温（中国的嫩江城——译者注）同中国外交官谈判时被迫“放弃”住在结雅河的缴纳实物税的埃文基人，但1677年俄国人已经在结雅河上游建立了城堡，两年后又建了两个小城堡——色楞格城堡和达罗涅茨城堡（结雅），以便把整个结雅河掌握在自己手中。1682年中国人要求毁掉这些城堡。达罗涅茨（结雅）城堡被撤销了。1683年阿穆尔河上出现了一支强大的中国舰队，在舰队掩护下，中国人在结雅河口附近建成了瑗琿要塞（满语称萨哈连乌拉霍特，1858年后出现瑗琿字眼——译者注），此后，结雅河上的俄国城堡被放弃。

现在我们回到哈巴罗夫和他的哥萨克的话题上。当新的俄国部队到来的消息传到当地达斡尔人那儿时，他们离开了河谷，躲到了领土的深处。哈巴罗夫进入了达斡尔王公拉夫卡亚位于乌尔卡河上的一座空的但防御设施完备的小城。小城由100多所房屋组成，每栋房屋住有50或50多个居民。这些明亮、宽阔的窗户上糊着油纸的房屋令哥萨克感到震惊。城里留下了大量的粮食储备。

哈巴罗夫从那儿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沿途他遇到了一些空无一人的小城和乡村。在一个小城里，哥萨克把一个当地女人带到哈巴罗夫面前，她告诉他，从阿穆尔河往南有一个富饶的满洲国，那儿的河里有一些大货船航行，而统治者拥有用大炮和火绳枪武装起来的军队。

对所有这些获得的信息作了一番斟酌后，哈巴罗夫在“拉夫卡亚小城”留下来大约50名哥萨克，他本人和其余的人在5月底回到了雅库茨克。他在那儿向督军们呈递了达乌利亚的地图和出征的报告，图纸和报告被紧急送往莫斯科。这份图纸在制作1667—1672年的西伯利亚地图时派上了用场。

为了向达乌利亚发动新的征讨，哈巴罗夫在雅库茨克招募了一批志

愿者——110名“乐意去的”人。而督军弗兰茨别科夫又给这些志愿者补充了27名军役人员和3门大炮。1650年秋天，哈巴罗夫和160人组成的队伍返回了阿穆尔河。他在阿穆尔河靠下一点儿的地方遇见了被他留在那儿的哥萨克，他们在那儿向设防的小城阿尔巴津（雅克萨——译者注）发动的猛攻无果而终。当哈巴罗夫的队伍临近时，达斡尔人逃离了阿尔巴津。哥萨克追上并击溃了他们，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和俘虏。

哈巴罗夫依托阿尔巴津向就近的达斡尔村庄发动了进攻，抓了许多俘虏，主要是女人，他把她们给了自己的哥萨克。造好了船只后，哈巴罗夫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起初哥萨克碰到的只是一些被达斡尔人自己烧掉的村落，但不久他们猛攻拿下了坚固设防的城市，战斗中死了大约600名达斡尔人。哈巴罗夫向周围的村子分别派去了自己的急使，劝说达斡尔人顺从沙皇，缴纳实物税。因为找不到自愿加入俄国国籍的人，哈巴罗夫就继续沿河而下。

8月，结雅河口下面的城堡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哥萨克，周围村子的居民也主动承认自己是莫斯科沙皇的臣民，他们还带来了不多的貂皮，答应秋天时交齐剩余的实物税。但过了几天，周围的达斡尔人抛弃了自己的家园，举家出走。

从布列亚河口起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与满洲人同源的民族。哥萨克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他们不大的村庄。以耕作为生的久切尔人对哥萨克的反抗不足为道。9月底哥萨克来到了那乃人居住的地方，哈巴罗夫在乌苏里江河口附近他们不大的村子里住了下来。他派出了一半哥萨克沿河向上去捕鱼。于是和久切尔人联合起来的那乃人于10月8日向哥萨克发动了进攻，但他们遭受了失败，死了100多个人，而哥萨克几乎没有损失。哈巴罗夫加强了村子的防卫并留在那儿过冬。哥萨克从阿枪斯克城堡（乌扎拉村，位于乌苏里江河口东北600里处，今俄罗斯境内宏加力河口——译者注）完成了对那乃人的进攻并收取了实物税。

1652年3月24日满洲的中国皇帝的总兵官（满洲官职为昂邦章京）派出以伊基涅王公（应为翼长希福，《清实录》载：“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译者注。）为

首的满洲军队从纽姆古塔（现在的宁古塔）来到阿枪斯克城堡。队伍总计约 2000 名士兵，配备有 8 门火炮，30 支燧发枪和 12 颗巴巴尔特（黏土制作的地雷一类的武器，用来炸毁要塞的城墙）。

在向城堡开炮后，满洲人在城堡墙上炸开一个缺口并蜂拥而入。哥萨克粉碎了进攻，缴获了两门最大的炮并立刻用它们轰击进攻者。在被打死 670 个人和损失大量辎重后，满洲人撤退了（注 53，29—30 页）。他们自己也承认，说没料到遇到的这些以哈巴罗夫的哥萨克为代表的人“像虎一样凶猛，射击准确”（注 2，38 页）。

但哈巴罗夫清楚，满洲人会继续尝试把哥萨克逐出阿穆尔河。于是当春天阿穆尔河刚刚解冻时，他就带领船队溯流而上。6 月在松花江河口上面哈巴罗夫遇到了派来帮助他的一支不大的俄国部队，他们继续沿河向上驶去，尤其是听到一支 6000 人的满洲大部队前来迎击他时。只是到了 8 月初他才在结雅河口停了下来，而后去往阿穆尔河右边的支流库马拉河（中国黑龙江省的呼玛河——译者注）口并在那儿建了设防的城堡。

一批造反者从这儿乘 3 艘平底木船沿阿穆尔河下行，他们抢劫、杀死了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那乃人并到达基里亚克人的地盘，在那儿建了城堡欲收取实物税。9 月哈巴罗夫沿阿穆尔河航行到达造反者的城堡。他们投降的条件是要哈巴罗夫保留他们的性命和抢来的物品。哈巴罗夫命令无情地鞭笞他们，许多人被打死。哈巴罗夫把造反者抢劫得到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

哈巴罗夫就在基里亚克的土地上度过了第二个冬天。他于 1653 年春天返回达乌利亚，回到了结雅河口。夏天在往阿穆尔河上游、下游派出了哥萨克的同时，他开始收取实物税。根据满洲当局的命令，阿穆尔河左岸的所有居民都迁到了右岸。1653 年 8 月，沙皇使者、贵族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基诺维耶夫来到位于结雅河口的哈巴罗夫的部队，他是 1652 年从莫斯科派出来接管新的达乌利亚土地的。

他带来了沙皇给哥萨克和哈巴罗夫本人的奖品，但后者被撤销了部队领导的职务，而当他开始反驳时，使者则将其痛打一顿并押往莫斯科。路上，哈巴罗夫随身携带的东西被没收。在莫斯科返还了他的私人物品，沙皇赏给他“贵族头衔”，在东西伯利亚给了他几处村庄作为

“食邑”，但不准许他返回阿穆尔河。

在那些年阿穆尔河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以军役人员伊万·安东诺夫·纳基巴和伊万·乌瓦罗夫为首的队伍的命运值得关注。1651年夏天经雅库茨克督军德米特里·弗兰茨别科夫的允许，从雅库茨克向阿穆尔河派出了一支以军役人员杰廉吉叶·叶尔莫林和阿尔杰米耶·费里波夫为首的给哈巴罗夫送弹药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哥萨克当中就有纳基巴和乌瓦罗夫。

叶尔莫林沿勒拿河上溯到它右边的支流奥廖克马河口，然后沿奥廖克马河向上，经过6个星期的航程到达杜基尔河口。沿杜基尔河谷上行时，叶尔莫林遇到了哈巴罗夫的使者，使者没有携带书信只是按后者的嘱咐，要求紧急给他送去弹药。叶尔莫林决定把一部分物资留在杜基尔连水陆地建成的冬营地交一支不大的队伍看管，而本人带着铅弹和火药去同哈巴罗夫的队伍会合，尽管他并不准确地知道后者所处的位置。

叶尔莫林的队伍来到石勒喀河，哥萨克在那儿建造了平底木船并沿河而下。哥萨克从在岸边抓到的“舌头”的嘴里得知，哈巴罗夫顺流而下，已“驶过了达乌利亚的土地”。因为结冰期已到，叶尔莫林的队伍就在达斡尔人放弃的班布来伊小城过冬，而达斡尔人因躲避哈巴罗夫的队伍都跑光了。

发现阿穆尔河后，叶尔莫林没得到任何有关哈巴罗夫的消息，经哥萨克同意，他决定派出侦察队沿河而下。侦察队由纳基巴率领，同他一起上路的有36名哥萨克。在送交伊万·纳基巴的委托公函中吩咐他航行时要格外小心，不要卷入同当地居民的冲突，如果碰不上哈巴罗夫，那么第11天就往回返。

而等待留在杜基尔连水陆地的哥萨克到来的叶尔莫林本人也沿河而下并最终同哈巴罗夫会合，但他在哈巴罗夫的队伍中没有发现自己的侦察员。哈巴罗夫的确从抓获的“舌头”嘴里听到过侦察员的消息，而且在距松花江河口不远的地方哈巴罗夫的哥萨克还找到过侦察员们的信。叶尔莫林想去寻找失踪的侦察员，但哈巴罗夫不放他走。

后来才搞清楚，纳基巴和同伴在沿阿穆尔河而下的途中曾几次靠岸，并在明显的位置给哈巴罗夫留下了书信。他们在松花江河口也留下了信，哈巴罗夫恰好也在那儿，但侦察员同他失之交臂。

上路的第7天，纳基巴的队伍遭到了久切尔人平底木船小舰队的攻击。哥萨克突出重围，但岸边等待他们的是大批的马队。在几天的时间里，哥萨克的船只遭受了日夜不停的数次进攻。第11天，哥萨克开始意识到，溯流而上返回大部队对他们来说极其困难。弹药告罄，而没有弹药不可能同久切尔人数量众多的部队作战。

最后他们作出了向下去往基里亚克人地盘的决定。当纳基巴的船队到那儿时，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敌对的基里亚克人的船队。战斗以有利于哥萨克的结局收场，但基里亚克人封锁了河流，沿河上下设置了岗哨。

这样的围困持续了两周，饥饿的哥萨克决定突围。但在第一个指望搞到点儿食物的宿营地，哥萨克中了基里亚克人的埋伏。战斗从中午持续到傍晚，在损失了30多个人之后，基里亚克人撤退了。

哥萨克就这样突围到了阿穆尔河口。他们在那儿登岸后改造了自己的一艘船做出海的准备。他们用钉在上面的木板加高了船舷，又对这些木板作了加固。在这儿，他们再次遭到基里亚克船队的攻击，但哥萨克成功地出逃来到河口湾。按著名西伯利亚历史学家C. B. 巴赫鲁申的话说，纳基巴和他的伙伴“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划船冲出海湾来到大海”（注28，58页）。

他们在那儿遇到了冰川，而这是在盛夏。在冰间漂流了10天后，他们的船被冰压坏。“我们，国王的奴仆，劳神费力地挣扎到了岸边，粮食、铅弹、火药、衣服都沉了底，我们落得一无所有”，后来伊万·乌瓦罗夫在报告中写道（注30，110页）。

到了岸边，哥萨克开始步行沿海岸往北去。他们靠野果和树根充饥，也猎取北欧海豹和海象，还找到一只不知被什么伤害而死亡的驼鹿。在行程的第5天哥萨克来到河岸上，他们造了小船并划到了对岸。而后甚至冒险乘这条船继续在海上航行，尤其是当从地平线开始的冰川使沿海未冻水面的波浪减小时。

哥萨克在途中遇到的通古斯村庄停了下来，他们是从阿穆尔河口走了8个星期到那儿的并在那儿等到了冬天。然后他们制作了雪橇，翻越了沿岸的山脉并来到了勒拿河流域。他们用4个星期穿过泰加森林，偶然发现了一条通古斯人的鹿拉雪橇商队走过的路并到达了一个通古斯村

庄，就留在那儿过冬。

夏天伊万·纳基巴和5个哥萨克终于来到雅库茨克并在那儿向雅库茨克当局转交了队伍首领伊万·乌瓦罗夫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通报了关于哥萨克这次令人震惊的“奥德赛”式的壮举。

为了巩固莫斯科沙皇在外贝加尔地区的政权和在石勒喀河建城堡，叶尼塞督军于1652年6月往那儿派遣了以中尉彼得·伊万诺维奇·别盖多夫为首的100名哥萨克。队伍沿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溯流而上到达布拉特城堡。别盖多夫从那儿向色楞格河的支流希洛克河的源头派出了一个侦察小组，小组以五十人长伊万·马克西莫夫为首并配备一名去年到过外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翻译雅科夫·索福诺夫。索福诺夫和5名同伴乘马从巴尔古津城堡出发用了6天时间到达了希洛克河的源头。他从埃文基人那儿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山岭外的”音果达河的消息并得知沿河到达“伟大的什尔卡河（石勒喀河）”要4天的路程。他还查明，沿希洛克河可以到达色楞格河，因此经过巴尔古津城堡也能到达石勒喀河。

别盖多夫在色楞格河上建起了乌斯季—普洛尔文斯克城堡并在它河口稍南边的地方留下来过冬，哥萨克在那儿储备了大量的鱼。1653年7月初，别盖多夫开始沿希洛克河向上并同在路上碰到的马克西莫夫的队伍一道于10月初到达河的源头。就在这儿，在伊尔根湖（位于外贝加尔边疆区的赤塔区——译者注）建成了伊尔根城堡。马克西莫夫向别盖多夫转交了征收的实物税和他于过冬时绘制的希洛克河、色楞格河、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的图纸——第一份外贝加尔的水文地质网的略图。这样一来，别盖多夫在从贝加尔湖到石勒喀河这条新的道路上的阵地得到了巩固。

别盖多夫急忙向东方进发，他越过雅布洛诺夫山脉，在音果达河建造了木排，但过早来临的冬天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只好返回希洛克河。1654年5月，当音果达河解冻后，他沿河而下，来到石勒喀河并于涅尔琴河口的对面建立了城堡。但埃文基人烧毁了播种的粮食，由于缺乏粮食队伍被迫离去。别盖多夫沿石勒喀河下到它同额尔古纳河的交汇处，他是第一个从外贝加尔到达阿穆尔河的俄国人。

在彻底考察了河流的上游到结雅河入口处900公里地段后，他同奥

努福里·斯捷潘诺夫的哥萨克会合了，后者代替哈巴罗夫被任命为“新的达乌利亚土地的小官吏……”（注 18，304 页）斯捷潘诺夫在阿穆尔河中游度过了半年的时间，“没到达基里亚克的土地”。这段时间哥萨克 4 次乘船到松花江弄粮。1654 年春天斯捷潘诺夫在松花江同满洲军队遭遇，后者不允许哥萨克沿河向上去，但简短的战斗过后，俄国人赶走了满洲军队。斯捷潘诺夫向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和基里亚克人收取了实物税并在结雅河城堡过冬。

别盖多夫和斯捷潘诺夫的联合部队（多达 500 名哥萨克）在哈巴罗夫于结雅河口上面约 250 公里处建的库马拉城堡过了冬。1655 年 3 月底一支装备 15 门炮的 1 万人的满洲军队包围了城堡。3 月 24—25 日夜间满洲人发动了猛攻，但被打退。围困持续到 4 月 15 日。在哥萨克一次果敢的出击后，满洲人撤退了并遭受了重大的人员损失。哥萨克缴获了 2 门炮、800 颗圆弹和超过 30 普特的火药。斯捷潘诺夫同哥萨克一道带着收取的实物税和从满洲人那儿抢夺的战利品经外贝加尔沿阿穆尔河向上进发。

和这支部队一起出发的还有费奥多尔·普欣的队伍和他的翻译 C. 彼特罗夫·奇斯德伊。5 月哥萨克首次考察了阿穆尔河右边的组成部分额尔古纳河。普欣沿额尔古纳河没有遇到居民，他返回了斯捷潘诺夫和别盖多夫的主力部队。只是过了几年之后额尔古纳河才成了从外贝加尔去往东部中国城市的贸易之路。

第二年斯捷潘诺夫从库马拉城堡出发再次沿阿穆尔河往下去，在松花江得到大量粮食储备，而后把它们分发到阿穆尔河上的主要的俄国城堡。

哥萨克的联合部队于 6 月下到阿穆尔河口，到了基里亚克人的土地，在那儿又建了一个城堡，队伍就在那儿度过了冬天。1656 年春末斯捷潘诺夫带着大部分哥萨克沿阿穆尔河来到乌苏里江河口，又沿河上行 300 多公里，于夏天考察了它右边最大的支流霍尔河、比金河和伊曼河。

1656 年，叶尼塞督军阿法纳西·费里波维奇·巴什科夫被任命为涅尔琴斯克边区的督军。莫斯科当局委托他管理阿穆尔河上所有的哥萨克。1658 年，他把自己主要的逗留地——涅尔琴斯克进行了加固，并

给阿穆尔河的斯捷潘诺夫发去命令，严禁出征满洲。尽管如此，斯捷潘诺夫还是同 500 名哥萨克去往松花江搞粮食。在江的下游他遇到了强大的满洲军队。在顽强会战的过程中，斯捷潘诺夫和 270 名哥萨克被打死，许多人被俘，其余的人一部分顺岸边逃走，另一部分人乘一条幸存的船逃生。斯捷潘诺夫队伍中的一些哥萨克回到了雅库茨克，而 1661 年 17 人来到涅尔琴斯克给巴什科夫带来了队伍被歼灭的消息（注 53，32 页）。

1656 年 8 月别盖多夫带着他的哥萨克和收缴的实物税在斯捷潘诺夫的队伍被击溃前沿阿穆尔河溯流而上经涅尔琴斯克返回了叶尼塞斯克。他是第一个仔细考察了全部阿穆尔河（从石勒喀河同额尔古纳河交汇之处到河口 2824 公里的地段）并返回的人（注 18，304 页）。

紧随哥萨克之后在 17 世纪 50 年代已经有一批批的俄国实业者和农民沿着奥廖克马河和杜基尔河去往阿穆尔河。“由于军役人员、实业者、各色人等以及养种地的农民逃往达斡尔人那儿”，为了禁止这种随便在阿穆尔河定居的企图，1656 年雅库茨克当局只好在奥廖克马河口建起了关卡（注 6，131 页）。

1665 年在阿穆尔河形成了以设防的小城阿尔巴津（雅克萨）为中心的类似自由哥萨克村社的组合物。这个村社的主体是伊利姆县的造反居民，他们是遭到督军镇压后在波兰人尼基福尔·罗曼诺夫·切尔尼果夫斯基带领下逃到阿穆尔河的哥萨克、农民和犯人。在巩固了被毁的达斡尔王公阿尔巴扎的小城阿尔巴津后，“这些窃贼哥萨克”又在结雅河及它的支流谢林巴河建了几座新的小城堡。自由的哥萨克村社于 1672 年最终得到了沙皇当局的宽恕，在阿尔巴津一直存在到 1674 年（注 2，132 页）。

1681 年从阿尔巴津派出一支考察团沿阿穆尔河进行考察，考察团在阿姆贡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左边的支流——译者注）与杜古尔河（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注入鄂霍次克海的杜古尔湾——译者注）建起了城堡：在阿姆贡河是在杰林河和涅米林河口处所建的乌斯季—杰林城堡和乌斯季—涅米林城堡；而在杜古尔河上有杜古尔城堡。这些河两岸的居民都缴纳实物税，成为了俄国臣民。

这样一来，1681 年之前，不仅整个阿穆尔河沿岸边区，而且乌苏

里江沿岸部分地区已并入俄罗斯国家。阿尔巴津是阿穆尔河上主要的设防据点，从阿尔巴津往下分布着库马拉、结雅、卡萨戈尔和阿枪斯克城堡；在阿姆贡河上有乌斯季—杰林城堡和乌斯季—涅米林城堡；而在杜古尔河上，在离它河口 100 公里处有杜古尔城堡。此外，在阿尔巴津周围沿阿穆尔河还建起了一些俄国村庄和市镇：安德留什基纳、伊戈纳基纳、莫纳斯德尔希纳、巴克罗夫斯卡亚、奥捷尔那雅等。

1684 年，整个阿穆尔河沿岸边区被称作独立的阿尔巴津省，给阿尔巴津市颁发了单独的徽章和印章。阿列克谢·多尔布金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注 53，32 页）。

满洲当局不仅不能容忍俄国人出现在阿穆尔河，而且不允许俄国人占领外贝加尔。为数不多的俄国部队在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的支持下不止一次击退了满洲人及其同盟者蒙古封建主的进攻。阿尔巴津围困战（雅克萨之战——译者注）就是这种斗争中著名的事件之一。

满洲人捣毁了位于阿尔巴津下面沿阿穆尔河修建的俄国城堡。1685 年 5000 名满洲士兵乘坐 10 艘船抵达阿尔巴津，另有 10000 名士兵从满洲城市齐齐哈尔携带 150 门野炮和 50 门攻城炮从陆路抵达。6 月 12 日在阿尔巴津人拒绝了满洲人自动投降的建议后，敌人的大炮开始轰击城堡。

守卫阿尔巴津的总共只有 450 名卫戍部队。敌人的炮火完全摧毁了城堡的防御工事，于是督军同围困者进行谈判。满洲人同意放多尔布金带领卫戍部队和阿尔巴津的居民回到涅尔琴斯克。在被毁掉的城堡里总共留下来 25 名居民和后来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的神父马克西姆·列昂奇耶夫。阿尔巴津被拆毁，而满洲人回到了他们此前在结雅河下面阿穆尔河右岸建立的要塞瑗琿。

1686 年根据涅尔琴斯克督军弗拉索夫的命令，阿尔巴津人在上校阿法纳西·别以托恩和督军多尔布金带领下返回被毁掉的阿尔巴津并修复了它的防御工事。但 1687 年 6 月一支 8000 人的满洲军队携带 40 门炮抵近阿尔巴津。俄国人烧毁了要塞外面所有的房屋后躲进了要塞并在那儿挖了地窖。总共有 736 名哥萨克、常备军和实业者守卫着要塞。

满洲人用修建的木城墙围住了营地，但哥萨克摧毁了它，于是满洲人在自己营地周围建起了土围子并在上面架起了炮。9 月 1 日满洲人开

始了向要塞发起攻击的尝试，但被击退并遭受了极大的损失。9月督军多尔布金死于敌人的炮弹，防御战由别以托恩上校指挥。因为满洲人对要塞的轰击不奏效，所以他们包围了它，而1688年5月甚至退到了离要塞4俄里的地方。

在此之前，要塞里总共还有66名活着的士兵，其余的在战斗中阵亡或死于坏血病，但敌人也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士兵。此时从北京来的急使来到满洲人的营地并带来了皇帝的诏书，借口同沙皇代表有关划分领土的谈判已开始命令停止围困。满洲人解除了围困，于1688年8月30日返回瑗珲（注53，33页）。

莫斯科派侍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作为自己同中国人签订条约的全权代表去往涅尔琴斯克。涅尔琴斯克督军伊万·阿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是谈判的副代表。1689年1月戈洛文成功地同蒙古可汗签订了关于中立的条约，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不帮助中国人并且不对外贝加尔的俄国边境城市发动进攻。

现在戈洛文有可能在同中国人的谈判中表现得更加自信。因为当时在整个涅尔琴斯克边区戈洛文只有不足500名士兵。而中国人却把几乎1万名步兵和骑兵带到了涅尔琴斯克四周，他们是作为被派去谈判的中国使臣的随从来到这儿的（注53，34页）。

在这样的条件下，莫斯科的代表被迫于（俄历）1689年8月27日同中国签订了《涅尔琴斯克和平条约》（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译者注）。根据条约，外贝加尔彻底归属莫斯科国家，但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俄国那次被迫放弃了部分已经攫取的领土。阿尔巴津，这个阿穆尔河上的哥萨克要塞被夷平。

根据条约莫斯科沙皇在阿穆尔河的领地局限于河流上游支流地区的领土，这块领土划归重新成立的涅尔琴斯克县。边界的走向从额尔古纳河源头到河口，然后沿着阿穆尔河的支流格尔必齐河，从它的上游沿着山脉“贴近阿穆尔河”到达注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流域的上游。从乌第河往南，河流与阿穆尔河中游以及大海之间的地区根据涅尔琴斯克条约没有划定边界（注2，39页；注5，282页）。

说实在的，Ф. А. 戈洛文坚决维护了罗斯的商业利益。条约签订之后他同莫斯科商量直接“从吏部帐篷”——自己的官邸——急忙向

中国派出了由军役人员和商人组成的贸易商队。从此时起，对罗斯极为有利的俄—中贸易的规模在涅尔琴斯克条约签订后的最初3年里扩大了3倍（注6，156页）。

这样一来，涅尔琴斯克条约就打破了中亚细亚商人的垄断，在条约签订之前他们事实上是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唯一的中间商。现在俄国商人可以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牢固的直接关系。俄国商人用毛皮和其他传统的西伯利亚商品从中国换回了茶叶、丝织品、棉布和棉布衣服、瓷器、大黄等。

只是过了170年，当东西伯利亚省长H. H. 姆拉维约夫将军于1858年同中国签订《璦琿条约》时，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土地所属权问题上的历史公正才得以恢复。按照该条约，所有阿穆尔河左岸土地永远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不包括黑龙江右岸“江东六十四屯”。1900年俄国以义和团兴起威胁俄国人的生命为借口吞并该片领土——译者注）。

1860年11月14日俄国驻中国公使H. П. 伊格纳季耶夫与中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俄—中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又称《中俄续增条约》——译者注），承认了《璦琿条约》的条件，确定了两国沿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的边界，于是从兴凯湖北边起，然后向南到日本海沿岸，也就是说除了阿穆尔河沿岸边区之外，整个滨海边区（阿穆尔河左岸从乌苏里江河口到阿穆尔河注入河口湾之处，以及乌苏里江右岸和彼得大帝湾沿岸土地，那年就在那儿，在金角海湾岸边建成了军港符拉迪沃斯托克）都永久并入了俄罗斯国家的版图。

这样一来，大约在70年（从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中叶）的时间里，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就走遍了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他们搜集了实际上完全准确的关于这个17世纪之前事实上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广阔地带所有区域的信息。按历史标准衡量，这项宏伟的事业是在极其短暂的期限内完成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C. B. 巴赫鲁申指出：“在世界地理发现史上还不曾有过如此大规模、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和以如此的毅力考察新地域的先例。”（注2，40页）

## 穿越西伯利亚到达遥远的 博克达汗<sup>①</sup>的国家

应当完全了解整个西伯利亚大地：  
生长什么，在哪儿生长，  
谁在哪儿游牧，谁在哪儿定居，  
他们有怎样的信仰和风俗  
俄国人怎样同外国人相处，  
以便相互不抱恶意。

——A. B. 普列洛夫斯基改编的关于《夺取西伯利亚》的故事

谈到西伯利亚时应当懂得，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用和必须的。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国内的商品（即普通的亚麻织品、盐和谷类，这些商品在他们那儿是非常贵重的）通过交换从任何一个当地民族那儿得到他们的产品而无须支付金钱。

——尤里·克里扎尼奇《关于统治地的谈话》，1663

1675年3月4日全俄沙皇使节摩尔达维亚贵族尼古拉·加福利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巴伐里在军队和大量随从陪伴下从莫斯科前往北京。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和有经验的外交家。他出生在扎普鲁茨卡亚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东部一个省，历史上曾是大摩尔多瓦国的领土，后并入罗马尼亚——译者注）的米列什塔赫（他的姓米列斯库即由此

---

<sup>①</sup> 源于蒙语。1636年蒙古16个部落46个封建主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大汗的继承者，并奉上“博克达·彻辰汗，即宽温仁圣皇帝的称号”。以后博克达汗即指清朝皇帝——译者注。

而来)，起初在亚萨赫读书，后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总主教学校学习，他在那儿研究希腊、拉丁、土耳其和阿拉伯语言，以后他继续在意大利的帕多瓦求学。

米列斯库开始是为摩尔达维亚公（14—19世纪摩尔达维亚公和瓦拉几亚公的称号，以后两个公国合并为罗马尼亚国——译者注）格奥尔基·施泰凡做秘书，后来在施泰凡尼金公那儿服务。格奥尔基·基加公任命他为军队统帅，尼古拉·米列斯库为此得到了“斯巴达尔”或“斯巴伐里”的称号（意味着“武器的保护者”）。因在宫廷担任职务的缘故，H. 米列斯库有了第二个姓——斯巴伐里。他曾在伊斯坦布尔（1660—1664）、斯德哥尔摩（1666）和巴黎（1667—1668）完成了委托的外交使命。考虑到摩尔达维亚和俄罗斯共同的东正教信仰，尼古拉·米列斯库拥护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亲近。

1671年，在大约40岁（或稍大一点儿）时他被耶路撒冷东正教大牧首多希费伊派往莫斯科并留在那儿为俄国服务，一年后成为外交部的翻译。多希费伊写到他时说，斯巴伐里在接受“希腊和其他语言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很快就学会了俄语，并打算自己翻译”（注20，151页）。

斯巴伐里在外交部迅速高升。他是翻译中酬金最高的并得到了有影响的贵族阿尔达茂·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的支持，而后者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未来的彼得大帝的母亲娜塔莉亚·基里洛夫娜的亲戚。

3年后根据贵族阿尔达茂·谢尔盖耶维奇·马特维耶夫的推荐斯巴伐里被派往中国担任大使以解决沿阿穆尔河边界地区的摩擦问题并着手建立贸易关系。外交使团的筹备工作进行得非常仔细。在1675年2月20日颁发给斯巴伐里的证书中指出：“……为自己伟大的国王服务的尼古拉·加福利洛维奇·斯巴伐里作为伟大国王的使节持友好国书觐见中国皇帝。命令同他一起出行的外国贵族有费多尔·巴甫洛夫、卡斯将金·戈列恰宁，处理外交部文牍事务的书吏官尼基福尔·维纽科夫、伊万·伐瓦洛夫。是的……还要带上懂岩石的希腊人斯比里多恩·叶福斯达费耶夫，懂医药的希腊人伊万·尤里耶夫。”（注28，129页）这样一来，使团成员中就有懂矿物学、植物学和医学的人。斯巴伐里本人在

旅行过程中借助星盘第一次确定了使团在西伯利亚考察途中所经过的一系列据点的地理纬度。而尼基福尔·维纽科夫和伊万·伐瓦洛夫则绘制了许多线路图，它们成了以后已经标有经纬线网的总图的基础。遗憾的是，这张总图没有保留下来。所以说，使团本身具有某种鲜明的科考性质，而使团的总结材料对研究广大的西伯利亚边区和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按照给斯巴伐里的命令，他旅行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俄国在西伯利亚新的领地作出详细的描述，而后是完成对中国的详细描述。要求他对“整个中国国家、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境城市沿途的情况加以描述，在图纸上画出所有小块土地、城市和道路”（注 28，128 页）。

根据本书的构思，使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斯巴伐里考察团所积累的同描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关的材料，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西伯利亚地理资料之集大成并吸收了那个时代俄国先驱者所取得的大量的发现成果。

人们委托斯巴伐里“千方百计打听”去往中国的道路并给他们提供一份图纸。那年的 3 月 30 日使团到达托博尔斯克，在那儿逗留了 5 个星期。人们从莫斯科的外交部藏书中给了斯巴伐里一本荷兰人彼得·万戈伦写的关于外交使团去往中国的书，作者 1666—1668 年曾随使团到过中国并于 1670 年用斯巴伐里不懂的荷兰文出版了一本关于自己那次旅行的书。

到达托博尔斯克后他仔细询问了当地的居民、俄国人以及布哈拉人和鞑靼人并依据他们的讲述决定经叶尼塞斯克去往色楞格河考察，然后前往阿穆尔河。正在托博尔斯克流放的霍尔瓦提（克罗地亚）学者、神父尤里·克里扎尼奇几乎每天都待在大使那儿。正是克里扎尼奇根据外交部的委托为大使把荷兰人彼得·万戈伦关于到中国旅行的书从荷兰文翻译成拉丁文。克里扎尼奇向大使转交了他为自己的书《关于中国贸易的书信》所搜集的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所有资料。

从莫斯科出发两月后使团离开了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托博尔斯克。使团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向上航行到达纳雷姆，而后沿凯特河到达马果夫斯克城堡，使团最终走陆路到达叶尼塞斯克。

7 月斯巴伐里和陪同人员沿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航行，于 9 月 12

日到达贝加尔湖。从一个叫作库尔杜克的最窄的地方渡过湖后，使团到达色楞格河。上岸后，使团经过3天的行程从色楞格城堡来到位于喀尔喀—蒙古人游牧区的俄国冬营地。

斯巴伐里从色楞金斯克经达乌利亚去往涅尔琴斯克走了一条“此前任何人没走过的”新路，即乌达河口（后来这儿建成了上乌金斯克市）—乌达河北岸—叶罗文斯克湖，往东南拐向杰列姆巴湖附近的杰列姆巴城堡—雅布洛诺夫山脉—因果达河和石勒喀河到涅尔琴斯克。接下来道路沿着额尔古纳河和它的支流延伸，然后经草原和山脉到达纳乌温河（嫩江）。当时俄国领土的边界暂且到杜尔加琴斯克（兴安岭）山区的在离阿尔巴津不远处注入黑龙江的乌鲁恰河为止。后来使团进入了满洲领土。1676年5月15日斯巴伐里到达北京，使团并未取得重大成果。斯巴伐里于当年9月1日离开北京，1677年5月他已在伊尔库茨克了，只是到了1678年1月5日他才返回莫斯科。

斯巴伐里随身带来了西伯利亚旅游的途中日记、俄国政府的文件资料、描写中国的书、旅游线路图和西伯利亚边界上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的图纸。斯巴伐里的途中日记名为：《西伯利亚帝国——从托博尔斯克市到中国边界游记 7183 年（1675 年——作者注）夏天 5 月 3 日》。事实上这在俄国是第一次根据自身的观察和通过询问内行的对话者——西伯利亚的居民对西伯利亚的主要部分所作的大范围的地理描述。

日记从详细描述沿额尔齐斯河的航行、描述河流本身的特点、它的支流、两岸的村庄和居民开始：“……额尔齐斯河静静地流着，宽大约 50 俄丈，深度在 10、11、20 俄丈或更深……在额尔齐斯河右面有一条小河巴布洛甫卡，水是黑色的，那里可以逮到海狸、貂、驼鹿和其他各种野兽，它从遥远的地方、从沼泽地流过来，距离托尔斯泰岛有半俄里。在左边有奥斯恰克人加列涅夫的帐篷……他们的信仰，人们说，通过印章来体现，印章上刻有偶像，有银的、铜的、木头的和各种各样的，祷告时站着，一边喊叫一边舞蹈。”（注 28，132—133 页）

然后对额尔齐斯河作了全面的描述。在这儿描述的已不仅仅是沿途的印象了，而是从物理—地理（河的长度、它的深度、源头、支流等）、人文和经济观点出发对大河所作的某种整体的描述。

关于西伯利亚河流名称的起源，斯巴伐里指出：“……额尔齐斯河

没有俄国名字，为此额尔齐斯河是按鞑靼语命名的，而不是用俄语，不仅额尔齐斯河……而且托博尔河、土拉河和其他的西伯利亚河流也是用早先占领西伯利亚的外国人——鞑靼人或奥斯恰克人的语言来命名的。”

日记中对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描述在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准确的：“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在姆加里山（南阿尔泰山——作者注），俄语称作石头山，额尔齐斯河从那儿起分成了两个小支流：姆加里人和卡尔梅克人把其中一条称作乌连加河，另一条叫作巴拉甘河。离那儿不远处就是中国边界，姆加里酋长祖鲁赫塔—古恩就在额尔齐斯河源头附近放牧。从那个地方到中国边界都是石头山……从托博尔斯克到额尔齐斯河源头可以通行轻型船只。”（注 28，134 页）

斯巴伐里还描述了基泽尔巴什湖（斋桑湖）并指出了它同额尔齐斯河的关系：“从那个酋长那儿沿额尔齐斯河到基泽尔巴什湖要 9 天的路程。额尔齐斯河穿湖而过但不与湖合为一体，而是在湖的外面又形成自己的水流。那个湖里的水是绿色的淡水，有许多鱼类和野兽。里面有一种不知名的野兽，它捕捉天鹅、鸭子和其他的鸟类，像是鳄鱼，可能就是鳄鱼，只是谁也不晓得……人们用卡尔梅克语把那个湖叫作基泽尔巴什。”（注 28，134 页）就是说，俄国人在 17 世纪最后 30 年已经知道斋桑湖，也可能更早。斯巴伐里就此说，“在很早的时候人们从托博尔斯克来到那个湖附近寻找云母，然而很不幸，那项事业就没搞起来”（注 28，135 页）。额尔齐斯河口的地理纬度标得相当正确，它的源头的纬度标得稍有误差，超了 5°。

他还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植物地带：“沿额尔齐斯河有各种森林，在靠近被春水淹没的河边地带的尽头是石头山，有长着树的，有没有树的，往后是大片含沙的草原。接着出现的森林分布在河的两岸和整个西伯利亚国，一直到海岸边。这种海边的森林极其壮美、辽阔，地理学家按希腊语为其命名‘艾尔基诺斯’，或者按拉丁语称其为‘艾尔岑尼奥，西尔瓦’，就是艾尔金斯森林，它可以沿海岸一直到德国和法国的地界，随后好像遍布整个大地……然而哪儿都没有见过像西伯利亚国这样广阔、壮观的森林。”

他还写到了经常在西伯利亚肆虐的北风：“沿额尔齐斯河及两岸刮

起的风主要是北风，来自正冲着最北边的旋风处的西伯利亚。”（注 28，136 页）

斯巴伐里还详细描述了所有与贸易有关的事。他这样写道，每年都有 30—40 艘平底小木船从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其他城市来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区域的伊梅舍夫湖（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巴甫洛达尔区，距鄂木斯克约 400 公里——译者注）“搞盐，人们在圣母升天节的斋戒期把盐从天然湖泊收集到小船上”。俄国关于那个湖泊市场的最早的信息是在 1594 年修建塔拉市的命令中提到的：“成千上万的卡尔梅克人、布哈拉人和鞑靼人来同俄国人交易。他们出售马、俘虏和其他的中国商品。”日记中还指出了去往印度的贸易之路：“从托博尔斯克去往印度要经过哥萨克汗国（哈萨克汗国——作者注）和布哈利亚（布哈拉汗国），前往印度贸易路上要走半年。”（注 28，136 页）

接下来日记对鄂毕河作了描述：“鄂毕河是一条非常长的河，因为它起源于南方遥远的、温暖的草原地带，在河口处注入北冰洋。它的深度也相当大，因为当遇到坏天气时，仿佛海上波涛汹涌，直到岸边都很深；河水泛滥漫过索拉形盐土地、湖泊和森林。它的宽度不均，因为从额尔齐斯河口往下相当宽，而往上，沿河岸走上二三俄里，两边尽是些小河汊和岛屿。鄂毕河不是石头河，它的河岸都是土地，哪儿都没有石崖峭壁。

“那条河里各种鱼不计其数，人们抓到非常大的鲟鱼……而鄂毕河的水很白，不透明，和别的河里的水不一样，因为它是从湖里流出的。现在鄂毕河水流得不像别的石头河那样快，然而也不那么平静，在有的地方相当急，不过对它来说又不那么快，因为它太深了。”（注 36，55 页）

作品指出了鄂毕河的源头，其中有比亚河（位于阿尔泰边疆区的东部，鄂毕河东边的支流——译者注）和卡通河，以及作为第三个源头错误指出的捷列茨科耶湖（事实上是比亚河的源头）。

从苏尔古特往上鄂毕河被分成了“许多小支流”，遇到顶风（“帆船坏天气”，就像当时人们所说）时，船队就被“吹到各个小支流里”。凯特城堡的督军甚至在其中的一个小支流建立了经常性的哨卡，因为“商人、实业者、醉汉等各色人夜间从上面和从下面穿过小支流跑

掉……他们不想给国家纳税，那些失宠的人、被流放的人和小偷，他们抢劫商人，还有各种盗贼”（注 6，112 页）。

日记相当仔细地描述了外交使团经过纳雷姆去往那儿的凯特河及它的支流、湖泊、“索拉型盐土”（草和花）。凯特河通过 3 个河口注入鄂毕河。斯巴伐里指出了这个地区人烟稀少的情况：“只是这条河让人提不起情绪，因为从凯特城堡到马果夫斯克这一河段没有住家。”（注 28，137 页）“沿河既没有叶兰（俄国各地——欧洲部分东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广泛使用的术语，指林中草地、牧场、草原——译者注），也没有田地，只有一些无法通行的森林、沼泽和湖泊。因为凯特河水是黑色的，（沿岸——作者注）很少有干地。”（注 36，56 页）根据斯巴伐里的描述，城堡都建在高地，里面有约 20 座院落、两座教堂。再往上“大船无法通行，因为水少。”（注 36，56 页）

马果夫斯克城堡建在从鄂毕河到叶尼塞河之间的连水陆地上，“在一个漂亮的地方，在凯特河左边的悬崖上；城堡里有教堂，有约 20 座院子，这儿平底木船多得是，有打碎的、有完整的，因为这里是国内人们一个大的避难所。离城堡半俄里远有一个商人的村庄，这里建了许多库房以便货物存在这儿，过后经连水陆地分发出去”（注 36，57 页）。所有这些货物都经冬天的道路运往叶尼塞斯克城堡。

斯巴伐里从额尔齐斯河口到马果夫斯克连水陆地用了 8 个星期零 3 天，但有可能他作为大使享有各种特权，人们给他提供了最好的船只和桨手。

斯巴伐里对奥斯恰克民族（汉特人）的人种特点作了详细的说明：“奥斯恰克像其他西伯利亚各民族一样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所有的居民都来自斯基泰人。”奥斯恰克人是“食鱼人”，“他们不知道盐和粮食，除了鱼以外，还有白花兰的根……他们用鱼皮缝制衣服、鞋子、帽子，他们用鱼筋来缝制这些东西，他们出行乘坐的小船非常轻，是木制的，能坐 5—6 个人或更多。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弓箭……他们有很多妻子，想要多少就娶多少”（注 28，137 页）。

斯巴伐里认为没有可靠的关于叶尼塞河源头的信息，但他又引用了一个想象出来的信息（说实在的，绝对不可信）：“我们不谈叶尼塞河，因为不知道那条河的尽头从哪儿开始，人们只是说，它的顶端离鄂毕河

的顶端不远。就像外国人所说的，当天鹅从叶尼塞河顶端飞往鄂毕河顶端并鸣叫时，两边仿佛都能听见它们的叫声。”（注 28，138 页）

他还提到了叶尼塞河两岸悬崖上的岩画，虽然他并未见过它们：“在叶尼塞河不大大石滩的地方有一处石崖。悬崖的石头上刻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文字间刻有十字，还有人，他们手里拿着锤矛，还有另外一些这样的事物……没有人知道，写的什么，谁写的。那个地方过后就是叶尼塞河可怕的石滩，谁也不敢乘船从那儿经过，因为河的两岸高耸着陡峭的悬崖。只能走路过去，绕过那片石滩要 5 天时间。”（注 36，58 页）

在安加拉河航行既困难又危险，因为“河中有大片的急流和大量的不同寻常的石滩……水路艰险和令人头痛，通古斯卡河（上通古斯卡河或安加拉河——作者注）水流湍急，石滩众多”。正是安加拉河可怕的石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描述了其中 4 个最危险的。

第一个是通古斯或叫斯特列洛奇石滩：“那个地方整条河里全是大石头，水流湍急，水流遇到石头形成大浪；只有一片不大的没有石头的空地，50 或更多的人可以用大绳沿曳船路将平底小木船拖过那个地方。”

第二个是姆拉（姆林斯克）石滩，位于姆拉河（安加拉河左边的支流）口处。“那个石滩有 2 俄里左右。那个地方的石头很大，水流湍急，水流遇到石头形成大浪，只有一片不大的没有石头的空地，可以用大绳沿曳船路将平底小木船拖过那个地方。”

通过第三个卡申石滩还要复杂：“那个地方水流湍急，整条河里全是大石头，而水却很少，所以船无法通过……河中间只有一处大门（指可通行之处——译者注），人们用大绳把平底小木船从那个地方领过去，要通过大门拖船，此外用任何办法也拖不过去。为此要等 8 个星期左右，要等待扬帆的天气。如果没有这种天气，就要在那儿过冬。用绳子拖拉时会把人从绳子上甩掉。因此那个地方溺毙了许多人。在那个石滩下面竖起了 40 多个十字架。”

第四个石滩阿普林斯克是“最让人头痛的地方……那个地方水流湍急，因为通古斯卡整条河都是大石头，水同那些石头碰撞，为此波涛汹涌、水流急速……只有一处水门可以通行平底木船，船上所有的人要

用大绳拖木船，而船上只留下 5 个了解可以通行木船水门的人”。

“在安加拉河上航行的使团船队必须‘在一些大的石滩之间穿过许多‘什维尔’——水浅、流急、多石的河床。伊利姆督军 T. A. 维恩多姆斯基乘坐的一艘木船就是在这样的—个什维尔遇险，这个地方因此被叫作‘维恩多姆斯基桥墩’。督军 B. Д. 奥拉奇因的船在另一处地方遇险，人们因此把此地叫作‘奥拉奇因什维尔’，还有奥福祥内伊什维尔等。船只在通过这些地方时经常遭遇同‘隐藏在水下的石头’相撞的危险。”（注 36，62—63 页；注 6，122 页）

叶尼塞河到阿穆尔河的道路从安加拉河向上要经过伊利姆河（位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拉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口。沿安加拉河向上航行时，岸边的山越来越多，而河中新出现了一排排的石块和岩礁，形成了一些可怕的石滩。为了克服每一处石滩必须卸船，“为了轻便，也因为那可怕的石滩”要把货物“沿着河岸在山之间分别运送，因为许多木船在那个石滩被撞碎”，而拖运那些船必须用“大量的俄国人和 60 个通古斯人”。

舍曼斯基石滩和巴都石滩是最可怕和“令人痛苦的”，也就是能给你制造困难和痛苦。斯巴伐里这样描述舍曼斯基石滩：“河流宽 3 俄里，而绕过石滩要 4 俄里……那个石滩有 3 俄里长，那个石滩所处的整个河流地段巨石密布，水流湍急，水与石头碰撞掀起小山一样的浪。沿河两岸石崖高耸……舍曼斯基石滩冬天也不结冰。”

舍曼斯基石滩过后是多尔基石滩，它后面是最危险的巴都石滩。这就是大司祭阿瓦古姆对它的描述：“那个地方河的宽度是 1 俄里，跨河架着的 3 块长木板非常陡峭，这不是可以通航的水门，因为会被撕成碎片。”而斯巴伐里描写这些石滩时不乏激情：“整条通古斯卡河没有比巴都和舍曼斯基石滩更令人头痛的了，人们把石滩叫作巴都是因为许多木船在此被打碎。”沿河往上还有两处叫作醉汉和醉酒的石滩：“在这儿轮船要卸载，要空船通过宽不过 10 俄丈的水门（21.6 米——作者注）。”（注 6，132 页）

上通古斯卡河（现在的安加拉河）在布拉特城堡分了岔，奥卡河从左边注入其中。17 世纪时人们把从这儿开始的上通古斯卡河的上游叫作安加拉河。使团所走的道路是沿安加拉河继续向上经巴拉干斯克城

堡和伊尔库茨克城堡到贝加尔湖。斯巴伐里描述了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流出之地：“安加拉河口的两边都是遍布巨石、树木的高山，而安加拉河口的宽度超过1俄里，伟大的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急速流出，从那些高山上可以看见贝加尔湖那面高耸的雪峰。”（注6，132页）

在途中日记里有专门描写贝加尔湖的一章：“对贝加尔海的描述要从安加拉河口开始绕一圈，即从安加拉河流出的地方又回到它的河口。”“贝加尔海，——本章开始时作者写道，无论对老的也不论对现在的地理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人们描写的是另一些小的湖泊和沼泽，而关于这个硕大无比的海任何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因此我们在这儿简略地对它加以描述。”

接着斯巴伐里作出了推断，认为贝加尔湖自身融合了海和湖的特征：“贝加尔可以被称作海是因为……绕它一圈是不可能的……它的长度、宽度、深度之大前所未有……而之所以把它称作湖是因为它的水是淡的而不是咸的，因此地理学家不把那些虽大但里面的水不咸的湖称作海。”

一般说来，俄国哥萨克效仿那种迷信的做法，在“神海”（他们认为把海称作“湖”而让海感到屈辱是危险的）面前诚惶诚恐，因此在跨湖时弃绝烟酒（注6，134页）。

本章还引用了某些关于贝加尔湖大小的资料和另外一些能说明俄国人当时对贝加尔湖的认识水平的信息：“它的长度是这样的：在某种天气下大帆船要行10天、12天或更多的时间，而宽度不一：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少于一昼夜是过不去的。它相当深，因为人们多次测量过，大约100俄丈或更深（216米或更多——作者注），人们不会去探底儿，因为贝加尔湖四周都是常年不化的高高的雪山（意即周围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译者注）。贝加尔湖中间有一个叫作奥尔洪的大岛。那个岛是长条状的，在海中间，绕一圈超过100俄里。以前岛上住过许多布拉特外国人（布里亚特人——作者注），因为岛上有山、大片的森林和草原。自从被哥萨克击溃后，他们就从那个岛上逃散了。现在岛上空无一人，而各种野兽很多。除了那个岛，还有另外一些不大的岛，但不多。贝加尔湖上经常是恶劣天气，但秋天尤甚，都是由于贝加尔湖的位置，像一个大碗，周围的石头山仿佛是墙壁，没地方休整也出

不去。除了安加拉河从这儿流出，再加上许多大河、小河注入其中，沿岸到处是石头，避难地不多（就是说当碰到坏天气时，岸边很少有船舶的避风港——作者注）。最坏的是左边，安加拉河流经之处，船只经常因此而被打碎。”

斯巴伐里在书中多次强调在贝加尔湖航行的危险：“没有避风港，只有悬崖和石头，非常可怕，尤其对那些以前没有到过那儿的人来说，因为四周到处是高耸的雪山、无法通行的森林和石崖。”

“贝加尔湖里各种鱼类很多，鲟鱼、淡水鲑鱼和其他各种鱼，湖里也有许多北欧海豹，除了为数不多的通古斯人，贝加尔湖附近的住户不多。他们以鱼为生，因为湖周围没有可耕地，实业者只在冬季住在沿河的冬营地。贝加尔湖周围有森林，大偃松上面结了许多榛子，还有另外一些树木。湖里的水很清，可以看见水下几十俄丈的底，用来做饮料很合适，因为是淡水。”（注 28，138—139 页；注 37，82—83 页；注 6，133 页）

《途中日记》里列举了所有注入贝加尔湖的河流，其中有色楞格河、巴尔古津河、上安加拉河。日记准确地描写了湖的南北岸沿岸地区的情况：“从上安加拉河到下安加拉河口沿海岸到处都是石崖、高山和最可怕的地方……而色楞格河那一面——土地贫瘠。”（注 40，145 页）显然，对于斯巴伐里同时代的地理学家来说，这本地理文献第一次对贝加尔湖所作的详细描述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此前它在他们的回忆之中是作为“不为人知的海”出现的。

人们跨越贝加尔湖都从它最窄的地方，即从安加拉河口到色楞格河口，通常作这种跨越要一昼夜时间。考虑到因坏天气可能造成的滞留，斯巴伐里还指出，无论从哪儿“少于一昼夜都不能跨越”。色楞格河口的浅滩对于船舶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虽然这条河不小，然而河口却很窄，那些多次通过河口的人在那儿航行时也极其困难。”（注 6，133 页）冬天通常是乘雪橇从那个地方跨越贝加尔湖，按列缅佐夫的说法，也需要一天。

人们还完成了从安加拉河口渡过贝加尔湖去往巴尔古津城堡的跨越：“跨海去往奥尔洪岛经常受到阻碍，在岛附近船底剧烈震荡，从奥尔洪到去往圣角这个经常发生阻断的地方有很大的旋涡，它的力量之大即使一个半船底也无济于事，为此在那些地方好多船都被打碎了。”人

们从这个方向跨越贝加尔湖去往“巴尔古津的库尔杜克（巴尔古津湾是贝加尔湖美丽的湾之一，又叫库尔杜克，埃文基语‘角’之意，位于贝加尔湖最东岸。巴尔古津湾在这儿同圣角半岛连成一片——译者注）”，从那儿过“石头山”用半天的路程到达巴尔古津城堡。这条路长期以来是官方使用的一条道路，“沿此路航行的有来自叶尼塞斯克运储备品的平底小木船（为达乌利亚各城堡运送给养——作者注），商人也经此路跨海……进行贸易”。看来，人们使用这条更复杂、更长的跨越贝加尔的道路是因为巴尔古津城堡作为外贝加尔行政中心的缘故。

在贝加尔湖的南岸发现了几条去往石勒喀河并进而前往中国的道路。道路从巴尔古津城堡起就是“旱路了，要骑骆驼或马经高山、石头、森林和沼泽，异常艰辛……如此令人痛苦的道路少见”。“冬天山上的积雪达‘印记俄丈’（完全符合官方制定的俄丈长度的度量单位——译者注）（约为1.76米——作者注），而在有的地方超过1俄丈”，要经过那样的积雪哥萨克必须用斧子砍出一条路。所以，即使在好的条件下到涅尔琴斯克城堡也要两个礼拜左右甚至更多的时间。

17世纪50年代初，根据督军A. Ф. 巴什科夫的委托，叶尼塞斯克的军役人员考察了经伊尔根连水陆地的道路。道路从色楞格河往上，经它的支流希洛克河到伊尔根湖和叶拉克列以湖，然后“穿过湖泊和连水陆地”到达同涅尔琴河汇合后形成石勒喀河的因果达河。通过希洛克河与因果达河之间的连水陆地要1天时间。热心旧教派事业的著名大主教阿瓦古姆曾生动地描写过伊尔根路，他被流放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后来我们到了伊尔根湖；连水陆地就在这儿，冬天人们开始拖拽……春天乘木排沿因果达河向下航行……开始断粮了，人们因饥饿也因为浅滩作业而死亡。河不大，木排不小……那段时光啊！”（注6，134页）为了巩固这条道路，1653年在连水陆地的开端处建立了伊尔根城堡，但过了大约20年这条路就几乎被彻底放弃了。

从贝加尔湖开始的第三条路是17世纪最后25年使用率较高的一条路，它从色楞格河起（走陆路）沿它的支流乌达河岸延伸，然后拐向三个叶拉夫宁湖：“前面将是方圆约20多俄里的那些湖泊，湖里的狗鱼和各种鱼类很多，人们把它们叫作叶拉夫宁湖，一个大，另一个中等，第三个小点。”接下来道路经杰列姆巴湖去向赤塔河和赤塔河注入

其中的因果达河，最终通到石勒喀河。1675年斯巴伐里以及后来（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使节去往中国走的正是这条路，俄国外交官和商人也走这条路。沿着这条从色楞格河到石勒喀河的路人们修建了许多据点。1658年在涅尔琴河注入石勒喀河的地方建起了涅尔琴斯克城堡（中国称之为尼布楚——译者注）。而到1675年，在杰列姆巴湖和叶拉夫宁湖上已建起了杰列姆巴城堡和叶拉夫宁城堡。斯巴伐里本人认为，必须在乌达河上建城堡：“在乌达河附近，他写道，可以建城堡和造船，可以找到出粮食的地方。”（注6，134—135页）此后不久建起的乌金斯克城堡被称作“达乌利亚的钥匙”。

尼古拉·斯巴伐里概括了俄国新土地发现者获得的资料，给出了第一幅、还远不是真实的关于东西伯利亚山脉位置的略图。他认为，勒拿河—阿穆尔河两河之间从贝加尔湖到鄂霍次克海横亘着一座“伟大的山脉”——这些河流之间的分水岭。这个关于长长的、连绵不断的斯塔诺夫山脉的不准确的观念流传很久，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期：人们认为，斯塔诺夫高原东边，从奥廖克马河右岸到北纬60°有一座弧形的、向东南突出的、延绵不断长达1500公里的山脉（注40，145页）。

《途中日记》终结于在边界同中国官员的会见的叙述。斯巴伐里在一本单独的书中描写了关于在中国的旅行及关于中国这个国家本身以及对中国人的风俗和行为的印象。

《途中日记》里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篇章：大使在地理观念上胜过与之同时代的学者不少于175年，他有预见性地提到了乘船从阿穆尔河口出发经大海去往中国和日本的可能性。他注意到阿穆尔河沿岸存在大量茂密的森林，可以为船舶制造提供木材：“另一条去往中国的海路虽然还不那么出名，但确实存在，因为在注入东部海洋的阿穆尔河口有大片的森林，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来制造某种船舶并跨海去往中国。从那儿到中国不远，只有一个难处，就是要绕过伟大的海洋国家朝鲜这个角才能到达辽东国（辽东——作者注），然后到达基耶任（天津——作者注）市这个中国最大的避风港。从那个城市走河路只须200俄里就可到达比任（北京——作者注）。”（注28，144页）

斯巴伐里还是另外一部重要的地理作品的作者，这部献给阿穆尔河的作品被收入到17世纪手稿汇编之中，它的名称是《关于把俄国乡村

同中国人隔开的伟大的阿穆尔河的传说》。这部作品仿佛是对俄国先驱者所收集到的关于伟大的东方河流的信息的总结。

传说以这样的词语开始：“伟大的、著名的阿穆尔河，虽然在古代和现代地理学家那儿没有关于它的传闻，也没有人用任何方式描写过它，但阿穆尔河的长度不仅超过西伯利亚的河流，而且我意料超过另外所有的河流，世上就没有这样的。它最胜出之处在那些地方——伟大的申加尔河（松花江——作者注）注入它的那些地方。阿穆尔河的源头和尽头是不同的，且相距遥远，有的地方为人所知，有的地方不为人所知。”

但斯巴伐里熟知俄国先驱者仔细考察过的阿穆尔河流域水文地质网的主要特征：“……而因果达河是一条能通航的大河……在过去的年代里阿法纳西·巴什科夫的平底木船沿那条因果达河航行到此并建立了涅尔琴斯克城堡……从鄂嫩河注入因果达河起，两条河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石勒喀河……伟大的阿穆尔河的另一个尽头是额尔古纳河，从伟大的达赉湖（中国的呼伦湖，当地牧人称之为达赉诺尔，蒙古语，意为海一样的湖泊——译者注）流出，经山脉、石头山、草原注入石勒喀河……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在汇合之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后被称作阿穆尔河。”（注 28，160 页）

斯巴伐里根据自己的知识面一一列举了阿穆尔河左右两边许多支流的名称：“卡马拉河是左边第一条河，从博克达（满洲）那面的山脉流出，沿河居住的是博克达达斡尔人……第二条河结雅河在左边，那条河的河口住着达斡尔人。第三条河贝斯特拉亚河在左边，沿阿穆尔河往下流去，在河口住着久切尔人，以耕作为生的中国人，而在它的尽头住着猎鹿的通古斯人，什么实物税都不交……沿河有许多森林。”他还提到了“申加尔河（松花江）”、纳乌温河（嫩江）其他一些流经满洲的阿穆尔河的支流。

斯巴伐里再次谈到了航行去往中国和日本的可能性，即从阿穆尔河口向南：“在过去许多年里，30 多年前达乌利亚的哥萨克多次在这儿，在阿穆尔河口，大海附近过冬。他们说，靠近岸边的海结冰，而往里旋涡处冬天不结冰。而雪厚达 1 俄丈，但不长久。冬天就到 5 月，尼古拉日（每年的 5 月 9 日和 12 月 6 日，和 12 月 19 日，东正教会都要纪念圣徒尼古拉·丘多特瓦列次日，圣徒尼古拉被认为是旅行者和航海者的

保护神，此处指5月9日——译者注）前后阿穆尔河及海岸就开河、解冻了，那时就可以出海航行了。”

斯巴伐里在关于阿穆尔河的著作中谈到了从北冰洋航行去往东部海洋的可能，他写道：“从勒拿河口航行到阿穆尔河口是不行的，因为海中大块的冰在浮动，而且石头山和从贝加尔湖到海边的石头仿佛是一堵墙横亘在海上，谁也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儿，也无从打听，船都被打碎了。人们说，那些石头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印度，到新大陆（新大陆是相对于旧大陆来说的。美洲和澳洲属于所谓的‘新大陆’，而亚洲和欧洲属于旧大陆——译者注）。”（注28，161页；注33，41页）

说实话，他并不否认有可能从阿穆尔河口向北航行很长一段距离到达一些河的河口。看来他对解决如何通过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峡这个重大的地理问题还没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见。

在《传说》的另一个地方，斯巴伐里断言，阿穆尔河口的对面有一个大岛，也就是萨哈林岛：“上面所说的阿穆尔河遍布森林和高山，自己有一个河口注入海洋，那个河口对面是一个大岛，那个岛上住着许多外国人和基里亚克人。”（注28，162页）的确，他错误地扩大了萨哈林岛的长度和宽度（1500公里和300公里，其实真实的尺寸相当于948公里和大约100公里）。看来他是把北海道也算进去了。斯巴伐里第一个指出了岛上气候的严酷性（大雪和严寒），第一个引用了真实的、相当完备的有关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和萨哈林部分地区的基里亚克人的信息（注40，146页）。

这样一来，斯巴伐里想象中的阿穆尔河口的出口和萨哈林岛的状况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些航海者拉别鲁斯、克鲁因施泰恩等认为的要准确得多，他们认为阿穆尔河口不能通航，而萨哈林岛是一个同大陆相连的地峡。是勇气和顽强帮助海军将官Г. И. 涅维尔斯基于19世纪中期证明了俄国先驱者早在17世纪已经了解了这一切。

应当指出，斯巴伐里在《传说》中还列举了那些注入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的河流：拉马河（乌第河）、鄂霍塔河、达乌伊河、达杜伊河、品仁纳河和其他一些河流，其中还包括阿纳德尔河。关于17世纪著名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大地的描述者尼古拉·加福利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巴伐里的故事就此结束。

## 堪察加半岛的俄国先驱者

那个可爱的地方属于我吗，  
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深入到你内部的不是我吗，  
驮载我的可是那匹良马：  
是聪明、伶俐和勇气，  
鼓舞着我这个善良的青年娃。

——古老的哥萨克歌曲

俄国人何时到达堪察加（《新唐书》称堪察加为“流鬼国”：“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穷。”《新唐书》卷220——译者注）半岛？至今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绝对清楚，这件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波波夫—杰日尼奥夫1648年的考察，当时俄国果奇首次从北冰洋进入东部海洋。从科雷马河口向东出海的7艘果奇有5艘在途中遇难，杰日尼奥夫的第6艘果奇被抛到阿纳德尔河口尽南边的岸边。费多特·波波夫和他的雅库特妻子以及从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峡遇难的船上救出的哥萨克盖拉西姆·安基吉诺夫在第7艘果奇上，它的命运，准确地说，无人知晓。

我们在С. И. 杰日尼奥夫于1655年给督军伊万·阿金否夫的官样文章中发现了最早的关于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和他的同伴的命运的材料：“去年，162年（1654年——作者注），我，谢蔑伊卡，从海边出征。从科里亚克人那儿抢回了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的雅库特女人。那个女人说，费多特和军役人员盖拉西姆（安基吉诺

夫——作者注) 死于坏血病, 而其余的人都阵亡了, 剩下不多的人一门心思地跑了 (就是轻装, 不要给养和装备——作者注), 不知道跑到哪儿了。” (注 18, 296 页)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 波波夫和安基吉诺夫多半死在岸上, 就是他们在他们上岸后或果奇被抛到岸边后。这很可能是阿纳德尔河口尽南边、奥柳托尔斯基河岸边的某个地方或已经在堪察加半岛东北沿岸地区了, 因为科里亚克人抓获雅库特女俘虏只能在沿岸地带的这些地区。

Г. Ф. 米勒尔院士是第一位仔细研究雅库茨克督军档案的历史学家, 他在那儿找到了谢蔑伊卡·杰日尼奥夫的官样文章和呈文的原本, 据此最大程度地复原了这段著名的航海史并于 1737 年写成了《关于从勒拿河口出发去寻找东方国家的北方海路的通报》。关于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的命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当时 (杰日尼奥夫在他所建的阿纳德尔河过冬地——作者注) 建造的果奇泊在阿纳德尔河口附近一个适宜探访的地方, 因此杰日尼奥夫 1654 年在海边遇到了科里亚克人的住所。看到俄国人后, 房屋里所有的男人带着自己最好的女人都跑了, 而把其他的女人和孩子留在了那儿, 杰日尼奥夫在他们中间找到了以前在上面提到的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那儿生活过的雅库特女人。那个女人说, 费多特的船在那个地方附近被打碎了, 费多特本人在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死于坏血病, 而他其余那些同伴则被科里亚克人杀死, 另外一些留在船上的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就同流传在堪察加半岛居民中的一种说法对上了号, 它从每一个到过那儿的人那儿得到了证实。人们是这样说的: 在瓦拉基蔑尔·阿特拉索夫到来之前许多年, 在那儿, 在堪察加河上一条小河 (那条河至今还被称作费多多夫卡河) 的河口住过一个费多特的儿子, 他同堪察加女人生了一些孩子, 这些孩子后来从堪察加河到品仁纳湾时被科里亚克人打败。根据所有的迹象来看那个叫作费多特的儿子就是上面提到的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的儿子, 他在自己父亲死后, 同他父亲那些被科里亚克人打败的同伴一样乘小船跑到海岸边, 在堪察加河那儿住了下来。还有, 1728 年当海军准将白令先生在堪察加半岛时, 他看到了两处那个费多特的儿子和自己的同伴住过的冬营地的遗迹。” (注 41, 260 页)

著名的堪察加半岛研究者斯捷潘·彼特罗维奇·克拉舍宁尼科夫

(1711—1755) 曾参加过白令的科学院考察团的工作，他也援引了关于费多特·波波夫的资料。他于 1737—1741 年曾在堪察加半岛旅行，他在自己的作品《堪察加大地记事》中指出：“但谁是第一个到达堪察加半岛的俄国人，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准确的资料，只知道传说中把这件事归之于商人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注入堪察加河的一条小河尼古利亚因此被称作费多多福希纳。人们说，好像阿列克谢耶夫他们乘 7 艘果奇从卡维姆河（科雷马河——作者注）口出发沿北冰洋航行，在风暴中所有的果奇都被吹到了堪察加半岛并在那儿过了冬。第二年夏天他绕过库里尔洛帕特卡（半岛最南端的海岬——洛帕特卡角——作者注）从海上到达基盖尔（季吉利河，它的河口在北纬 58°。他很可能是从半岛东部沿岸徒步到达季吉利河的——作者注），在那儿，冬天时（看来，是 1649—1650 年冬天——作者注）他和所有的同伴都被当地的科里亚克人杀死。当时他们还给出了屠杀的理由，当地科里亚克人中的一个之所以杀死另外的人，是因为科里亚克人认为，掌握火器的人是不死的，当他们看到他们也能死时，他们再也不想同这些可怕的邻居生活在一起，所以把所有的人（看来，总共 17 个人——作者注）都杀死了。”（注 35，740、749 页）

按照克拉舍宁尼科夫的意见，Ф. А. 波波夫正是第一个在堪察加土地上过冬的俄国人，第一个到过它的东部和西部沿岸地区的人。克拉舍宁尼科夫在援引上面引用的杰日尼奥夫的通报时推测，Ф. А. 波波夫和同伴不是死于季吉利河，而是在试图去往阿纳德尔河口时死于阿纳德尔湾和奥柳托尔斯基湾之间的沿岸地区。

俄国第一位北千岛群岛研究者、1703—1720 年到过堪察加河的哥萨克大尉伊万·克泽廖夫斯基 1726 年时曾谈到（在克拉舍宁尼科夫之前 25 年），在费多多福希纳河上有俄国哥萨克或实业者建造的两个冬营地的残迹，这就确切地证实了波波夫和他的同伴或另外的俄国先驱者到过堪察加半岛：“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从雅库茨克市乘果奇来到堪察加半岛。那些堪察加人说，他们中有些人成了人质。在我们这个年代，人们向那些老人征收实物税，人们说有两艘果奇。迄今为止人们都知道那些过冬地。”（注 18，295 页；注 33，35 页）

上面所引用的不同时代（17—18 世纪）的记述尽管在内容上有很

大差距，但据此毕竟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俄国先驱者是 17 世纪中叶出现在堪察加半岛的。或许，这不是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和同伴们、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另外的哥萨克和实业者。关于这一点当代历史学家没有一致的意见。但第一批俄国人出现在堪察加半岛不晚于 17 世纪 50 年代初则被公认为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学家 Б. П. 波列沃依仔细地研究了第一批俄国人出现在堪察加半岛的问题。1961 年他成功地发现了哥萨克组长 И. М. 鲁别茨的呈文，在呈文中他提到了自己“溯堪察加河向上游”出征。后来通过对档案文件的研究使得 Б. П. 波列沃依确认，“鲁别茨和他的同伴可以在堪察加河上游度过 1662—1663 的冬天”（注 33，35 页）。他认为，上面提到的 И. 克泽廖夫斯基通报中所说的冬营地同鲁别茨和他的同伴有关。

在托博尔斯克地图学家 С. У. 列缅佐夫 1701 年初完成的地图册里，有一张“雅库茨克市图纸”，上面画出了堪察加半岛，在半岛西北岸的沃耶姆利亚河（来自科里亚克名称“乌艾姆良河”——“破碎的”之意）河口处，即现在的列斯纳亚河标出了过冬地的位置，旁边的注释为：“沃耶姆利亚河，这儿曾是费多特的过冬地。”据 Б. П. 波列沃依说，只是到了 20 世纪中期人们才成功地查明，“费多特的儿子”——这是一个逃亡的科雷马哥萨克、也叫费多特的列奥恩基。他先跑到布鲁德那亚河（现在的奥莫隆河），又从那儿到了品仁纳河。在那儿，在 17 世纪 60 年代初他同实业者谢洛格拉斯（沙洛格拉斯）一起在一段时间里控制了河流的下游。后来他到了堪察加河的西岸，在沃耶姆利亚河住了下来。在那儿他把持着堪察加河北部从列斯纳亚河（沃耶姆利亚河）到卡拉加河（位于堪察加半岛的东北部——译者注）之间最狭窄处的通道。说实在的，Б. П. 波列沃依并没有引用“费多特的儿子”列奥恩基在堪察加河逗留的资料。很可能，关于两个“费多特的儿子”的信息在 И. 克泽廖夫斯基那儿合二为一了。况且根据文献的记载，是地方官费奥多尔·拉普杰夫在鲁别茨的队伍里负责收取实物税。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关于杰日尼奥夫远征参与者“福马·卡切福希科”留在堪察加半岛的说法得到了证实。原来，外号叫作“狗熊”或“老头”的福马·谢苗诺夫·比尔米亚科参与了鲁别茨“溯堪察加河向上游”的出征。他同杰日尼奥夫于 1648 年来到阿纳德尔河，后来

又不止一次去过阿纳德尔河，从1652年起在被杰日尼奥夫发现的阿纳德尔长沙滩上从事捕猎海象获取海象骨的工作。而从那儿，于1662年秋天同鲁别茨一起去了堪察加河。

克拉舍宁尼科夫关于在俄国哥萨克中间因为堪察加河上游地区的女人而发生内讧的故事也得到了证实。后来阿纳德尔的哥萨克责备伊万·鲁别茨说，他在远征期间“总是和……两个娘们儿……违法取乐，因这些娘们儿同军役人员、商人、猎人和实业者失和”（注33，37页）。

米勒尔、克拉舍宁尼科夫、克泽廖福斯基等关于最早在堪察加逗留的俄国人的报道也涉及另一些哥萨克和实业者。Б. П. 波列沃依写道，白令海南部沿岸地区海象栖息地的消息最早是从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夫·丘基切夫—伊万·伊万诺夫·堪察德伊哥萨克小组那儿得到的，这个小组曾从吉日加河上游的冬营地出发经北部地峡前往堪察加，即从列斯纳亚河去往卡拉加河到半岛的“另一面”（注33，38页）。1661年，全组人在返回科雷马河时在奥莫隆河遇难。杀死他们的犹加吉尔人逃到了南方。可能，克拉舍宁尼科夫提到的关于杀死从堪察加返回的俄国人的故事就是由此产生的。

堪察加半岛得名于从西南向东北横贯半岛的堪察加河。而河的名字，根据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的历史学家Б. П. 波列沃依的权威性意见，则同前面提到的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伊万·伊万诺夫·堪察德伊的名字有关。

1658—1659年，堪察德伊两次从吉日加河上的过冬地出发去往南方寻找新土地。按照Б. П. 波列沃依的说法，他很可能经堪察加半岛西岸到达在北纬59.30°附近注入舍利霍夫湾的列斯纳亚河并沿着卡拉加河到达卡拉金湾。他在那儿搜集到了一些在南方某个地方有一条大河的信息。

第二年，以哥萨克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夫·丘基切夫为首的一支12人的队伍从吉日加河过冬地出发，队伍中包括И. И. 堪察德伊。队伍到达品仁纳河后继续向南，前往后来被称作堪察加河的河流，只是到了1661年哥萨克才返回吉日加。

有趣的是，有两条河因伊万·堪察德伊这个诨号得到了同一个名称“堪察加”：第一条——1650年中期还属于因迪吉尔卡水系的巴杰里哈

河（现在叫巴加里哈河）的一条支流；另一条——1650年末时——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半岛上最大的一条河。而人们开始把半岛本身叫作堪察加则已经是17世纪90年代了（注33，38页）。（俄国学者克拉舍宁尼科夫认为，堪察加一词源于科里亚克语，科里亚克人称一条注入堪察加河的小溪为“科奥恰伊”，这一名称演变成同音的“堪察加”——译者注）

根据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67年的命令，在御前大臣和托博尔斯克督军彼得·伊万诺维奇·戈都诺夫主持下编成了一幅“西伯利亚地区图纸”，那上面第一次标出了堪察加河。图纸上河流是在西伯利亚东部，在勒拿河与阿穆尔河之间注入大海的并且从勒拿河经海路去往它的道路是畅通的。说实话，图纸上甚至没有堪察加半岛的迹象。

1672年一份新的更加详细的“西伯利亚地区图纸”在托博尔斯克编制完成。图纸附有一份“从图纸抄录下来的副本”，上面指出了楚科奇的位置，还第一次提到了阿纳德尔河和堪察加河：“……而在堪察加河口对面，从海上伸出一些石柱，高大无比，没有人到过那儿。”（注28，27页）就是说，图上不仅指出了河的名称，而且给出了一些河口地区地形的信息。

上面提到的哥萨克И. М. 鲁别茨于1663—1665年在阿纳德尔城堡担任总管。历史学家И. П. 马基多维奇和В. И. 马基多维奇认为，1684年编纂的西伯利亚总图上堪察加河的位置标注得特别符合实际恰恰是因为使用了1662—1663年在堪察加河上游过冬的鲁别茨所提供的资料。

关于堪察加河和堪察加半岛内部的情况早在雅库茨克的哥萨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阿特拉索夫出征前很久已经为雅库茨克人所熟知。用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著名诗人——译者注）的话说，阿特拉索夫这个“堪察加的叶尔马克”事实上在1697—1699年期间已经把半岛并入了俄罗斯国家的版图。1685—1686年间的雅库茨克政府机关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文件谈到，在这些年里雅库茨克的哥萨克和军役人员的阴谋被揭露。人们责备这些阴谋家，说他们企图“打死”御前大臣和督军彼得·彼特罗维奇·季诺维耶夫和城市居民，“抢夺他们的财产”，以及“抢夺”市场上的商人和实业者。

此外，还诟病这些阴谋家，说他们想侵夺雅库茨克城堡国库的火药和铅弹“逃到角外”去，到阿纳德尔河和堪察加河去。就是说，雅库茨克的哥萨克——阴谋家已经知道堪察加，看来打算走海路逃往半岛。他们的“逃到角外”的计划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绕道楚科奇半岛或楚科奇东部海岬—杰日尼奥夫角，而不是绕道石头山，即绕过注入北冰洋的那些河流与流入远东海洋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山脉（注 29，66 页）。

17 世纪 90 年代初阿纳德尔城堡的哥萨克开始了向南方、到堪察加半岛探寻“新土地”的远征。1691 年一支 57 人的队伍在外号莫罗兹卡的雅库茨克哥萨克鲁卡·谢苗诺夫·斯达里金和哥萨克伊万·瓦西利耶夫·加雷金带领下从那儿出发去往南方。队伍沿堪察加半岛西北或东北沿岸地带于 1692 年春季之前返回了阿纳德尔城堡。

1693—1694 年，莫罗兹卡和加雷金带领 20 名哥萨克再次向南方进发，但“用了一天时间也没到达堪察加河”，于是折返回北方。在发源于奥柳托尔斯基山脉、注入奥柳托尔斯基湾的奥普卡河（阿普卡河），即“猎鹿”的科里亚克人的居住地，他们在半岛这个地方建立了第一个俄国过冬地，在那儿留下了两个哥萨克和一个翻译尼基塔·沃雷巴耶夫以看管从当地科里亚克人那儿抓到的人质（注 10，186 页）。

人们根据他们的口述不晚于 1696 年编成了一本“故事”，里面有一直保存到我们今天的最早的有关堪察加人（伊特里门人）的信息：“他们那儿不产铁，也不会冶炼矿石，而城堡都很大。那些城堡里的住所……冬天在陆地上，而夏天……则住在建在柱子上像棚子一样的冬天的帐篷里……各城堡之间……相距 2 天、3 天、5 天、6 天的路程不等……有鹿的叫作使鹿的外国人（科里亚克人——作者注）。而那些没有鹿的则被称作坐着的（即定居的）外国人……使鹿人被认为是最淳朴的。”（注 40，73 页）

1695 年 8 月新总管（城堡头目）、五十人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阿特拉索夫带领 100 名哥萨克从伊尔库茨克被派往阿纳德尔城堡。第二年他派出了以鲁卡·莫罗兹卡为首的一支 16 人的队伍去往南方沿海地区科里亚克人那儿。莫罗兹卡深入到堪察加半岛，到了季吉利河，在那儿遇到了第一个堪察加人的村庄。他正是在那儿看见了一些不

认识的日本文字（看来这些文字是被风暴吹到堪察加岸边的日本船舶带到那儿的），搜集了一些关于向南延伸很远的堪察加半岛的信息以及半岛南部一排岛屿，也就是千岛群岛的信息。

1697年冬初，一支120人的队伍在B. B. 阿特拉索夫亲自率领下骑鹿对堪察加人进行冬季讨伐。队伍中一半是俄国军役人员和实业者，另一半是纳税的犹加吉尔人。他们用了两个半星期到了品仁纳河，哥萨克在那儿向300多个步行的（即没有鹿的、定居的）科里亚克人收取了红狐狸实物税。阿特拉索夫沿着品仁纳湾的东岸到了北纬60°的地方，然后拐向东方翻山到达注入白令海中的奥柳托尔斯基湾的奥柳托尔河口。在那儿向早先从未见过俄国人的科里亚克—奥柳托尔人收取了实物税。尽管不远处的山中就有白貂（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的毛色不如西伯利亚貂的毛色深），但奥柳托尔人却不去捕捉它们，“因为用阿特拉索夫的话说，他们对貂一无所知”。

后来，阿特拉索夫派了队伍中的一半人沿半岛东部沿岸地区向南进发。历史学博士M. И. 别洛夫发现，按照C.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不准确的情报，是鲁卡·莫罗兹卡率领着这些人。但后者此时正在阿纳德尔城堡代替出征的阿特拉索夫担任城堡的总管。被莫罗兹卡留在堪察加的哥萨克和翻译尼基塔·沃雷巴耶夫有可能参与了阿特拉索夫的出征，而不是他本人（注10，186—187页）。

阿特拉索夫本人带着队伍的主要部分返回了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又沿着堪察加半岛的西部沿岸出发。但此时，一部分犹加吉尔人的队伍起事了：“在帕拉纳河（在堪察加边疆区北部，半岛的西海岸，注入鄂霍次克海——译者注）他们背叛了伟大的国王，向瓦拉基蔑尔（阿特拉索夫）发动了进攻，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并开始用弓箭射击。3个哥萨克被打死，他，瓦拉基蔑尔，身上6处负伤，军役人员和实业者也有多人受伤。”“面对”围困，阿特拉索夫和哥萨克选择了一片合适的地方坐下来与其对峙。他派了一个忠实的犹加吉尔人去告诉被派往南方去的队伍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军役人员前来支援我们，把我们从围困中救出”，他后来宣称（注32，41页）。

接下来他沿季吉利河向上到达中部山脉，翻过山后于1697年6、7月间进到注入堪察加河的卡努奇河口（恰内奇河）。在那儿竖起了一个

十字架，上面写着：“205年（1697年）7月18日瓦拉基蔑尔·阿特拉索夫和同伴竖立了这个十字架。”该十字架一直保存到40年后C.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来到此地（注42，41页）。

阿特拉索夫把自己的鹿留在了这儿，然后同军役人员和纳税的犹加吉尔人、堪察加人一起“坐上平底小木船沿堪察加河向下航行。”一部分堪察加人加入阿特拉索夫的队伍是因为当地不同的部族和群体之间发生了争斗。堪察加河上游缴纳实物税的堪察加人请求阿特拉索夫帮助他们抵抗河的下游那些向他们进攻、抢劫他们村庄的同乡。

阿特拉索夫的队伍航行了“3天”，期间向当地的堪察加人征收了实物税并“击溃了”不服从的人。阿特拉索夫向堪察加河口派出了侦察员，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河谷地区住的居民比较稠密，在大约150公里长的地段上有多达160个堪察加人的城堡，每个城堡里住着200多个人。

然后阿特拉索夫的队伍溯堪察加河向上游返回。翻过中部山脉后哥萨克发现，科里亚克人偷走了阿特拉索夫留下的鹿，于是他们开始追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成功地夺回了被抢的鹿，在这场发生在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战斗中有大约150名科里亚克人被打死。

阿特拉索夫再次沿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向南进发。他沿堪察加半岛西岸走了6个星期，途中向遇到的堪察加人收取了实物税。他到达伊恰河后继续向南前进。学者们认为，阿特拉索夫到达了内恩古丘河（后根据在那儿失踪的哥萨克的名字改为加雷金河，它的河口同奥帕拉河的河口是一起的）或者甚至还要往南，到堪察加半岛的南端总共只剩下约100公里。

奥帕拉河上住的是堪察加人，而在加雷金河上，俄国人则已经遇到了第一批“库里尔男人——有6个大城堡，里面住了许多人”。住在堪察加南部的库里尔人就是虾夷民族——爱奴人，这是同堪察加人混在一起的堪察加半岛的居民。因此，当阿特拉索夫宣称，“在第一条库里尔河对面的海上仿佛看到有岛屿时”（注42，69页），他指的正是加雷金河。

毫无疑问，阿特拉索夫从北纬52.1°附近的加雷金河能看到千岛群岛最北边的阿莱德岛（现在叫阿特拉索夫岛），岛上有一座千岛群岛最

高的同名火山（2330米）（注43，133页）。

从那儿回到伊恰河并在那儿建了过冬地后，阿特拉索夫向堪察加河派出了以哥萨克巴达珀·谢尔久科夫为首的由15名军役人员和13名犹加吉尔人组成的队伍。谢尔久科夫和哥萨克在堪察加河上游地区由阿特拉索夫建造的上堪察加城堡度过了3年的光景。

和阿特拉索夫一起留下的人“因为没有火药和铅弹，无法服役，所以亲手向他递交了一份呈文，以便从那个伊恰河回到阿纳德尔城堡。”（注42，41页）1699年7月2日阿特拉索夫的队伍一行15名哥萨克和4名犹加吉尔人返回了阿纳德尔，他们运到那儿交官家的实物税有：330张貂皮、191张红狐皮、10张深灰喙（某种介于红色和褐色带黑之间的颜色）狐狸皮、貂皮巴尔卡（衣服）。在收缴的毛皮当中有此前还不为俄国人所知的10整张海狸皮（海獭）和7小块海狸皮。

阿特拉索夫把一名堪察加王公带到了阿纳德尔城堡并将他送往莫斯科，但“外国人”却在卡马河上的凯伊格拉特县死于天花。

1700年春末，阿特拉索夫带着收缴的实物税到达雅库茨克。在把对他的问话编成一本《故事集》后，阿特拉索夫继续向莫斯科出发。途中在托博尔斯克时，著名的西伯利亚地图学家、贵族子弟谢苗·乌里扬诺维奇·列缅佐夫见到了阿特拉索夫的《故事集》。历史学家认为，地图学家和阿特拉索夫见面后在他的帮助下绘成了最早的一幅堪察加半岛的详图。

1701年2月，阿特拉索夫在莫斯科向西伯利亚衙门递交了自己的《故事集》，里面包括最早的有关堪察加半岛的地形、气候、它的动植物、环绕半岛的海洋、海上冰面状况的信息，自然，还有大量半岛土著居民的信息。有趣的是，恰恰是阿特拉索夫通报了某些他从半岛南部居民——库里尔人那儿得到的有关千岛群岛和日本的信息。

阿特拉索夫描述了他出征半岛期间所遇到的当地居民的情况：住在品仁纳河的科里亚克人没有胡子，淡褐色脸庞，中等个儿，讲自己独有的语言，没有任何信仰，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萨满法师：招引他们需要的什么东西，敲打红方块并大喊大叫。他们穿鹿皮衣服和鞋子，而鞋底是海豹皮的。他们吃鱼、各种野兽和海豹。他们的帐篷是用鹿皮和罗甫杜沙（用鹿皮制作的麂皮——作者注）做的。

在那些科里亚克人的后面住着外国人柳托尔人（奥柳托尔人——作者注），而语言基本上与科里亚克人一样，他们陆地上的帐篷与奥斯恰克人的帐篷相似。在那些奥柳托尔人的后面沿河住着年龄（个头儿——作者注）不大的堪察加人，胡须不长，脸长得像泽梁人（科米人——作者注）。他们穿貂皮、狐狸皮和鹿皮衣服，外衣用揉好的狗皮缝制。他们的帐篷冬季在陆地上，而夏天则在柱子上，离地面约有3俄丈高（5—6米——作者注），是用木板架设的，用云杉树皮覆盖，进帐篷要从扶梯上去。帐篷和帐篷间隔不大，在一个地方约有200—400顶帐篷。

他们以食鱼和野兽为生，吃生鱼和冻鱼。冬天把生鱼储存起来：“放到坑里，培上土，而那些鱼‘活受罪’，（吃时）把那些鱼挖出来，放到木槽里，给水加热（把烧得赤热的石头放水中加热——译者注），把鱼和水搅拌好了喝掉，那些鱼发出阵阵恶臭，俄国人因为需要可以忍受。而器皿是木制的和黏土制的，那些堪察加人自己制作瓦罐，他们的另一些器皿是用白灰泥打底的和上过漆的。他们说，这些器皿从一个岛来到他们这儿，而那个岛属于哪个国家他们不知道。”（注42，42—43页）Л. С. 别尔克院士认为，这儿“显然说的是日本的漆器，它们首先从日本被带到远处的库里尔人那儿，然后到近处的库里尔人那儿，而这些人又把它们运到了堪察加半岛的南部”（注43，66—67页）。

阿特拉索夫说，堪察加人有一种大兽皮艇，长达6俄丈（约13米），宽1.5俄丈（3.2米），能盛下20—40个人。他指出了他们的宗族制的特点和经济活动的特殊性：“他们自己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只是谁在他们那个宗族里富有，人们就比较敬重他。族与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和打斗。”“战争期间很勇敢的人，而其余的时间（他们）则令人讨厌和沉不住气。”他们在小城堡里自卫时，从里面把石头用投石器扔向敌人。哥萨克把堪察加人的“帐篷”叫作小城堡，就是土围子和栅栏加固的地窖。只是哥萨克和实业者出现在半岛之后堪察加人才开始修建这种堡垒。

阿特拉索夫讲述了哥萨克怎样无情地镇压那些不顺从的“外国人”：“俄国人从盾牌后面接近小城堡并点燃了城堡。他们站在他们（外国人——作者注）逃跑的城门对面，就在那些城门那儿杀死了许多敌对的外国人。那些小城堡都是土垒起来的，俄国人在接近城堡时用标

枪刨开了土，而且用火绳枪压制外国人登上城堡。”（注 43，68 页）

在谈到当地居民的作战能力时，阿特拉索夫指出：“……他们相当害怕火器，把俄国人叫作喷火的人……他们无法抵抗火器，往回就跑。堪察加人冬天滑雪参加战斗，而使鹿的科里亚克人则乘雪橇：一个人驾驭，另一个人射箭。而夏天他们则步行去战斗，有的赤裸着，而有的穿衣服。”（注 42，44—45 页）“而他们的武器——用鲸鱼骨斜接的弓，石制和骨制的箭头，他们那儿不产铁。”（注 40，74 页）

关于堪察加人的家庭结构的特点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有多少妻子完全凭自己的能力——1 个、2 个、3 个、4 个。”“而没有任何信仰，只有一些萨满（巫师），而那些萨满同别的外国人有区别：留着长长的头发。”阿特拉索夫的翻译都是科里亚克人，他们和哥萨克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已掌握了俄语的基本知识。“他们（堪察加人——作者注）那儿没有任何牲口，只有狗，大小与本地狗有一拼（即同雅库茨克当地的狗一样——作者注），不过毛发长得多，身上的毛长达 1/4 俄尺（18 公分——作者注）。”“而在有很多鱼的河里捕猎黑貂时用库列马（独特的捕捉器——作者注），而另一些在树上活动的貂则直接射杀。”（注 42，43 页）

阿特拉索夫评估了在堪察加土地上推广种植粮食的可能性以及同堪察加人进行贸易交换的前景：“在堪察加和库里尔的土地上可以播种粮食，因为这个地方气候温和，土壤又黑又软，只是没有牲口，无法进行耕种，而外国人对播种一窍不通。”（注 43，76 页）“而对他们来说商品是需要的：浅蓝色的阿杰古伊（淡蓝色的小玻璃珠子——作者注）、刀子。”他在《故事集》的另一些地方补充道：“……铁、刀子、斧子和棕榈（很宽的铁刀——作者注），因为他们那儿不产铁。而他们要靠它捕捉貂、狐狸、大海龙（看来是海狸——作者注）、水獭。”

阿特拉索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堪察加的大自然、它的火山、植物、动物、气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关于后者他写道：“堪察加土地上的冬天相对莫斯科来说是温暖的，而雪通常不大，而在库里尔外国人那儿（即半岛南部——作者注）雪很少。堪察加冬天日照的时间相对雅库茨克来说要长接近两倍。而夏天在库里尔太阳直接照在人的脑袋上并且人站在太阳下没有影子。”（注 43，70—71 页）阿特拉索夫的最后一个判

断一般说是不准确的，因为甚至在堪察加的最南端太阳从来没有高过地平线  $62.5^{\circ}$ 。

正是阿特拉索夫首次向世人通报了堪察加两座最大的火山——克柳切夫火山和托尔巴奇卡火山以及堪察加其他一些火山：“从堪察加河口向上走一个星期就能见到一座像粮食垛一样的山，巍峨、高大，而它附近的另一座山像干草垛，也相当高，白天里面冒出烟雾，而夜间有火星和闪光。堪察加人说，如果人上到那座山的半山腰，他们在那儿能听到使人无法忍受的巨大的轰鸣声和雷声。而上到超过那座山一半高度的人就回不来了，他们在那儿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注 42，47 页）“有泉水形成的河从那些山里流出，河水是绿色的，当你往水里扔一个戈比时，能看约 3 俄丈深。”

阿特拉索夫着重描述了半岛沿岸地区和河流的冰面状况：“柳托尔人（即奥柳托尔人——作者注）附近的海上冬天有浮冰，而整个大海不结冰。堪察加（河——作者注）对面的海上有没有冰不知道。夏天那片海上一点冰也没有。”堪察加大地另一面的海上冬天没有冰，不过从品仁纳河到给给尔（季吉利河——作者注）的岸边有不多的冰，而从给给尔再往远处就一点冰也没有了。从给给尔河到河口有路，到堪察加河步行走快些，过石头（即翻山——作者注）要 3—4 天。而乘小船沿堪察加河往下到海边要 4 天时间。海边有很多熊和狼。”“银矿和其他什么矿有没有不得而知，无论什么矿都不知道。”（注 43，71—72 页）

在描述堪察加的森林时，阿特拉索夫指出：“那儿有树生长——雪松都不大，与瓔珞柏相当，树上结坚果。堪察加这边有许多白桦、落叶松、云杉，而在品仁纳那边沿河生长着白桦和白杨。”他还列举了在那儿所遇到的野果：“堪察加和库里尔大地上的野果有：越橘、稠李、忍冬——大小不如葡萄干，甜度可比葡萄干。”（注 43，72、74 页）

他在描写早先不为俄国人所知的那些野果、小草、灌木、野兽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观察力、精细令人吃惊，例如：“有一种草，外国人把它叫作阿嘎达特加，能长到膝盖那么高，像一根小树枝。外国人把那种草拔出，清除表皮，用河柳的内皮将中间缠起来放到太阳下晒，等干了就变白了，人们吃那种草，味道甜甜的。而如果把那种草揉软了，也将变

白，像糖一样甜。”（注 43，73 页）当地居民从这种“甜草”——阿嘎达特加草中得到了糖，而哥萨克后来利用它酿出了酒。

阿特拉索夫特别指出，在堪察加岸边有对实业者非常重要的海兽和红鱼：“海里有巨鲸、海豹、海獭，那些海獭在涨潮时上到岸上，而当水落时它们就留在了陆地上，人们就用标枪扎它们，用棍儿敲它们的鼻子，而那些海獭跑不了，因为它们的腿是最小的，而（布满带尖头小石子——作者注）的海岸既松散又坚硬。”（注 43，76 页）

他还特别指出了鲑鱼类的鱼产卵期的洄游过程：“堪察加大地河里的鱼属于海鱼，是一种特殊的种类，它像鲑鱼，夏天是红色的，个头儿比鲑鱼大，外国人（堪察加人——作者注）把它们称作阿维奇那（鲑——王大马哈鱼，堪察加人叫作乔乌伊恰，是可在堪察加河穿行的，也就是能从海洋到河流产卵的鱼中最好的和最大的——作者注）。另外的鱼类也很多——有 7 种不同的鱼，同俄国的鱼不一样。海里的那种鱼沿河洄游的很多，它们不返回大海，而是死在那些河里和一些小河汉里。为了吃到那些鱼，野兽——貂、狐狸和水獭就守在那些河里。”（注 43，74 页）

阿特拉索夫指出，在堪察加半岛，尤其是半岛的南部存在大量的鸟类。《故事集》里谈到了堪察加鸟类的季节性迁飞：“库里尔大地（在堪察加半岛南部——作者注）冬天时海上有许多海鸭和海鸥，而尔扎维耶茨里有许多天鹅，因为尔扎维耶茨（沼泽地——作者注）冬天不结冰。而夏天那些鸟都飞走了，留下来的数量很小，因为夏天阳光强烈，经常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他认为那片土地太往正午方向（向南方——作者注）移动了。”（注 43，75 页）阿特拉索夫如此精细地描述了堪察加的植物和动物，以至于后来学者们能轻松地对他所指出的所有动植物种类进行准确的科学命名。

最后我们要引用 П. С. 别尔克院士对“堪察加的叶尔马克”所作的评论，以我们看，这个评论是准确的和内容丰富的：“阿特拉索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人。他是一个学问不大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具有超群智慧和巨大的洞察力的人。下面我们将看到，他的记述包含了大量最有价值的人种志，一句话，地理学方面的资料，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的西伯利亚的新土地发现者中没有人（不排除白令本人）能作出这种内容充

实的总结。而关于阿特拉索夫的道德面貌可以通过下列事情来判断。在征服堪察加（1697—1699）后作为哥萨克首领受到奖励的阿特拉索夫被重新派往堪察加去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在从莫斯科去往堪察加的途中他决定去做一件极其无理的事情：1701年8月当他在上通古斯卡河时抢劫了乘船出发的商人的货物。为此，尽管有过功劳，他还是在审讯后被投入监狱。他在监狱里待到1707年，当他被赦免后又被派到堪察加去做总管。在这儿，当哥萨克1711年起事时他被杀死。”（注43，60页）这个把面积相当于联邦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总和的堪察加并入俄罗斯国家的杰出的人就这样悲剧性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 17 世纪著名的西伯利亚地图绘制者和 首位西伯利亚历史学家

西伯利亚大地盛产粮食、蔬菜和牲畜，除了蜂蜜和葡萄应有尽有。

它辽阔的面积和珍贵的野兽全世界独一无二。贸易自由，货物进出通畅。

大小河流、河汊、湖泊无法计量，鱼类丰富、众多，易于捕捞。矿藏丰富，有金、银、铜、锡、铅、上等剑钢、红铁、刀刃钢和普特钢、各种丝绸颜料、彩石且没有被外国人发现，而西伯利亚人对此一无所知。

——谢苗·列缅佐夫（注 47，139 页）

1696 年，看来是根据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的意愿，贵族议会决定：“将伟大国王的谕旨发往所有的西伯利亚城市，命令所有的西伯利亚城市、县城及俄国乡村，各州及缴纳实物税的州用粗麻布画出图纸，标明城市与城市之间多少俄里或几天的路程，以及俄国乡村、州和缴纳实物税的州与那些城市之间的距离。”（注 48）

然后他们提议在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托博尔斯克：“命令能工巧匠制作全西伯利亚地图，在下面填写上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多少俄里或几天的路程，测定县城到所有城市的距离，说明什么样的民族在何地游牧或居住，以及什么人从什么方向向边境地带靠近。”贵族议会甚至确定了那些必要的图纸的尺寸：个别的区 2×3 阿尔申（一阿尔申等于 71 公分），而整个西伯利亚大地图为 3×4 阿尔申（注 28，28 页）。

工作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能工巧匠也找到了，这就是托博尔斯克

的贵族子弟谢苗·乌里扬诺维奇·列缅佐夫，著名的俄国地图学家、地理学家和第一位西伯利亚历史学家。他的祖父，贵族子弟卢克扬的儿子莫伊谢伊（缅恩绍伊）·列蔑佐夫曾在莫斯科大牧首菲拉列特那儿服务。1628年12月2日，贵族子弟缅恩绍伊根据国王的命令从莫斯科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在那儿，他很快就成了17世纪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西伯利亚的军事—政治、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托博尔斯克行政当局的著名人物。

贵族子弟，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作为莫斯科罗斯军役人员中的一类人要承担一定的义务，也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薪水。他们是大公卫队年轻成员——“古罗斯大公卫队中的少年队员”或破产贵族的后代。在西伯利亚并入（俄国）时期，莫斯科当局依靠有特殊功勋的哥萨克军官来补充这类军役人员队伍。17世纪时大多数贵族子弟直接为莫斯科沙皇服务。谢苗的父亲，老列缅佐夫的儿子乌里扬·莫谢耶夫在托博尔斯克服役时一直升迁到特种常备军中尉。

乌里扬的儿子谢苗·乌里扬诺夫生于1642年。1682年根据督军A. A. 戈里岑的决定，命令“无报酬的贵族子弟”乌里扬的儿子谢苗·列缅佐夫加入“贵族子弟的队伍”代替在战斗中阵亡的彼得·扎巴洛茨基，领“同样的粮食和盐巴薪水”。最初给他定的年薪是7卢布、7俄石黑麦（728公斤）、7俄石燕麦（560公斤）和两普特盐（32公斤）。此前谢苗·乌里扬诺维奇已经成家，有3个儿子：5岁的列奥恩基、3岁的小谢苗和1岁的伊万（注47，26页）。后来列缅佐夫家又添了一个女儿玛丽娅和一个儿子彼得。

从1682年起贵族子弟谢苗·列缅佐夫开始“派遣”到西西伯利亚平原中部和乌拉尔山东麓各地一些操心的地方去收取粮食和金钱代役租，给“伟大的国王”运去“粮食储备”和向治下的当地部落收缴实物税。从1684年起在托博尔斯克县“派遣”期间他被招去做“登记土地事务的工作”。1687年C. Y. 列缅佐夫被派往“额尔齐斯河下游蓝色的广阔水面捕鱼。”

在1689年一本“走俏的”书里，C. Y. 列缅佐夫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绘图家被介绍给读者，说他“在不同时期凭知识绘制了许多托博尔斯克市、大市镇和西伯利亚一些城市的图纸”。学者们认为，列缅佐夫

的绘图活动开始得还要早，从 1683 年就开始了。看来，从那时起他就被看作一位有经验的绘图家、掌旗兵和圣像画作者，也就是圣像画家和旗帜画家。用 C. Y. 列缅佐夫本人的话说，他作为一个圣像画作者和掌旗兵从 1694 年 8 月起就出名了，当时“为了在额尔齐斯河上举行水的祓除仪式”，他同另外一些工匠一起用 4 天的时间“用金颜料”对小教堂进行的彩绘令人叫绝，而在 1696 年初“他为骑兵和步兵团缝制和彩绘的带花纹的旗帜独具匠心”（注 47，36—37 页）。

国内 C. Y. 列缅佐夫生平研究者 Л. А. 格力金伯格认为，正是谢苗·乌里扬诺维奇绘制了 1687 年那幅著名的西伯利亚全图，他是根据 1683—1685 年的资料、以托博尔斯克督军戈都诺夫那幅著名的西伯利亚地图为基础、对其“加以补充”而完成的这幅地图。列缅佐夫把这张图纸收入到了自己的地图集《地势图图册》（1697—1711）之中（注 47，33 页）。

1696 年 4—9 月，C. Y. 列缅佐夫作为军队的一员参与了对伊希姆河以外的草原地区的征讨，期间士兵们被迫同敌对部落的骑兵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后来，在解释自己创作《大片干旱、难以通行的石头草原地带图纸》的初衷时，他说明了当初参与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按照伟大国王 204 年（1696 年——作者注）4 月 17 日的命令，吩咐在托博尔斯克的贵族子弟谢苗·列缅佐夫绘出那片草原的图纸：从托博尔斯克到哥萨克汗国（哈萨克汗国——作者注）、大布哈拉、基发（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古时曾是丝绸之路的中心之一——译者注）、叶伊克河（亚伊克河，乌拉尔河 1775 年之前的名称——作者注）、阿斯特拉罕，哪儿近哪儿远，走旱路、走水路多少天，夏天和冬天情况又如何？河流的数量和大小，人的饮食和牲口的饲料能满足吗？渡口和石头山能通行吗？河流、山岭的天然界线都清楚吗？把所有这一切绘成一幅长约 3 俄尺，横着 2 俄尺的图，就是说绘在这样一张图纸上。”（注 49，8 页）

他从草原地区困难的征讨中返回后，得到了一项任务：根据贵族议会的决定制作一幅托博尔斯克县的地图。1696 年 10 月 28 日，当他离开托博尔斯克去进行测量工作时收到了一份训示公文，内称：“命令他，谢苗，到托博尔斯克县去，沿伊谢季河（在乌拉尔地区，托博尔河左边的支流——译者注）、尼擦河（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土拉河

左边的支流——译者注)、佩什马河(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土拉河左边的支流——译者注)、托博尔河、米阿斯河(在库尔干州和车里雅宾斯克州,伊谢季河右边最大的支流——译者注)、土拉河、塔夫达河去往所有的城堡和村镇,对那些城堡、村镇、乡村、缴纳实物税的省份加以描述,包括所有的河流、山岭的天然界限和小河、湖泊;把这一切都画在图纸上。”(注47,38页)

根据列缅佐夫此次所做的工作可以把他看作第一位外乌拉尔地区考察者。事实上,他创作出了一份研究西伯利亚这个地区的示意图,有了它,那些浓密的河网就起到了地理网的作用,使得布局地图其余部分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他第一次创作出了科学地研究外乌拉尔(即搜集地理、人种志和历史方面的资料)的示意图,它是如此的成功,后来18世纪30年代维杜斯·白令的科学院考察团在西伯利亚的工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得以完成正是借鉴了他的这一成果。

1697—1698年冬天他和两个助手考察了托博尔河流域。他成功地将整个托博尔河从河口到尽头超过1500公里的地段标在了地图上,还测绘下了它的几条大的(长度从600—1000公里的)支流土拉河、塔夫达河、伊谢季河和一些注入这些河的河流,包括米阿斯河和佩什马河。他把早先考察过的额尔齐斯河从注入鄂毕河到塔拉河口约1000公里长的地段及它的3条支流(其中长达2450公里的伊希姆河几乎到它的源头)也绘制到了图上(注40,82页)。

1697年3月3日之前,C.Y.列缅佐夫在 $3 \times 2$ 俄尺的亚麻布上完成了《大片干旱、难以通行的石头草原地带图纸》并把它寄到了莫斯科的西伯利亚衙门。而那年的9月18日,他按照贵族议会的决定绘制的托博尔斯克县地图也寄到了那儿。

这一年对列缅佐夫家来说是成功的一年。西伯利亚衙门决定用石头替换托博尔斯克那些官舍的木制建筑,而C.Y.列缅佐夫负责整个预算工作和制作砖的生产准备工作。10月11日多年来在制图事业上帮助过父亲的列奥恩基·谢苗诺维奇·列缅佐夫被授予贵族子弟的头衔,并且给他规定了“最初的”薪水。谢苗·乌里扬诺维奇还把小谢苗(1699年被授予贵族子弟头衔)吸引来参加绘图工作,后来还有伊万(1702年得到贵族头衔的赏赐)。

列缅佐夫的第一幅地图、尤其是第二幅给西伯利亚衙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正如他本人在《西伯利亚地图集》中指出的：“虽有笔误仍得到了赞扬，况且那是些技艺完美的地图呢！”（注 49，7 页），关于这件事有一封专门的证书寄到了托博尔斯克。

此后，列缅佐夫和孩子们被招到西伯利亚衙门，在那儿委托他把所有西伯利亚地区地图上的信息综合起来绘制一张 6×4 俄尺的西伯利亚全图。正如列缅佐夫本人所写的，“按照前述命令，谢苗·列缅佐夫应把在莫斯科和儿子谢恩卡所绘制的地图，即运到莫斯科的 18 幅作在锦缎上的所有城市的图纸，要把它们作成翻译（拷贝——作者注），要把上面提到的作在画布上的所有西伯利亚城市的图恰到好处地拓下来，用罗盘定位，按教会的尺寸，按照命令根据样品——纸地图的大小把以前画出的河流、山岭之间的天然界线和所有西伯利亚城市的道路以及到莫斯科的道路放入全图中。作好绘制准备，207 年（1698 年——作者注）11 月 8 日递到西伯利亚衙门（它的首脑——作者注）议会秘书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纽斯那儿，为此项工作伟大仁慈的国王要出朝接见并给 5 个卢布的奖赏”（注 49，9—10 页）。

或许 C. Y. 列缅佐夫和儿子们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还制作了一幅或两幅西伯利亚全图。就这样，他绘制在白色棉织物上的地图一直保存到 20 世纪初并挂在叶卡捷琳娜宫，后来保存在苏联地理协会档案馆并在艾尔米塔日国家博物馆展出。有一则传说流传至今，说彼得一世为了开玩笑，根据这幅地图组织了一次地理考试（注 47，47 页）。

1698 年，C. Y. 列缅佐夫在制作拷贝和全图的同时还到兵器陈列馆去学习石头建筑方面的知识，在那儿甚至给了他“一本法国印制的建筑书籍作为参考”。而在西伯利亚衙门他实际学习了“如何打椿和揉黏土，怎样把石灰和石头、水和其他的用具拖到山上”（注 47，49 页）。

根据 1698 年 12 月 4 日的证书 C. Y. 列缅佐夫被任命为托博尔斯克所有的建筑—施工工作的指挥，叫他“执掌城市的石建工作并管理所有的用具”（注 47，51 页）。

1699 年 C. Y. 列缅佐夫在托博尔斯克开始了自己最著名的地图集《西伯利亚地图集》的绘制。他在给地图集写的序言——“致温柔的读者”里指出，根据西伯利亚衙门首脑 A. A. 维纽斯的指示“他从 207 年

(1699年——作者注)1月30日同所有的孩子勤勉地开始了该书的工作”(注49,3页),而结束的时间是1701年1月1日。

在《西伯利亚地图集》的里封面有下列一段题词:“地图集是秉承伟大的沙皇和大公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君主的意志于耶稣诞生——创世纪的7209年,即1701年1月1日对整个西伯利亚、城市和土地及相邻地区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注49,1页)

地图集由下列23份地图组成:托博尔斯克市地图,包括城郊及上、下城区的街道,西伯利亚地区的18幅地图(托博尔斯克市、塔拉市、秋明市、图林斯克城堡、魏尔霍图利耶市、伊利姆市、佩雷姆市、别廖佐沃市、苏尔古特市、纳雷姆市、托木斯克市、库兹涅茨克市、图鲁汉斯克市、叶尼塞斯克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雅库茨克市、伊尔库茨克市、涅尔琴斯克市),即从西伯利亚各城市寄来的那些地区(已归属于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地区和县以及满洲)的图纸,《大片干旱、难以通行的石头草原地带图纸》——伊希姆河南边草原地区的图纸,全西伯利亚地图汇编——《西伯利亚城堡和地区全图》,罗斯北方个别地区地图——《大佩尔姆地区、北方沿海地区、伯朝拉地区和德维纳地区到索洛韦茨基海峡及周围住户新图》,最后一张:上面标有居住在西伯利亚领土和相邻地区各民族信息的西伯利亚地图,即西伯利亚人种志地图。

C. Y. 列缅佐夫收入地图集中的有他与孩子们绘制的托博尔斯克市、托博尔斯克地区地图和他后来增补的、寄到莫斯科的其余17幅西伯利亚地区地图的拷贝,以及他们编纂的全西伯利亚、罗斯北部地区略图及西伯利亚人种志地图。

这样,到1701年初时谢苗·列缅佐夫汇总了俄国督军、大使、实业者和哥萨克搜集的关于西伯利亚领土本身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以及相邻地区的民族的所有信息。事实上,这是一个总结性的文件,是对俄国当局、实业者和哥萨克在整个17世纪期间归并、开发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活动所作的说明。

在绘制《西伯利亚地图集》时,谢苗·列缅佐夫当然不仅使用了从西伯利亚各城市寄来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图纸,而且使用了许多17世

纪其他的一些图纸和保存在托博尔斯克官厅和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的含有描写西伯利亚内容的史料。这是一些税册、人口调查册、实物税手册、“入账”、保存在使馆的“政府文件汇编”和其他一些资料。无疑，他还使用了各种当事人的直接记述：“各种身份的俄国人、外国人、外国居民、托博尔斯克的外来户、老住户、某地出生的人、记性好阅历丰富的人、喀山人、乌法人、贝尔米人（科米、贝尔米亚克的旧称——译者注）、乌索利耶人、海富洛尔人、叶连斯克（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东南部，1924 年之前为城市——译者注）人、乌斯秋格人、梅津人、科尔马各尔人（该姓氏起源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尔马格雷村——译者注）、卡列列茨人（朝鲜人）、皮涅加人、诺夫哥罗德人，打听出了每块土地的尺寸和各城市间道路的距离，他们的乡村、省份，在过去的地图上从来没有标出的河流、小河和湖泊，北部沿海地区的海岸、海湾和岛屿，海上作业场、山、森林和各种河流、山岭之间的天然界线。”（注 49，3 页）

当然，所有这些“图纸”远不符合现在绘制地图的标准，它们没有经纬线网络，绘制时没有使用测量工具。地图上距离的确定主要靠路程的长短，只在托博尔斯克地区标注了俄里。

A. Ф. 米金多尔夫院士在描述自己 1842—1845 年在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的旅行时分析了列缅佐夫的《西伯利亚地图集》。他指出：“被大海所环绕的西伯利亚的界线被勾画得比较天真：在这儿，地区的轮廓要适应地图自身的边框……列缅佐夫让海岸的外形线沿着图纸的平行线走，直到在图纸右侧的边缘与另一条垂直的边相交，顺着这条线在直角处拐了一个弯，继续延伸，直至再次同图纸第三条边的平行线交叉。”（注 50，38 页）

在这幅地图上堪察加被画成了一个岛，在岛的东北部有一条巨大的地峡一直延伸到北冰洋。就算这样吧，但那个 A. Ф. 米金多尔夫院士仍然肯定了地图的精细之处，认为列缅佐夫在“标注叶尼塞河沿岸的居民点、描述阿穆尔边区和当时西伯利亚的人种志状况时”已够仔细了。

不但如此，在《西伯利亚地图集》绘制完成后几乎过了 150 年，院士在旅行时仍断言，“即使现在过了 200 年当谁想在被哥萨克根据自己的经历所描述过的那些地方旅行时，被他们所标识的中途休息地确信

无疑地能够为你指明避免在荒无人烟之处迷路的路径”（注 50，39、43 页）。

地理知识发展史研究者指出，列缅佐夫的《西伯利亚地图集》与那个时代西欧地理地图集的区别在于图纸上有大量有益的经济方面的信息。地图集还附有一份图例的目录，包括森林、草原、沼泽、岛屿、教堂、修道院、磨坊、渔场、河流间的连水陆地。上面还有题词，指出哪儿有沙土地、耕地、水井、道路、晒盐场等。

C. Y. 列缅佐夫郑重提出了西伯利亚的财富对俄罗斯国家的重要性。譬如在题词中所引用的他的一则笔记就证实了这一点，他在里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此问题的态度。

可以断定，《西伯利亚地图集》是一部工作蓝图的汇编，它有可能被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实际运用，以及被西伯利亚的督军们在处理日常行政和经济事务时所运用。遗憾的是，列缅佐夫和他的孩子们所编的另两本最有价值的地图集——1697—1711 年的《地势图图册》和 1702—1730 年的《业务地图册》看来肯定很少为人所知并且在 18 世纪的科学和实践活动中没有被广泛运用。

出现在列缅佐夫地图集中的人种志资料是 17 世纪居住在西伯利亚和相邻地区的定居和游牧民族迁移史的明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人种志著作《对西伯利亚各民族及其领土边界的描述》，它是通过西伯利亚自学成才的学者——马车夫 И. Л. 切列巴诺夫的转述为世人所知晓。

列缅佐夫在与他的著名的西伯利亚地图集有关的文字当中引用了一些研究罗斯这个广阔地区的历史资料。《西伯利亚地图集》的序言指出，1567 年夏天根据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伊凡雷帝）的命令哥萨克首领伊万·彼特罗夫和书吏们及贵族布尔纳什·阿雷舍夫和 20 名同路人被派往西伯利亚，“前往东方和北方去探寻邻国的土地和语言，汗国和省份，到莫斯科的距离，离莫斯科国家有多远”（注 49，4 页）。

被派出的人在返回后递交了一份见闻报告（说实在的，最近的研究成果证明，在叶尔马克的出征之前派出这种考察团的可能性很小。这儿多半说的是托木斯克的哥萨克 И. 别特林 1618—1619 年的旅行）。

后来列缅佐夫提到了在御前大臣和托博尔斯克督军彼得·伊万诺维

奇·戈都诺夫主持下于 1667 年编纂最早的全西伯利亚地图册及文字说明一事。而且据列缅佐夫证实，地图于 1667 年被交付印刷。考虑到居民迁移引起的困难和各地间遥远的距离，他特别强调了这第一幅西伯利亚地图的重要性。

在对《西伯利亚城堡和地区全图》所作的文字说明中，列缅佐夫宣称，“195 年（1687 年）6 月 16 日根据伟大国王的谕旨托博尔斯克贵族子弟柳比姆·扎伊采夫用国王确定的俄丈作了测量，大约 1000 俄丈相当于 1 俄里”（注 49，12 页）。据此测量了从托博尔斯克到秋明、图林斯克城堡、魏尔霍图利耶、索利卡姆斯卡亚、佩雷姆的距离（莫斯科俄里最初被认为是 700 俄丈，然后是 1000 俄丈，最终定在 500，也就是说 1 俄里正好等于 1066 米）（注 28，31 页）。

列缅佐夫宣称，就在那年托博尔斯克的贵族鲍里斯·车尔尼岑测量了从托博尔斯克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到苏尔古特的距离。而且在《西伯利亚地图集》里列缅佐夫还引用了从西到东横穿整个西伯利亚这条路线用天数计算的距离：托博尔斯克—塔拉—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位于伊尔库茨克州西部——译者注）—色楞格斯克—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中国；从北到南：托博尔斯克—亚伊克河的尽头—里海；从阿尔巴津经阿穆尔河到海。

许多迹象表明，《西伯利亚地图集》包括对它完成的时代来说都是一些最新的西伯利亚地理资料。这可以用堪察加半岛的资料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地图集》中这些资料同 1696 年（也就是在导致堪察加并入俄罗斯的阿特拉索夫远征之前）从哥萨克德米特里·巴达波夫那儿获得的信息有关。因此，在《雅库茨克市地区地图》中就没有堪察加半岛，只有堪察加河及旁边的题词“河上住着不纳实物税的堪察加人，他们穿狗皮、貂皮和狐狸皮的外衣，他们的弓很小，是用筋斜接起来的”。堪察加河口附近标有一处伊万诺夫乡村墓地，旁边写着：“堪察加来了一些有文化的人，他们穿着带花纹的大褂。”Л. С. 别尔克院士认为，这些信息同因船舶遇险而落到堪察加半岛的日本海员有关（注 51，4 页）。

在地图集的题词和分布于堪察加河两岸的题词中含有半岛其他一些河流的信息，其中就有鲍波罗瓦亚河，即流经半岛南部的奥泽尔纳

亚河。

在列缅佐夫于1698年在莫斯科绘制的西伯利亚综合地图上，不仅标注了堪察加河，而且把堪察加岛安置在了乌第河口对面。

众所周知，B. 阿特拉索夫1700年从并入俄罗斯的堪察加去往莫斯科时于1700年12月16日路过了一下托博尔斯克。听到了这个消息，C. Y. 列缅佐夫向督军递交了一份呈文，要求“把那个五十人长在雅库茨克描述他所到过的当地边区的口供抄录”下来。列缅佐夫说明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为了编纂全西伯利亚地区的地图，他需要最新的情报，因为“不确实打听清楚，在那些地图上就会绘出某些不真实的东西”。

督军 M. Я. 切尔卡斯基公爵在给西伯利亚衙门的复文中报告说，他命令开启了在雅库茨克查封的文件箱，“抄录了口述，把抄件给了他，谢苗，以便得到地图集所需的信件和证明”（注47，158页）。历史学家认为，列缅佐夫本人同阿特拉索夫见了面并进行了交谈。

看来，著名的地图学家 C. Y. 列缅佐夫于18世纪初年开始、在其逝世后（这多半发生在1720年之后）由他的孩子们完成的《业务地图册》是以从阿特拉索夫那儿得到的资料为基础编纂而成的，正因为如此，那上面堪察加已经被描绘成一个半岛，它的轮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真实的半岛相比照。

某些历史学家，包括1940年在列宁格勒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收藏的艾尔米塔日文集中发现并第一个研究《业务地图册》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A. И. 安德烈耶夫都认为，“在列缅佐夫寄到莫斯科的1701年地图集原件中，在全西伯利亚总图上堪察加已经有了那种形状，即在标有它的那些地图集上、在《业务地图册》上我们看到的那种”。他推测说，那份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唯一著名的《1701年西伯利亚地图集》尽管在1882年据此做过照相复制品，但它不是原件，而是拷贝（注28，32、34页）。说实在的，现在并非所有研究 C. Y. 列缅佐夫生平活动的专家都支持 A. И. 安德烈耶夫的意见。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列缅佐夫是如何适时地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以校正自己的西伯利亚地图的。在1698年编制的《西伯利亚城堡和地区全图》上，标注在勒拿河口对面的一个岛旁写有：“198年（1690—

1691 年——作者注) 被探访过。”我们研究北极地带发现史的权威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B. IO 维泽使这一问题更加明确, 他说可以把这个岛确定为 1690 年夏天雅库茨克哥萨克、后来的贵族子弟马克西姆·木霍普列夫从勒拿河前往克雷马河航行时发现的斯托尔博沃伊岛(利亚霍夫群岛中的一个)(注 10, 180、181 页)。

1701 年 10 月 10 日, C. Y. 列缅佐夫将《西伯利亚地图集》寄往西伯利亚衙门。历史学家认为, 根据 A. A. 维纽斯的建议, 打算在阿姆斯特丹 И. A. 杰辛克的印刷厂印刷出版俄文和荷兰文的《西伯利亚地图集》原稿, 但随着后者于 1701 年去世和维纽斯于 1703 年中期离开西伯利亚衙门, 列缅佐夫地图集的出版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注 47, 93、94 页)。

C. Y. 列缅佐夫绘制全西伯利亚地图的工作对俄国和西欧的制图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奥地利大使戈瓦利因基于 1699 年从维纽斯那儿得到一张德文版的 1698 年的西伯利亚地图的拷贝。这张地图里的许多资料都被用到 И. 伊杰斯的地图中, 伊杰斯的地图是作为荷兰发行的一本描写他旅行的书的附件于 1704 年出版的。而在 1707 年法国地理学家 Г. 杰里利的地图上, 西伯利亚东北边缘的“绕不过去的海角”正是根据列缅佐夫的地图标记的。众所周知, C. Y. 列缅佐夫同西伯利亚旅行家 Д. Г. 梅塞施密特和被俘的瑞典军官斯特拉伦伯格相识, 因此后者关于西伯利亚的书及里面的地图肯定包含了 he 通过与 C. Y. 列缅佐夫的交往而得到的信息(注 47, 195 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贵族子弟、在生命终结时已是托博尔斯克贵族的谢苗·乌里扬诺维奇·列缅佐夫的《西伯利亚地图集》不仅是一份表现了俄国人在 17 世纪研究、开发西伯利亚所作的重大工作的出色的总结性文件, 而且包含了地图集创作时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理方面的最新的知识。正因为如此, 这本地图集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制图史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位西伯利亚历史学家 C. Y. 列缅佐夫的作品——1697—1710 年完成的《西伯利亚史》和《西伯利亚昆古尔(彼尔姆边疆区的城市, 昆古尔区的行政中心——译者注)简史》(以下称《简史》)的价值是毫无疑义的。这些作品使得西伯利亚并入莫斯科帝国这段历史中的许多

实事变得更加准确。列缅佐夫编纂西伯利亚地区地图的工作以及由于这个缘故开始研究托博尔斯克聚会厅档案馆（首先是从1683年起有关西伯利亚首都的详细的统计资料）和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图书馆里的文件使得他积累了大量有关西伯利亚历史的知识。

重要的是，除了书面资料之外，用他的话说，他还询问了各种“老住户、阅历丰富的人”、“知情人”、“在无法通行的地方、干旱的石头草原和大海上及各民族不同的地方必定会有的处所待过的饱经世故的人”，不仅有“各种职务的俄国人”，而且还有“外国人、布哈拉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新入教的人”、在游牧民那儿当过俘虏的俄国人、“移民和俄国的俘虏”。通过搜集地理资料，他了解了许多西伯利亚历史和考古学中的事情，包括“古代楚德人（16世纪时居住在乌拉尔山北边、鄂毕河下游，即尤格拉和伯朝拉一带的民族——译者注）和库楚姆人的住所、祈祷献供之处、古城遗址、要塞和墓地”（注49，2、3、7、8、14页）。

因此在他著名的地图集里，在那些地理名称中间掺杂着一些简短的历史记载。例如，在谢列勃良卡河（银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丘索瓦亚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附近他作了一段注释：昆古尔编年史中有一段传说：好像叶尔马克在谢列勃良卡河留下了一些沉重的小船，“那些旧的（船——作者注）所在之处，穿过它们的底部长出了树”，根据这则传说“那儿有叶尔马克他们的船”。而在阿穆尔河口附近，在按照列缅佐夫的观念有过基里亚克帝国的地方，被他添上了一段神奇的故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到达过此地，他藏起了武器，留下了钟。”（注6，34页）

在自己最后一本地图集——《业务地图册》中，列缅佐夫在乌拉尔中部的地图上作了一个记号“叶尔马克们的连水陆地”并用红色的虚线标出了叶尔马克沿谢列勃良卡河、被他称作“丘亚河”的它的一条支流所经过的道路，接来越过连水陆地经朱拉富尔河、巴兰恰河（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从左边注入塔基尔河——译者注）和塔基尔河所走的道路（注12，518页）。

列缅佐夫把自己的作品《西伯利亚史》完全献给了首次“夺取西伯利亚”的历史。他利用了托博尔斯克宫廷大主教基普利安、然后是

涅克达里编纂的托博尔斯克编年史并用另外的一些资料对此加以补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比托博尔斯克编年史容量大得多的历史著作。

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列缅佐夫在自己的两部历史作品、尤其是《简史》史中除了展现首次“夺取西伯利亚”进程中许多生动的事实之外，还引用了传说中“上帝神奇地帮助”基督徒同“异教徒”斗争的事例。无疑，他热切地希望将叶尔马克这个为了在西伯利亚多神教徒和穆斯林当中传播基督教建立了功勋并献出生命的人归入东正教会的圣徒之列。

《西伯利亚史》一书引进了一些仿佛伴随哥萨克出征的奇迹：圣徒、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出现在托博尔河哥萨克面前，在远征的困难时刻带有拯救者面容的哥萨克旗帜从小船上升起并自动沿托博尔河行走。甚至上帝本人也带着天兵出现在云中保护哥萨克避开鞑靼人的射击……

同时在他的编年史里给出了许多远征的详情细节，尽管他披露的某些情节明显地带有传说的性质。例如，下列事情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哥萨克在向西伯利亚进发时犯了错误，他们起初没有拐到谢列勃良卡河，而是去了瑟尔瓦河并在那儿过冬，就是说还在沿乌拉尔地区就迷了路。而这还是在有斯特洛干诺夫的“向导”的情况下！

P. Г. 斯科雷尼果夫教授认为，关于叶尔马克在瑟尔瓦河过冬的传说产生自 17 世纪末昆古尔当地牧师中间，这是为了给那种观点寻找依据：正是叶尔马克在昆古尔郊区修造了保存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小教堂（注 12，516 页）。

列缅佐夫所引用的另外许多叶尔马克出征的情节都带有传说的性质。叶尔马克出征的所有年代和先后顺序在他那儿都是颠倒的和矛盾的。但用批判的态度分析列缅佐夫的编年史对于学者们弄清叶尔马克出征的真实情形提供了许多帮助。

在《简史》中引用了许多同出征有关的生动的画面，而且照 C. B. 巴赫鲁申通讯院士的意见，“《简史》最典型的特征是它那渗透着粗俗的民间幽默的纯粹的大众风格……某些片段的叙述几乎使用了童话的语言：‘……叶尔马克有两个同龄人——伊万·加里采夫、伊万·格洛扎，巴戈丹·勃良兹卡和选出来的 4 个哥萨克大尉，以及团部司书，号手和苏尔纳管手、打定音鼓的人和鼓手、百人长和五十人长、组长和士

兵及旗手，加上3个牧师、一个老乞丐，走路时不穿黑袈裟，要纠正生活习惯和煮粥，知道储备品的情况，很了解教会事务。发布鞭笞罪犯的命令，有人不想待了，要背叛离开他们，按顿河方式（即按哥萨克传统——译者注）对其下命令：把沙子倒入怀中，（将人）装入口袋，扔进水里。叶尔马克的队伍因此而稳定下来；有超过20个人被倒入沙子绑上石头沉入瑟尔瓦河”。

对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大尉去马克西姆·斯特洛干诺夫那儿为哥萨克向西伯利亚的出征索求储备品的描写也是这样。斯特洛干诺夫想供给哥萨克粮食储备品不外是按利率出借，“向他们求得一纸卖身契”。但愤怒的哥萨克几乎杀了他：“老乡，你现在还不懂得什么叫死吧，我们会抓住你把你打成碎片。给我们一份平底小船的目录，大家共同出钱备5000条船（据这个编年史，哥萨克卫队所要的不合实际的数目就是这样——作者注），每个人配备3俄磅火药和铅弹、火枪和3门步兵团炮、3俄担黑麦粉、1俄担面包干、2俄担米粒和燕麦粉、1俄担盐和几俄担油。”（注6，40页；注12，511页）

列缅佐夫在从其他的西伯利亚编年史中汲取大量信息的同时，还把许多无论是俄国本土的也不论是当地产生的口头传说运用到自己的历史作品里。他经常引用这些传说——《伊斯兰历史》《伊斯兰纪事》，也就为后代保存了它们。这指的是那些用歌曲形式表现出来的哀歌，即“鞑靼人用歌来进行对话时唱出来的哀歌”。其中有一种名为“纪事”的体裁，里面人们因西伯利亚汗国被俄国人占领而痛苦并且谈到了叶尔马克：“他是这样的神奇和可怕，当纪事中的人彼此间提到他时，无不动容。”在昆古尔编年史里给出的恰恰是《察里津哀歌》这种形式的哀歌。用列缅佐夫的话说，鞑靼人“直到现在对天发誓和祈祷时都用叶尔马克的名义”（注6，35页）。某些伊斯兰教的精神人物——神学家的布道和传教是这些各地传说的根源。

列缅佐夫还传达了鞑靼传说中关于值得纪念的一些地区和陵墓的内容。譬如托博尔斯克附近苏兹古和巴尼丘陵之间的地区就使人回想起库楚姆两个妻子的宫廷帐篷的所在地。在萨乌斯干岬及托博尔斯克近郊，按鞑靼传说有“国王的墓地”，而按哥萨克的说法，那儿是战斗中阵亡的叶尔马克士兵的墓地。

列蔑佐夫有选择地在自己的编年史中使用了一些与叶尔马克的出征有关的迷信传说。比如，在编年史中对北极光的描写，它仿佛是库楚姆帝国灭亡的预兆：“火柱从地上直冲云霄，火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幻象……人们在火柱中看见了不同的恐怖幻影，还有会战、喊叫声。”所有这些都符合伊斯兰教把极光看作神兵会战的观念。要知道西伯利亚鞑靼人这样解释极光的出现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好像是些排斥那些每天傍晚都在厮杀的人的魔鬼的崇拜者。”（注6，36页）

列缅佐夫道出了鞑靼人关于叶尔马克的铠甲和他死后在他坟墓上出现奇迹的传说。总的来说，这有些使人感到惊异，因为恰恰是同叶尔马克和他的哥萨克作战的鞑靼人编造了这些传说。谢苗·列缅佐夫的父亲给他讲述了这些故事。乌里扬·列缅佐夫1660年曾是被派往有威信的卡尔梅克王公阿布拉伊酋长处使团成员，阿布拉伊酋长当时同他的人们正在离俄国边界不远的斋桑湖岸边游牧。

传说叶尔马克的一副铠甲放在托博尔斯克服役的鞑靼贵族凯达乌那儿，阿布拉伊请求把这副铠甲寄给他。使团给阿布拉伊送去了据说是叶尔马克的铠甲，而乌里扬·列缅佐夫则从酋长的话语中记下了一个关于铠甲的“故事”：“卡克（叶尔马克——作者注）来到了西伯利亚，因躲避库楚姆落在阻断的横沟里溺毙。他被找到了，中了枪，血流如注，人们拆开了铠甲，铠甲和外衣多么神奇啊！”

过后阿布拉伊讲述了自己痊愈的事：“我小时候，内脏得了病，人们给了我他（叶尔马克——作者注）坟上的一些土，吃了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当带着从坟上抓来的土作战时就打胜仗，如果不带，只能空手（没有战利品——作者注）而归。”（注6，37页）

看来，阿布拉伊《故事》中这样一则传说进入了列缅佐夫的编年史：在那个悲剧性的死亡之夜，叶尔马克“穿着两副沙皇的铠甲”——沙皇伊凡雷帝的礼物成为哥萨克军官在西伯利亚河流的波浪中溺死的原因。

在分析列缅佐夫编年史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C. B. 巴赫鲁申中肯地指出：“因此大体上得到西伯利亚衙门的官方文件确认的列缅佐夫的叙述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地方传说进入俄罗斯文学的过程和当时的学术界使用它的方法。”（注6，38页）

## 17 世纪俄国人移民西伯利亚

军役人员、农民和工商业者步先驱者——哥萨克和实业者的后尘陆续来到新发现的西伯利亚大地。俄国人 17 世纪移民辽阔的西伯利亚存在两种方式。

一方面，莫斯科当局为了新占领土的防务和尽可能地保证固定的实物税的收入，既要吸引“乐意人”中的志愿者移居西伯利亚，又要把军役人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以强制的方式迁到新的地方。后来，西伯利亚出现了不少流刑犯、刑满释放的人或者根据当局的命令直接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流刑犯。

另一方面，在“自由民间”运动和“自由民间殖民”浪潮中移居新发现的西伯利亚大地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是为了到乌拉尔山那面寻找“合意的可耕之地”和摆脱督军、管家、收税官和地主到遥远的边区过自由的生活，他们是自愿奔赴西伯利亚的。

随着先驱者往东方的推进和越来越多的新的西伯利亚土地并入莫斯科罗斯，当局开始采用强制的手段将人们从西西伯利亚的城市迁到位于更加遥远的东方和南方去服役和耕种，例如从托博尔斯克和秋明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

俄国农民开发西西伯利亚地区的热情尤其高涨，因为那儿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发展农业。在 16 世纪最后几年和 17 世纪初年俄国农民已经出现在秋明、魏尔霍图利耶、图林斯克和佩雷姆附近。他们当中有来自喀山、卡尔戈波尔（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西南部，奥涅加河左岸——译者注）、维亚特卡和彼尔姆的农民。

正如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 B. A. 亚历山大所言，“到 17 世纪 30 年代在土拉河流域和它南边的支流地区（沿塔基尔河、尼擦河和它们的

支流)形成了俄国在西西伯利亚主要的农业区。在 17 世纪头 10 年那个地区已经非常迅速地出现了一些乡村小区。1612 年在塔基尔河地区出现了塔基尔大村镇;在 1620 年期间,沿尼擦河——有丘巴洛瓦和尼擦大村镇,1630 年初有伊尔彼特村镇、基尔金村镇和其他一些大村镇出现”(注 52, 11 页)。

尽管受到南部突厥语系游牧部落经常性进攻的现实威胁,这些村镇还是建起来了。不过这种威胁毕竟阻止了在佩什马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的塔拉城堡地区建立新的大村镇。然而,俄国人自发地迁居西西伯利亚和在当地发展农业从 1620 年就已经开始,并且进行得异常迅速,以至于地方上对西伯利亚当局提供的粮食量急剧增长。

虽然存在来自南方的进攻威胁,但 17 世纪中叶俄国居民继续从魏尔霍图利耶、图林斯克、秋明和托博尔斯克向南进发去占据地盘。土拉河最南边的支流佩什马河两岸已住满;借助雅卢托罗夫城堡和伊谢季城堡的掩护,俄国移民推进到了托博尔河中游往上、它的支流伊谢季河及伊谢季河的支流米阿斯河的富饶土地,这些河流的沿岸地区在 17 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超过 50 个大村镇。

17 世纪西伯利亚正经的农业区就这样产生了。这意味着俄国西伯利亚的农业扩展到了最适合它发展的地区,即最南部地区。当时在那儿出现的大村镇——沙德林镇、雅卢托罗夫镇、帝王城后来变成了沙德林斯克市、雅卢托罗夫斯克市和库尔干市。

比如有这样一些事实可以证实这个地区人口密度的大小:1680 年魏尔霍图利耶县涅夫扬斯克镇主管 49 个乡村,阿拉马舍夫镇主管 22 个乡村(注 52, 12、13 页)。

按照历史学家 В. И. 舒恩科夫的意见,17 世纪末西西伯利亚的四个县——托博尔斯克、魏尔霍图利耶、秋明和图林斯克成了西伯利亚的主要粮仓,而整个西伯利亚 3/4 的农民和个体农户住在这些地区(注 52, 14 页)。

随着先驱者到达叶尼塞河中部并建立叶尼塞斯克,那儿就出现了俄国农民。从 1620 年起在这个城堡地区开始形成一些农民的大村镇和乡村。17 世纪时叶尼塞河两岸从皮特河(位于东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叶尼塞河右边的支流——译者注)口起(乌斯季皮特村、

安齐费罗瓦等地)沿叶尼塞河往上包括叶尼塞斯克周围一直到安加拉河口都成了农业区。17世纪中叶农民开垦了叶尼塞河左边的支流凯米河及它的支流别拉亚河沿岸地区,许多村镇就出现在安加拉河口地区。

到1710年时,叶尼塞斯克县的农民和工商业者占了县里所有俄国居民的3/4还要多(也就是说,军役人员总共只占1/4)。

1630年俄国农民开始在勒拿河流域耕种土地。他们最早在布拉特城堡(在安加拉河的支流奥卡河上——作者注)和伊利姆城堡(在安加拉河的支流伊利姆河上——作者注)周围开垦荒地,也就是在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的南边的主路——深入东西伯利亚的道路附近。直接建在勒拿河上的最早的农业居民点出现在它的支流库塔河河口,然后是基廉加河口和切丘伊河(在伊尔库茨克州,勒拿河东边的支流——译者注)口,再往后是维季姆河口、别列杜伊河(在雅库特共和国,勒拿河东边的支流——译者注)口和奥廖克马河口。

17世纪后半期俄国农民已经开始从雅库茨克往东(去往阿姆加河)、从库塔河口沿勒拿河向上往南去开垦土地,这样那些地方就出现了一些带有大量远离村庄的生荒地的村镇:伊尔金镇和杜杜尔镇。这些村庄同贝加尔湖沿岸上林斯克、巴拉干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城堡、比柳尔斯克和班佐尔斯克镇所在地区的居民点连接。

根据历史学家B. И. 舒恩科夫的意见,恰恰是“林斯克区西南角这个地方在17世纪末时集中了区里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在这儿建成了雅库特的粮仓”(注52,19页)。但到了18世纪初,林斯克和贝加尔沿岸地区的农民还不占俄国居民的大多数,在人口数量上不及这个地区的军役人员。

许多普通的军役人员在住到西伯利亚最早的城堡和城市时并不特别在乎国家的薪水,因此他们在完成自己的服役任务的同时还必须务农。其结果是西伯利亚大面积的土地由军役人员和他们的家庭在经营,而不少的粮食从他们那儿流到了当地的市场。

还要看到,军役人员也积极参与各种实业活动。最终,去缴纳实物税的省份“出差”,“因公务”去莫斯科和相邻的亚洲国家旅行给了军役人员中的头儿做买卖的机会。

在西伯利亚的流刑犯中有一些农民起义和哥萨克暴动的参与者,当

局把他们称为“盗贼”。例如，1635 年就把“来自罗斯拉夫尔省斯摩棱斯克县的 3 个农民加上一个西姆比里亚杰宁人费契卡·瓦西里耶夫（他们同顿河哥萨克一起在罗斯拉夫尔和乌克兰城市进行偷盗）”派遣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这个县由于经常发生“不顺从的外国人”的袭击非常危险，不适于居住。当时还命令把也是因为在罗斯拉夫尔（在斯摩棱斯克州——译者注）同顿河哥萨克一起“盗窃”而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的戴足枷流刑犯中的 24 个派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年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哥萨克盗贼”有 21 名，其中 6 个人被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堡，安排在那儿从事耕种（注 27，61 页）。

但学者们认为，17 世纪西伯利亚流刑犯的数量与所有移民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而且与大量移民不同的是，流刑犯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历史学家 П. Н. 布津斯基 19 世纪末在分析流刑犯的民族成分时查明，根据一些显然是不充分的资料，1593—1645 年间有 1500 人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不算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各类亲戚），其中有 650 人是战俘（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契尔卡塞人”，即乌克兰人），还有大约 850 名俄国臣民（其中有约 400 名俄国人，超过 350 名乌克兰人）（注 52，29 页）。

西伯利亚耕种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主要是耕作国家的亩耕地，其数量由督军规定。按照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С. В. 巴赫鲁申的意见，这些农民“事实上处于一种农奴状态，区别仅仅在于，他们不是个体所有者的农奴，而是整个封建国家的农奴”（注 27，84 页）。

西伯利亚的私人农奴非常少，通常那儿的农奴主都是修道院，修道院的农奴耕种修道院的土地，因此可以免去给国家耕种亩耕地。的确，国家在安排新地区生产时会通过发放生产工具（马、犁、镰刀、大镰刀）、种子的方式“帮助”耕种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给予数量不大的现金。但并非所有地方这种帮助都能及时到位，许多时候督军当局故意拖延这种帮助，或者完全不提供这种帮助。

17 世纪正是从西伯利亚移民——那些富有的企业家，常常是一些富有的商人（“西伯利亚的自由居民庄主”）中涌现出一批自由居民村镇的奠基者，他们得到当局的允许在自由土地上建一些村庄，把钱借给移民以便让他们购买马、农具和种子。著名的先驱者叶罗菲·哈巴罗夫

正是这样的企业家。

巴达波夫家的耕种农民拉斯普达·斯捷潘诺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安加拉河上靠近下布拉特城堡的耕种农民中第一位“地方行政官”。用他的话说，开垦土地花掉他 300 卢布，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数目。他“收拾”（招收）了一些乐意干的人“不要国家的帮助和贷款，只凭一些优惠”去耕种。1654 年，他将被当局发送到那儿的流刑犯中的 70 名耕种农民迁入自己村庄附近。在彼得·别盖托夫和阿法纳西·巴什科夫出征阿穆尔河期间他从自己的“耕种”中拨给他们“种粮”。1658 年巴达波夫因功被授予贵族子弟的头衔并得到 10 卢布的年薪（注 39，214、215 页）。在占据西伯利亚土地时，“西伯利亚自由居民庄主”中这种成功经营的事例还可举出几个。

耕种农民除了给官府提供粮食以外还要为督军和“聚会厅”的书吏们完成准备柴草等各种杂活儿。对农民的审判由督军从军役人员中挑出担任管家的人负责。管家通常住在村里或者农民大村镇中“单独的管家院”里，他们有自己的“聚会厅”，以便把农民召集到那儿确定他们应缴纳的实物贡赋。

此外，每个村里的农民都有自己的自治制度：从他们中间选出“村社长”和“地方平民中的教堂下层职员”。为了解决所有的社会事务都要举行村社大会，在村里就像在罗斯各地一样，村社会议都在教堂举行。

从农民中还要选出“粮仓地方官”，负责保管从国家亩耕地收上的粮食并将其根据督军的要求运往城市，以及按督军公函发放。

在西伯利亚各个城市就像在罗斯各地一样，城郊工商区是这些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工商业者要纳税：货币形式的工商业代役租和因从事鱼、猎、矿所交的代役租。在工商业者耕种土地的情况下，向他们征收实物税——种出的粮食。此外，工商业者还要尽其他一些义务，在“不顺从的外国人”发动进攻时要帮助军役人员保卫城市。

工商业者居民在这样一些贸易—手工业中心，比如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茨克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但总的说来，在 17 世纪末时，他们在西伯利亚俄国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大，不超过 7%。

17 世纪在新并入的西伯利亚土地上俄国人力求马上就修建教堂。在西伯利亚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寺院，里面除开僧众还住有“储户”。这通常是些世俗之人，多数是军役人员，他们把一定数量的“钱款”存入寺院，为此而得到老年人入寺出家的权力。

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来得及给新建教堂派遣牧师。比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督军米哈伊尔·斯科里雅宾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圣母教堂和雅萨乌洛夫村的教堂一事给莫斯科写信说：“在那两处的教堂里没有神父，也没地方去请，神父不愿到这么远的边区来，两个教堂为你国王祈祷时都没有唱诗班，没有人从事……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堡和县里所有远近的村里许多人，陛下，死前都不做忏悔，产妇临产也没有念经的，婴儿出生多时还没受洗，死了都没有领洗礼。”（注 27，90、91 页）

而且这种状况存在于许多遥远的西伯利亚边区，所以政府只能自己承担僧侣们的费用。比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主要教堂——显圣大教堂，列入编制的有：两位神父、一个助祭、一名下级职员、一个圣堂工友和一个烤圣饼的女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的另外 3 个教堂：一位神父、一个下级职员、一名圣堂工友和一位烤圣饼的女人。对修道院的僧侣国家只负责院长、圣堂工友、一个下级职员和烤圣饼的女人的开支（注 27，91 页）。

西伯利亚的历史学家查明，17 世纪时大多数移民都是从罗斯北方沿海各省去往西伯利亚的。在一个世纪当中，东部北方沿海地区，包括当时的中卡马河、上卡马河和维亚特卡河地区以及昆古尔县在内，由于来自北德维纳河及它的支流以及奥涅加河和梅津河流域居民的大量涌入一下子住满了人，而农民和实业者已经从东部北方沿海地区迁到了西伯利亚。

一种名为魏尔霍图利耶县乌特金斯克镇和丘索夫斯克镇的记事本一直保留着，里面包括一些有关往西伯利亚移民的有趣资料。根据这些记事本的登记，1699 年“为了生计”经过这些镇子前往西伯利亚的有 405 名“流浪人”，其中有 250 名北方沿海居民和 127 名昆古尔人。北方沿海居民进入了西伯利亚深处。在托木斯克县，大部分 1705—1707 年到那儿的移民来自北方沿海地区——科伊戈罗多克（现属科米共和国）、索利卡姆斯克、乌斯秋格、乌斯季扬斯克省和与之相邻的省份

(沃洛格达、位于苏杭纳河岸边的托季马、伏尔加沿岸一带的尤里耶维茨、位于科斯特罗马州西部的加利奇)，其他的来自昆古尔和托博尔斯克县各个村镇。

其他西伯利亚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翻过乌拉尔山去往西伯利亚的主要是俄罗斯北方的居民（注 52，26 页）。因此 17 世纪移民西伯利亚的主要是北方沿海一带的居民，是一些不知农奴制为何物、经过气候寒冷地区的生活锻炼、善于耕种土地和在泰加森林捕捉野兽的精明和富有冒险精神的俄国人。

17 世纪移居和开发西伯利亚的结果在 1710 年西伯利亚省的统计资料中得到明显的反映。在原本西伯利亚的范围内（不包括那时并入西伯利亚省的昆古尔、叶连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切尔德尼、科伊戈罗多克和维亚特卡）居住着 312872 名俄国人，其中男性为 157040 人，女性为 155832 人，而且几乎 4/5 的俄国居民住在西西伯利亚。这样一来，在 1710 年时，俄国移民已经不低于西伯利亚居民总数的 65%—70%（注 17，55）。

## 俄国人在千岛,谁最早描述了千岛群岛?

普通的俄国人几乎总是用科学的探索开辟道路。整个西伯利亚和它的沿岸地区就是这样发现的。政府总是将人民的发现据为己有,仅此而已。堪察加和千岛群岛就是这样归并的,只是后来它们才由政府开发。

——卡尔·马克西莫维奇·拜尔院士, 1839

“堪察加的叶尔马克”、五十人长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向雅库茨克督军,然后在莫斯科向西伯利亚衙门的长官们通报了通过询问在堪察加搜集到的关于千岛群岛的情报,尽管他并没有到过那儿,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谈到过此事。

著名的俄国海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格罗夫宁 1816 年出版了一本描述千岛群岛和被日本人俘虏的书。他在书中断言,人们这样称呼千岛群岛是因为“冒烟的火山”,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按照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院士的意见,“库利尔(千岛群岛一词中前半部分的俄文发音——译者注)”是哥萨克从堪察加人那儿借用的一个词汇,堪察加人把堪察加南部的居民叫作库申(库什)或库仁。在堪察加人(伊特里门人)的语言里没有“р”这个音,因此在其他民族使用这个音的地方,他们就发“ж”。所以,哥萨克就像对其他伊特里门词汇的使用一样把库仁(кужин)改成了库利(кури)。

历史学家 Г. 米勒尔院士在 18 世纪时写道,堪察加南部的居民(库利尔人——千岛群岛上的爱奴人和伊特里门人通婚生出的后代)和伊特里门人一样把岛(指千岛群岛)上居民叫作 kuride。在库利尔人和爱奴人的语言中,库利或库鲁意味着“人”。基里亚克人(现在把他们称

作尼夫赫人)把爱奴人称作库基,而对从基里亚克人那儿得知萨哈林岛爱奴人情况的中国人和满洲人来说,他们被叫作库耶。

爱奴人自己把千岛群岛叫作库鲁米西,就是人的土地之意。这意味着群岛的名称同爱奴人关于“人”和“人的土地”的观念有联系。的确,爱奴人就是这样用在他们语言里也表示人的“爱奴”来称呼自己(看来,是在爱奴部落里一个具体的人的意义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注43,134、135页)。

爱奴人本身不仅是千岛群岛,而且是北海道和南萨哈林岛的最古老的居民。他们的特点是脸上有明显的毛发,无怪乎哥萨克叫他们毛发蓬松的人。学者们就这个古老民族的起源发生了许多争论。

著名的人类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Л.Я.施泰恩伯格提出了关于爱奴人起源于太平洋南部群岛的假说,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就身体类型来说,他写道,爱奴人是赤道附近最原始的人种之一。他们头长,留着大胡子,我们同样可以在澳大利亚、印度南部、大洋洲西部发现它的变种,而他们文化和语言的特点我们可以在大洋洲各个不同的民族中发现,特别明显的是在居住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福摩萨(台湾岛——作者注)的那些相近的民族中间。”(注43,136页)

关于爱奴人的特点,我们可以引用С.П.克拉舍宁尼科夫院士(18世纪)谈他们的近亲——库利尔人时的意见,用后来到过千岛群岛的旅行者的评价说,这个意见完全可以适用于爱奴人:“他们比其他民族谦恭得多:同时又是始终不渝的、正直的、功名心重的(无疑,诚实之谓——作者注)和温和的。他们极其敬重老人,相互之间非常友爱,对自己的亲人尤其热情。”(注43,136页)

1706年堪察加城堡总管(堪察加城堡首领)瓦西里·卡列索夫“为了安抚不顺从的外国人”派米哈伊尔·纳谢德金去往“库利尔地区”(就是堪察加半岛的最南部)。他应当向还不是俄国臣民的堪察加南部的居民——所有的库利尔人收取实物税。

纳谢德金乘狗拉雪橇到达了“鼻子”(即半岛最南部海岬)——洛帕特卡角,并证实,在“鼻子”、“闪变”(海峡)外面能看见土地,“而没有可乘工具去探访那片土地,没有海船和船舶工具,也无处可寻,因为附近没有森林,也没有地方能找到缆索和锚”(注43,137

页)。

1710年,雅库茨克督军得到在海峡那面发现土地的报告后委托派到堪察加的哥萨克组长瓦西里·萨沃斯奇雅诺夫“精心地造一些船,尽可能千方百计地弄清闪变外面海上土地和人的情况”,让他们加入国籍,向他们收实物税,并“将那片土地绘成一幅专门的地图”(注43,137)。

1711年8月,哥萨克军官达尼尔·雅科夫列夫·安齐费洛夫和哥萨克大尉伊万·彼特罗夫·克泽列夫斯基被派去考察海上看到的岛屿。他们自告奋勇、自愿参加考察团,希望减轻自己参与哥萨克暴动的罪过,期间哥萨克头领B.阿特拉索夫和两个管事被杀死。

他们乘坐小船和大兽皮艇从“鼻子”来到千岛群岛的第一个岛屿,长约30公里的占守岛。岛上的库利尔人和住在堪察加南部的民族一样。哥萨克同他们发生了冲突,根据他们的通报,“库利尔男人无畏地参与了军事行动,这是一些住在从阿纳德尔到堪察加鼻子之间的外国人中最灵巧者”。

Л.С.别尔克院士认为,安齐费洛夫和克泽列夫斯基“故事”里的这些话未必符合事实。后来许多库利尔人的描写者所证明的事实恰恰相反:当地居民爱好和平,甚至有些胆怯。哥萨克在占守岛上没有收到实物税,根据他们的报告,是因为“他们那个岛上没有貂和狐狸,没有海狸作业场和休息地,他们捕捉北欧海豹。他们穿海豹皮和鸟的羽毛做的衣服”(注40,79页)。

安齐费洛夫和克泽列夫斯基还通报了他们探访南边第二个库利尔岛幌筵岛的情况(按照爱奴人的说法,幌筵就是“大岛”的意思——作者注),说岛上有许多居民。但是那个地方,用他们的话说,实物税收得很不成功,尽管哥萨克“温和有礼貌地”号召当地的爱奴人入籍。当地居民回答说,他们从未交过实物税。“我们不捕捉貂和狐狸,他们说,在你们到来之前的1月份我们在海狸作业场捕捉的海狸已全部卖给另一块土地上的外国人了,你们可以从我们这个岛上看到这块土地,在南面。他们把铁器和其他的商品、荨麻、花布运到我们这儿,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实物税可交。”(注43,140、141页)安齐费洛夫和克泽列夫斯基,用他们的话说,在幌筵岛待了两天,他们不想在哥萨克人数处于

劣势的情况下同爱奴人发生冲突，因此就往回返。

返回勃利舍列茨克（位于堪察加半岛南部西海岸——译者注）后，他们呈递了一份图纸，可惜没有保留下来。不错，有一名叫格里高利·别列洛莫夫（参与过杀害包括阿特拉索夫在内的管事，后来又参加了对千岛群岛的征讨）的堪察加哥萨克在刑讯时供称，哥萨克只到过第一个岛。无疑，对刑讯逼供产生的口供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然而关于哥萨克探访第一个岛的事实可以说是绝对可靠的。而关于第二个岛的信息他们可能是从第一个岛上的居民那儿得来的。

1712年安齐费洛夫死在阿瓦恰河上，而堪察加城堡总管瓦西里·卡列索夫委托克泽列夫斯基测量从大河（位于堪察加半岛南部，注入鄂霍次克海——译者注）到洛帕特卡角之间的土地，以及“闪变”之外的岛屿，并且“吩咐伊万把所有这一切制成一张图纸，画上到各处的通道。”（注43，141页）

克泽列夫斯基通过详细询问（包括1710年在堪察加岸边遇难的日本船上的日本人）绘制了一幅“堪察加地区”和千岛群岛的地图——第一幅库利尔系列群岛地图。他还把在损毁船上找到的22左洛特尼克（1左洛特尼克等于4.266克）半圆木形（硬币形的）和块状的红金及所有在这些船上发现的书面文件交到了国库。

1713年夏天，克泽列夫斯基又被派出，“从堪察加鼻子去闪变外面探寻海岛和日本国”。乘坐在勃利舍列茨克制作的小船同他一起出发的有55名哥萨克和实业者以及11名堪察加人。在上堪察加城堡上面发给克泽列夫斯基两门铜炮，20颗圆弹，一些火绳枪、火药、铅弹和其他一些储备品。遇险日本轮船上的船员萨那作为“向导”（引水员）和翻译随队出发。

克泽列夫斯基声称，在第二个多山的大岛（它的长度达100公里）上，“库利尔人非常厉害，他们穿着库亚克（来自蒙古的хуяг，用木片或骨片制作的盔甲——作者注）冲锋，手持马刀和梭镖，有弓箭。”（注43，142页）哥萨克同当地居民展开激战并缴获了战利品。第三个岛仅仅“被探寻”，而哥萨克多半没有登岛。

克泽列夫斯基在堪察加向管总卡列索夫呈递了航海日记和探岛日记，以及“那些岛屿的图纸，甚至包括马特曼斯岛”即马茨麦岛或北

海道。这是最早的一批有关库利尔系列群岛地理状况的比较可信的资料,主要是依据详细询问的信息编制的。

米勒尔院士在描述千岛群岛时依据的就是克泽列夫斯基的报告。乘坐桨划的大兽皮艇可以用2—3天从洛帕特卡角到第一个岛占守岛。南部群岛的居民来到这个岛上是为了购买海狸、狐狸和做箭用的鹰羽毛。堪察加沿岸和两个北方岛屿的居民乘小船去往占守岛西边离堪察加沿岸地区80公里的阿莱德火山岛(现在的阿特拉索夫岛)是为了捕猎海狗和海豹,当时那儿有很多这种动物。

在堪察加半岛南部居民中间存在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关于阿莱德火山的传说,“仿佛上面提到的那座山原来在人们所说的那个湖(堪察加南部的库利尔斯科耶湖——作者注)中间,由于它以自己的高度夺去了其余所有山脉的光,其余的山就不停地向它发泄愤怒,同它争吵,所以阿莱德由于不得安宁被迫离去,成了大海中的孤岛,然而它留下了自己的心作为对自己曾在湖中逗留的纪念。心在库利尔语里叫乌齐齐,也叫努赫滚克,就是肚脐之意,而俄国人把它叫作石心,是一个圆锥形的物体。通往它的道路是这样—一个地方,那儿有一条奥泽尔纳亚河流过,这条河是发生上述旅行(指火山被迫离去一事——译者注)时产生的:因为当山从原地升起时,湖中的水从山后急剧流出,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往大海的道路”。(注43,148页)

第二个岛幌筵岛距离第一个岛的距离有两俄里之远。岛上的居民用荨麻织布。他们从来自南部岛屿(得抚岛)的库利尔人那儿换来丝织品和棉织品、锅、马刀和漆器。他们的武器是弓箭、梭镖和马刀,他们有盔甲。

下一个岛,按米勒尔的说法,是姆舒岛,或叫奥尼古丹岛(现在的温祢古丹岛,爱奴语的意思是“古老的乡村”)。岛上的居民——爱奴人捕猎海狸和狐狸,也到相邻的岛屿捕猎,有时航行到堪察加半岛买海狸:“许多人会说大河上的人讲的堪察加语,因为他们要同勃利舍列茨克的堪察加人做买卖和通婚。”(注43,150页)

再下一个岛是阿拉乌马古丹岛(现在的春牟古丹岛,爱奴语是“百合花村”)。库利尔人为了买卖从北边和南部汇聚到第五个岛西亚斯古丹岛(现在的舍子古丹岛),然后是一堆小岛。在基杜伊岛(现在的

计吐夷岛)上生长着芦苇,早先库利尔人用它做箭杆(显然指的是库利尔的竹子)。第十一个岛——什姆什尔岛(新知岛)上人烟稠密。接下来开列出了第十二个岛伊杜鲁普岛(择捉岛)和第十三个岛——得抚岛。米勒尔在这儿重复了一个错误——得抚岛在择捉岛的北边。

他宣称择捉岛(群岛中最大的岛,长达211公里)非常大,上面有许多居民。就语言和风俗来说,他们与北方的库利尔人不同:他们剃光头,“给人祝福时下跪”。岛上有森林,里面有狗熊,那儿有一些河流,有舒适的港湾,包括东北岸的马伊奥罗或叫狗熊湾。

按照米勒尔的意见,得抚岛上的居民同择捉岛上的居民一样。他们在国后岛买布匹,在北方岛屿中第一、第二个岛上销售。得抚岛和择捉岛上的居民通过国后岛的居民从马茨麦岛(北海道)得到了日本的丝织品、棉织品和铁器。而择捉人和得抚人则把荨麻布、皮货、干鱼和鲸油卖给日本人。

接下来米勒尔描述了国后岛,岛上的居民因同日本人贸易而致富。然后,他指出,相对于国后人来说有一点不清楚,“他们是自由民还是从属于马特麦市”,即马茨麦岛(耶佐,现在的北海道)上的函馆。他们为了买卖经常去马茨麦岛。通过克泽列夫斯基米勒尔开始了解马茨麦岛、国后岛、择捉岛和得抚岛上堪察加男女不自由的状态,即奴隶状况。

在谈到北海道时通报了岛上居住的爱奴人的情况。日本人在那儿建了一座城市马特麦(现在岛南部的福山市——作者注;疑是函馆之误,因福山在本州岛中部——译者注),把日本南部岛屿的人流放到那儿并在那儿驻有日本军队。他们正是从马特麦市把日本商品运到国后岛并在那儿用丝织品、马刀、生铁锅、漆器交换海狸和狐狸,在结尾处还通报了某些日本本土的信息。

克泽列夫斯基将在幌筵岛找到的丝绸外衣和荨麻外衣、日本马刀、3枚金币、两名人质、一个名叫沙普达诺的聪明的堪察加人(他是从择捉岛到幌筵岛经营日本商品买卖的)连同报告一起送到了总管那儿。

克泽列夫斯基搜集了最早的有关群岛土著居民——爱奴人的信息。他查明,在哥萨克到来之前,爱奴人不仅住满群岛北边的岛屿,而且遍布南部的择捉岛、得抚岛和国后岛,他们不承认任何政权的统治。

他宣称,当时日本人被禁止航行到北海道的北边,他们同库利尔系列岛屿居民的贸易只通过中间人——爱奴人来进行。这些信息鼓舞了彼得一世继续对千岛群岛考察。

伊万·克泽列夫斯基后来的命运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在同波兰战争期间被俘的波兰人,它的祖父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伊万·克泽列夫斯基成了一名哥萨克并积极参与了他们1711年在堪察加的暴动。说实在的,保留下来的他儿子的证据证实,父亲对于B.阿特拉索夫之死只有间接关系。1717年克泽列夫斯基削发为僧,取名伊格纳季。

1720年,他在官办大车店时同一个指责他杀害堪察加管事的军人发生争吵,对此伊格纳季回答说:“那些人,弑君者,他们活着被派去是为了国家的事情,而不是从事在堪察加杀害管事的伟大事业的(犯上作乱之意)。”伊格纳季因为这些言论被卫兵押送到雅库茨克,随同寄去的信中说,“通过出家人伊格纳季看出,堪察加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愤怒”。

但在雅库茨克他被开释了,甚至一度在雅库茨克修道院代替了费奥方的修士大司祭的职务。1724年,他再次因1711年堪察加暴动之事被监禁。他从监禁中逃脱后向雅库茨克督军衙门递交了一份呈文,说他知道去往日本的道路并请求为此事派他去莫斯科,但遭拒绝。

1726年他带着一份堪察加和千岛群岛的地图来到雅库茨克B.白令这儿,请求接纳他参与向日本沿岸的航行。在递交给白令的节略中,克泽列夫斯基指出了一年四季各个海峡的气候条件和各岛屿之间的距离,白令同样拒绝了他。

第二年伊格纳季参加了哥萨克首领阿法纳西·舍斯塔科夫的队伍,队伍是被派往西伯利亚东北部“寻找新土地和号召不顺从的外国人入籍的”。人们委托伊格纳季航行到勒拿河口,出海去开辟河口北面的土地。他自费(或许用修道院的钱)建造了“艾维尔斯号”轮船,并于1728年8月沿勒拿河向下航行。到达西克加赫(勒拿河上几乎在北纬70°附近的村庄)后,他就在那儿过冬。1729年1月伊格纳季返回雅库茨克,而春天“艾维尔斯号”被河中的流冰拆毁。

1730年伊格纳季来到莫斯科。根据他的呈文,枢密院划拨了当时一笔不小的数目——500卢布用于让堪察加人皈依基督教。他被任命为

修士司祭的教职并着手准备出行。1730年3月26日的《圣彼得堡新闻公报》登载了一篇介绍他在发现堪察加南边新土地事业中所建功勋的文章：“他能够提供许多有趣的信息：关于通往雅保恩（日本）的道路，应当沿岛屿的哪个方向行进，以及关于其他岛上一个边缘城市马特麦或叫马茨麦的信息。”（注43，145页）

但接着又有人告发他参与反对阿特拉索夫的暴动。伊格纳季被东正教事物总管理局判决褫夺教职和僧侣身份，在西伯利亚的文件到达之前被投入监狱，于1734年12月2日死于狱中。

鄂霍次克海西岸的鄂霍次克和堪察加之间的“海路”通畅后，沙皇彼得一世决定组织考察团，以探寻位于堪察加半岛东部和东南部的土地。

1719年，他命令在彼得堡莫斯科研究院学习的大地测量学家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叶夫列伊诺夫和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鲁仁提前通过全部学习课程的考试，率领20名军役人员组成的队伍去往远东完成他的委托：“你们去托博尔斯克，从托博尔斯克带上向导前往堪察加，然后前往指定的地方。描述一下当地的情况，美洲和亚洲在哪儿相会，应当非常仔细地描述的不仅仅是南、北和东、西，还要把一切事物完好地搬上地图。”（注29，148页）

的确，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大地测量学家还得到了口头的秘密指令。例如历史学家、航海家、海军上校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斯季勃涅夫于1869年所写的一段话，依我们看，是有说服力的。他写道，了解美洲和亚洲是否相遇的任务仅仅是为了掩盖派考察团调查库利尔并搜集通往日本的道路的详细情报的真正目的。有人推测，沙皇派大地测量学家到库利尔去是为了查明那儿有没有银矿。因为克泽列夫斯基在关于库利尔的报道中宣称，日本人正在第6个岛上开矿。

大地测量学家沿长约6000公里的路线横穿西伯利亚，完成了测量距离的任务并确定了33个点的天文坐标。1720年5月他们到达雅库茨克，而后去往鄂霍次克。1720年夏天在鄂霍次克，康德拉吉·莫什科夫船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9月他们乘坐莫什科夫驾驶的大官船前往堪察加。10天后他们在伊恰河（堪察加半岛西海岸的河流，注入鄂霍次克海——译者注）口靠岸，从那儿又转往南边的克尔巴卡瓦亚河，人

和船就在那儿过冬。

1721年5月，他们乘坐同一艘船从大河河口出发驶向库利尔。他们沿着系列群岛到达了“第6个岛”（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1738—1741年得到了比较可靠的关于他们航行的资料，他认为，这是指新知岛）。

在这个岛附近船遇到风暴，失去了锚，被吹到了第二个岛幌篷岛。在那儿人们用炮和铁砧代替锚停靠在岸边并补充了水和粮食。在升起那个不合格的锚时缆绳断裂了，然而船在6月底顺利地返回了勃利舍列茨克。在这儿准备了两个外面包上平底锅的木头锚，之后船驶向鄂霍次克。

这样一来，俄国海员首次到达包括新知岛在内的千岛群岛中部地区。大地测量学家把14个岛屿画到了地图上。叶夫列伊诺夫从雅库茨克没告诉任何人航行的目的和结果急急忙忙往西赶。1722年5月，他在喀山碰到了彼得一世，向他呈递了一份报告及西伯利亚、堪察加和仔细考察过的千岛群岛的地图。应当指出，这是俄国第一份依据借助于天文观察所测定的（对当时而言）准确纬度而绘制的地图。

1730年，哥萨克首领阿法纳西·舍斯塔科夫的儿子瓦西里·舍斯塔科夫和25名军役人员来到千岛群岛北边的5个岛，在克泽列夫斯基之后首次在那儿收取实物税并抓了两名人质。阿法纳西·舍斯塔科夫是亚洲东北部大型考察团的领导，那年春天在同楚科奇人的冲突中被打死。

科学院研究生、自然科学家斯捷列尔从白令的美洲西北岸考察团返回后，在第二次在堪察加逗留期间，造访了千岛群岛头几个岛屿。在部分依据自身观测、部分根据询问写成的书中，他描述了库利尔系列群岛。

在维杜斯·白令第二次堪察加考察（1733—1743）期间，俄国航海家成功地穿过大海沿库利尔系列群岛（千岛群岛）到达日本海岸，考察队当中的一支应当描绘了千岛群岛和从属于俄罗斯的远东海岸去往日本的道路。

去往这个方向的考察在白令的主要考察队驶向北美海岸前两年，即1738年就已开始，这种情形恰恰说明了这项任务的优先地位。

丹麦人、海军上校马尔登·彼特洛维奇·什班伯格被任命为这支队伍的首领。他从1720年起以中尉军衔开始在俄国舰队服役。1727年，还是海军大尉的什班伯格指挥“福尔图娜（古罗马幸运女神——译者注）”号小木船（北方沿海地区的一种船，按古老的工艺把甲板用皮条穿起来而制成）把白令第一次堪察加考察团的人和物资从鄂霍次克运送到了位于堪察加西岸的勃利舍列茨克。

后来，1728年他成为白令乘坐“圣·加福利尔（东正教殉教圣徒，生于1684年3月22日——译者注）号”小船在楚科奇海做历史性航行时的助手。什班伯格积极参与了白令的第二次堪察加考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带领水路和陆路商队穿越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把人员、食品、物资送到鄂霍次克，保证了远东鄂霍次克考察团船舶的建造。

在鄂霍次克为什班伯格的队伍专门建造和装备了“天使长米哈伊尔号”两桅帆船、不大的“希望号”帆桨战船以及整修过的“圣·加福利尔号”小船。这是一些不大的双桅—单桅帆桨船，长度在18.3—21.3米，宽为5.2—6.1米，吃水量在1.52—2.3米。

中尉维利姆·瓦里顿被任命为“希望号”船长，中尉阿列克谢·舍利金科指挥“圣·加福利尔号”小船，而两桅帆船由什班伯格亲自驾驶。

瓦里顿是英国侨民，1723年在俄国服役时担任过副船长，后来被派到第二次堪察加考察团担任中尉。舍利金科是荷兰人，1730年在俄国舰队任海军准尉，1733年根据个人请求被编入堪察加考察团。

1738年6月18日，三艘船在什班伯格总的指挥下从鄂霍次克出发，向堪察加驶去。乘坐“天使长米哈伊尔号”两桅帆船出航的有63名海员，其余两艘船上各有44名。在汪洋大海上他们遇到了冰块，他们必须在几天时间里绕过它们。然后起了风暴，船舶相互之间失去了联系，接下来各自向勃利舍列茨克驶去。

7月中旬，所有3条船都从勃利舍列茨克出发，沿库利尔系列群岛向南进发。由于浓雾，船舶再次相互失去联系。舍利金科落在队伍后面，返回了勃利舍列茨克。什班伯格驶过了库利尔系列群岛，一次也没有停靠峭壁重叠的海岸。他在关于航行的报告中宣称，群岛的“海岸都是石头的，悬崖非常陡，海流急速，波动剧烈，水底没有抛锚的硬

地，水太深。”（注 43，173 页）

看来，他到了被他称作奥利霍夫岛的得抚岛，绕过它后返回了勃利舍列茨克。他把千岛群岛系列岛屿画到了地图上，他列出的岛屿超过 32 个，比现在的实际数字多。什班伯格认为在“恶劣天气”航行非常危险。此外，粮食储备已近告罄。

瓦里顿和什班伯格分开后，继续沿库利尔系列群岛航行。他在地图上记下了 26 个岛屿，他几乎到达了北海道的岸边，只是在这之后才返回勃利舍列茨克。

这次航行期间又搜集到了一些新的千岛群岛的资料：绘制了几幅群岛的地图，对这些岛屿海岸的首次描述记入了军舰的航行日记，并指出了海岸附近的深度和水流。对风的记录一小时一次，对天气及其变化的总的评价一昼夜记录数次。所有这些对气候学有价值的观察资料都保存在彼得堡俄国国立海军舰队档案馆里。

在勃利舍列茨克过冬期间，什班伯格成功地用白桦木建造了一艘叫作“柳莺”的 18 桨小木船“勃利舍列茨克号”，并交付水手长助手瓦西里·艾尔特指挥。

1739 年 5 月 22 日，4 艘船组成的队伍从勃利舍列茨克出发驶向南方，几天后到达千岛群岛头前的岛屿。在这儿根据什班伯格的命令对指挥员进行了调整：瓦里顿到“圣·加福利尔号”小船上，而舍利金科到“希望号”帆桨战船。看来，队伍的首领想让瓦里顿去领导一支不太熟悉的队伍，以此限制他的独立性，因为后者不止一次试图脱离队伍，独自去寻找新土地。

后来什班伯格的船队继续向南航行，试图找到当时许多地图都标明的位于堪察加东南海上的假想中的土地——华纳·捷·伽马（仿佛是半传说中保加利亚航海家发现的假设中的土地，位于日本东北部，北纬 44—45° 之间——译者注）。继续往南航行时并没有发现这块土地，什班伯格拐向了西南日本沿岸地区。

1739 年 6 月 16 日，在接近日本海岸时，瓦里顿多半是故意落在了后面，而什班伯格的队伍靠近了岸边并贴着海岸往南行驶。途中俄国海员遇到了许多不大的日本船只。海员们从两桅帆船的船舷上眺望海岸，看到了一些被种满了庄稼的土地所环绕的大村庄和稀疏的森林。一个礼

拜后什班伯格的船队才在离岸边一俄里之处下锚。

“当时，维杜斯·白令在关于什班伯格船队活动的报告中写道，一些渔民从那些日本海岸乘小船驶近他，什班伯格，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他的，什班伯格他们的船上，给他们送来了比目鱼和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鱼。”附近村庄的居民运来了“索洛钦黄米（据俄国人所知，这种叫法的东西就是稻米——作者注），腌黄瓜和大个儿的小洋萝卜，烟叶和其他的蔬菜。”海员们“以各种友好的态度”接受了“所需要的东西”。日本人很乐意接受回赠的礼品，感激地“用手将它们按在胸前”。后来，“一些有头脸的人”访问了双桅帆船，人们向他们赠送了金币（注57，180页）。

就这样，交给什班伯格的主要任务就顺利地完成了：开辟了一条从堪察加海岸沿库利尔系列群岛去往日本沿岸的道路，并且还确定了整个群岛系列的长度。

在返程途中船队经过了色丹岛和择捉岛的南岸。在色丹岛人们发现了一个方便的海湾，进入海湾后，海员们在岸边用大桶装满了淡水。“勃利舍列茨克号”小船在这儿离开了船队。什班伯格和舍利金科从这些岛屿拐向西方，在南千岛群岛的其他一些岛屿靠岸，包括国后岛，在那儿从爱奴人——土著居民嘴里成功地获取了许多新的邻近土地的情报。

说实在的，在北千岛群岛找的库利尔人翻译不完全明白南库利尔人的话：“我们对他们的语言，他写道，不是非常明白。”什班伯格这样描述南部库利尔人：他们“作为一个库利尔民族是相似的，穿着长长的外衣，没有裤子，赤脚，他们的衣服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布头缝制的，腿上和全身长满了毛，他们留着椭圆形的黑色大胡子，而某些老年人无论胡子，也不论身上的毛都是白的，有些人戴着银耳环。他们的船同我们库利尔人的船一样是大兽皮艇，有些居民的语言同库利尔语相近”。米勒尔对此补充说，岛上居民看到船上的活公鸡后跪倒在地，“将紧握的双手高举过头顶对公鸡一躬到地，如同得到礼物时所做的那样”（注43，178页）。

然后两桅帆船和帆桨战船再次驶向北海道，但海员们没有靠岸，因为此前船上有许多人病倒了。什班伯格决定返回鄂霍次克。在去往堪察

加的路上,他特意穿越那些按照当时的地图应当有一个大岛什达多夫(位于新大陆东南端,是麦哲伦群岛最东边最后一个点——译者注)的地方,但他什么也没发现。按当代历史学家的意见,在(17世纪时被荷兰人发现的)什达多夫岛的位置上实际是择捉岛和国后岛,它们在地图上的方位完全不正确。航行期间,两桅帆船上因坏血病死去了13名海员。

在返回的路上同什班伯格分手后,“希望号”帆桨战船在舍利金科指挥下独自返回了勃利舍列茨克。在接近勃利舍列茨克时遇到了风暴,船几乎被抛到岸上。第二天舍利金科最终成功地驶进了大河河口。出航期间“希望号”上有几名船员死亡,有许多人生病。

不久,“希望号”从勃利舍列茨克出发,驶向鄂霍次克,但被风暴抛到了南方。两天后,当风暴平息时,“希望号”再次驶近鄂霍次克,但又一次被风暴顶回来。这样过了两个礼拜,一切都在重复。饱受折磨的船员被迫返回堪察加,只是到了第二年船才来到鄂霍次克。

瓦里顿乘“圣·加福利尔号”小船也到达了日本海岸并在阿姆祖姆拉(本州岛)附近的村庄下锚。为了补充淡水储备,副船长列夫·克基蔑洛夫在军需官切尔卡舍宁和6名持枪海员陪同下上了岸。日本人殷勤地迎接了他们,用葡萄酒、蔬菜、烟草、米饭款待客人。日本人从搬运艇上卸下两个空桶,装满了水后又送回到小艇上。

瓦里顿返回时走的那条路线比什班伯格的船队去往日本海岸走的路线还要往南。看来,瓦里顿还是不想放弃发现捷·伽马土地的希望。

彼得堡当局对什班伯格船队1738—1739年航海的结果很满意。在得到白令和什班伯格的报告后,内阁发布的命令草案指出:“我们非常高兴,从上述报告看出,你们在第二次旅行中不仅看到了许多日本岛屿,而且靠近了日本国的岸边,有幸看到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船只,肇始了与他们的友好交往并顺利从那儿返回。”(注57,259页)

1741年在鄂霍次克为什班伯格的队伍建造了“圣·约翰号”邮轮,还修复了“天使长米哈伊尔号”两桅帆船、不大的“希望号”帆桨战船和“勃利舍列茨克号”小船,从彼得堡专门派了两个懂日语的科学院学生为什班伯格服务。

1741年9月,什班伯格的全部四条船从鄂霍次克出发前往勃利舍

列茨克。第二年5月底什班伯格指挥下的“圣·约翰号”邮船、舍利金科指挥下的“天使长米哈伊尔号”两桅帆船、副船长瓦西里·尔季谢夫指挥下的不大的“希望号”帆浆战船和水手长助手尼基福尔·科金指挥下的“勃利舍列茨克号”小船驶向南方的大海。在千岛群岛头几个岛上他们从当地居民中抓了两个翻译到船上。起了大雾，船只相互失去了联系。几天后雾散去时，邮船附近只有“勃利舍列茨克号”了。然而经过几周的航行，它也从视线中消失了。

什班伯格往南航行了很远，但他的船被发现漏水，他只好返航。在千岛群岛北边头几个岛屿附近船队再次相遇，什班伯格带着除了“希望号”以外的所有船只驶往勃利舍列茨克，而后返回鄂霍次克。

按照什班伯格的看法，只有处在最佳技术状态下的“希望号”在继续它的考察。被任命为帆浆战船指挥的舍利金科乘船沿库利尔系列群岛向西南方航行并驶近萨哈林岛。然后他沿岛的东岸向南驶去几乎到达把萨哈林和北海道分开的宗谷海峡（拉彼鲁兹海峡）。由于雾和大风，舍利金科对萨哈林东岸的考察完全流于形式，他将萨哈林东岸同地图上所谓的耶佐领土（北海道）混为一谈了。然后“希望号”掉头向北，返回了鄂霍次克。

什班伯格的船队就这样结束了调查千岛群岛和探索从堪察加去往日本的道路的活动。根据著名海洋学家和研究地理考察的历史学家、教授、海军少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祖博夫的评价，“什班伯格和瓦里顿 1738—1739 年航海的结果就是绘制了千岛群岛的地图，从地理学的观点看，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注 34，94 页）。

俄国航海家完成了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开辟了从堪察加沿库利尔系列群岛到日本的道路；第一次把从洛帕特卡角到北海道之间整个千岛群岛、鄂霍次克海西部沿岸地区（包括萨哈林岛东部沿岸和日本北部部分地区在内）绘到了地图上，虽然不准确，有的地方不可信；证实了从日本列岛往东没有任何陆地，也就是说捷·伽马领土不存在，而在许多西欧地理学家的地图上标出的什达多夫岛和相邻地区不是别的，而是千岛群岛的两个大岛。

在绘制 1745 年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的地图集中《俄罗斯帝国全图》东部地区时，什班伯格和瓦里顿的地图派上了用场，再就是绘制地图集

中反映千岛群岛、日本部分、堪察加南部、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时也用了他们的地图(注43,182页)。

俄国航海家是乘坐在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年轻的远东前哨建造的船舶、付出了损失和巨大的生命的代价而完成所有这些发现的。要知道马尔登·彼特洛维奇·什班伯格船队的远征是俄国海员出征辽阔大海中最早的一批。

这些海上远征对于发展地理科学贡献很多,对于19世纪初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包括借助于天文钟比18世纪前半期海员们更加准确地确定地理目标的经度)对千岛群岛进行调查准备了条件。

但这已经是俄国地理考察史上崭新的一页,它同19世纪初俄国海员在国内著名的航海家伊万·费多洛维奇·克鲁捷施泰因和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格罗夫宁领导下所进行的最早的环球航行紧密相连。

整个17世纪俄国人都利用库利尔的作业场和开发千岛群岛。直到那个世纪40年代实物税的收取都没有超出最北边的两个岛。40年代时税务官深入到了志林古丹岛(舍子古丹岛对面),部分当地居民因此航行去了南边的岛屿。为了让他们返回,1750年把在第一个岛上住过的部落酋长(海军军士)尼古拉·斯多洛热夫派了去。他到了更南边的岛屿,直到新知岛,但没能让逃跑的库利尔人返回。

1755年,他向勃利舍列茨克当局递交了一份报告,里面谈到了宇志和群岛(位于千岛群岛中部,由两个岛组成——译者注)的居民:“有25个库利尔人,天生的毛发蓬松,为了美观,用黑颜料涂在嘴和手脚上,他们穿鸟皮做的日本大褂,生活中并不常见。他们的语言同附近人的语言不一样,所以没有翻译不好理解。对来客非常和善,人们出大价买鹰尾。他们的主人是部落酋长,人们给予他荣誉并听命于他,他住在第21个岛上(据Л.С.米勒尔院士推测,这儿说的是择捉岛——作者注)。经劝说,他们中10个人同意缴纳实物税。”(注43,153页)新知岛的部落酋长赠给斯多洛热夫一把带刀鞘的马刀,这在爱奴人那儿意味着最高的荣誉,是永久友谊的标识,但没能说服他接受俄国国籍。

西伯利亚省长索伊莫诺夫于1761年委托阿纳德尔、鄂霍次克和堪察加城堡首领普列尼斯涅尔上校搜集更加详细的南千岛群岛的情报。为此1766年把第二个岛上的酋长尼基塔·奇金和哥萨克百人长伊万·切

尔内伊从勃利舍列茨克派到那儿去，命令他们“劝说库利尔人人入籍，同时在做这样时不仅不能有野蛮的行为和露出凶恶的迹象，而且要嘘寒问暖，以理服人。”（注 43，154 页）

奇金死于新知岛，因此从 1767 年起切尔内伊成为俄国政权在群岛上的唯一高级代表。1767—1768 年他在新知岛过冬时强迫当地居民为其干活并无情地惩罚有过错的人。夏天他到达择捉岛并迫使所有当地爱奴人、甚至还有两个来自国后岛的人入籍。择捉岛的酋长告诉他，国后岛上有日本人建造的要塞。切尔内伊移居到了得抚岛，从事捕捉海狸的工作并继续盘剥当地爱奴人。

1769 年切尔内伊返回勃利舍列茨克并递交了一份关于自己出航的报告。按 Л. С. 别尔克院士的意见，他在报告中详细地、非常有条理地描述了群岛的情形。库利尔系列群岛当时极小的人口密度令人吃惊。例如切尔内伊在 19 个岛（包括择捉岛）上只成功地使 83 个成年“爱奴男人”入了籍。有趣的是，切尔内伊所有的罪行，包括对爱奴人的态度都为俄国当局知晓。随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只是由于他在伊尔库茨克因天花死亡，审讯才终止。

百人长切尔内伊的暴行致使爱奴人于 1771 年起而反抗，在择捉岛杀死许多俄国人。库利尔人夜间偷走了俄国人的武器，随后向手无寸铁者发起攻击，他们还使用了毒箭。

1777 年 9 月“娜达莉亚号”两桅帆船从鄂霍次克驶向得抚岛，船上有作为翻译出行的伊尔库茨克工商业者沙巴林。第二年 5 月沙巴林和 3 艘两桅帆船到达择捉岛。他在那儿同当地爱奴人酋长的会见令人惊奇：“起初他们为了表明友谊，手握出鞘的马刀和梭镖，在小船上喊叫。作为回应，岸上陪伴沙巴林的人中一些毛发蓬松者拿着梭镖沿海岸行走，双脚不时地往上蹦跳，用一种怪诞的类似野兽的声音异样地喊叫和跳跃。而他们的女性，32 个人，走在他们后面，也用这样细的声音喊叫。”而后，所有的人——新来的和岸上的——合为一群，拿着出鞘的武器开始跳跃，然后酋长们轮流走近翻译，把马刀举到他的头上。俄国人起初认为，爱奴人要对他们发动进攻，但后来误会消除了。看来，所描述的欢迎附近另外的旅行者的仪式植根于古代迎接其他部落代表的风俗（注 43，155 页）。

沙巴林从择捉岛前往北海道。途中,看来是在国后岛,他从爱奴人那儿弄清了他们同日本人贸易的性质。爱奴人从日本人那儿得到斧头、马刀和棕櫚(宽刀),以及外衣——大褂。沙巴林宣称,爱奴人用树的内皮织成粗糙的布,他们用弓和箭,箭头沾上了有毒的“毛茛”液体。他们穿着用小木块制成的木质盔甲(“库亚克”),戴着木制的头盔,建有小型要塞,吃鱼和从日本运来的米。爱奴人还告诉他,从国后岛北边往对面看有一块土地,上面住的人与爱奴人同源。这儿说的是萨哈林岛,日语叫桦太,爱奴语叫卡罗斯卡。

1799年沙皇政府授权俄—美公司在更广阔的区域——太平洋北部岛屿和阿拉斯加进行实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因此库利尔系列群岛实业的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已经同该公司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了。

## 参考书目

1. 约翰·贝克尔：《地理发现和研究史》，莫斯科：国家外国文献出版社 1950 年版。
2. Н. И. 尼基金：《17 世纪西伯利亚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 Б. О. 多尔基赫：《17 世纪西伯利亚民族的氏族和部落构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4. Б. А. 雷巴科夫：《12—13 世纪的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公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5. Л. Г. 卡马宁：《西伯利亚和远东》（苏维埃亚洲的发现和和研究史汇编），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9 年版。
6. С. В. 巴赫鲁申：《16—17 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纲》，《科学著作》第三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
7. В. В. 马夫罗金：《俄罗斯极地航海家》（从古代到 16 世纪），列宁格勒：全俄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1955 年。
8. 《西伯利亚史》，多人合著，第一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9. И. П. 马基多维奇、В. И. 马基多维奇：《地理发现史纲要》第一卷，莫斯科：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
10. М. И. 别洛夫：《北方海路的开辟和控制》第一卷，莫斯科：海运出版社 1956 年版。
11. А. П. 奥柯拉德尼科夫：《发现西伯利亚》，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79 年版。
12. Р. Г. 斯科雷尼果夫：《遥远的时代》（伊凡雷帝、鲍里斯·戈都诺夫、

- 叶尔马克的西伯利亚历险), 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出版社 1989 年版。
13. М. И. 别洛夫: 《追随极地考察团的踪迹》, 列宁格勒: 水文气象出版社 1977 年版。
  14. М. И. 别洛夫: 《边远的北方和北方的海路》(苏维埃亚洲的发现和  
研究史汇编), 莫斯科: 思想出版社 1969 年版。
  15. 《С. М. 索罗维约夫全集》第三册, 第 5—6 卷《古代俄罗斯历史》, 莫斯科: 思想出版社 1989 年版。
  16. К. Ф. 雷列耶夫: 《随想》, 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出版社 1984 年版。
  17. 《西伯利亚史》, 多人合著, 第二卷, 列宁格勒: 科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18. И. П. 马基多维奇、В. И. 马基多维奇: 《地理发现史纲要》第二  
卷, 莫斯科: 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19. С. В. 巴赫鲁申: 《17 世纪托博尔斯克吏部的督军》, 《科学著作》  
第三卷, 莫斯科: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
  20. Л. Н. 普什加列夫: 《尤里·克里扎尼奇》, 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21. М. И. 别洛夫: 《“金子般沸腾的”曼加杰亚考古挖掘》, 列宁格勒:  
苏联地理协会出版社 1970 年版。
  22. 《俄罗斯历史丛书》第二卷, 圣彼得堡, 1875 年。
  23. М. И. 别洛夫、В. Ф. 奥夫向尼科夫、В. Ф. 斯达尔科夫: 《曼加杰亚》,  
《曼加杰亚海路》第一卷, 列宁格勒: 水文气象出版社 1980 年版。
  24. 文件汇编: 《17 世纪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和极地航海家的发现》,  
莫斯科: 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 1951 年版。
  25. С. В. 巴赫鲁申: 《17 世纪曼加杰亚的米尔村社》, 《科学著作》第  
三卷, 莫斯科: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
  26. М. И. 别洛夫、В. Ф. 奥夫向尼科夫、В. Ф. 斯达尔科夫: 《曼加杰  
亚》, 《16—17 世纪俄罗斯极地航海家和新土地发现者的资料文献》,  
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7. С. В. 巴赫鲁申: 《17 世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历史纲要》, 《科学著  
作》第四卷, 莫斯科: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9 年版。
  28. Д. М. 列别杰夫: 《17 世纪的俄罗斯地理》, 莫斯科—列宁格勒: 苏

- 联科学院出版社 1949 年版。
29. А. В. 叶费莫夫：《伟大的俄罗斯地理发现之一瞥》，莫斯科：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 1950 年版。
  30. И. М. 扎别林：《消失的会见》，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6 年版。
  31. 文件汇编：《北冰洋和太平洋的俄罗斯航海家》，莫斯科—列宁格勒：北方主要海路出版社 1952 年版。
  32. Н. А. 谢维林：《国内探险者和研究者》，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国家教育师范出版社 1956 年版。
  33. Б. П. 波列沃伊：《俄罗斯的美洲前史》（俄罗斯对美洲西北海岸产生兴趣的开始），载《俄罗斯的美洲史》（多人合著）第一卷，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 1997 年版。
  34. Н. Н. 祖波夫：《国内的航海家—海洋研究者》，莫斯科：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 1954 年版。
  35.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堪察加大地素描》，莫斯科—列宁格勒：北方主要海路出版社 1949 年版。
  36. Л. М. 杰明：《谢苗·杰日尼奥夫》，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37. Д. Т. 沃苏尔：《尼古拉·加福利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巴伐里》，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80 年版。
  38. С. В. 巴赫鲁申：《安德烈·费奥多洛维奇·巴利岑》，《科学著作》第三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
  39. С. В. 巴赫鲁申：《西伯利亚的小城镇》，《科学著作》第三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
  40. И. П. 马基多维奇、В. И. 马基多维奇：《地理发现史纲要》第三卷，莫斯科：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41. 摘引自 Г. Ф. 米勒尔教授的文章《有关从勒拿河口出发寻找东方国家的北方海路的通报》，载 А. В. 叶费莫夫《伟大的俄罗斯地理发现之一瞥》附刊，莫斯科：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 1950 年版。
  42. Д. М. 列别杰夫：《彼得时代的俄罗斯地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0 年版。
  43. Л. С. 别尔克：《堪察加的发现和白令的考察》，莫斯科—列宁格勒：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46 年版。

44. Н. П. 扎果斯金：《彼得一世之前俄罗斯的水路和航运事业》，喀山，1910 年。
45. В. Г. 卡斯普京：《贝加尔》，载《地方志文选·祖国》，莫斯科：职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46. С. В. 巴赫鲁申：《16—17 世纪的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科学著作》第一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9 年版。
47. Л. А. 格里津别尔克：《谢苗·乌利扬诺维奇·列缅佐夫》，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65 年版。
48. 《俄罗斯帝国 1649 年后的法律大全》第三卷，圣彼得堡，1832 年。
49. 托博尔斯克贵族子弟谢苗·列缅佐夫 1701 年编纂的《西伯利亚地图册》附录，圣彼得堡，1882 年。
50. А. Ф. 米金多尔夫：《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纪行》第一卷第一分册，圣彼得堡，1860 年。
51. Л. С. 别尔克：《最早的堪察加地图》，载《全苏地理协会通报》第七十五卷第四分册，莫斯科，1943 年。
52. 多人合著：《西伯利亚的俄国老住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53. Г. И. 涅维尔斯科伊：《1849—1855 俄罗斯边远的东部地区俄国海军军官的功勋》，莫斯科：国家出版社联合公司地理文献部，1947 年。
54. Э. Б. 瓦杰茨卡雅：《古代陵墓的故事》，诺沃西比尔斯克：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55. Н. Я. 比丘林：《古代中亚细亚民族资料汇编》第一卷，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0 年版。
56. В. Е. 拉伊科夫：《卡尔·拜尔的生平和创作》，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61 年版。（卡尔·拜尔：1792—1876，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57. 《白令的考察》，文件汇编，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总局 1961 年版。
58. А. П. 杰列文科：《寻找“金角”鹿》，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 1980 年版。

## 译 后 记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这部学术专著终于脱稿。这首先要感谢郭沂纹女士和本部书稿的编辑校对人员，没有他们的慧眼和付出，不可能有今天这部书的问世。

俄国哥萨克东扩史是中俄两国史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米·伊·齐保鲁哈的这部书又是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将其译成中文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正是抱着这种目的，本人在好友靳大成先生的怂恿和金惠敏先生的鼓励下斗胆揽下了这一“工程”。但当开译之后，发现难度之大完全超出自己的想象，甚至可以说是自己力不能胜任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勉为其难。这首先是书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需要查找各种资料；其次是古俄语的翻译，书中所引用的当事人的谈话、书籍等有许多是古俄语，而古俄语的词形、语法与现代俄语不一样，且没有一本可用的古俄语词典，只能在参照俄文网站所提供的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上下文和事件、叙述的逻辑定稿；再就是作者在引用中国古籍中的段落时，对地名和人名的音译往往造成极大的混乱，必需查找原文的出处。幸运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和提示下，经过本人的不解努力，这些问题被逐一解决，障碍被一一克服。现在终于可以拿出一本对得起读者和自己的良心的译著了。当然，百密一疏，限于自己的俄语水平和知识面，肯定会有不尽人意之处。在此诚恳请教于国内专家、学者，望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激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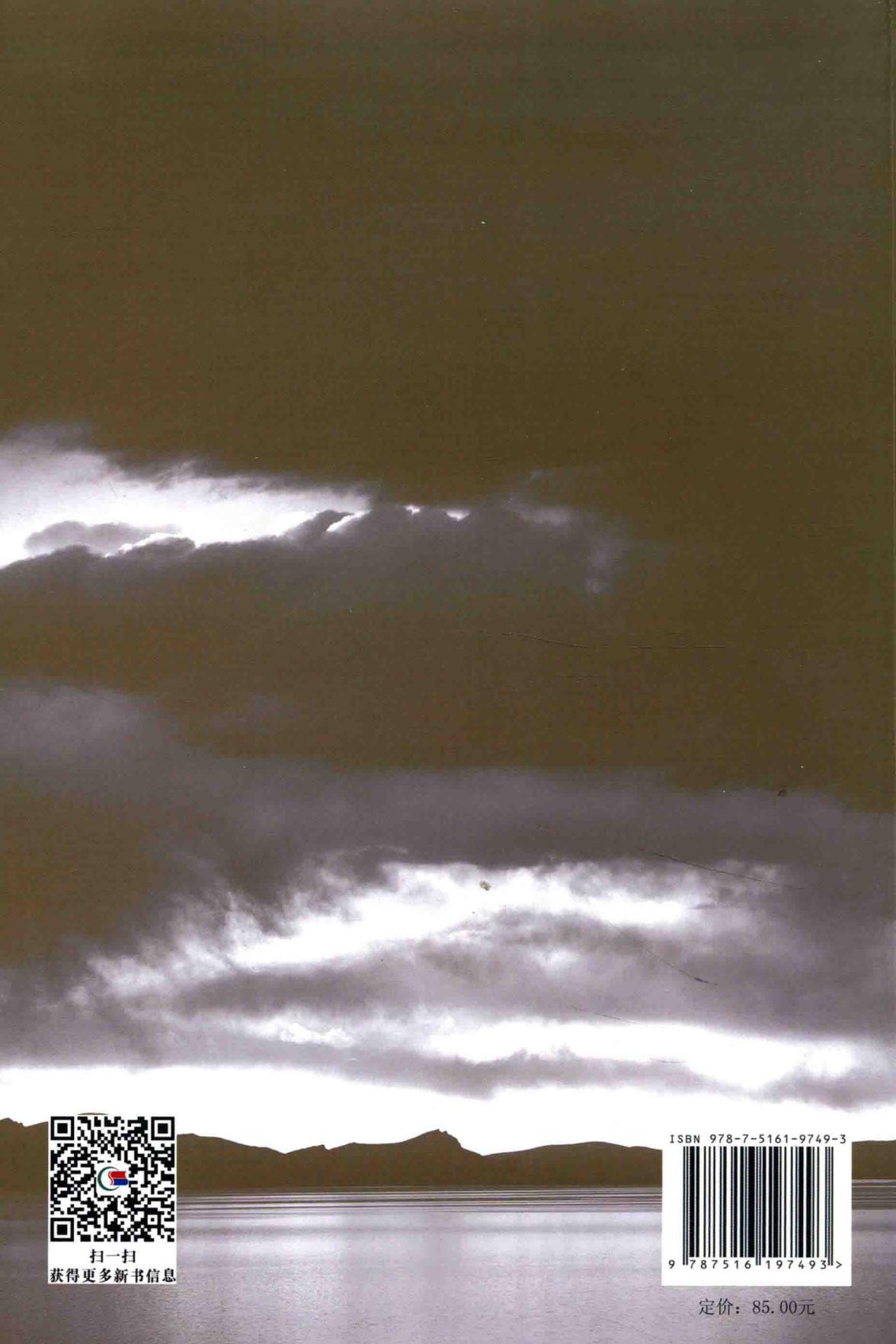
当卸下本书的翻译这付担子时，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翻译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一种再创造，需要极大的毅力，这种考验既是残酷的，

也是甜蜜的；有一种进步的喜悦，终于迈进了翻译这一神圣的殿堂。

最后，再次向出版社致以深切的谢意！是你们的决策和帮助成就了这本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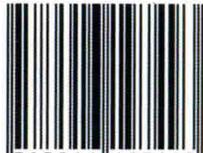
杨海明

2015年11月20日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161-9749-3



9 787516 197493 >

定价：8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

作者=(俄罗斯)齐保鲁哈著

页数=311

SS号=14216116

DX号=

出版日期=2017.06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